



周恩来选集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周恩来选集

下 卷

人民出版社

目 录

当前财经形势和新中国经济的几种关系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二十三日)1—14

国家财经计划问题2

几种关系问题7

在全国高等教育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〇年六月

八日)15—20

一 新民主主义的教育方针15

二 理论与实际一致17

三 团结与改革19

建设与团结(一九五〇年八月二十四日)21—30

为巩固和发展人民的胜利而奋斗(一九五〇年

九月三十日)31—49

人民解放战争的大胜利31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政策34

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和准备土地改革工作37

统一财政和恢复经济42

培养干部和提高文化47

抗美援朝,保卫和平(一九五〇年十月二十四日)50—54

切实执行婚姻法,保护妇女合法权益

(一九五一年九月二十六日)55—58

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一九五一年九月二十九日）	59—71
一 立场问题	61
二 态度问题	68
加强老根据地的工作（一九五一年——一九五二年）	72—80
一 下山不忘山，进城不忘乡（一九五一年十月九日）	72
二 大力扶植老根据地的经济和文化建设（一九五二年一月二十八日）	76
“三反”运动与民族资产阶级（一九五二年一月五日）	81—84
我们的外交方针和任务（一九五二年四月三十日）	85—92
关于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问题（一九五二年六月十九日）	93—103
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一九五三年九月八日）	104—117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118
增强党的团结，反对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一九五四年二月十日）	119—128
为祖国锻炼身体（一九五四年二月二十一日）	129—131
把我国建设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工业国家（一九五四年九月二十三日）	132—145
在亚非会议全体会议上的发言（一九五五年四月十九日）	146—157
主要发言	146
补充发言	153
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一九五六年一月十四日）	158—189
经济工作要实事求是（一九五六年二月八日）	190—191

关于昆曲《十五贯》的两次讲话(一九五六年 四月、五月)	192—199
四月十九日的讲话	192
五月十七日的讲话	194
台湾的解放一定能够实现(一九五六年六月 二十八日)	200—203
专政要继续, 民主要扩大(一九五六年七月 二十一日)	204—210
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执行情况和第二个五年计划 的基本任务(一九五六年九月十六日)	211—228
经济建设的几个方针性问题(一九五六年十一月 十日)	229—238
关于中缅边界问题的报告(一九五七年七月九日)	239—246
关于我国民族政策的几个问题(一九五七年 八月四日)	247—271
一 关于反对两种民族主义的问题	247
二 关于民族区域自治的问题	253
三 关于民族繁荣和社会改革的问题	261
四 关于民族自治权利和民族化的问题	268
给程砚秋的信(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三日)	272
进一步提高军队的政治素养(一九五七年十二 月二十四日)	273—279
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一九五八年一月十日)	280—294
把知识和经验留给后代(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九日)	295—299

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一九六〇年七月十四日、十五日)	300—312
加强调查研究(一九六一年三月、五月)	313—315
调查研究, 实事求是(一九六一年三月十九日)	313
关于食堂和评工记分等问题的调查(一九六一年五月七日)	314
接见嵯峨浩、溥杰、溥仪等人的谈话(一九六一年六月十日)	316—322
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一年六月十九日)	323—348
引言	323
一 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问题	328
二 阶级斗争与统一战线问题	331
三 为谁服务的问题	336
四 文艺规律问题	340
五 遗产与创造问题	343
六 领导问题	344
七 话剧问题	346
说真话, 鼓真劲, 办实事, 收实效(一九六二年二月三日)	349—352
论知识分子问题(一九六二年三月二日)	353—369
一 知识分子的定义和地位	353
二 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发展过程	355
三 如何团结知识分子	364
四 知识分子自我改造	367

国民经济的调整工作和当前任务（一九六二年 三月二十八日）	370—387
我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新发展（一九六二年 四月十八日）	388—402
认清形势 掌握主动（一九六二年五月十一日）	403—411
建成社会主义强国，关键在于实现科学技术 现代化（一九六三年一月二十九日）	412—416
学习雷锋（一九六三年三月六日）	417
反对官僚主义（一九六三年五月二十九日）	418—422
过好“五关”（一九六三年五月二十九日）	423—428
对外经济技术援助的八项原则（一九六四年 一月十五日）	429—430
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一九六四年十月 十七日）	431—432
在治理黄河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四年十二月 十八日）	433—438
发展国民经济的主要任务（一九六四年十二月 二十一日）	439—442
农村卫生工作和计划生育问题（一九六五年 十一月一日）	443—445
植树造林是百年大计（一九六六年二月二十三日）	446—447
发展生产，重建家园（一九六六年三月十日）	448—449
关于保护干部的若干文电 （一九六六年——一九七四年）	450—457
一份应予保护的干部名单（一九六六年八月三十日）	450

应当尊重宋庆龄（一九六六年九月一日）	451
不应改变被批斗干部的工资（一九六六年九月十八日）	452
一定要放出李葆华、李任之（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四日）	452
关于刘澜涛出狱问题给西北局的电报（一九六六年 十一月二十四日）	452
九大代表应包括王恩茂（一九六九年一月十二日）	453
建议徐海东参加九大主席团（一九六九年三月三十一日）	453
陶铸应送入医院治疗（一九六九年四月五日）	454
不要斗批民主党派的领导人（一九六九年五月四日）	454
应给华罗庚以保护（一九七〇年三月四日）	455
关于张霖之死亡问题（一九七〇年七月三十一日）	455
废除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十八日）	456
对参加国庆招待会名单的意见（一九七四年 九月二十九日）	457
关于经济工作的几则文电（一九六六年—— 一九七三年）	458—466
工人请愿不要妨碍生产（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458
藏富于民（一九六七年五月三日）	459
不许中断铁路轮船交通（一九六七年五月三十一日）	460
联合起来，保护海港运输（一九六七年十月二日）	460
制止武斗措施（一九六八年）	461
合理的规章制度应该保留（一九六九年四月十二日）	462
要把质量问题放在议事日程来解决（一九七一年 十二月十五日、一九七二年一月二十一日）	463
消除林彪一伙对经济的破坏性后果（一九七三年 二月二十六日）	463
农业生产要注意防涝抗旱（一九七三年五月十四日）	466

恢复文教科技部门的正常工作（一九七〇年——	
一九七三年）	467—474
不要因人废文（一九七〇年九月十七日）	467
关于外语教学的谈话（一九七〇年十一月二十日）	468
讲历史，多出书（一九七一年四月十二日）	470
极左思潮破坏艺术质量的提高（一九七二年四月九日）	471
加强气象工作（一九七二年七月三十日）	472
重视基础科学和理论研究（一九七二年九月十一日）	473
中学毕业生可以直接上大学（一九七二年十月十四日）	473
要学外国的长处（一九七三年二月二十六日）	474
中美友好来往的大门终于打开了（一九七二年二月	
二十一日）	475—476
中日两国人民应该世代友好下去（一九七二年	
九月二十五日）	477—478
向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前进（一九七五年一月	
十三日）	479
注 释	480—535

当前财经形势和 新中国经济的几种关系^{*}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二十三日）

诸位同志：

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以后，各部委分别召开了全国性的会议，一方面了解情况，一方面确定今后一个时期的工作方针和计划，这是必要的。各部委工作的总的方针在《共同纲领》〔1〕中都已经规定了，可是怎样使这些方针具体化，怎样贯彻下去，就需要召开一些业务会议来解决。各部委都是草创，不可能立刻掌握全面情况，也需要通过开会或者去各地调查来了解。

诸位这次来北京开会，除了讨论本部门的业务以外，有权要求了解全面的政策，了解全国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等方面总的方针。只有这样，你们才能知道本部门的业务同总的方针怎样配合，才能有整体的观念。不然，你们业务的进行就会是孤立的、迷失方向的，成为盲目的工作。盲目不是科学的态度，不能建设新国家。我今天对同志们谈话，目的就在于使大家有个整体观念。今天要谈的是总的方面的问题。我想，

^{*} 这是对参加全国农业会议、钢铁会议、航务会议人员的讲话。

你们不仅对中央，就是在地方上，也有权要求负责同志在一定时期向你们做这样的报告。有人说，这是国家大事，要保守秘密，不能随便告诉别人。国家大事中有秘密的，也有不秘密的，在秘密的范围内也还要区别对待。我认为国家大事必须与闻，应该使每个人有与闻国家大事的习惯。也有人说，工作忙，完成工作任务就可以了，没有必要去与闻国家大事。这是旧社会里公务员办公事的态度。新中国的工作人员对自己的国家应有责任感，这样才能涌现出成千成万具有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工作人员。

按照刚才所说的要求，我下面讲两个问题。第一，国家财经计划问题。讲财经计划的目的在于给大家一个整体观念。现在，全国的工作已经开始从军事方面转向建设方面，财经计划就体现了在这种形势下政府采取的一些政策。比如，从国家财经计划中可以看出在总的安排上是军事为主还是建设为主，在生产上是工业为主还是农业为主，也可以看出政府在文教、外交等各方面的政策。第二，新中国经济的几种关系问题。处理各方面的关系问题也是工作问题。做好工作决定于处理好各种关系，看出工作的重点所在。

国家财经计划问题

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批准的一九五〇年度全国财政收支概算，是个一年的计划。为什么只订一年的计划呢？因为现在还处在战争状态中，成都附近、西藏、台湾、海南岛等地还没有解放。在这种情况下还不能制定出一个几年的计划。就是

这一年的计划也只是个大体的、不很准确的，还要在执行的过程中不断地修正，才能准确。要求一下子订出一个准确的计划是不可能的，不实际的。在中国此时此地，只能做到有个这样大体的计划，这倒是科学的，合理的。就是你们的业务计划现在也只能如此。

全国财经计划是根据什么观点、什么理由制定的呢？我提出四点来讲。

（一）承受负担。为了全国的胜利，要求人民承受必要的负担。我把这种负担叫做胜利负担。解放战争已经取得基本的胜利，只剩下成都附近以及西藏、台湾、海南岛等地尚待解放。只有这些地方解放了，才能得到完全的胜利。因此，还要有军事上的准备，不仅要有陆军的而且要有海军、空军的准备。这样，军费在财政支出上仍要占很大的比重。军队的人数也要增加。现在是四百七十万人，因为要把被我们俘虏或者改编的国民党军队包下来，估计明年最高峰会达到五百五十万人。大家知道，去年以来，特别是今年一年，被我们俘虏或者改编的国民党军队大部分都被我们包下来了。北京解放后，我们曾把几百个国民党军官遣送回家，但是绥远^{〔2〕}解放以后，又碰到了他们。现在对国民党的官兵已经再没有地方送了。假如不管他们，就会影响社会治安，所以非把他们包下来不可。武的包下来，文的也要包下来。前些时候上海实行精兵简政，裁减人员，闹得上海、南京都不安，引起了政府的注意。解决他们的吃饭问题是个重要的问题。根据他们的要求，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吃，把他们全部包下来了。这样，全国公教人员要从现在的二百万增加到三百五十万。文武加起

来，就是九百万。

靠公家吃饭的人增加到这样多，是要由人民来负担的，这是件大事。但这九百万人的吃饭问题解决了，对国家的生产建设是有利的。要告诉人民，这是胜利的负担，是推不开的。包下来的几百万人并不是没有用处的，要下决心使他们变成生产的力量。我们这样说是把握的，在抗日的时候就实行过这种方针，现在是在全国范围内开始这样做了。毛泽东同志对军队生产有个意见：首先进行农业生产和手工业生产，还可以搞工业生产、兵工生产等。我们相信，这样做，两三年后就会有很大成绩。目前，公教人员是不需要三百五十万人的。我们要进行准备，使他们除做好业务工作外还参加生产和学习，成为既适应工作需要又有劳动观点和科学知识的人，成为新中国所需要的革命的工作人员。各级政府都要做好这项工作。现在的政府工作人员太多，这些人将来不一定都在机关工作，一部分人可以转到企业中去。

（二）恢复生产。国家明年的负担很大，不抓生产是不行的。毛泽东同志说，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现在不抓生产靠什么来支援战争和巩固胜利？生产是我们新中国的基本任务。当前生产任务的重心是恢复而不是发展，当然也不排斥可能而且必要的发展。抗日战争以前全国粮食的最高年产量是二千八百亿斤，今年的产量比那时大概减少了百分之二十。明年计划增产一百亿斤，但距二千八百亿斤还很远。棉花生产的情况也是这样。整个说来，当前各方面首先需要恢复，然后再在这个基础上发展。毛泽东同志说过，三年五年来恢复，十年八年便发展。如果我们能在三五年内达到或超过战

前水平，那就很好了。农业的恢复是一切部门恢复的基础，没有饭吃，其他一切就都没有办法。轻工业的原料，输出的产品，现在绝大部分都要依靠农业。国家计划中的经费，除去军事开支和行政开支，主要的是用于恢复生产。只有生产恢复以后，才能使几百万人转到企业中去。

（三）开源节流。这虽是老生常谈，但还是有道理的。财政收入增加了，开支才有可能增加，赤字也才能减少。我们开源主要是依靠人民：一是来自农村的负担；二是来自城市的负担；三是国家企业的收入；四是预支，即借债。

先谈农村负担。过去我们的老解放区负担相当重，负担的时间也相当长，从抗日战争开始到现在，十二年来没有得到喘息的机会。目前，全国性的胜利很快就要到来了，那么是不是可以减少老解放区的负担呢？提出这个要求是合理的，但一时还不能实现。因为战争还在进行，新解放区的一切还没有组织好，土改尚未进行，税收工作也没有就绪，所以还是老解放区要负担得多一些，不能减少。我们从抗战以来的经验中研究出一个比例：农民的负担是东北高、西北低、华北适中，农村平均每人每年的收入约四百斤粮食，交给公家八十斤，按军队每人每年开支合四千斤粮食计算，每一百个农民可以负担两个公家人。如果合乎这个比例就正好，超过就困难些。按照这个比例，我们支持了十二年。将来在一个相当的时期内，农民大概还要拿出收入的百分之二十左右作为负担。这个事实也可以说明中国农民的伟大。

城市中的负担是税收。从前几乎全部负担靠农村，现在形势变了，也要靠城市，也要由工商业来负担。但开始的时候

不能把城市的负担提得很高，要比农村少一点。现在农村负担占国家财政收入的百分之四十一·四，城市负担占百分之三十八·九，而实际上许多税收如盐税、货物税、屠宰税等，很多还是要转嫁到农民身上的。要求城市在目前负担很大是不对的，但城市工作人员要说服工商业家缴纳应该缴纳的负担。

国家企业收入占财政收入百分之十七·一。

以上三种收入还不够，还会有赤字，这就要发公债。一九五〇年整个预算支出的百分之八十二是靠各种收入，百分之七靠公债，其他靠发行货币。这样就可以度过明年在胜利中出现的困难。是不是可以借外债呢？我们需要外援。友邦的援助我们是欢迎的，因为它是真诚的。但中国的建设主要应靠自力更生。

开支方面，国家财经计划的安排是节约的。

第一，在整个预算中，军事费占百分之三十八·八。陆军开支每人每年仅合四千斤粮食，总共二百一十亿斤。建设海军、空军的费用除外。

第二，行政费占百分之二十一·四。我们的行政开支是不大的，实行供给制的每人每年平均一千八百斤至二千斤粮食，实行薪金制的每人每年平均四千二百斤粮食。现在还不能把供给制改为薪金制，原来是薪金制的也不能改为供给制。两者比较，收入是不平等的，但我们不能不要求实行供给制的同志多忍耐些，政府知道他们的家庭困难，也正在设法解决一些必须解决的困难。

第三，经济建设和文教费用约占百分之三十。一是国营企业投资，二是文教建设，三是地方建设。其中第一项占百分

之二十三点九。

第四，总预备费约占百分之十，用于临时遇到的事项，如救灾等。

从预算的分配来看，开支主要的还是用于支援战争，解放全中国，其次是用于建设，恢复生产。财政支出总共不到六百亿斤粮食，这说明我们的开支是节约的，生活水平是低的。中华民族有勤劳勇敢的传统，我们党又有艰苦奋斗的革命传统，在开始建设新中国的时候，我们要求全体工作人员保持和发扬这种传统。

（四）掌握政策。我们一定要在上面说的总的方向下掌握政策，进行工作，这样才能避免各部门闹独立性。我们要重视重工业，但决不能把它当作唯一的工业。重工业中，钢铁业是占第一位的，但它也不是重工业的全部。农业方面，要水利与农业生产并重，水利要配合农业。交通方面，铁路的恢复最重要，恢复得也最快，预定今年恢复到一万八千公里，现已超额两千公里，明年可以全部恢复，并可新建一些。公路、航运等的恢复放在其次。

每个单位必须有整体观念，要在总的财经计划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认识自己的方向，有重点有计划地恢复生产和发展生产。这样才能不犯本位主义，不单纯依赖国家，并在各自的范围内做出最大的成绩。

几种关系问题

现在讲六种关系，即城乡关系、内外关系、工商关系、公私

关系、劳资关系和上下关系。

（一）城乡关系。

在中国，城乡关系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关系。一方面，中国革命要由工人阶级领导；另一方面，要使革命取得胜利，又必须依靠农民阶级和广大乡村。要彻底解放城市，必须依靠广大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组织力量，积蓄力量，发动武装斗争，以乡村包围城市，一块一块地夺取敌人的阵地，最后解放城市；反过来，再以城市领导乡村，恢复和发展生产，进行建设。对我国城乡关系的这种辩证的处理，是毛泽东同志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解决我国革命问题的一个最成功的范例。

在谁领导谁的问题上，今天我们确定了城市领导乡村、工业领导农业的方针。城市领导乡村、工业领导农业，资本主义社会就是如此，社会主义社会更是如此。从我国国民经济的构成来说，农业和手工业占百分之九十左右，现代工业占百分之十左右，乡村比重大，城市比重小，但并不能认为因此就可以取消或减弱城市领导乡村、工业领导农业的作用。城市对粮食和工业原料的需要刺激乡村的农业生产，城市以消费品和生产资料的供应保证和促进乡村的农业生产。

既然是集中的城市领导分散的乡村、工业领导农业，那么，是不是就可以不要依靠农业这个基础并从而忽视乡村呢？不能。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能取消或忽视乡村这个广大的农业基础。城市与乡村、工业与农业都是辩证的两方面，决不能取消或忽视任何一方面。我们强调城市领导乡村、工业领导农业，决不是忽视广大的农业生产对发展工业的作用。如果没有广大农业的发展，工业发展是不可能的。目前的任务首先

要恢复农业生产，然后再进一步发展农业生产。明年计划增产一百亿斤粮食，经过三五年的努力就可以恢复到年产二千八百亿斤的战前最高水平。这样就可以提高四亿农民的购买力，增加他们对工业品的需要和对工业原料的供应，也就可以在恢复和发展农业的基础上恢复和发展工业生产。今年全国棉花产量为八百多万担，明年计划增加到一千三百万担。如果没有这一千三百万担棉花，一百万纱锭就得停转。如果没有粮食，城市人民就不能生活下去。京、津、沪三地一千万人口的吃穿都要靠乡村来供应。城市离不开乡村而且要依靠乡村，工业离不开农业而且要以农业为基础。

在城乡关系问题上，必须防止两种偏向。从老解放区乡村来的干部，有一套很好的农村生产经验，懂得如何组织农业劳动，但不能因此就说农业是重心而忽视工业，否认或者忽视城市领导乡村、工业领导农业的作用。不防止与纠正这种偏向，就会发生错误。农业不能作为重心，它必须在工业的领导下才能发展。必须把城市工业组织起来发挥领导作用，才能使农业现代化、机械化。党的七届二中全会〔3〕决定，今后党的工作的重心应该转向城市，应该把主要力量放在城市，恢复与发展工业以促进农业的恢复和发展。同时，也要防止另一种偏向，就是在城市中工作的同志，不能因工业领导农业、城市领导乡村而忽视农业和乡村。中国农民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农业和手工业在国民经济构成中占百分之九十左右，工业生产要顾到农村的需要。如修铁路，首先要想到这条铁路在城乡交流、工业品与农产品的交换中所能起的作用。谁忽视了农民和农业，谁就要犯错误。

我们必须在发展农业的基础上发展工业，在工业的领导下提高农业生产的水平。没有农业基础，工业不能前进；没有工业领导，农业就无法发展。这个辩证的正确的方针是毛泽东思想在工农业关系、城乡关系上的运用。

（二）内外关系。

国家建设是以国内力量为主还是以国外援助为主？我们的回答是以国内力量为主，即自力更生为主。小国应该这样，有四亿五千万人口的大国更应该这样。毫无疑问，生产建设上要自力更生，政治上要独立自主。美帝国主义封锁我们，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困难，但我们决不能因此就向美帝国主义屈服。我们不但要经受这些困难，并且，正因为封锁和轰炸，逼迫着我们多想些办法，建设好我们的国家。一百零九年的斗争，牺牲了多少仁人志士，经过了多少挫折和失败，中国人民终于胜利了。现在这样的局面，我们是有办法对付的，要迎接困难，“多难兴邦”。

帝国主义不同我们做买卖并不可怕。过去他们侵略我们，使我国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生活过不下去了，这才闹革命。现在我们当然不能依靠他们。再说中国过去同他们做买卖并不多，抗日战争以前每年只有几亿元，抗战时期每年才不过几千万元。现在同帝国主义国家也可以在有利的条件下做买卖，对此我们不拒绝，也不强求。要打破依赖帝国主义的观念。这种观念是一百多年来形成的，在一些人中间是根深蒂固的。旧中国不但在经济方面，而且在文化教育方面也是依赖帝国主义的；不但经济上受剥削，思想上也受毒化，这是很危险的。现在要清算、消除这些毒素。不要依靠他们，也不要

怕他们，这样，自力更生的基础才会巩固。我们需要的物资大部分可以自己解决，一部分可以从朋友那里解决，决不要依靠敌人。此外，我们的物资是可以找到有利的市场的。我们明年增产一百亿斤粮食，四百多万担棉花。粮食增产了，可以增加出口，换取外汇；棉花增产了，可以减少进口，少花外汇。我们欢迎友邦在平等互助基础上的帮助。这种真正的帮助，有助于我们自力更生。

（三）工商关系。

工业和商业比较，当然是以工业为主。那么，商业占多数的城市是不是要以商业为主呢？不，也要以发展工业为主。国家方面主要是经营重工业。我们的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是以服务于工农业品的流通、服务于人民为主的，必须防止投机现象。对私人资本方面，要提倡、鼓励和帮助它发展工业生产。对私营商业，在十分必要的情况下也可以给予帮助。解放前夕，城市的生产几乎都破坏了，只剩下商业投机，这种情况要改变过来。

（四）公私关系。

新民主主义的中国，为了恢复和发展国家的经济，需要私人资本的帮助和合作。除了国营企业外，还允许私营企业的存在和发展。在《共同纲领》中写上了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公私兼顾”的方针。私人资本的问题，在我们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过程中是必须解决的。

在公私关系上应该确定以公为主。国营经济应该是领导的成分。虽然它在国家的经济构成中现在只占百分之五，但它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它的领导能够保证中国走向社会

主义。凡与国计民生有重大关系而不应该由私人操纵的企业都要归国家经营。国民党政府曾利用官僚资本垄断国家的经济。这种官僚资本不但奴役人民而且也窒息私营经济的发展，应该将它没收。但是另一方面，官僚资本垄断使得许多大的企业不断地集中，给我们的国家准备了集中的生产组织。这样，旧社会中的某些事物一旦到了人民的手中，便立刻变成了积极的力量。为了使国营经济的比重不断地增加和保证它的领导，政府把百分之二十三点九的预算支出用在国营经济上。

既然以公为主，是不是就不管私人企业了呢？不，当然要管的。现在整个工业中有一半是属于私人经营的，它对国家的经济发展是有很大帮助的。在那些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人企业遇到困难的时候，政府是会帮助它的。国营企业应该起带头作用，使私人企业对我国的生产发展有利。我们允许私人资本主义企业存在，但是要引导它不走旧资本主义的道路，而走新民主主义的道路。我们要经过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使我们的国家健全地、有步骤地、不急躁地走向社会主义。

（五）劳资关系。

这个问题在国营企业中不存在，在私人企业中则是存在的。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同志确定了“劳资两利”的方针。但这并不是把劳资两个方面平列起来。人民的国家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在劳资关系上，我们要采取保护劳动的政策，对于资方也要给予适当的利润。我们对于私人资本采取限制政策，对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人企业要鼓励它经营，对有害的则要禁止。我们对于私人资本取得利润也有两个条件：第一，不允许有非法的利润，只许可有合法的利润；第二，不能有过

分的利润，只能有合理的利润。工人不应该为了眼前的利益要求过高的工资，那样会使资方无法经营而企业倒闭，结果会弄得自己失业。我们不要为一时的利益而损害长远的利益。工人的劳动是应该实行八小时工作制的，但现在一般还得工作八个多小时到十个小时。工人的生活水准应该同中国的现有情况相适应。今天的主要问题，是先做到不失业、不饥饿。劳动条件不可能一下子变得很好，只能逐步改善。工人阶级应该用自我牺牲的精神来努力生产。我们必须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保护劳动和限制资本。

(六)上下关系。

这里说的上下关系是指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在今天的情况下，我们还不能完全做到集中和统一，但也不允许各自为政。我们实行的是民主集中制，不是封建割据。要既利于国家统一，又利于因地制宜，这是《共同纲领》中确定了的。比如钢铁生产，就要在工业投资、矿石生产和销路等方面对各产钢地区进行统一安排。棉花生产计划的制定，也得看各地的条件。航务计划也得照顾到各个方面，不要犯本位主义，不要妨害地方的积极性。毛泽东同志领导中国革命战争，在战略领导上抓得很紧，在战役的组织 and 战术的运用上就交给下面去办，因为他们最了解具体情况，只有充分发挥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才能打胜仗。打仗是这样，建设也是这样。人民的创造力是无穷的。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发挥地方的积极性，才能使各方面的工作生气勃勃，否则就死气沉沉。只有广大人民在生产中发挥了积极性和创造性，才能提高他们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水平，也才能更有效地克服官僚主义。

上述六种关系，各个部门都会遇到，尤其是生产部门。必须正确解决这六种关系，才不会犯本位主义，才能有全局观念，才能使本部门的生产在统一计划中占有适当的地位，才能使各方面的计划掌握重心，准确地加以实施。

在全国高等教育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五〇年六月八日）

听说全国高等教育会议开得很好。全国的教育专家会聚一堂，经过充分讨论做出的决定，我想一定会是合乎实际情况的。现在，我只想根据政协《共同纲领》^{〔1〕}的文教政策，对教育方面提出三个问题和大家商讨。

一 新民主主义的教育方针

《共同纲领》第一条指明了我们反对什么，主张什么。我们的新民主主义教育同整个新民主主义的纲领是一致的，都是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因此，我们在教育上就要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这项任务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欲速则不达”，如果急于求成，形式上好象肃清了，而实质上仍然存在。所以，我们在原则上一定要坚持新民主主义的教育方针，在具体步骤上则必须一步一步地求其实现。

我们主张什么呢？《共同纲领》说得很清楚，新民主主义的教育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教育。

我们的教育是大众的，是为人民服务的，这是我们教育的

方向。现在是人民的时代，我们的教育应该是有利于人民的。人民是什么？在现阶段，人民包括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这就是我们服务的对象。我们的国家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所以，我们的高等教育首先就要向工农开门，培养工农出身的新型知识分子。大家知道，过去如果不是封建地主或资产阶级的子弟，是很少有机会受大学教育的。即使在今天，大学学生的成份也还是没有什么变化。这种情况不符合我们新民主主义教育方针的要求。但是，培养工农知识分子不是一下子就能办到的，需要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需要不断地努力。特别是在工农大众过去长期受剥削压迫、文盲较多的情况下，更是一件困难的事。惟其困难，更要唤起大学教育工作者的注意。我们一定要在若干年内从劳动人民中培养出大批新型的分子。培养这些新型知识分子，并不是为排斥原有的知识分子，而是在团结改造原有知识分子的同时，增加新的血液。

我们的教育是科学的，要有科学的内容。科学是从实际中总结出来的系统知识，是客观真理。有一种说法，中国过去没有科学。这种说法是不对的。不论自然界或人类社会，任何事物的存在和发展，必然有它自己的客观规律。问题在于人们能不能科学地说明它。近代自然科学是从西方开始的。科学地说明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是从马克思开始的。但是，不能说在这以前就完全没有科学。拿中国来说，我们的国家存在了几千年，人口发展到四亿七千五百万，能够抵抗敌人的侵略，战胜各种自然灾害，这表明我们民族过去是掌握了一些客观事物的规律的，因而是有科学的。问题是我们没有很好

地去发掘它，研究它。科学理论是将实践的经验提高到理性的高度，反过来又指导实践的。劳动创造世界，科学也是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产物。我们应该以科学理论作为教育的内容。这也不是一下就可以实现的，需要有步骤有计划地去做。

我们的教育是民族的，要有民族的形式。普遍真理是各民族都适用的，但在不同的民族会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中国民族有自己的传统习惯，这些传统习惯总是以民族的形式表现出来。具有民族形式的教育，才易于被人民所接受，为人民所热爱。教育如果不注意民族的特点和形式，就行不通。我国是个多民族的国家，要注意各兄弟民族的特点和形式，兄弟民族之间也要互相学习彼此的长处，这样才能将科学的内容输送到各族人民中去，把教育办好。

二 理论与实际一致

《共同纲领》规定我们的教育要采取理论与实际一致的方法。我想把这个问题展开讲一讲。理论是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又对实践加以指导。我们不能把理论当作教条，如果不顾实际情况，把理论拿来乱套一阵，总是要失败的。同时，实际工作要有理论的指导，才不会盲目乱撞。没有理论指导而盲目乱撞，虽然也会在失败中摸索出一些道理，但是太痛苦了。我们的教育不应该犯脱离实际的教条主义错误，也不应该陷入没有理论指导的经验主义错误中去，这样才能使青年少走弯路，少碰钉子。这是教育者的责任。

理论有深有浅。深和浅二者不是对立的，是有联系的。理

论要由浅入深地不断发展。一个没有文化的人，也会有些知识，也会有些粗浅的理论。比如农民，虽然缺乏系统的科学知识，却懂得生产，有些抵抗天灾的办法，可见他们也掌握一些粗浅的原理原则。不过，还需要深造。我们不能否认深造的必要，否认是不对的。

对学校教育中实践应该多些或者少些的问题，看法不尽一致，有的人主张多一些，有的人主张少一些。为了速成，实践少一些是可以的，但是为了更好地掌握理论，还是要多去实践。学习理论需要反复实践，才能掌握得更准确，领会得更深刻。所以，忽视实践的一面，或者把实践和理论对立起来，都是不对的。

我们的大学是要学习理论的，但是我们所要学习的是经过实践检验了的理论，目的是要用它进一步指导实践，更好地为人民服务。这样才能合乎实际工作的需要。那些认为大学不需要学比较高深理论的看法是不对的。全国高等学校都要重视实践，都要提高理论水平。

旧中国的高等教育大多是理论与实际脱节的。今天，如果说我们的大学理论与实际已经完全一致了，那也不符合事实。在座的专家都知道，我们高等学校的教学方法，就有很多是理论与实际脱节的，有许多地方需要改革。怎样使理论与实际联系起来？这就需要从教材、课堂教学到实验实习，反复研讨，总结经验。

会上有人提到通才与专才的问题。通才也好，专才也好，都需要理论与实际联系。通才和专才不是对立的，只是在学识的范围与程度上有一定差别，而不是在理论与实际联系这一

原则上有什么不同。因此，在大学里反对理论与实际联系，或者主张少联系，都是不对的。另一方面，不适当地强调实践，忽视理论，把大学降低到专科学校的水平，也是不对的。大学和专科有差别。大学总是要学得广一点，深一点，理论更多一点。

现在我们国家的经济正处在恢复阶段，需要人“急”，需要才“专”，这是事实。为了便于联系实际，适应建设的需要，由企业部门举办短期训练班或专科学校是必要的合理的。但这绝不是说要将现有各大学分归各企业部门领导，教育部就不管了。为了适应需要，可以创办中等技术学校，也可以考虑在大学中缩短一部分专业的修业年限，但不能取消大学教育培养高级建设人才的方针。为了培养具有较高理论水平、能更好地解决实际问题、符合长远需要的专门人才，有必要将现有的大学整顿得更好一点。目前，大学还不能大量地扩充与发展，高等教育只能根据我们经济的发展而发展。

三 团结与改革

去年开了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现在又开全国高等教育会议，以后还要召开中小学教育会议，还要成立全国教育工会，目的都是为了使全国教育工作者更好地团结起来，实现《共同纲领》所规定的教育改革的任务。除了极少数反动分子，我们应该团结所有的教育工作者。凡是在政治上反对三大敌人、在教育上赞成新民主主义教育的人，我们都要团结。这是肯定和不可更易的方针。

这次高等教育会议作出了若干决定，有的要马上实施，有

的要在一些学校试行，有的只供各学校参考，这样的办法很好。我们对于文化教育的改革，应该根据《共同纲领》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毛主席告诉我们要谨慎。教育改革不能漫无计划，兴之所至乱搞一气，要区别轻重缓急，分阶段有步骤地进行，在有些问题上要善于等待。文化教育一方面是政治的先导，另一方面它的改造又要在经济、政治变革之后才能完成。所以文化教育既是“先锋”，又是“殿军”。

教育改革是比较长期的事，要有步骤地进行，但不能停止不动。有改革条件而拖延着不改革是不对的，口头上同意改革而实际上不改革也是不对的。只有在客观情况确有困难或者主观上对情况了解不够时才可以等待，但是等待并不等于拖延。另一方面，鲁莽从事，过于性急，企图用粗暴的方法进行改革，也是不对的。比如说，在唯物论与唯心论、无神论与有神论以及教学方法等问题上，不能急性地强迫人家同意你的意见。不然的话，表面上好象同意了，实际上并没有解决问题。总之，我们对教育工作者要循循善诱，使人心悦诚服，要用这种精神来团结全国教育工作者。

在教育方面，也要“公私兼顾”。这次高等教育会议就有许多私立学校的代表参加，这是很好的。今天私立学校处于困难的境地，以前它们的经济来源大都依靠军阀、官僚资产阶级，现在没有了，学田〔4〕，土改时也分了。这些困难，政府应该照顾。教会学校在与外国断绝关系后，经费上有很大困难，政府也应该照顾。私立学校问题怎样解决，教育部要考虑。这也是学校自身的事。现在，国家经济处在恢复过程中，大家要多想办法，度过这一二年。

建 设 与 团 结

（一九五〇年八月二十四日）

诸位代表，诸位同志：

我很高兴今天能参加中华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在去年的筹备会上，我曾经和在座的一些同志谈过中国科学工作者的任务与前途问题。现在我们的代表会议在北京召开，成立了科学工作者自己的领导机构，这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对于自然科学，我是门外汉，谈不到贡献什么意见，主要应该向诸位学习。不过自然科学工作者也会关心另外方面的一些问题，如自然科学工作的环境，自然科学工作与各方面工作的联系和关系，自然科学工作者的岗位和前途等等。现在我就这方面的问题讲一些意见，题目是“建设与团结”。

首先讲一讲建设问题。

先从中国自然科学家本身说起。依我看，一般从事自然科学研究工作的人，或多或少都有与自然界作斗争的认识。他们在事业上下功夫、费精神，目的是为人类扫除生存中的障碍，改善人类的物质生活和发展精神生活。学医的想把病人治好，学农的想把农作物病虫害消灭，学工的想把人类生活的物质基础搞得更好，学理的为着增加人类的科学知识，使世界文化水平更加提高。一般地说，科学家是不愿意利用科学知

识来毒害人类的。当然，世界上也有一些科学家不是这样，如日本的某些细菌学家研究细菌战争，做危害人类的事。但这只是极少数，而且有的是被迫这样做的，只有更少更少的人才是自觉地去做的。我相信绝大多数科学家，从他们本身学习和工作的目的来说，都是为着造福于人类的。

我为什么一开始就提出这样的问题呢？这就是说，我们今天有条件团结科学家们为中国人民服务。我们相信科学家们能够这样做，因为他们是善良的，在旧中国他们被压迫了多少年，今天已经和人民一道翻身了。

自从海禁开放〔5〕以后，西方的文化科学进入中国。可是我们的国家和人民究竟得到多少好处？又受到多少害处？中国人自己能够掌握科学来为人民谋幸福吗？在反动政府统治下，不论是清朝、北洋军阀〔6〕或国民党反动派，都不允许我们这样做。虽然有少数科学工作者埋头从事建设工作，如铁路、水利、工程建设都有中国的工程师自己计划、设计的，不能说中国的科学家没有个别的人获得成就，但总的来说，成就是很少的。他们的工作时常遭到反动统治者的破坏。如李仪祉〔7〕先生在关中兴修水利，对关中的农业尤其是棉田有很大好处，但是后来孔祥熙〔8〕压低棉价，大大损害了棉农利益，使他们无法继续经营棉田，水利也因此受到影响。举此一端，可见全貌。

反动政府的摧残和破坏是国内的因素，而更大的破坏来自帝国主义的侵略。一百多年来，帝国主义者站在中国人民头上，利用科学作为剥削、压迫和屠杀中国人民的手段，这是大家都看到了的。帝国主义者控制了我们的经济，中国的工业生产很多是为帝国主义者服务的，农业原料也被他们掠夺

了去，加上水灾旱灾连年不断，哪里谈得到真正的建设。尤其是抗日战争以来，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罪恶更是数不胜数。例如，花园口的决堤^{〔9〕}造成了极大灾难，创伤至今未能平复。去年淮河有水灾，今年又有水灾，直接原因就是蒋介石在花园口决堤，黄河的泥沙流入淮河，使淮河的河床增高，洪泽湖的水位高出周围的田地，因此经常发生水灾。

由于帝国主义者和国内反动统治阶级的破坏，旧中国不能进行建设，科学也很难在旧中国的土壤上生长，科学家没有办法贡献自己的能力。但是有良心的中国科学家并没有放弃建设中国的志愿，不少人为中国的前途和中国的科学发展摸索道路，寻求真理。然而他们并没有成功，他们一直受着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压迫，理想不能实现，计划不能实行，工作不能开展，甚至连生活也陷入困境。这部科学家的苦难史，诸位比我了解得不知要深刻多少倍。现在情况完全改变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了，中国人民翻了身，这就给中国的科学和科学家的发展开辟了一条无限广阔的康庄大道。去年，人民政协通过的《共同纲领》^{〔1〕}规定了建设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要把中国由一个农业国变为工业国，这也就是规定了中国科学家的奋斗目标。这个方向和目标是很清楚的，这正是近百年来中国科学家所寻求的。

方向和目标确定了，但道路是要我们一步一步去走的。诸位都明白，我们所接收的旧中国满目疮痍，是一个破烂摊子。要在这个破烂摊子上进行建设，首先必须医治好战争的创伤，恢复被破坏了工业和农业。我们决不能随随便便在破烂摊子上建设高楼大厦，那是不稳固的，必须先打好基础

才行。在科学技术方面，我们从国民党反动派手中接收了什么遗产呢？他们留给我们什么科学器材、设备和资料呢？太少了。这并不是说诸位科学家不努力，而是反动派不让我们做，不让我们有机会勘测地下的富源，不让我们有机会纪录中国人民在历史上的功绩。现在我们要进行建设，首先就要进行发掘、调查、统计和搜集材料的工作。这是准备工作，是建设新中国的重要基础工作。目前我们的财政经济状况已开始好转，但要达到基本好转还需要经过三五年困难阶段，也就是恢复、整顿、调查和有重点地建设阶段，然后才能在全国规模上进行建设。

在国家建设计划中，站在科学家的岗位上，我们开始做些什么呢？不可能百废俱兴，要先从几件基本工作入手。

农业方面。首先是实行土改，解放生产力，然后求得发展。中国本不是缺粮的国家，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和剥削，从根本上破坏了中国的农村经济。现在进行的土改〔10〕，就是要使农民从旧的生产关系桎梏中解放出来。这项工作需要两年左右时间。配合土改，我们要着手做以下几件工作。

第一，兴修水利。我们不能只求治标，一定要治本，要把几条主要河流，如淮河、汉水、黄河、长江等修治好。华北的永定河，实际上是“无定”的，清朝的皇帝封它为“永定”，它还是时常泛滥。不去治它，只是封它，有什么用？国民党统治时，有一个南京河海工程专门学校，也得不到支持，因为反动派不需要做水利工作，反动政府不是为人民办事的。我们今天必须用大力来治水。要开展这一工作，把全国的水利专家都集中

起来也不够。兴修水利，联系到动力，更需要有长远的计划。

第二，修筑铁路。以中国之大，只有二万多公里铁路，与工业先进的国家不能相比。这件事也必须在恢复工作中大力来做。铁路交通首先要保证东北的粮食能够运出，调剂关内缺粮的地区。

第三，制造化学肥料。这一点侯德榜〔11〕先生很了解。我们要大力发展化学肥料工业，不然就要从外国进口，消耗外汇。

不说旁的事情，单说这几件大事，都需要科学家的努力。现有的专家不是太多而是不够。代表中的萨福均〔12〕先生，曾和詹天佑〔13〕先生同时修粤汉铁路，他知道中国的铁道专家也是很少的。

讲到林业，中国森林的面积，远不够一个森林国家的标准。基础太小，林政不修，森林采伐不按科学的方法，这都需要大力整顿。如东北森林地区，据调查，如果林业工作不加以改进，快则十年，慢则二十五年，就会完全毁了。不科学的采伐，没有护林和育林，森林地带也会变成象西北那样的荒山秃岭。我们需要林业专家从事这方面的工作。

工业方面。据初步统计，我国有六万多台机床。其中有的没有转动，有的生产安排不当，如工厂距原料产地太远、产品并非急需等。这些机床的调整与修复，也是需要大力进行的工作。从国防观点来看，工厂不能都放在沿海。过去许多工厂是为帝国主义利益服务，现在要为人民利益服务，就要面向广大的内地农村。联系到动力问题，愈到内地，动力愈不够，这就需要勘测燃料资源。大家想一想，需要有多少科学家从事这方面的工作！

医疗卫生方面。全国卫生会议提出普及医疗事业的问题，希望在三五年内使每一个县都有医院，每一个区都有卫生所。这就得增加九万多名医生，数十万名护士和助产士。这要用三五年或更长一点的时间才能培养出来。现在我国的中医人数没有统计，西医人数估计有三万上下，医生的人数是太少了。

国防工业方面。制造兵器、飞机等都需要专家，也感到人才不够。

总起来说，各种建设从恢复、整顿和调查开始，已经看出现有的专家是不够的。我去年说过，只要整理工作有了头绪，就会感到我国的科学家不是太多而是太少。现在愈接触各种事实，愈使我们感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

今天我还不能把全国的建设计划向各位报告。全盘的计划要等政协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才能决定。不过现在可以肯定，自然科学工作者的岗位是有的，他们的工作是国家急需的，问题是需要时间来合理调整。现在对科学家人数的统计很不完备。我很高兴这次会议成立了自然科学工作者的全国性组织。有了组织，就有力量，就给我们以机会，从调查统计全国科学家人数着手开始工作。我正式提议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首先进行这个工作，政府愿给以一切物质上的帮助。中国自然科学工作者到底有多少？他们的水准、专长、职业、资历怎样？要做一个全盘的调查。这样，我们就可能更好地把他们安排在适当的岗位上，为国家为人民服务。现在我们对这方面的情况不清楚，可能埋没了许多人才。调查统计对政府从事建设工作是有很大帮助的。调查统计之后，虽然不能人人马上都有适合自己能力和志愿的岗位，但至少

可以向这个方向努力。今天安排的岗位不适当，明天就可以安排得适当些。今年的待遇差一些，再忍耐一些时候，三年左右，情况一定会好转的。我们只会一天一天好起来，不会一天一天坏下去。在旧社会，我们在物质上精神上都受到压迫，现在精神上解放了，物质上再忍受一时的困难不算什么。我还希望现有的科学家能培养出更多的青年科学工作者，让他们跟着你们一道前进，这样，中国的科学事业才有前途。

再讲一讲团结问题。

为了有效地工作，科学家必须团结。说到团结，很容易想到“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道理。在阶级社会中，人类是划分为阶级的。有阶级的区分，就有阶级的斗争和阶级的团结。我们的国家是多阶级的国家，今天要打倒的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要团结的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即使将来阶级消灭了，还需要继续与自然界作斗争，仍然需要团结。与自然界作斗争是无限的，所以团结也是长久的。自然科学家当然懂得这个道理。

现在我们内部还有破坏团结的因素存在，所以团结问题更加重要。我们必须划清界限，分清敌友。团结谁？反对谁？团结为人民服务的科学家，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凡是承认《共同纲领》的都要团结。不论是私人开设诊所的医师，或是在私人工厂中服务的工程师，今天都是需要的。我们国家今天的财力有限，不能立刻建立那么多的医院，因此还需要私人开业的医生的帮助，他们对国家人民是有益的。所以，只要是为人民服务的科学家、知识分子，不管是工农出身、小资产阶级或剥削阶级出身，我们都应该团结，对他们都要尊重，

目的是要打倒共同的敌人。现在国内的敌人已经打倒了，国外的敌人还存在，尤其是帝国主义还存在，我们必须与破坏人民事业的敌人作斗争，这就是团结的前提。我们反对甘心为帝国主义服务的少数堕落的科学家，但有一些科学家是被动的、盲目的，或者是在非常不得已的条件下跟着敌人走的，我们很愿意争取他们回来，欢迎他们回来。科学家最易于接受真理，我们可以用事实说服他们。在这方面我们要进行说服工作。人民同他们没有私人的恩怨，只有对反动派的共同仇恨。

各民主阶级团结起来了，科学家一定会比其他人团结得更好。

凡是为新中国努力服务的科学家都是朋友，都应该团结。为了实现和巩固这个团结，我们必须破除门户之见。自然科学是分门别类的，家所学的不可能一样，各人所努力的方向自然也不同，但是不能因此而有门户之见，互相歧视，如学这一门的看不起学那一门的，在同一部门中这个学派看不起那个学派。我们的自然科学，有许多是从国外学来的。学医的有德日派和英美派，彼此形成门户。同样，学数学、物理、化学、工程、农业、交通的人，也有这类门户之见。门户之见是受旧社会的影响形成的，很不利于我们的建设事业。今天我们要强调集体合作，抛弃那种旧的影响。各方面有各方面的长处，大家要彼此看到别人的长处，保持各自的长处，去掉短处，互相学习，互相切磋。当然这不是容易做到的事。

中国共产党是用无产阶级世界观武装起来的，是决心为革命为人民服务的。党内同志尽管在大的方面是一致的，但在民主革命时期，由于各人所处的具体环境的局限，相互间容

易产生隔阂。如长期处在农村游击环境中，这个山头那个山头互相隔离，产生了山头主义，形成了门户之见。又如在白区的革命工作者，长期处在秘密的环境中，容易产生只看到局部的倾向；而在根据地工作的同志，则习惯于一切公开，容易忽视秘密工作。中国无产阶级的人数不多，工业发展的程度不高，社会主义传统不深。在共产党内，党员的出身和成份不同，也容易产生不同的思想。因此，我们党开展了整风运动〔14〕。经过两三年的整风，迎来了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15〕，增强了党的团结，使我们党在日本投降后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在解放战争中更加显出了力量。以上是说在共产党内也还存有门户之见，需要整风。难道在共产党以外的团体，在所有的科学工作者之间，就能够一下子很理想地团结起来吗？

我们不能空想，不能凭主观，消除这些门户之见一定要经过一个自觉的过程。要面对事实，才能寻找出正确的方法来克服我们的缺点。一个科学团体中，人们来自不同的生活环境，有着不同的思想与生活方式，是很不容易聚集在一起的。共产党员过的是集体生活，在战争时期生活在同一队伍之中，而科学家是一小群甚至是极少的几个人在一起工作的，因此养成了各种不同的性格。科学家的良心、骨气是可钦佩的，但是科学家的脾气有时是很难相处的，这都是一定的生活环境造成的。我们要用唯物主义观点来看这个问题，要了解生活环境可以影响脾气，既然环境变了，脾气也是可以改的。

团结是在矛盾中形成和发展的。人心不同，各如其面。人们的智慧、才能、性格各有不同，相互之间有时是有矛盾的。团结就是在共同点上把矛盾的各方统一起来。善于团结的

人，就是善于在共同点上统一矛盾的人。钢铁和水泥是性质不同的物质，把它们结合起来，就变成钢筋水泥那样强有力的东西。科学家能把自然界不同的物质组合、统一起来，难道不能把有不同见解和脾气的人统一起来吗？我们在自己的队伍中，就是要强调统一与团结。统一矛盾并不妨碍个性的发展。毛主席在《论联合政府》中说过，只有在共同的大前提下，个性才能得到更好的发展。在旧社会，反动派利用知识分子的弱点，孤立他们，分裂他们，这样来操纵他们。人民的国家给大家找到一个共同的目标，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直到共产主义，逐步消灭一切束缚人类发展的阶级和反动势力，实现真正的进步和自由。以全人类的力量来和自然界作斗争，这是多大的自由，多大的个性发展！也只有这样，才能使个性得到正确的发展。不然，这部分人的个性发展了，就排斥和压迫另一部分人，这叫什么个性的发展？在人类几千年的阶级社会中，少数人无止境的欲望，妨碍了大多数人的生存与发展，这样的个性发展是专制主义的，个人主义的。我们集体主义者反对这种个性发展。我们要发挥集体主义的精神，打破个人主义的小圈子，群策群力，与群众结合，为新中国的建设而努力。今天的胜利是经过几十年的斗争而得到的。我们今天抬头、翻身、开步走了，我们应该在团结上努力，携手共同前进。

我们这代人经历了很多战乱，我们是欢迎和平的。我们有信心在这一辈子能看到光明、幸福、富强的新中国。从新民主主义开步走，为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子孙打下万年根基，“其功不在禹下”。大禹^{〔16〕}治水，为中华民族取得了福利，中国科学家的努力，一定会比大禹创造出更大的功绩。

为巩固和发展 人民的胜利而奋斗^{*}

（一九五〇年九月三十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宣告成立，现在是一周年了。这是中国人民伟大胜利和迅速进步的一年。在这一年中，中国人民在国内继续解放战争的大进军，完成了除西藏、台湾以外的全国解放；在国外与苏联等十七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并与苏联订立了友好同盟互助条约〔17〕。在这样的内外关系的巩固基础之上，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了全国人民在政治、经济和文化各方面进行了蓬蓬勃勃的改革和建设。国内外的人民都看到：经过了这一年，中国已经比过去几百年甚至几千年经历了更重要的变化；旧面貌的中国正在迅速地消失，新的人民的中国已经确定地生长起来了。

让我们简单地回顾一下过去的一年吧。

人民解放战争的大胜利

我们是在人民解放战争继续胜利进行的条件之下度过过

^{*} 这是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为建国一周年举行的庆祝大会上的报告，刊载于一九五〇年十月一日《人民日报》。

去的一年的。从一九四六年七月开始的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在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前夜已经得到了基本的胜利。但是当时国民党残余匪帮还占据着以广州为中心的华南地区，以重庆为中心的西南地区，和一些海岛。在过去一年中，人民解放军经过了衡阳——宝庆、广东、广西、平而关、海南岛各次战役和漳州——厦门战役，解放了华南全境和福建省，然后又经过西南、滇南、西昌各次战役，解放了除西藏以外的西南全境。此外，人民解放军还解放了舟山群岛、东山岛和其他岛屿。在这一年中，我军消灭了敌军二百零三个整师，共约二百十八万人。

这样，从一九四六年七月算起，在四年的作战中，我军就消灭了敌军八百零七万人。在我军四年作战的大量缴获中，单是各种炮就有五万四千四百三十门之多。大家知道，我们所缴获的这些炮和其他军火，除了一小部分是国民党反动派自己制造的以外，其余大部分都是美国制造了供给国民党反动派的，还有一部分是日本制造，也是在美国帮助之下由投降的日本军队交给国民党反动派的。

中国人民从全部中国大陆上消灭了美国所武装的国民党匪军，得到了这样巨大的胜利，可以给我们什么教训呢？最重要的教训就是：这样巨大的胜利决不是历史上的偶然现象，而是中国人民近百年来无数次革命斗争的必然结果。没有千千万万人民的决死支持，绝对不可能设想这样巨大这样迅速这样彻底的胜利。中国人民的这个胜利，和中国历史上有过的“统一”完全不一样。历史上有过这样那样的“统一”，但是那些“统一”者或者本来是人民的压迫者，或者本来虽不是而后

来也变成了人民的压迫者，因此他们不可能达到真正的统一，而那些“统一”不久也就瓦解了。今天出现了第一次的中国人民的统一。人民自己成了中国土地上的主人，而反动派在中国的统治就从此永远不可挽回地被推翻了。中国人民所消灭的敌人既然是由美国政府所武装，那么就可以完全确定：中国人民不但对国内敌人取得了胜利，同时也对国外敌人即美国的帝国主义干涉者取得了胜利。美国帝国主义者如果再要采取什么新的工具和新的形式来干涉和侵略中国，它就必然重复国民党所遭受的失败。

现在中国人民和国民党反动派残余的斗争还没有完结，这是因为反动派残余所盘踞的台湾，现在是在美国海军和空军的直接控制之下。人民解放军决心从美国侵略者手中解放台湾，并最后消灭中国反动匪徒的巢穴。人们可以看出：在解放台湾的作战中，我们的战略地位是比任何敌人要优越得多；我们是站在神圣的正义方面；我们的后方是这样近，这样大，这样巩固；我们正为取得这个最后胜利而在加倍努力。人民解放军也决心西去解放西藏人民，保卫中国边防。对于这个为祖国安全所必须的步骤，我们愿以和平谈判的方式求得实现。西藏的爱国人士对此已经表示欢迎，我们希望西藏的地方当局不再迟疑，好使问题能得到和平解决。

中国百多年来的历史特别是近二十几年的历史表明：中国一直是帝国主义侵略盗匪的重要目标，因此胜利了的中国人民不可能没有强大的国防力量来保护自己。我们必须及时地加强我们的国防建设，并且随时警惕地注视着帝国主义敌人扩大侵略战争的阴谋。我们必须建立强大的人民空军和人

民海军，才能够击退从空中和海上袭来的武装盗匪，保护我们的领空领海不受侵犯。我们的人民陆军必须陆续加以强化，使它足以战胜任何侵略者。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政策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政策，明确地规定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所通过的《共同纲领》^{〔1〕}上。《共同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政策的原则，为保障本国独立、自由和领土主权的完整，拥护国际的持久和平和各国人民间的友好合作，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在与外国建立外交关系和贸易关系的问题上，《共同纲领》规定：“凡与国民党反动派断绝关系，并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采取友好态度的外国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可在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与之谈判，建立外交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可在平等和互利的基础上，与各外国的政府和人民恢复并发展通商贸易关系。”中央人民政府一年来的外交，就是按照这些基本原则执行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苏联、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匈牙利、朝鲜、捷克、波兰、蒙古、德意志、阿尔巴尼亚、缅甸、印度、越南、丹麦、瑞典、瑞士、印尼等十七个国家，已与我国相继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巴基斯坦、英国、锡兰、挪威、以色列、阿富汗、芬兰、荷兰等八国，也已经表示愿与我国建立邦交，其中，英国、挪威、荷兰、芬兰四国尚在与我国进行建交的谈判中。

中华人民共和国坚决地站在以苏联为首的世界和平民主阵营方面，并且与苏联建立了最亲密的兄弟关系。在毛主席访问苏联期间，中苏两国缔结了具有重大的世界历史意义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由于这个条约，欧亚大陆上的近七万万伟大的人民已经结成了军事上、经济上、文化上的亲密同盟，使两国防御由东方来的侵略的力量大为加强。在这个条约的同时或稍后，中苏两国还签订了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关于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关于在新疆创办中苏石油股份公司的协定，关于在新疆创办中苏有色及稀有金属股份公司的协定，关于建立中苏民用航空股份公司的协定，专家协定，贸易协定等。在这些协定中，我们的伟大盟邦给了在恢复战争创伤期间的中国以许多慷慨的援助。全中国的人民，由于中苏之间的条约、协定的签订和实施，感到极大的兴奋，对于苏联领袖斯大林大元帅、苏联政府和苏联人民的友谊，表示无限的感谢。

中国与波兰、捷克和朝鲜也已签订了关于贸易的合同和协定，与德国和匈牙利的贸易谈判正在进行。

中国与若干资本主义国家也发展了贸易关系。今年中国的对外贸易总额，估计是可以达到并超过预定计划的。

对于和资本主义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比建立贸易关系的问题要复杂。在这里可以特别提起与英国进行了长时间而还没有结果的谈判。谈判还没有结果的原因就是英国政府一方面表示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另一方面又同意中国国民党反动派残余集团的所谓代表继续非法地强占联合国中的中国席位，这样，就使中英的正式外交关系难于开始。英

国在香港和其他地方对待中国居民的极端不合理的非友好态度，也不能不引起中央人民政府的严重关切。

美国政府在中国人民解放战争中间始终站在中国人民的敌人方面，用一切力量援助国民党反动派进攻中国人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美国政府对于中国人民的敌视有加无已。不顾苏联、印度和其他国家的正当指摘，美国在联合国及其各个组织中间，顽固不化地阻挠着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的参加，并且无耻地庇护着国民党反动派残余集团的所谓代表的席位。美国同样在阻挠中国代表参加盟国对日管制委员会〔18〕，并阴谋抛开中国和苏联缔结对日和约，以便决定重行武装日本和保留美国在日本的驻军和军事基地。美国为着进一步扩大在东方的侵略，故意制造了李承晚〔19〕傀儡集团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进攻，随即借口朝鲜的形势派遣海军空军侵略我国的台湾省，宣布所谓台湾地位问题应由美国所操纵的联合国解决，同时多次派遣侵略朝鲜的空军侵入中国辽东省〔20〕上空，实行扫射轰炸，并派遣侵略朝鲜的海军炮击中国的航海商船。美国政府由于这些疯狂横暴的帝国主义侵略行为，已经证明了它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最危险的敌人。美国的侵略武力已经侵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版图，并且随时有扩大这种侵略的可能。美国侵略台湾和朝鲜的总司令麦克阿瑟早已透露了美国政府的侵略计划，并且正在继续制造扩大侵略的新借口。中国人民坚决反对美国的侵略暴行，并决心从美国侵略者手中解放台湾及其他领土。

中国人民密切地关心着朝鲜被美国侵略后的形势。朝鲜人民和人民军是坚决而勇敢的。他们在金日成首相领导之下

抵抗美国侵略者，已经取得了惊人的成就，并且受到了世界人民的同情和声援。今后朝鲜人民在坚持长期抗战的方针下，必能克服许多困难，取得最后胜利。

中国人民是爱好和平的。一亿二千万个中国人已经在斯德哥尔摩的庄严宣言〔21〕上签了名，这个签名运动还在中国人民中继续扩大。很明显，中国人民在解放自己的全部国土以后，需要在和平而不受威胁的环境下恢复和发展自己的工农业生产和文化教育工作。但是美国侵略者如果以为这是中国人民软弱的表示，那就要重犯与国民党反动派同样严重的错误了。中国人民热爱和平，但是为了保卫和平，从不也永不害怕反抗侵略战争。中国人民决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谁要是企图把中国近五万万人口排除在联合国之外，谁要是抹煞和破坏这四分之一人类的利益而妄想独断地解决与中国有直接关系的任何东方问题，那么，谁就一定要碰得头破血流。

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和 准备土地改革工作

帝国主义者和反动派常常过低估计了中国人民的力量，因为他们习惯于拿看待旧中国的眼光来看待解放了的新中国。他们常常忘记了中国人民已经有了自己的最有力的武器，即人民民主专政。这个人民民主专政，已经把自己的力量组织了起来，并且把反对人民的反动分子压倒了。

在过去一年中，在中央人民政府的领导之下，全中国已经

成立了一个大行政区人民政府和一个中央直属的自治区人民政府，四个大行政区的军政委员会，二十八个省人民政府，九个相当于省的行政区人民行政公署，十二个中央和大行政区直辖的市人民政府，六十七个省辖的市人民政府，二千零八十七个县人民政府。所有这些政权组织，都与压迫人民的国民党反动政权组织在原则上根本相反，因为它们是代表各阶层人民利益、联系广大人民而仅仅压迫反动派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工具。

在各级人民政府中，有的已经是相当的人民代表会议〔22〕选举出来的。有极少数的市和县已经召集了人民代表大会。其他所有的市以及一千七百零七个县，三十六个蒙古旗，都召集了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大部分的区乡和村都召集了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会议或农民代表会议。这些代表会议和代表大会，对于团结人民中的各阶层、各党派、各民族，对于政府听取人民的意见及人民了解与监督政府的工作，都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各级人民监察组织和工作，业已开始建立，但各级人民政府还须加强对这方面工作的领导。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全国委员会，在过去一年中已经证明了是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兄弟民族、各人民团体进行协商的有效和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组织。仿照这个经验，十二个省、七十三个市和很多县都组织了省、市、县的协商委员会。

有组织的人民在过去一年中的迅速增加，是使中国人民团结大大加强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全国各主要产业部门和主要城市的工人基本上已经组织起来，全国工会会员已经有四

百零九万人，约占全国工人职员总数三分之一。新解放区农民协会正在普遍地建立，今年将要实行土地改革的华东和中南两区的农民协会会员已经达到两千万人以上。全国有组织的妇女在民主妇联领导下已经有三千多万人。全国有组织的青年已经有七百多万人，其中包括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团员三百零一万人。

过去一年的经验表明，中国各民主阶级和各民主党派在反对共同敌人的斗争中是团结一致的。为了加强这种团结，中央人民政府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在过去一年中，曾采取了一系列的步骤来调节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的相互关系，特别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关系。工人阶级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导阶级，忽视工人阶级的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无疑地是不能够容许的。但是民族资产阶级在现阶段的中国既然有它的重要作用，那么，团结民族资产阶级使其积极地参加经济的恢复和发展的事业，也就是工人阶级自己的利益。在今后，各民主阶级关系的调节，仍然是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重要任务。各民主党派间的关系，主要是中国共产党和各友党之间的关系，是良好的和融洽的。各民主党派对于中央人民政府所执行的各项重要政策，都经过了充分的协商，取得了一致的意见。在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加强同党外人士的团结合作的指示〔23〕并开展整风运动〔24〕以后，这种合作将更有进步。但是在这个问题上的关门主义，仍然是一部分共产党员的主要倾向，必须继续注意克服，来巩固各民主党派及无党派民主人士的团结。同时对违反原则的迁就倾向，也必须防止。

中国是一个以汉族为主体的多民族的国家，各民族之间的关系在过去国民党反动统治之下是恶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这种关系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内蒙成立了自治区人民政府。新疆成立了各民族的联合政府，汉族人在这个政府中只占少数。少数民族的聚居区实行区域自治的方针，正在有步骤地求其实现。在民族杂居区的人民政府，努力于调解民族间的历史纠纷，鼓励民族间的互让互助。中央人民政府力求促进少数民族区的卫生事业、教育事业和经济事业，而对于各民族内部的社会改革工作，却采取完全依靠各民族自觉自愿的原则，反对在这方面采取强迫命令手段。对于各民族的宗教信仰和其他群众性的风俗习惯，人民政府和人民解放军坚持不干涉的原则。由于实行以上的政策，各民族对于人民解放军和人民政府中的汉族干部，已经开始表示信任和爱戴了。但是在团结各民族方面，我们所已经做的还很少，需要做或者需要改善的地方还很多，因此我们不应当有丝毫自满的地方。

人民民主专政包括对人民的民主和对反动派的专政两个方面。对人民的民主需要继续扩大，而对反动派的专政则需要继续加强。

国民党反动派的残余虽然已经逃到台湾，但是他们在大陆上却有计划地留下了一大批土匪和特务人员。土匪最多的时候曾经达到一百多万，但是经过一年来人民解放军协同当地人民的坚决的剿匪斗争，现在已经只剩二十万人左右，还需要继续清剿，借以根绝匪祸，安定新解放区的社会秩序。人民公安机关对于特务机关的斗争也得到了巨大的胜利。一年

来，全国就捕获了特务分子一万三千七百九十七人，缴获电台一百七十五部。此外，在过去一年中，还破获了国际间谍案七起。要知道，反对特务和间谍的斗争，是不会随着反土匪斗争的结束而结束的。无论是本国或外国的敌人，在公开的武装斗争失败以后，一定会利用种种掩护进行潜伏斗争，这是中国人民所必须警惕的，也是人民政府所必须予以镇压的。

在过去一年中，中国人民司法工作在保护人民权利，惩治土匪、特务和其他犯罪分子，制订人民法律，改善诉讼制度和监狱管理等方面都有了成绩，但也有缺点。最重要的缺点是许多地方的司法工作人员在镇压反革命分子的问题上曾经发生曲解宽大政策的偏向。他们对于反革命分子只有宽大而没有镇压，以致人民群众责备他们为“宽大无边”。人民群众的这种责备是正确的。毛主席所规定的对待反革命分子的原则是“首恶者必办，胁从者不问，立功者受奖”，必须完整地而不是片面地执行这个指示，使坚决的反革命分子受到坚决的镇压。这是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严重任务之一。

目前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最重要任务，就是在中国新解放区实施土地改革^{〔10〕}。实施土地改革，这就是保障约占中国人口百分之八十的农民的基本生存权利；这就是消灭反革命活动的最重要的社会基础——地主阶级；这就是实施中国人民民主专政的基本任务——解放被封建生产关系所束缚的农业生产力，并从而为中国的迅速工业化准备条件。在新解放区约三万万人口中实施土地改革，这是紧接着人民解放战争而来的中国第二场最激烈的阶级斗争。为了有准备地、有步骤地、有秩序地进行这一场斗争，中央人民政府已经先后发布

了土地改革法、农民协会组织通则、人民法庭组织通则、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份的决定等项指导文件，并且决定在一九五〇年冬季只在一万万人口的地区进行土地改革工作，而将其他地区留在明年或明年以后进行。

在今年冬天就要实施土地改革的地区，现在已经在宣传关于土地改革的法令文件，训练进行土地改革工作和人民法庭工作的干部，发展或整顿农民协会的组织。这些步骤是必要的。任何剥削阶级不会自动地退出历史舞台，在中国有了几千年历史的地主阶级决不是例外。地主阶级中现有一些人正在制造反对土地改革和土地改革法的“理论”，对于这种“理论”应当加以坚决的驳斥；应当加强对于土地改革法各项主要内容的宣传，使之在准备土地改革的地区首先是农村中家喻户晓。还有一些地主正在非法地分散土地财产，宰杀耕畜，破坏农具、房屋、耕地和树木，对于这些不法行动，必须坚决制止和制裁。对于土地改革的最重要的准备是干部的准备，因此必须集中主要的力量来训练干部和巩固农民协会。有了纯洁可靠的农民积极分子领导下的农民协会，才能保证土地改革工作的顺利完成。

统一财政和恢复经济

中华人民共和国及其各级政权机关成立以后，在战争已经结束的地方立即遇到一个最迫切的任务，这就是扭转国民党反动派多年罪恶统治所遗留下来的财政经济的极端混乱危险的状况。中国人民所接收的城市，由于多年不断的通货膨

胀，物价高涨，差不多变成了投机商人的大赌场。为了稳定通货和物价，必须平衡财政收支和保证物资供给。而在稳定通货和物价以后，又必须按照新的条件和新的需要，调整全国的工商业，整理交通，使之为恢复生产服务。除此以外，人民政府还必须立即进行对于国民党反动统治和战争所造成的灾荒和失业的救济。一切这些，就是人民政府所面对着的巨大的困难的任务。帝国主义者再三地认定年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将被这些看来是无法解决的难题所压倒，而不得不向他们求救。但是一年来的经验证明：帝国主义的预言家是破产了；中国人民在经济战线上如同在军事和政治的战线上一样是胜利了。

中央人民政府在忍受了在解放战争扩大期间所不可避免的几个月的通货膨胀以后，在今年三月间决定用极大的努力来增加财政收入，减缩财政支出，使收支接近于平衡。为了保障这个计划的实现，中央人民政府迅速地完成了全国财政管理的空前未有的统一。中央人民政府的计划受到了全国人民的热烈支持。这样，通货膨胀立即制止了，从今年三月以来，不但不再需要增发通货来弥补财政赤字，相反地，中国人民银行存款总额在今年九月份比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份竟增加了十六倍以上。

为了维持物价稳定，还需要保障物资供给。中国虽然是一个农业国，但是腐败的国民党反动派政府却连中国所需要的粮食和棉花多年来也依赖外国输入，加上国内市场被官僚资本家和投机商人所操纵，以致物价无法稳定。中央人民政府从根本上改变了这种恶劣状况。由于中央人民政府在全国范围内掌握了充分的粮食、花纱布、煤炭、食盐等民生必需品，

并克服了调运和贮存的严重困难，战胜了投机商人的扰乱，使全国大城市和灾区的供应问题得以顺利解决，今年三月以来的全国物价已经基本上趋于稳定。最近因为夏秋季的丰收和由外国进口的某些物资的减少，农产品和工业品的差价有些增大，中央人民政府正在设法调节，以免农民和一部分以粮食计算的工资生活者的生活受到影响。

财政收支接近平衡，物价趋于稳定，如同毛主席所指出的，还只是我国财政经济情况的开始好转，还不是它的根本好转。按照毛主席的指示，为了达到根本好转，除了必须完成土地改革，大量地节减国家机构所需要的经费以外，还必须合理地调整现有工商业，使它从适应于囤积投机的活动转变为适应于生产的有计划的恢复和发展。为了从各方面解决这个问题，国家的经济行政机关、国营企业机关、私营企业机关、合作社组织和工会组织，已经在克服产销的盲目性和加强产销的计划性问题上，在向私营企业实行委托加工、订货、收购和贷款的问题上，在公私商业、金融业和合作事业的分工问题上，在解决侨汇困难的问题上，在调节劳资关系的问题上，举行了一系列的会议和商讨，并得到了初步的结果。当然，私营经济的资本主义性质与彻底的计划性是有矛盾的。但是在这里我们需要注意：第一，在一切最重要的经济部门，我们已经有了强大的社会主义性质的国家经济，并已开始发展了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经济。第二，私营经济是处在国家经济的各种形式的领导之下，其中还包含着日益发展的为社会主义经济服务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因为这样，我们就有根据来说，可以使中国的经济一步一步地避免过去的无政府状态，而带

有更大的计划性。

在调整各种经济关系的问题上，中国合作事业的发展已经开始具有重要的意义。据今年七月的统计，全国合作社已经有了社员两千万人以上，资金五千五百余亿元〔25〕，在今年第一季度购销业务的总值已达三万八千五百亿元。合作社的发展主要地是在东北、华北和华东的老解放区。东北合作社一九四九年采购和推销的总值，合高粱一百三十余万吨，等于东北公营贸易总额的百分之四十。目前我国最需要发展的合作社是农村中的供销合作社和城市中的消费合作社，这两种合作社的任务，就是保护小生产者和消费者少受或免受中间剥削，促进生产的发展，这是我国劳动人民的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中央人民政府正在拟订合作社法，以便全国合作事业能够得到健全的发展，避免过去所曾发生过的错误。

从全局来说，由于长期的战争和战争还没有结束，并由于缺乏必要的准备条件，中国的经济事业现在还只是处在恢复的阶段。我们还缺少发展工业的资金，还缺乏对于实际情况的全般了解，在干部和经验方面也很不足。在一九五〇年，中央人民政府把财政开支约百分之二十三点九用于经济建设的投资，这个数字比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政府的建设投资都要大，但是，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经济建设的全部需要来说，这个数字却是很少很少。在一九五一年，这个数字还不能希望有大的增加。事实上，中国的经济恢复将需要三年至五年的时间，然后才能转入有系统的发展。在这三五年内，我们应当集中力量于几个重点的发展，这种发展，应当是有利于为工业

化准备基本条件，即资金条件、国内市场条件和技术条件的，同时，对于国防建设，也需要占适当的比重。因此，中央人民政府的经济投资，将着重用在发展工农业所首先需要的水利事业、铁道事业和交通事业方面，用在农业和纺织业方面，用在一切工业所首先需要的燃料工业、钢铁工业和化学工业方面。

中央人民政府计划在今年生产原粮二千四百亿斤，棉花一千三百万市担，现在估计都可能实现，或者还要超过。全国纱锭有五百二十二万锭，去年九月开动四百零八万锭，今年九月开动四百二十八万锭，拟争取于今年年内再开动二十万锭。全国铁路，至一九五〇年六月底止，已通车者达二万一千七百四十二公里，占全国铁路线百分之八十八，到今年年底，可达二万二千零十九公里。今年一月至八月，国营煤矿产量比去年同期增产百分之三十七，国营电厂可供电量比去年同期增加百分之三十一，实际售电比去年同期增加百分之五十八。

在过去的紧张的一年中，中央人民政府除了坚决制止经济上的混乱并开始了恢复工作以外，在救济灾荒和失业的工作上，也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一九四九年中国遭受了严重的水灾，受灾面积达一亿二千万亩，灾民四千万人，包括情形最严重的灾民七百万人。今年在皖北和河南等地方又发生水灾，灾田仍有四千多万亩。为了直接间接地救济灾民，中央人民政府在今年一月到九月支付了二十二亿四千万斤细粮，派出了大批干部，采取了各种有效的救济的步骤，使受灾的人民得以安全地渡过了灾荒，这在一九三一年国民党反动政府处理那年的水灾使人民遭受大量的死亡一事比较起来，实有天

渊之别。中央人民政府在一九五〇年投资十几亿斤细粮，动员几百万人来兴修水利，这是今年灾荒减少并在全中国得到丰收的重要原因之一。对于四十几万失业工人（其中包括一部分失业知识分子），中央人民政府和全中国人民一同进行了救济。失业只是我国经济恢复工作开始时期的一个暂时的现象，这个现象在东北已经基本上消失，在其他地方，今后两三年内也将同样消失。

培养干部和提高文化

象经济一样，中国的文化教育事业在过去一年中，一方面进行了恢复工作，一方面又开始了新的创造。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一年，是全国人民卷入学习高潮的一年。闭塞聪明制造无知的国民党反动派的文化统制被打倒了；各个阶层的人民，从工人到大学教授，甚至许多老年人，不约而同地要求用新的眼光来观察中国，观察世界，观察自己。在学习过程中，广大的人民迅速地认识了新的中国和新的世界，认识了劳动的光荣和为人民服务的光荣。人民政府用种种方法满足人民的学习要求。以前难得有学习机会的工人农民，现在也得到机会了。学校向工人农民和他们的子弟开了门。七十万职工已经参加了经常的业余学校，一九五一年的人数将增加一倍以上。一千多万农民已经参加了冬学，明年并将有五百万农民参加常年的农民业余学校。

新中国的建设需要大量的有充分的政治觉悟和文化知识的干部。人民政府正在从三方面来解决这个问题。第一，大

规模地提高现有干部（主要是工农出身的干部，包括人民解放军的干部）的文化水平，为他们举办工农中学和工农文化补习班，或者吸收其中具有适当条件的人到各种高等学校和中等学校。第二，大规模地训练旧公务人员和知识分子，使他们在较短期间抛弃旧的错误的政治观点，取得新的为人民服务的观点。第三，有步骤地改革现在的高等学校和中等学校，使它们能够适应人民的需要。这几项工作在过去一年中都已经开始，并且得到了良好的效果，今后将沿着这个方向更有效地进行，以便在最近几年内可以源源不绝地向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战线输送它们需要的干部。

中央人民政府为了提高中国人民的文化生活水平，对于全国的艺术和出版事业正在进行有系统的改进和推广工作。年轻的人民中国的电影已经迅速地在市场上代替了美国电影的地位，受到了广大观众的欢迎，并正在逐步深入到部队、工厂、农村中间去。书籍、刊物和报纸的发行量和流通范围，也已经迅速地增加和扩大。

人民政府在领导人民反对愚昧的同时，领导着人民向疾病作斗争。在过去一年内，人民政府已经大规模地展开了防治疫病的斗争。人民政府决定在最近几年内在每个县和区建立起卫生工作机关，以便改进中国人民长时期的健康不良状况。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年，虽然还遭遇着种种困难，虽然也还有许多工作上的错误和缺点，但已经显出了自己的壮健的生命力和无限的前途。困难是可以克服的，而且已经克服了许多。工作上的错误和缺点是可以改正和弥补的，而且已

经改正和弥补了许多。人民对于自己的国家已经给予了信任。毫无疑问，人民的信任是正确的。在中国，历史上只有一个政府，曾经在一年内做了这么多有利于人民的工作；只有一个政府，曾经在一年内驱逐了那么多的强盗式的“军队”和“政府”，而代之以纪律严明和蔼可亲的人民军队和廉洁而讲道理的人民政府；只有一个政府，曾经在一年内剥夺了帝国主义国家的特权，消灭了可恨的特务机关，停止了无限期的通货膨胀，而给予人民一种欣欣向荣的气象；这个政府，就是中央人民政府。

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伟大的开端中所得到的这一切成功和胜利，乃是全体人民团结一致共同奋斗的结果，乃是中国人民伟大领袖毛主席天才领导的结果。

全中国人民将在自己的政府和领袖的领导之下，团结一致，努力工作，巩固和发展这些胜利。

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创造者和领袖毛主席万岁！

抗美援朝〔26〕 保卫和平^{*}

（一九五〇年十月二十四日）

朝鲜反侵略战争胜利地开始，大家看到了朝鲜人民的英勇，同时也看到了帝国主义的残暴。

七月半以后，帝国主义向南撤退，迅速地把军力集结在朝鲜半岛南方大邱地区，意图引诱朝鲜人民军向其进攻。年轻的朝鲜人民军是勇往直前的，要一直把美国兵赶下海去。当时的形势已表现出战争将长期化。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是一个新的国家，朝鲜人民军是一支年轻的部队，他们战斗非常英勇，真使我们感动。敌人依仗暂时的强大，有意制造阴谋。现在朝鲜是困难的，但他们英勇地坚持着，在南方打游击，在北方抵抗，斗争仍在继续，只要坚持下去，就可以生长出新的力量来打败敌人。朝鲜地方较小，所依靠的基础是九百万人口，以这样的力量，抵抗这么强大的敌人，下了长期抵抗的决心，是难能可贵的，我们应当赞佩。

朝鲜问题是一个国际问题，它同国际上的其他问题是不可分割的，朝鲜人民的长期抵抗，将更增加问题的国际性。同时，朝鲜要胜利，也必须得到国际的援助。尤其是在困难的时

^{*} 这是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十八次常务委员会上的报告。

候，更需要国际的援助。我们应该发扬革命的道义。只有朝鲜胜利了，和平阵营才不会被打开一个缺口。如果朝鲜这个缺口被打开，则其他方面要相继被打开。东方阵线门户洞开，敌人打进我们的大门来了，怎么还能谈建设？

中朝是唇齿之邦，唇亡则齿寒。朝鲜如果被美帝国主义压倒，我国东北就无法安定。我国的重工业半数在东北，东北的工业半数在南部，都在敌人轰炸威胁的范围之内。从八月二十七日到昨天这两个月间，美帝国主义的飞机已侵入我国十二次。最近不仅在鸭绿江，而且已飞到宽甸来示威、侦察、扫射和轰炸。如果美帝打到鸭绿江边，我们怎么能安定生产？

我们国家的建设需要有三年五年时间先恢复生产，我们也正在进行恢复工作。最近拟定了一九五一年的经济计划，总想减少军费，增加经济建设费和文教费，把军费由今年占预算的百分之四十三减为明年占预算的百分之三十，以全部概算的百分之七十投入经济建设、文教事业等，并考虑改善公教人员的生活，收购农民的余粮，发展日用品的生产。但敌人不让我们这样做。不久以前华莱士〔27〕给毛主席一封信，他说，愿中国造拖拉机，不要将造拖拉机的力量造了坦克车。实际是敌人不许我们建设，逼得我们不能造拖拉机。

假如我们采取消极防御的办法，那是不行的。消极防御也要花许多钱，例如改装一个飞机场就要一亿斤小米，东北修八个，关内修三个，就要十多亿斤小米，飞机场外还有许多设施，所费甚大。再有工厂搬家，许多工业无法按计划生产下去。军事上，除装备之外，还有兵力问题，鸭绿江一千多里的防线，需要多少部队！而且年复一年，不知它哪一天打进来。这样下

去怎么能安心生产建设？况且敌人如果将朝鲜侵占了，也不会就此罢手。所以，从朝鲜在东方的地位和前途的展望来说，我们不能不援助；从唇齿相依的关系来说，我们也不能不援助。这是敌人把火烧到了我们的大门口，并非我们惹火烧身。

一个月前，就是说美军在仁川登陆以前，我们曾经考虑过，美帝打到三八线^{〔28〕}后是否会停止，而后转为外交的谈判。在敌人占领汉城以后，尼赫鲁^{〔29〕}曾经对我们说，三外长会议^{〔30〕}已经说好，不过三八线，如要过三八线也要提到联合国来决定。但我们得到的情报是，他们要稳住中国，过三八线，过了以后，再搞中国。我们看穿了骗局，所以在九月三十日声明：对美帝侵略朝鲜我们不能置之不理^{〔31〕}。十月一日、二日的消息是美军已过三八线，南朝鲜军则在三八线以北深入很远。我们曾找印度驻华大使指出，以上情况与尼赫鲁所说不同，我们对朝鲜问题不能不管，要他通过尼赫鲁转告贝文^{〔32〕}。过了几天，敌人的推进并不停止。不久，贝文通过尼赫鲁向我表示，过了三八线到距鸭绿江四十英里时即可停止。当时敌人已进到平壤。目前，敌人又由平壤北进。这显然是对我们第二次欺骗。如此下去，我们如坐视不救，敌人必然继续前进，咄咄逼人，直到鸭绿江边，然后再做第二步文章。

所以我们要理，要管。但如何理？如何管？要有进一步的决策。过去我们是管过理过的，例如向联合国控诉等。现在这样已经不够了，应有新的决策。美帝国主义的政策是一步步地制造并扩大战争。如果我们予以打击和斗争，它可能缩回去，否则它必然照计划继续推进。

美帝国主义在东方实行麦克阿瑟^{〔33〕}的政策，利用日本的

基地，继承日本军国主义的衣钵，沿袭着甲午战争〔34〕以来的历史，走吞并中国必先占领东北，占领东北必先占领朝鲜的老路。不过日本帝国主义是用四十多年的时间逐步进行的，而美帝国主义则要在四五年内来完成。

历史的教训是：对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我国一派主抗，一派主让，让到七七事变〔35〕，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抵抗，还抗不起来。甲午之战也是抗，不过那是在统治者中的抵抗，由腐败的朝廷领导，没有人民的支持，结果失败了。如果是人民的国家，就不会如此。

现在对美帝如果不抵抗，一着输了，就会处处陷于被动，敌人将得寸进尺。反之，如果给以打击，让它在朝鲜陷入泥坑，敌人就无法再进攻中国，甚至会影响它派兵到西欧的计划。这样，敌人内部的矛盾也会发生。总之，如果我们让，只会缓和敌人内部的矛盾；管，则会促使敌人内部矛盾加深。只有管，才能使敌我力量的对比发生变化。不过，我们过去的管法现在已经无效，只有拿出力量来管，才能起作用。

朝鲜问题对于我们来说，不单是朝鲜问题，连带的是台湾问题。美帝国主义与我为敌，它的国防线放到了台湾海峡，嘴里还说不侵略不干涉。它侵略朝鲜，我们出兵去管，从我国安全来看，从和平阵营的安全来看，我们是有理的，它是无理的。

美帝国主义用武力压迫别国人民，我们要使它压不下来，给它以挫折，让它知难而退，然后可以解决问题。我们是有节制的，假如敌人知难而退，就可以在联合国内或联合国外谈判解决问题，因为我们是要和平不要战争的。必须由朝鲜人民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外国军队必须退出朝鲜。如果解决得好，

美帝国主义受到挫折，也可以改变台湾海峡的形势和东方的形势。我们力争这种可能，使国内外人民一致起来，动员起来。

还有另一种可能，敌人愈打愈眼红，打入大陆，战争扩大。敌人孤注一掷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因为美帝有疯狂的一派，我们应该做这方面的准备。我们并不愿意战争扩大，它要扩大，也没有办法。我们这一代如果遇着第三次世界大战，为了我们的子孙，只好承担下来，让子孙永享和平。不过我们绝不挑起世界大战。我们应力争前一种前途，力争和平。但也准备应付后一种可能，应付世界大战。

既然要拿出力量来管，那么我们的力量如何？

我们的陆军是能够解决问题的，但是空军海军不足，因为我们在去年春天才开始建空军和海军。那么是否要等到我们力量强大时再抵抗呢？不行。那样敌人就会把朝鲜压了下去，气焰会更加高涨，敌我力量对比会相距更远。所以我们必须全面地发展地考虑问题，到斗争中去增强自己，在狂风暴雨中锻炼自己。革命的力量有时看起来是劣势，在斗争过程中却会变为优势。当然，这需要一定的时间，要付出一定的代价。另外，我国大陆防卫的力量也要顾到。敌人可能来轰炸，或者用蒋介石的空军来轰炸，或登陆袭扰，我们应增强防卫力量。政治上，我们有同盟国家、友好国家的支援，力争和平。方式上，我们采取志愿军的形式，无须宣战。宣传上，我们应该广泛宣传抗美援朝，保卫和平。同时，我们在国内要镇压敌特的捣乱，巩固广大人民内部的团结，经济建设不能停止，重工业要有重点地恢复，水利、铁道、纺织这几方面的建设要不动摇地进行，并且要照顾到人民生活的改善。

切实执行婚姻法， 保护妇女合法权益^{*}

（一九五一年九月二十六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36〕是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后公布的国家大法之一。这一国家大法的公布施行，是中国人民在赢得革命战争胜利之后和全国范围进行土地改革〔10〕的同时，进一步肃清封建残余和建立新的社会生活的重大的社会改革。这一国家大法公布施行以来，已经获得广大人民的拥护，并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封建压迫的旧家庭制度正在逐渐变革，平等和睦的新家庭正在不断产生。大批新中国的男女，特别是深受封建制度压迫的妇女群众，得到了婚姻自由和男女平等的权利，因而更积极地参加了新社会的各种政治活动和各种建设事业。

但是，由于中国社会曾经长期地受着封建主义的统治，虽然土地改革运动已经或正在从经济基础上给封建制度以根本的摧毁，而封建思想和封建婚姻制度的残余，不仅在一部分人民中，甚至在不少的干部中，依然留有深固的影响。根据各方

^{*} 这是由政务院总理周恩来署名发布的《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检查婚姻法执行情况的指示》，刊载于一九五一年九月二十九日《人民日报》。

面的报告，许多地方带有封建思想的人仍有继续干涉男女婚姻自由、虐待妇女和虐待子女等非法行为，而一部分干部竟对此种非法行为采取袖手旁观的态度，或者有意予以宽纵、袒护，甚至他们本身也做出直接干涉男女婚姻自由的非法行为，致使被干涉者和被虐待者得不到法律上和事实上应有的保护。因此，包办、强迫与买卖婚姻在许多地方，特别在农村中，仍然大量存在。干涉婚姻自由与侵害妇女人权的罪行时有发生，甚至严重到迫害妇女的生命，致使全国各地有不少妇女因婚姻问题而被杀或自杀。据不完全统计，各地妇女因婚姻不能自主受家庭虐待而自杀和被杀的，中南区一年来有一万多人，山东省一年来有一千二百四十五人，苏北淮阴专区九个县在一九五〇年五月到八月间有一百一十九人。这些数字必须引起各级人民政府严重的警惕。各级人民政府对此严重情形绝对不应容忍。

最近几个月，华东军政委员会、中南军政委员会和有些省（市）人民政府已先后发布了贯彻执行婚姻法的指示，对于上述违法现象加以处理和纠正，这是十分必要的。但在中国这样一个曾受长期封建主义统治的社会中，婚姻法的执行是一件艰巨的社会改革工作，必须经过经常的有系统的思想斗争和法律斗争才能贯彻。为此，各级人民政府一方面必须把婚姻法的贯彻执行和对于干部与人民的思想教育，当作相当长时期内经常的重大政治任务，并领导司法、民政、公安、文教等机关并与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通力合作，尽可能结合当地土地改革、民主建政等中心工作切实进行；另一方面，必须对于因干涉婚姻自由而伤害、虐杀妇女或逼致妇女自杀的严重罪

行，采取严肃的法律手段予以制裁。各级人民政府对于这种已经发生的伤害、虐杀妇女或逼致妇女自杀的案件，应即进行检查。已判者，如有错误，应予查明，依法处理；未办者，必须严加追究，依法制裁，务使每个犯罪者都受到应有的惩处。干部中如有宽纵、袒护罪犯，或干涉男女婚姻自由因而促成妇女被杀或自杀者，应按责任轻重，予以应得的处分。今后如有妇女因婚姻问题得不到婚姻法所赋予的权利与保护而被杀或自杀者，区、乡、村（街）级的主要干部，首先应负一定责任。

为了保证婚姻法的正确执行与贯彻，各级人民政府首先应教育干部，尤其是区、乡、村（街）级干部和司法干部，认真地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各级司法机关与婚姻登记机关在处理婚姻事件时，必须严肃负责，遵守婚姻法的规定，并应通过具体事例加强对婚姻法的宣传，批判封建主义婚姻制度的不合理，表扬按照婚姻法处理婚姻事件的典型例证，在人民中树立新民主主义婚姻制度的新风气，而对于有教育意义的严重案件，则应在群众中进行充分的准备工作后举行公审，以便正确而全面地教育干部和教育人民。同时，各级人民政府、人民解放军、各民主党派和各人民团体的每个干部都应认识到：能否认真坚决地执行婚姻法；能否采取严肃慎重负责的态度解决婚姻案件，保护妇女的合法利益；能否积极支持群众特别是被压迫的妇女群众反对封建婚姻制度和反对封建思想的正义斗争；能否在处理自己本身的婚姻问题时以身作则地遵守婚姻法——这些，都是自己在政治上是否愿意彻底反对封建主义的严重考验，也是能否严格地遵守人民政府法令的严重考验。

本指示下达后，省（市、行署）以上各地方人民政府应即督促所属司法、民政、公安、文教等部门并邀请协商机关及各民主党派和各人民团体参加，有领导有重点地组织一次关于婚姻法执行情况的检查，采取有效办法发扬成绩，纠正缺点，并查处杀害妇女或逼致妇女自杀的严重违法的案件。各省、市人民政府应将此项检查结果于十二月底以前向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做专题报告。本年内各级人民代表会议〔22〕及其协商委员会或常务委员会在开会时，必须进行一次关于婚姻法的宣传和执行情况的报告和讨论，并将讨论结果按级上报。

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

（一九五一年九月二十九日）

北京大学教师学习会^{〔37〕}和马校长^{〔38〕}要我给他们做一个报告。我想，既然给北京大学讲，也就应该给别的大学讲。因此，我同教育部商量了一下，这个报告会就以北京大学为主，把北京、天津其他大学的教师和同学代表也请来了。

我讲什么呢？做一般的政治报告吧，也许不适合大家的要求，因为大家正在进行思想改造的学习，这样的报告不是最需要的。既然在学习，就一定要下决心改造自己。因此，我想讲一讲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

讲到改造问题，我想还是先从自己讲起。我中学毕业后，名义上进了大学一年级，但是正赶上五四运动^{〔39〕}，没有好好读书。我也到过日本、法国、德国，所谓留过学，但是从来没有进过这些国家的大学之门。所以，我是一个中等知识分子。今天在你们这些大知识分子、大学同学面前讲话，还有一点恐慌呢。不过，我总算是知识分子出身的，对知识分子的改造有一些体会，联系自己来谈这个问题，可能对大家有一点帮助，有一点参考作用，总不至于成为一种空论吧！

^{*} 这是在北京、天津高等学校教师学习会上讲话的前两个问题。

大家学习的目的是为了改造自己。我想，凡是要求学习的人，都应该有这样一个起码的认识。当然，改造需要时间，一下子要求很高、很快，这是急躁的，不合乎实际的。应该由浅入深，循序渐进。拿我个人来说，参加五四运动以来，已经三十多年了，也是不断地进步，不断地改造。也许有的同志会说：你现在担任了政府的领导，还要学习和改造吗？是的，我还要学习和改造。因为我不知道的事情还很多，没有明白的道理也很多，所以要不断地学习，不断地认识，这样才能够进步。三十年来，我尽管参加了革命，也在某些时候和某些部门做了一些负责的工作，但也犯过很多错误，栽过筋斗，碰过钉子。可是，我从不灰心，革命的信心和革命的乐观主义鼓舞了自己。这个力量是从广大人民中间得到的。我们应该有这样的态度和决心，即犯了错误，就检讨，认识错误的根源，在行动中改正错误。有了犯错误的经验，就可以少犯以至避免再犯同样的错误。当然不可能一次就改得好，犯了一次可能再犯，但总可以改正吧！犯了错误，不要当作包袱，要把它丢开。丢开了还不算，还应该公之于众，作自我批评。这不仅可以教育自己，同时也能帮助别人少犯这样的错误。也就是告诉别人：这类错误是可以改正的，只要认识了，同时又肯改，仍然是可以进步的。犯了错误，关起门来检讨是需要的，更需要的是到人民中去学习。一个人之所以犯错误，一方面是由于对理论、原则认识得不清楚，所以需要向进步的理论求教；另一方面是由于自己相信的那一点道理跟实际相矛盾，行不通，所以必须向广大群众求教，从实践中求得新的认识，发现新的道理。这样两方面结合起来，就有了力量，就行得通了，也就可以不犯

或者少犯错误了。

我讲这一段话，是为了使同志们在学习的过程中建立这样一个信心：只要决心改造自己，不论你是怎么样从旧社会过来的，都可以改造好。在座的同志多数在旧社会生活过较长时间，会带来很多旧的东西，要求一下子把旧的影响肃清，这是不可能的。只有在不断的斗争中，才能求得进步。

下面讲几个大家在学习中可能遇到的问题，以及我对这些问题的认识。

一 立场问题

我们在学习和工作中，总有一个站在什么立场的问题。我们现在还不能说都已经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上来看待一切问题、处理一切问题了。这不仅是你们诸位，就拿我来说，几十年以前就参加了共产党，是不是进了共产党之后工人阶级立场就那么清楚了呢？也许看书学习、写文章的时候是那样，但是到实践的时候，是不是办每一件事情都合乎工人阶级立场呢？认真检查起来，还是差得很远的。工人阶级立场不是从空中掉下来的，也不是自己封的，决定的关键是实践，只有实践才能证明是否合乎这样一个立场。例如，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我们把广大的中国人民组织起来了，首先是把工人、农民、学生和一部分军队组织到革命的潮流里，革命的力量推动他们前进。但是，到了一九二七年武汉时期，有些人在陈独秀^{〔40〕}领导下，立场就很不稳了，跟着他犯了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这就说明他们没有坚定的工人阶级立场，受了

当时反动阶级的影响。类似的例子还有。所以，立场问题不是一下子就能解决的。

我国的知识分子，大部分是从地主阶级或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的，不能要求他们一下子就能站到工人阶级立场上来。

我的家庭是一个破产的封建家庭。我家原籍是浙江绍兴，后来祖父到江苏淮安做县知事，家也搬到淮安。我家虽然没有买土地，只有一幢房子，但仍然是封建官僚家庭，这样的家庭不能不影响我的思想。一个人幼年所受的影响，往往在他的思想上、生活作风上长期存在，说话或者写文章，如果不经很冷静地思考，旧的东西常常会不自觉地流露出来。

既然如此，要求知识分子一下子就有坚定的工人阶级立场，那是困难的，一定要有一个过程。

一般的人开始最容易有一个民族观念、民族立场。因为中国是一个百年来受帝国主义侵略的半殖民地国家，所以容易使我们产生爱国的民族观念。例如，我小的时候读章太炎〔41〕先生发表在《国粹学报》〔42〕上的文章，当时虽然读不大懂，却启发了我的爱国的民族思想。中华民国成立以后，袁世凯〔43〕、北洋军阀〔6〕的专横卖国，更使我增加了爱国的思想，因而积极参加了反对“二十一条”〔44〕、反对中日军事协定〔45〕等爱国活动。我想很多人都有这样的过程。这是一个好的起点。知识分子有了爱国的思想、民族的思想，就可以从这个立场上前进。

当然，这里面可能有危险性。假使从民族立场发展到国家主义〔46〕或狭隘的民族主义，对外侵略别的国家，对内压迫小的民族，那就走到邪路上去了。这种危险性虽然有，但是对

于中国的知识分子来说，不是主要的方面。其原因在于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中华民族是受外国侵略、欺凌和压迫的，所以人们首先产生的是一种民族的反抗侵略的爱国主义。在这样一个具体的环境中，大多数知识分子的思想可以由民族思想、爱国思想发展到争取民族解放和为人民的思想。所以，知识分子初步有了这样的思想，应该受到欢迎。当然，我们也要防止产生国家主义或狭隘的民族主义的危险思想。

在中国，国家主义是跟共产主义同时出现的。五四运动时的同辈们，今天在座的很多。大家知道，当时的少年中国学会〔47〕分成两派以李大钊〔48〕、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一派，走向了共产主义。另外，曾琦〔49〕、李璜〔50〕、左舜生〔51〕等人又是一派，他们走向了国家主义，结果做了国民党的尾巴。这个尾巴做得也很可怜，因为在中国这个半殖民地的环境里，不可能出现土耳其式的基马尔主义〔52〕。狭隘的民族主义在中国是行不通的，只有极少数人玩弄那种货色，在大多数的知识分子中是生不了根的。

一百多年来，帝国主义和中国的买办阶级、地主阶级勾结在一起，压在中国人民头上，形成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毛主席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说，一百多年来，多少仁人志士想替中国人民找出路，如洪秀全〔53〕和孙中山的革命，严复〔54〕和康有为〔55〕的改良，在当时都是想把中国往前推进，但结果都失败了。中国既没有象法国大革命〔56〕那样把封建势力完全摧毁，也没有象日本那样发生了明治维新〔57〕。为什么？原因很清楚，各位教授先生最近参加土改〔10〕工作时看到

了，中国的封建势力太大，地主和富农在中国农村中约占人口的十分之一。这些人散布在中国广大的土地上，压在农民头上，帝国主义就凭借着这些人统治中国。在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中，过去有些人企图走改良主义的道路，走旧的资产阶级革命的道路，但走不通，统统失败了，不能不找新的办法了。

中国人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更加觉醒了。俄国十月革命给了我们新的启示，使我们认识到要“走俄国人的路”。孙中山先生也提过“以俄为师”的口号。这样，中国第一次大革命就组织和发动起来了。许多知识分子从民族的立场进一步认识了人民的立场，觉悟到只有站在人民的立场上才能救中国，才最爱民族。因为封建经济束缚着中国广大农村的生产力，买办势力束缚着中国的民族工商业；国民党反动派集中代表了封建和买办势力，成为一种反动政治力量，他们依靠帝国主义，压在中国人民的头上。所以要求得民族解放，一定要有人民的立场，而不是只有笼统的民族观念。

人民的立场，是不是进了共产党以后一下子就站稳了呢？不错，当着对敌斗争很激烈的时候，我们是很清楚的，对地主阶级、买办阶级和国民党反动派是坚决斗争的，这是站在了人民的立场。但是到抗日战争时期，我们要和国民党讲联合，共同对外，这时有一部分共产党员的人民立场就不那么明确了。你们从胡乔木同志著的《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中可以看到，在抗日战争初期，毛主席坚决主张对国民党有联合有斗争，推动全面抗战，反对国民党不要人民的片面抗战，这是坚定的人民立场。但是有些共产党员，有时只注意联合的一面而忽略了斗争的一面，迁就了国民党，人民立场就不那么清楚了。一

九三八年在武汉，曾发生过这样的错误。那时联合的工作是做了，但斗争不够。后来认识了这个错误，纠正了，到重庆、南京工作时就好一点了。这就是说，人民的立场，在共产党的领导人当中也不是一下子就完全站稳了的。大家看过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那时在延安的文艺工作者读了很多书，又住过延安的学校，但还是有不少人没有站在人民的立场，所以毛主席在那篇讲话中就首先提出立场问题。

现在，工人阶级有工人阶级的想法，农民阶级有农民阶级的想法，城市小资产阶级有城市小资产阶级的想法，资产阶级有资产阶级的想法，只要各个阶级存在，他们的不同立场就会存在。我们今天要求大家有一个共同的立场，这就是为绝大多数人民的最高利益着想的人民立场。

由人民的立场再进一步站到工人阶级立场，那是更难的一件事。为什么要知识分子进一步站在工人阶级立场呢？因为工人阶级是最先进的，是为人民的，也是为民族的，将来要实现共产主义，使社会达到无阶级的境地。工人阶级的伟大就在于此。资产阶级不可能把所有的人都变成资本家。如果人人都当资本家，谁去做工人呢？如何积累资本呢？我参加共产党，最先就是这一句话说动了我，我也用这句话写过文章，向别人宣传过。为什么工人阶级是先进的？因为工人阶级可以使全世界的人都变成劳动者，使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统一起来。工人阶级和共产党最本质的东西，是它能使全世界进到没有阶级、谁也不剥削谁的社会，别的阶级和政党都不能担当这个任务。

对阶级立场问题，在知识分子中有几种认识。一种认识

是：中国没有那么多的工人，产业工人不过三四百万，并且是从封建社会中生长起来的，或多或少地带有封建的影响，恐怕不会很强，怎么能领导全国呢？另外一种认识是：中国共产党里面，农民、知识分子出身的党员占很大的数目，怎么能代表工人阶级的立场和思想？是不是代表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还有一种认识是：知识分子加入共产党以后，实行党的口号、政策，他的一切就都站在工人阶级立场上了，就体现工人阶级的思想了。这三种想法都是错误的。

我们认为，中国工人阶级尽管人数少，而且其中还有若干人受过封建的影响，但是只要积极工作，发展生产，跟世界上的工人运动的经验和先进理论相结合，这个力量就是无穷的。它是新生的力量，一定会发展壮大。一切新生的力量都是从小到大的。我们每一个人也是由幼年长大的，幼年的生长力是最强的。所以工人阶级在中国是有远大前途的。工人阶级能照顾全局的利益。将来在工人阶级领导下发展工商业，不仅对本阶级有好处，对农民有好处，对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也有好处。为了更好地发展工商业，它要把重要的生产资料掌握在国家手里，逐步走入社会主义社会。也只有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下，根据它的思想，根据国家的物质条件和不断提高的生产能力，才可以使中国工业化，消灭阶级，实现共产主义。所以不能因为它人数少而忽视这个最可靠、最有希望、最大公无私的阶级。

共产党内有大量的农民、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党员，他们能站稳工人阶级的立场吗？我认为，经过锻炼是可以站稳工人阶级立场的。工人阶级并不把它的立场私有，只要真正愿意

接受它的思想，就可以站到它的立场上来。中国工人阶级也是从旧社会来的，不过跟知识分子不同，它经过现代化大生产的锻炼，体现了先进的思想和立场。知识分子的改造也要经过锻炼，经过学习，经过实践。知识分子到工厂去，到农村去，就是要学习工人阶级、劳动人民的思想和立场。这不仅是对党外知识分子说的，也包含党内的知识分子。梁漱溟^{〔58〕}先生在一封信上说，过去认为共产党的领导人都是知识分子，党员很多是农民，大概你们是农民思想、小资产阶级思想吧？他这话有一半道理，就是一些共产党员如果不经过改造，是会有很多农民思想、小资产阶级思想的，但经过改造就会逐渐减少，工人阶级思想就会逐渐加多。毛泽东思想体现了中国工人阶级的伟大思想。即将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就是体现中国工人阶级思想的伟大著作。

做了共产党员，是不是就一切都合乎工人阶级的立场和思想了呢？不是的。也许我们主观上觉得是为工人阶级了，但有时我们的工作犯了错误，实行的政策有了偏差，说明我们还不是真正站稳了工人阶级立场。这种情况是常有的。我们过去发生的右的或“左”的错误，就是离开了工人阶级立场对反动阶级迁就，或者是把自己这个阶级孤立起来。拿我个人来说，就有过多次这样的经验教训。正是因为有过这样的错误，才使自己受到更多的教育。工人阶级立场不是那么容易站稳的，需要长期地摸索、学习、锻炼。毛泽东思想是我们革命的指南针，但是单靠这个指南针还不行，还要有自己的革命实践。毛主席常说，任何一个人不经过自己的实践，碰过钉子，摔过跤，别人的经验对他总是作用甚小。自己实践的经验

是最可宝贵的，最有用处的。所以共产党员也需要经过锻炼，而且是长期的锻炼。

从民族立场进一步到人民立场，更进一步到工人阶级立场，大体上会有这么一个发展过程。要促进这个发展过程，推动知识分子的进步，防止这个过程中可能发生的各种偏差，逐步地解决立场问题。

二 态 度 问 题

明确地认识了立场的发展过程，态度问题也就容易解决了。一个人生活在社会中，生活在世界上，对遇到的任何事情总会有一个态度。立场不同，态度也就不同。

今天的世界上还有阶级存在，还有国家的对立。帝国主义侵略集团要统治全世界，尤其是美帝国主义，要把世界变成美国的世界。中国人民是深受美帝国主义帮助蒋介石大打内战之苦的，现在美帝国主义又侵入朝鲜，侵入我国的台湾。世界人民经过两次世界大战逐步觉醒了，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民主国家先后建立了，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不断发展，帝国主义国家的人民也在逐步觉醒。全世界人民都不愿意再受帝国主义的剥削和侵略，不愿意再遭受战争的痛苦，要求持久和平。世界分成了两个阵线，这是客观形势发展的必然结果。

对这样的世界形势，我们中国人民怎么能够不表明自己的态度呢？必须要有明确的态度。首先要分清敌我友，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没有这样一个区分，那你是什

么态度呢？难道你站到敌人方面去？当然，在中国还有站在敌人方面的反动分子、反革命残余分子，我们要肃清他们。但是，站在人民立场上的人，站在爱国的民族立场上的人，能不表明态度吗？所以，我们在学习时必须要有敌我友的观点。全世界人民包含美国人民、日本人民在内都是我们的朋友，我们要争取他们。现在还被帝国主义欺压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政府，我们应该争取他们反对战争，赞成和平，即使是暂时的朋友，我们也要争取。一切国家，一切可以争取的政府，都应该争取，即使是中立，那怕是暂时的、在一个问题上的中立，对于人民来说也有好处。我们应该分清敌我友的界限。我们的敌人就是美帝国主义和它的同盟国家、帮凶国家的反动政府。我们的朋友遍及全世界，其中包含在某一个问题上一时的朋友。这样，我们人民的力量就壮大起来了。这是在国际上。在国内呢？这个问题已经清楚了。我们站在工人阶级立场上，首先应该巩固工农联盟，还要团结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以及其他一切爱国分子。我们的敌人就是反动阶级，最集中地表现在国民党反动派残余集团上，还有一些反革命残余分子。在态度问题上，是不是还有保持中间的可能呢？应该说，基本上没有可能，尤其在国内更没有可能。因为胜败已经定下来了，人民已经当政了。难道今天还可能又站在蒋介石方面又站在中国人民方面吗？也许可以躲到香港去，但那是临时性的，最后态度总是要判明的。

关于态度问题，我们历来主张靠自己觉悟。我举个例子，大家会清楚的。张伯苓^{〔59〕}先生，晚年做了国民党政府的考试院长，重庆解放以后，开始有了觉悟，后悔了。以后他回到北

京，又转到天津。他和我总算是师生关系了，也很接近，但是我丝毫没有勉强他写一个东西。以后他慢慢地认识了新中国，认识了人民中国的好处，开始跟我讲了一些他最赞成、最高兴的事，但是我仍然没有请他写个东西。我觉得一个人的进步要等他自觉地认识以后才最可靠。这样一耽搁，没想到他就年老病故了。临终前他写了一个遗嘱，大家可能在报上看到了。也许这是我的一个缺点，没有及早地帮助他提高觉悟。假使我知道他身体那样差，早一点提醒他一下，他也可能多一点进步表现，使人民对他有更多的谅解。这是我抱歉的地方。我再举一个例子：翁文灏〔60〕，大家也很熟悉，新华社宣布过他是战犯之一。但是他在欧洲表示愿意回到新中国来，无论如何也不愿意到美国去当教授。因为他有这样的表示，我们就欢迎他回来。他回来以后，有些朋友觉得他应该写一个声明，这样好使人民谅解他。但是我们仍然觉得不要太勉强，要他慢慢觉悟，自觉地写。

真正的中间态度，基本上是不存在的，一个时期的动摇、怀疑是有可能的。有一种人他对新生事物要怀疑一下，观察一下，我觉得应该允许。怀疑并不等于对立。对立就是敌视新中国，这不能允许。在学习中，对某一个问题持怀疑的态度是可以的，因为真理并不是一下子就能被人们接受的。真理愈辩愈明，我们不怕怀疑。观察一下也是可以的。梁漱溟先生初到北京的时候跟我说，有些问题他要观察一下。他在这点上很直爽，我们也很尊重他，所以介绍他到各个地方去观察。他每次回来的确都有进步，这一点我们应该欢迎。他观察一个时期就提出一个新的认识，那很好嘛！观察不等于旁观，观

察的态度是积极的，旁观的态度是消极的。

还有一种态度是同情但不参加。这种人只是做到对中国革命表示同情，但是参加还要考虑考虑。这也是允许的。我们愿意等待，而且要耐心地等待。香港有许多人跟我们打过招呼，说他很同情新中国，但是他自己暂时还不能回来。我们绝不勉强。因为这里面还有客观的原因和主观的原因，我们应该谅解。

加强老根据地的工作

（一九五一年——一九五二年）

一 下山不忘山，进城不忘乡^{*}

（一九五一年十月九日）

各位同志：

你们从老远的地方来到了北京。南方老根据地的同志是从广东、四川、江西、湖北、安徽、浙江等省来的。北方老根据地的同志是从陕北、东北、华北等地来的。志愿军战斗英雄的代表是从朝鲜前线来的。解放军的战斗英雄是从各大军区来的。这是很不容易的事。今天借这个机会，中共中央、中央人民政府和各大区的负责同志，都来到这里同大家见见面。

今天看到你们真是高兴。我们离别已经好些年了，有十年的，还有二十年的。中国革命进行了三十年。一九二七年的大革命失败后，毛主席带着队伍到了井冈山，在农村建立根据地，这样才使我们的力量生长起来，依靠这个力量，我们的党、我们的军队都得到发展。革命由南发展到北，军队由红军、八路军和新四军发展到人民解放军，最后打垮了蒋介石，取得了

* 这是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举办的来京参加国庆节观礼的战斗英雄代表和老根据地代表联欢会上的讲话。

全国性的胜利，建立了新中国。去年我们的志愿军到了朝鲜，和朝鲜人民军一起打败了美国侵略者。这些胜利是来之不易的。在毛主席的领导下，依靠大家长期的英勇奋斗，才取得今天的胜利。饮水思源，我们应该向你们致敬，向你们代表的各老根据地的人民致敬，致谢。在这三十年当中，不知牺牲了多少人，我提议，大家起立为这些烈士志哀。

同志们，你们来到北京是不容易的。你们不只看到了毛主席，看到了我们的首都，还看到了我们军队的力量，看到了人民对我们党、我们领袖的热爱。希望你们回去以后，把这些告诉广大的人民和军队，进一步增强胜利的信心。

这次中央人民政府派遣访问团到各个老根据地，听到了一些意见。有的同志说，革命胜利了，不要下了山就忘了山，进了城就忘了乡。我们应不应该下山，应不应该进城呢？应该的。假若不下山、不进城，就不能够取得今天全国性的胜利，革命就不会成功，那我们作了那么大的牺牲，付出那么多的代价，就没有意义了。有些代表大概还记得，在我们离开瑞金以后，老根据地的人民遭到白匪的残杀。假若没有今天的胜利，我们能够回去吗？同志们，山是应该下，城也应该进。我们的胜利是依靠了农村的，但今后农民生活的改善，还必须依靠城市。革命就是为了使全国人民不再过苦日子，要过上好生活。应该下山，应该进城。但是正如老根据地的同志所说的那样，下了山不应该忘了山，进了城不应该忘了乡。如果忘了，就是忘本。中国革命过去是以农村为根据地的，如果忘了这些根据地，就不是毛主席的好学生，就应该受到批评。毛主席这次特别派访问团去，就是为了关心老根据地的人

民。访问不只是为了看看，而是想尽力解决一些问题，当然不可能一下子把所有的问题都解决。现在战争尚未结束，志愿军还在朝鲜作战，国家还有困难。在取得全国性胜利后的今天，我们还不能够转过手来大力改善生活，还须进一步克服困难，努力恢复和发展生产，并加强我们军队的力量，使美帝国主义不敢发动大战。我想老根据地的同志们是会理解这一点的。

我们有些干部对改善老根据地的群众生活关心不够，应该承认错误。今后各省的省委和政府要关心老根据地的事，每省应该有一个副主席专门负责老根据地的工作，每年至少要到各地看一两次，帮助老根据地的人民解决一些困难。各级人民代表会议〔22〕要有一定数量的军烈属代表参加。如果下面不这样做，你们可以给政府写信，给我写信，给党中央写信，我们一定予以答复。这样做，也会使我们声息相通，更加了解。

你们提出来的几个具体问题，如贷款、修路、兴修水利、城乡交流等，已交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讨论，帮助你们解决一些问题。

文教方面，要在老根据地增设小学、中学，还要办些工农学校，开展成人教育和干部教育。有的同志说，大干部到了北京，小干部到了省，乡下无干部。这句话是有一定道理的。老根据地为全国培养了干部，这是很大的光荣。现在乡下干部少了，应该很好地培养新干部，并且帮助现有干部提高政治文化水平，以适应工作的需要。

卫生工作也要作为重点。最近我看到一个报告，反映陕

北保安县的婴儿死亡率很高，这是多么令人痛心的事！当年我们在瓦窑堡站不住脚退到了保安，保安人民为革命出了力。现在知道那个地方的婴儿死了那么多，于心何安！我们已命令卫生部派医疗队到那个地方去。象这样的事，今后是不应该发生的。

还听说在乡下轻易看不到戏和电影。我们也下了命令，先让北京的剧团十一月份到乡下去，为农民群众演出，争取大家都能看一看。

在优抚方面也要规定更好的办法，不要发生“优新不优老，优生不优死”的现象。

参加人民代表会议的军烈属代表，应该在农村中由大家评选，再报上面批准。

以上这些事我们要发个文件^{〔61〕}，传达到各地。

今天是老根据地代表和战斗英雄代表两部分人联欢。没有老根据地就不会有我们的解放军，解放军是老根据地人民的子弟兵。子弟兵看见老根据地的人就象看见了自己的叔叔、伯伯、兄弟、姐妹。大家可以在一起叙叙知心话，彼此给予安慰和鼓励。

最后，希望你们象毛主席说的那样：“发扬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62〕}

二 大力扶植老根据地的 经济和文化建设^{*}

(一九五二年一月二十八日)

(一) 中央人民政府派遣访问团访问各老根据地并邀请各老根据地人民代表来京参加国庆节观礼，加强了中央人民政府及各级人民政府与老根据地人民的联系，表扬了老根据地人民伟大的革命功绩，提高了老根据地人民热爱祖国和建设祖国的积极性。这一收获是很大的。

老根据地人民长期对帝国主义、国民党匪帮、封建地主的残酷压迫进行斗争，贡献最大，牺牲和受到的摧残也最大。解放后经过积极生产，部分地区已经恢复，有的地区甚至超过战前水平，但大部分老根据地因遭受战争创伤太重，且地处山区，交通不便，生产恢复很慢；其中若干地区又遭到水旱灾害的侵袭，特别是南方老根据地因重获解放为时较晚，荒芜现象仍多数存在，人民生活极为困难。因此，无论从政治上或经济上都必须十分重视加强老根据地的工作，大力领导与扶植老根据地人民恢复与发展经济建设与文化建设。

(二) 加强老根据地的经济建设，是加强老根据地工作的中心环节。老根据地多系山地，生产条件比较困难，应该本着解决群众当前生活困难与长期建设相结合的方针，因地制宜，

^{*} 这是由政务院总理周恩来署名发布的《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加强老根据地工作的指示》，刊载于一九五二年二月一日《人民日报》。

有计划地有重点地逐步恢复与发展农林畜牧与副业生产。一般地区应以农业为主，不宜耕耘的山岳地带应以林业与畜牧业为主，但均须同时极力注意利用当地一切条件发展当地有可能发展的手工业和副业，以增加群众收入。

1. 恢复与发展农业生产：首先要补充农具，增加耕畜，养猪养羊，以克服当前缺乏农具、耕畜和肥料的困难。从长期与全局打算，山地应不再开荒，但凡能修成梯田的坡地，要尽快地逐步修成梯田，并集中力量提高现有耕地的单位面积产量。在有条件的地区，修塘，筑坝，开渠，打井，扩大灌溉面积；治河，防洪，闸山沟，修水库，做好水土保持。在粮食缺乏的地区，应提倡增种多产作物如红薯、马铃薯、南瓜等；在不缺粮食的地区应有计划地提倡栽种经济作物如棉、麻、烟等，以增加群众收入。

2 发展林业 提倡封山育林，禁止烧山燎荒，滥伐林木，挖掘树根，但必须照顾群众当前生产与生活的需要，反对机械的封死，进行合理的砍伐。在有条件地区应积极发展茶、桑、桐、橡、茶油、漆、果树等经济林木及其他用材林、薪炭林，并根据当地条件发展采集药材及竹木编制等副业。

3 发展畜牧 为增加老区人民收入，增加畜力、肥料，并供应毛纺制革原料，应大力增殖牛、羊、马、驴、骆驼、猪、鸡等。提高饲养技术，奖励繁殖。加强畜疫防治，畜种改良。为此，应有计划地建立防疫组织与繁殖场、配种站。

4. 发展手工业与副业：许多老根据地农村副业收入占全部收入的百分之三四十以上，有的甚至超过农业生产的收入。农村副业和手工业是多种多样的，必须因地制宜有计划地加

以恢复与发展，合作社和国营贸易机关应尽力帮助他们打开销路，以增加老根据地人民的收入。有些地区应特别提倡土特产与农产品的加工，如造纸浆、缫丝、烧酒、打蛋等。在兽害严重地区应组织群众打猎。

5. 开采矿产：老根据地多系山地，各种矿产如煤、铁、石灰、钨、锡等蕴藏丰富，在不破坏矿藏、不影响大规模开采的原则下，可以有计划地扶助当地群众按照开矿的规定作小型开采。

（三）正因为老根据地多系偏僻穷困的山区，要求得老根据地经济建设的迅速恢复与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就必须首先解决以下几个问题：

1. 恢复与开辟交通，这是改善老根据地人民生活的主要关键。必须分级负责，采取发动群众义务劳动为主、国家出资为辅的办法，有计划地修好老区主要的交通干线如公路、大车路、驮骡路、人行路以及河道等，利用当地一切可能利用的交通工具如大车、手推车、船筏等，并扶助群众添置这些交通工具，发展运输业。建立转运货站，把运输工作加以组织，以利推销土产和供应山区人民所需要的生产资料与生活资料。

2. 增设国家贸易机构与供销合作社，组织私商上山，建立山区商业网，促进物资交流。合作社应以山区为发展重点之一，指导群众提高产品质量，进行规格教育，使当地土特产得到畅销。贸易公司、合作社应在对老根据地人民不挣钱甚至采取若干贴补办法的精神下，收购山货、土产，并解决油盐等日用必需品。

3. 大力组织合作互助。在自愿互利的原则下，采取多种

多样的形式，如互助组及养畜、造林、修滩等合作社，逐步把群众组织起来，有条件的地区可适当提倡农业生产合作社。

4. 今后一般贷款应将老区列为重点之一。并应依据当地条件举办养牲畜、修水利、修梯田、购买农具等特殊贷款。举办贷款时应注意适当延长期限，简化手续，及时放发。这次拨给老根据地的特别救济费，应结合生产发出，或提出一部作为建设基金。

5. 老根据地遭受的战争创伤深重，生产水平较低，人民生活很苦，为帮助老区人民迅速恢复元气，在负担上应以省为单位，适当加以调整。特别困难的老区，可宣布免纳一定时间的公粮。

（四）加强老根据地的文化教育、医疗卫生与优抚工作：

1. 老根据地人民的政治水平一般较高，对文化生活的要求尤为迫切，必须提倡文化下乡，电影上山，普及社会教育，并在这些地区增办小学、中学、工农速成中学和各种技术学校，以培养工农出身的知识分子及各种专门人才。为此，应以省为单位适当调剂教育经费与教员。

2. 老根据地人民的医药卫生要求也十分迫切。卫生机关应协同有关部门在老根据地大力开展卫生防疫运动，宣传卫生保育知识，设立卫生站与医院，派遣医疗队巡回治疗，开办卫生医疗人员训练班、新法接生训练班，帮助中医学习，设立中药铺，并注意供应海盐、海带等以避免粗脖子、柳拐子等病症，保护群众健康。

3. 在优抚工作上，首先是收葬烈士遗骸，收集烈士事迹。老根据地烈军属多，他们缺乏劳动力，生产与生活困难最多，

过去有些地方对优抚条例〔63〕的贯彻施行较差，今后必须切实执行优抚条例，加强对缺乏劳力的烈军属的代耕工作，保证他们的生活不低于一般农民。县、区应定期召开烈军属、革命残废军人和优抚模范的代表会议，以便检查优抚工作，交流代耕经验，进行政治教育。各级人民代表会议也应有烈军属及革命残废军人的代表参加。

（五）老根据地的工作是一件光荣的任务，应作为有关省、专署考绩中的一项。凡辖区内有老根据地的各级人民政府要把老根据地的恢复与建设工作作为一九五二年的工作重点之一，并组织专门委员会，指定得力干部经常注意老根据地的工作，及时检查、督促。开好老根据地的代表会，并将加强经济建设作为会议的主要内容。除重获解放的时间较晚、土地改革〔10〕尚未完成或刚刚完成不久者外，一般老根据地的县、区、乡人民代表会议均应代行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未建立区、乡人民代表会议者，应迅速建立区、乡人民代表会议，使富有斗争经验与政治认识的老根据地人民自己起来讨论与执行自己的事，选举自己的行政人员，发扬人民的积极性，“发扬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

必须认识老根据地的恢复工作是长期性的工作。凡辖区内有老根据地的省份，应根据当地具体情况，拟定切实可行的老根据地工作计划，领导群众逐步实现，并予以必要而又可能的经济扶植，争取在三五年内改变老根据地的经济面貌，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之上提高老根据地人民的物质生活与文化生活的水平。

“三反”运动与民族资产阶级^{*}

（一九五二年一月五日）

目前,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运动,正在各级政府机关、企业、学校、团体、军队、党派中紧张地进行,并需要继续深入。贪污、浪费、官僚主义的毒害,在中国的阶级社会中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是有着深厚的社会基础的。要完全地彻底地铲除这一积害,必须全社会都动员起来,特别是与贪污、浪费有密切关系的工商界要动员起来。

今天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有其积极进步的一面,那就是由于他们长期受过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他们中间一部分代表人物,在一定时期、一定程度上参加过或同情过人民解放斗争。解放后,他们逐渐参加了人民中国的建设,并在国家的领导下,发挥着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还有其黑暗腐朽的一面,那就是由于他们与帝国主义的、封建的、官僚买办的经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同时,中国资产阶级本身也同世界各国的资产阶级一样,具有唯利是图、损人利己、投机取巧的本质。因此,解放后,他们中间有很多人,正如天津工商界自己所检举的,常常以行

^{*} 这是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三十四次常务委员会上的讲话要点。这个要点刊载于一九五二年一月八日《人民日报》。

贿、欺诈、谋取暴利、偷税漏税等犯法行为，盗窃国家财产，危害人民利益，腐蚀国家工作人员，以遂其少数人的私利。这种情形如果不加以打击和铲除而任其发展下去，则我们革命党派、人民政府、人民军队、人民团体日益受着资产阶级的侵蚀，其前途将不堪设想。不错，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是参加人民民主专政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国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也是我们国家五种经济成分^{〔64〕}之一，但是，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在人民中国并不是可以不受限制而自由发展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参加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政权，是承认了这个政权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以工人阶级及其政党中国共产党为领导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存在和发展，是要在国家经济领导之下的。因之他们在国家、社会和经济生活中是有可为的方面，亦有不可为的方面；有被容许发展的方面，亦有被禁止发展的方面的。凡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人经济事业，就容许发展；凡不利或有害于国计民生的私人经济事业，就不容许发展；凡能操纵国计民生的经济事业，就应由国家统一经营。这是《共同纲领》^{〔1〕}规定了的。只有这样，中国经济的发展道路才能由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否则，私人经济事业如果不受限制、不受领导而任其自由发展，则中国经济的发展道路将不是新民主主义而是资本主义，将不是走向社会主义而是回复到帝国主义的附属国或殖民地的经济。非如此，即如彼，中间的道路是没有的。

在新民主主义的中国，第一，不能孤立地讲公私兼顾，而一定要在服从国家经济领导的条件下讲公私兼顾，就是说，要在符合全国最大多数人民的最高的和长远的利益的原则下照

顾私人利益。第二，不能抽象地讲劳资两利，而一定要在承认工人阶级领导的前提下讲劳资两利，以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之目的。第三，不能提倡盲目生产，而一定要逐步实现国家生产总计划的领导。无论公与私，城与乡，中央与地方，大公与小公，都必须逐步纳入计划。否则，工农业的盲目生产，就会发生过剩与不足；商业的盲目经营，就会扰乱市场，波动物价。第四，不能容许谋取暴利，而只能在国家规定的限度或议定的价格内取得合法利润。第五，不能容许行贿、欺诈、偷税漏税、盗窃、引诱等犯罪行为继续发生，听其侵蚀人民政权，损害国家财产，腐蚀国家工作人员。凡有犯者必须惩办，坦白自首者则从宽处理。人民政府所保护和欢迎的是那些拥护《共同纲领》、服从政府法令的工商业家，而不是那些不受领导和限制而想自由发展、盲目生产、贪图暴利的工商业家。中国的工商业家如果按《共同纲领》的方向发展，遵守国家政策法规，服从国营经济和国家生产计划的领导，那么，他们的出路是光明的，他们不但在目前时期可以充分地发展他们的有利于国计民生的事业，而且在将来全国转入社会主义的时期，也一定可以得到工作的机会，并且可以保留他们的消费财产。相反，如果有人违背《共同纲领》和国家政策法规，抵抗国营经济和国家生产计划的领导，那是与新民主主义的经济背道而驰，无疑必将遭受全国最大多数人民的反对而归于失败。正因为只有工人阶级才能担任领导而资产阶级决不能担任领导，所以在新民主主义的中国，其指导思想只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只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而资产阶级思想却不能不受到批判和改造。

中国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今天通过《关于展开各界人士思想改造的学习运动的决定》，并决定首先号召全国社会人士特别是工商界人士参加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这是有历史意义的。我们号召全国工商界人士参加这一斗争，进行检举和坦白运动。这不仅在巩固人民民主政权和树立新的社会风气上将有所贡献，即在工商界人士的自我改造上也将有所收获，并利于他们与全国最大多数人民一道前进。

我们的外交方针和任务^{*}

（一九五二年四月三十日）

一、我们的外交方针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一直坚持和平的外交政策。我们坚持这一政策，相信以和平竞赛的方法来胜过帝国主义是完全可能的。当然，为防备帝国主义发动战争，我们应该在和平斗争中巩固国防，加强经济力量。要使帝国主义不敢发动战争，万一它发动战争，就叫它遭到失败。

我们在执行和平政策中的一些外交方针是：

（一）“另起炉灶”。一九四九年春，毛泽东同志就说过，我们的一个重要外交方针是“另起炉灶”，就是不承认国民党政府同各国建立的旧的外交关系，而要在新的基础上同各国另行建立新的外交关系。对于驻在旧中国的各国使节，我们把他们当作普通侨民对待，不当作外交代表对待。历史上，有在革命胜利后把旧的外交关系继承下来的，如辛亥革命后，当时的政府希望很快地得到外国承认而承袭了旧的关系。我们不做。毛泽东同志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中宣告，我国同外国的外交关系要建立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这是一百多年来旧中国的政府所没有

^{*} 这是在一次我国驻外使节会议上的讲话节录

做到的。毛泽东同志宣告后，我们以外交部长的名义把这一公告送达各国政府，向世界各国表明了我们的态度。为了表示外交上的严肃性，我们又提出建交要经过谈判的手续。我们要看看人家是不是真正愿意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同我们建立外交关系。在和平阵营方面，首先是苏联，然后是各人民民主国家相继承认了我们。这些国家是真诚地愿意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同我们建立外交关系的。因此，我们同它们很快地建立了外交关系。对资本主义国家和原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则不能不经过谈判的手续，看一看它们是否接受我们的建交原则。我们不仅要听它们的口头表示，而且还要看它们的具体行动。例如，它们如果在联合国中不投新中国的票，而去赞成蒋介石反动政府，那我们就宁愿慢一点同它们建交；反之，如印度、缅甸等，能够真的同国民党反动派断绝关系，那就可以在经过谈判之后同它们建交。

这一“另起炉灶”的方针，使我国改变了半殖民地的地位，在政治上建立了独立自主的外交关系。

（二）“一边倒”。在一九四九年党的建立二十八周年纪念日，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前夕，毛泽东同志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提出了“一边倒”的方针，宣布我国站在以苏联为首的和平民主阵营之内。之后，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在七月七日发表了联合声明，拥护这一方针。我国在世界上明确地站在和平民主阵线一边，旗帜鲜明，打破了帝国主义的幻想。如果没有这一明确的宣布，帝国主义者就会胡思乱想地望着我们，如司徒雷登〔65〕在南京时还想钻空子。“一边倒”

的方针给这种胡思乱想的人浇了一头冷水。

（三）“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帝国主义总想保留一些在中国的的特权，想钻进来。有几个国家想同我们谈判建交。我们的方针是宁愿等一等。先把帝国主义在我国的残余势力清除一下，否则就会留下它们活动的余地。帝国主义的军事力量被赶走了，但帝国主义在我国百余年来的经济势力还很大，特别是文化影响还很深。这种情形会使我们的独立受到影响。因此，我们要在建立外交关系以前把“屋子”打扫一下，“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但是打扫要有步骤，不能性急。我们在美帝侵朝的时候，针对美帝对我国采取敌视政策并冻结我国财产的情况，先接管或冻结美帝在华资产，并接管美帝津贴的文化机关，特别是在抗美援朝运动〔26〕中肃清亲美崇美恐美思想，这在平时恐怕要几年几十年才能做到。

（四）“礼尚往来”。资本主义国家，你对我好，我也对你好；你对我不好，我也对你不好。针锋相对，来而不往非礼也。我们总是采取后发制人的办法，你来一手我也来一手。不怕它先动手，实际上它一先动手就马上陷于被动。开国后我们用“另起炉灶”和“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这两手，在整个战略上处于主动地位。至于在具体事情上，是可以后发制人的。

（五）“互通有无”。我们开国以来就根据平等互利的原则同外国做买卖，不能象过去那样把中国作为它们的消费品市场。美帝国主义对我搞禁运，我们就以货易货，不用结汇，这对打破禁运是极有利的。我国出口的主要是农产品，换回来的是工业装备。我国同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的贸易大大增加，对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也增加了，我国的出口贸易额已经

超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数字。我们想扭转国民党时期的入超，变为出超，这是好的，但我们当前的目标是进出口平衡。现在我们入口的东西是我们所需要的，出口的东西如鸡蛋、猪肉，是人家所需要的，这种互通有无是互利的。

（六）团结世界人民。我们对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是“一边倒”的，对原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对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国家的人民也要团结争取，以巩固和发展国际的和平力量，扩大新中国的影响。

以上一系列的方针就体现了我们坚持的和平外交政策。

二、外交阵线

（一）建立什么样的外交阵线。外交是国家和国家间的关系，还是人民和人民间的关系？外交工作是以国家为对象，还是以人民为对象？我们要团结世界各国的人民，不仅兄弟国家的人民，就是原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我们也都要争取。但就外交工作来说，则是以国家和国家的关系为对象的。外交是通过国家和国家的关系这个形式来进行的，但落脚点还是在影响和争取人民，这是辩证的。这一点要搞清楚。

（二）要分清敌我友。在建国开始时，我们就提出过这个问题。我和友是一方面，敌又是一方面。具体地分析一下，朋友方面以国家来分有两种：第一种是基本的朋友，第二种是一时的朋友。这后一种朋友也不完全一样，有的只能在某一时期内成为朋友，有的可以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成为朋友，区别的主要关键是对战争与和平的态度。从国家的性质上来说，它们是属于资本主义世界的，但对战争它们不参加，表示中立，

这是可能的。这种情形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时有过，那时苏联争取瑞典保持中立〔66〕，这对当时的局势是有利的。假如那时挪威也被争取保持中立，对苏联会更有利，对欧洲的形势会更好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如果在同帝国主义的战争中保持中立，对我们是有利的。所以对这些国家，我们不能采取敌对态度，不要把它们挤到敌人的营垒里去，我们可以和它们做朋友。当然在战争中，问题可以看得更清楚，但在战争爆发前，我们就要有预见，努力做争取工作。在战争一旦发生时，这些国家守中立的可能性是存在的，站在和平阵营方面反对帝国主义的可能性虽然极少，但也不是绝对不可能的，这要看我们和平阵营力量的增长，要看敌人阵营的分化情形。

对帝国主义阵营也要有分析。追随美帝的国家毕竟是少数。在朝鲜战场，和美国在一起的虽然有十五个国家，可是万一战争发生在中国，是否也有那么多国家参加对中国作战呢？这是很值得怀疑的。敢于坚决和我们敌对并走上战场的究竟还是少数。资本主义世界并不是铁板一块，我们应该区别对待。

同我们最敌对的国家，应该对它坚决斗争。

同我国未建交、关系又较坏的国家，不能把它们看成同美帝一样。它们同美帝国主义之间有矛盾。我们应该给一些影响，使它们不过分同我敌对。

同我国正在谈判尚未建交的欧洲国家，它们不愿意同我闹翻，就悬在那里。

同我国已经建交的欧洲国家，对他们要分别对待，做好工作。

同我国已建交的东南亚国家，过去是殖民地，现在不仅形

式已经改变，有自己的国会与政府，同时人民的觉醒也使得帝国主义不能不改变过去对殖民地的一套办法，而由当地资产阶级来统治。在这种情形下，如果现在有人说它们是殖民地，那是不切合实际的。即使是现在的日本也不能说是美国的殖民地。日本人民的主要斗争对象有时是美国帝国主义，有时是本国政府。由帝国主义直接统治的才是殖民地。东南亚国家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同帝国主义有矛盾，我们要在战争时争取它们中立，在和平时争取它们同帝国主义保持距离。

伊斯兰教国家，我们同它们关系较少，影响也小。工作可以逐步进行。

我们要依靠进步，争取中间，分化顽固。这样可以使我们的外交工作更灵活一些，不是简单的两大阵营对立，没有什么工作可做。我们要这样来打开我们外交工作的局面。

三、外交工作的思想领导

我们的外交工作要绝对地接受无产阶级思想的领导，不能允许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当然更不能允许这些思想占据领导地位。我们的立场必须十分坚定，思想必须十分明确。

（一）坚持国际主义，反对狭隘民族主义。对这个问题，大家在理论上也懂得，但是在工作中，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就往往容易带着新中国胜利的骄傲，表现出狭隘的民族主义和大国思想。当然我们应该有民族自信心，可是如果有自大、骄傲的情绪，那就是狭隘的民族主义了，即使有时是不自觉的，也不好。每一个民族都有它的优点，值得我们尊重和学习。要肃清狭隘的民族主义思想，确立国际主义思想。

(二) 坚持爱国主义, 反对世界主义。我们的爱国主义是社会主义和人民民主主义的爱国主义, 不是资产阶级的沙文主义^[67]。我们反对失去民族自信心的、投靠大国的“世界主义”。美国所说的“世界主义”、“大国领导”, 其目的是要小国永远跟它走, 永远受它奴役剥削。我们的国际主义是要各国都独立平等。

社会主义的爱国主义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 而是在国际主义指导下的加强民族自信的爱国主义。我们有些同志有时表现得失去立场, 那是因为我们过去是半殖民地国家, 羡慕资本主义国家的文明, 不审查其中有无毒素, 盲目崇拜。说中国一切都好或一切都不好, 都是不对的, 应该批判地接受一切中外的文化。《大公报》有一栏叫“中国第一”。中国哪里有那么多第一, 这样提就不对, 后来这一栏也只好取消了。新中国当然比旧中国好, 祖国是可爱的, 但我们仍然必须向外国学习。

(三) 坚持集体主义, 反对个人主义。外交工作是代表国家的, 一切必须从集体出发, 倘若从个人出发, 就一定很危险。任何荣誉都是来自毛泽东思想的胜利和人民群众的努力, 都是国家的荣誉。外交工作中不容许有个人打算, 不要因为人家一说好就沾沾自喜, 应该想这是人民的光荣; 如果人家说坏, 就要检查一下我们的工作是否做错了, 要把个人完全溶化在集体当中。

(四) 坚持无产阶级的纪律性, 反对自由主义。我们强调高度自觉的、合乎党的利益的纪律性, 丝毫不能允许自由主义存在。乱说乱搞就会出乱子。外交是国家与国家的关系, 外交工作的一切都必须注意事先请示、事后报告。国家同国家

办事，说了就得算数，所以多说不如少说。但是，是不是什么都不说呢？不是。已经宣布的事，已经办成功的事，已经决定了的事都可以说；尚未宣布的，经验还不成熟的不能说。因为这不是在一个党内，而是办国家同国家之间的事。在一定原则下可以有一定限度的机动，也就是临机应变，但对新的问题处理迟缓一些并不是错误。经验不足时，还是慢一些好。

（五）坚持民主集中制，反对官僚主义。我们大家对外交工作的经验都不多，还是要发扬民主。“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多听取大家意见是必要的，但是还要有集中。使馆内的民主一定要做到。光有集中，没有民主，就成为官僚主义了。我们应该提倡民主，才能克服官僚主义。

（六）要求有高度党性，反对政治空气稀薄。政治空气首先要求有高度的党性，锻炼同志们的思想，一切从原则出发。政治化是多方面的。把原则变成教条来背诵不是政治，轻一点说是书呆子，重一点说是教条主义者。要调查研究，分析问题。平时谈生活、谈文艺都要注意从原则出发，这样，庸俗空气就稀薄了，政治空气就浓厚了。当然，并不是说只有张口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才叫做政治空气浓厚。

（七）提倡勤俭朴素的作风，反对资产阶级的铺张浪费思想。我们的外交工作中有不少浪费，这是受了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我们在生活享受方面处处想跟苏联比是不对的。苏联在十月革命后也是十分俭朴的。毛泽东同志主张不要去提倡那些形式的东西，因为不适合我们现时的经济情况。生活上同他们比是不对的，今天我们的生产还没有发展到他们那样的水平。

关于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问题^{*}

（一九五二年六月十九日）

三年来，由于我们进行了抗美援朝〔26〕、土地改革〔10〕、镇压反革命〔68〕三大运动，在国内把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势力基本上肃清了。在这样的情况下，国内的阶级斗争就突出地表现在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内部。现在发生了一个新的问题，就是如何正确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问題。

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有一个特点：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它既是我们的朋友，又是要被消灭的阶级。我们共产党员必须懂得这个辩证关系。毛泽东同志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已经讲得非常清楚，又原则，又策略。他是从共产党说起，说共产党最后要把自己消灭，全世界的共产党都要消灭。今天我们进行新民主主义建设，跟资产阶级合作，最后还是要消灭资产阶级的。有一种舆论，说资产阶级作为阶级可以跟我们一道进入社会主义。这是错误的。前些日子王芸生〔69〕在上海《大公报》上写了一篇文章，全篇写得很好，很动人，就是最后一句话说得不对。他写道：“我们人民民主政权的‘四友’就团结得更为亲密，共同胜利走向社会主义的前途！”毛主席

^{*} 这是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全国统战部长会议上的讲话第二部分的节录。

席把这句话删掉后要《人民日报》转载了。在党内进行思想教育的时候，要把民族资产阶级既是朋友、又是要被消灭的阶级这两方面都说清楚，只说一方面就容易发生误会，产生“左”的或右的情绪。

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经济上处在这样一个地位，因此它的思想也是这样的。拿资产阶级思想跟无产阶级思想来比，资产阶级思想当然是反动的落后的。但是资产阶级在反对封建势力的时候，尤其是在资本主义初期，它是起了积极的进步的作用的。文艺复兴〔70〕时期的资产阶级思想比起当年欧洲黑暗时期的封建思想来是进步的。美国独立战争〔71〕、法国大革命〔56〕和美国南北战争〔72〕的时候，资产阶级思想比起封建思想来是进步的。旧中国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在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这三个敌人时，资产阶级思想也起过进步的积极的作用。可是资产阶级思想没有把中国革命领导成功，也不可能领导成功，强大的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和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不允许资产阶级发展。资产阶级可以一个时期参加革命，一个时期中立，一个时期退出，甚至向反动势力妥协。这种曲折的道路走了多次。

中国资产阶级的两面性是长期的。它领导辛亥革命〔73〕的时候，由于跟反动势力妥协，革命失败了，自己也被反动势力挤了下来。辛亥革命以后，它的积极性并没有完结，资本主义经济还是发展了。可是刚有了一点发展，又被买办资本和帝国主义压下去了。后来资产阶级参加了大革命，在大革命的后期，又跟反动势力妥协，最后还是被反动统治阶级挤下来了。以后资产阶级参加了抗日战争，在解放战争中多数人保

持中立或者同情革命，少数代表人物还参加了反对美蒋的斗争，建国以后，又参加了建设。所以我们说，中国资产阶级还是有积极作用的，它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中的一员，是我们的朋友。

没收资产阶级的企业，去掉资产阶级，走向社会主义，这是东欧各人民民主国家的做法。我们中国有所不同。中国革命的时期很长，从共产党诞生到取得政权，将近三十个年头，中间经过了四个革命阶段。四个革命阶段中，民族资产阶级有时参加，有时中立，有时附和了反动。附和反动的时期很短，中立动摇的时期很长。在不同的时期都有一部分资产阶级分子参加革命或对革命表示同情。

到革命取得胜利的时候，也有一部分资产阶级分子去了台湾，但多数还是参加了新中国的建设。这里，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有很大的封建力量，封建势力跟买办阶级相结合。清朝末年、北洋军阀^{〔6〕}、国民党三个朝代，反动统治者都是依靠帝国主义的。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资产阶级的发展就受到限制、打击和压迫，它对此是不满的。新中国建立以后，资本主义经济得到了发展，比那三个朝代得利还多，多数资产阶级分子觉得在新政权下有利可图。所以他们中间的多数对于新政权还是赞成的，至少不是采取积极反对的态度。他们参加全国和地方的政治协商会议，参加各级人民代表大会^{〔22〕}，成为我们的朋友。这是由历史发展而来的。

尽管中国是这样大，有这样多的人力，可以加快前进的速度，但中国的经济是落后的，要实现工业国有化和农业集体化，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还需要动员各方面的力量。要

发挥资产阶级的积极性，让它发展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经济事业，使我们的经济能更快地发展。所以我们和资产阶级的联合，不仅政治上有可能，经济上也有需要。

当然，我们是为了社会主义而奋斗，这是清楚的。如果我们不认识这一点，麻痹起来，就会发生政治性的错误，就会失掉这个前途，就会与资产阶级混同起来。丧失前途，丧失立场，混同思想，那是很危险的。如果共产党人不认识这一点，不是从基本原则上去认识问题，去实现政策和策略，用适合于团结、改造资产阶级分子的方法来跟他们做朋友，把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发展起来，那就很难团结、改造资产阶级分子。只有明确为社会主义而奋斗，我们才能恰当地解决资产阶级问题，这是现在国内生活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把封建制度消灭以后，农村中的主要矛盾就变成广大农民跟农村中的资本主义势力的矛盾。在城市中，国民党被打倒了，反革命被肃清了，帝国主义势力被赶走了，主要矛盾就变成无产阶级跟资产阶级这样一个矛盾了。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当着我们反对三大敌人的时候，说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是中间力量，那是恰当的。但是，现在不能这样说了。

在我们党内，必须把今天存在于城市和乡村的这样两个对立的方面说清楚，只说一面就不完全。如果只说交朋友，“五反”〔74〕斗争就会轻轻过去，将来“五毒”〔75〕又会严重起来，又要进行“五反”。反过来，如果只说阶级矛盾、思想矛盾、对立、限制，现在就要把资产阶级打倒，就会发生“左”倾。因此，应该全面地说。现在反对他们的“五毒”，联合与改造他们，都是

为了将来便于和平转变到社会主义，为消灭资产阶级准备条件。这是很辩证的。从事统一战线工作的同志，一定要非常坚决又非常稳当地掌握方针政策。

这是一个思想认识问题。如果不从思想上搞清楚，我们做工作很容易碰到这样两种情况。一种是急躁地把前途当作今天要实行的政策，超越现阶段的政策，这就会发生“左”倾冒险情绪。另一种就是忘掉前途，忘掉坚定的方针，盲目地只顾眼前的利益，同化于人家，在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进攻下，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我们要防止这两种倾向。

在“五反”中，有些同志曾经在资产阶级两面性的问题上发生过摇摆，这是不对的。刚才我从历史根源上讲了它的两面性，现在它仍然有两面性。我在一月五日讲到这些，《人民日报》用纪要的形式发表了〔76〕。讲话中有一段说到资产阶级分子自我改造的问题，就是和两面性的问题有联系的。

要讲资产阶级的两面性，也要讲它的本质。资产阶级的本质就是唯利是图，就是剥削工人榨取剩余价值。从社会主义的观点来看，当然要反对这种本质。尤其在“三反”〔77〕“五反”运动中，必须明确地把它的本质揭露出来。在统一战线工作中，如果不把资产阶级的本质揭露出来，不把资产阶级的两面性指出来，的确会跑到另一方面去。我们是反对资产阶级的腐朽黑暗面的。如果不把“五毒”去掉，腐朽黑暗的一面不但会在资产阶级本身发展，还会侵入国家工作人员中，侵入共产党内部，侵蚀整个社会，毒害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毒害人民民主政权。

关于“五毒”，毛泽东同志在提出“五反”的时候就确定了

这样五项，这是具体化而又集中化了的。说得过多就不利。比如对于资产阶级的限制问题就是这样。一方面，在新民主主义的方针下，不是资本主义自由经济，而是节制资本。公私兼顾是在国家领导下的公私兼顾；劳资两利是在中国工人阶级领导下的劳资两利；生产要有计划有领导地进行，反对盲目发展；规定合法利润，反对暴利。这些原则还是必须坚持的。另一方面，什么是合法利润？什么是暴利？还要经过经济改组，经过工商业恰当地发展，才能逐步规定。在这次工商业联合会筹备代表会议上，陈云^{〔78〕}同志可能讲一讲合法利润的大致范围，但不是最后确定，最后确定还要摸索一点经验。合法利润还不能明确规定，暴利的范围也就很难确定。所以这次“五反”就没有提出反对资产阶级的暴利，如果提出就会把经济弄乱。暴利思想要反对，但反对“五毒”没有把暴利问题规定为一条，原因就在这里。否则，我们对资产阶级算帐就会很苛。又比如买房子这件事情。我们公家需要很多房子，鼓动人家卖，人家不愿意，就抬高房价，结果出了很高的价钱，“五反”来了又算人家的暴利，说人家抬高房价。我们不能这样干。现在还是实行自由贸易的原则，不是强迫的方式，何况还是你要求人家卖的。那么高的房价，谁叫你买呀！再如银行利息高，工业利润低的问题，这也说明我们的社会经济还没有改组，还很乱。今后对于利润范围也要有一个规定，使银行利息压低，工业利润逐渐提高。但这需要一个过程。

资产阶级还有积极的进步的一面，我们还要尽量地利用它的积极性进步性。从经济上来说，今天我们的国营经济还不能完全代替它。如果中国工业化了，国营经济能够代替资

本主义经济，私人的经营范围就不会这样大。私人的经营范围这样大，就说明国营经济的比重还不够大，还不能代替它。这就一定要发挥它的积极性。发挥积极性一定要符合我们的《共同纲领》^{〔1〕}，遵循新民主主义的发展轨道。但是从资产阶级的本质来说，它是不愿意遵循这个轨道的，它只要得到一定的发展，就会突破这个轨道，要求自由发展，追逐利润。其实，资产阶级分子哪有那么循规蹈矩的，你要他们做什么他们就做什么？损人利己，唯利是图，投机取巧，这三句话概括了资产阶级的本质。他们是要按照这个方向发展的，因此，必须进行长期的斗争。

斗争就是改造，就是要把“五毒”去掉。就是毛泽东同志说的，再犯再去，再犯再去，长期斗争，用改造的方法来解决。

我们现在之所以能够强调改造，是因为今天有人民民主政权，有共产党的领导，有工农联盟的广大基础，资产阶级在数量上不过是一个很小的数目。在城市中，所有工商业者加上他们家庭的人口，也不过两百多万。而资产阶级的家庭已经起了变化，共产党员、青年团员很多。在全国约五十万工商户中，还有一部分是独立劳动者。我们能够改造地主分子，那么，为什么不能够改造资产阶级分子呢？何况资产阶级还跟我们共同走过一段建设的道路，而封建地主阶级除少数开明绅士外却根本没有跟我们一同走过。

有些外国朋友听说我们改造地主就摇头。“地主还能改造？”这种怀疑是有道理的。他们那里的封建主跟中国的地主不同，多是大贵族、大封建主，人数也很少，可以把他们赶到外国去。中国的地主人数上千万，有一个中等国家的人口那么

多，而且分散得很，你把他们赶到哪里去呢？只有改造他们。能不能改造呢？在农村人口中，农民占百分之九十以上。如果说农村人口是四亿的话，农民有三亿六千万以上，占绝对优势，而他们又经过了长期的革命教育。有这样大的一个基础，怎么不能监督和改造地主呢？地主阶级是革命的对象，跟我们有过近三十年的生死斗争，对地主都可以改造，那么，资产阶级在中国革命中一般说来是中立的，有一部分同情革命，有一部分还参加革命，资本主义经济在新中国又是五种经济成分〔64〕之一，他们还有利可图，而我们还有政权，有军队、法庭，有无产阶级强大的领导力量，为什么不能够改造他们呢？当然在改造中会有少数人走向反动，甚至会有个别的分子勾结国外敌人企图造反，但可以肯定地说，这总是少数。如果工作做得好，即使世界大战打起来了，多数还是能够跟着我们走的，或者是观望动摇的。当然也会有少数人没有改造好，这就需要我们加紧做工作。

要把资产阶级分子改造成什么样子呢？就是要使他们按照《共同纲领》的规定办事，以适合于新民主主义经济的要求，适合于新民主主义政治的要求，适合于新民主主义文化的要求。所谓改造，在经济上，就是要使他们的经济发展受到限制，但又要使他们有利可图，有适当的发展；在政治上，要吸收他们的代表参加政府，并使他们在政治上受到影响；在文化上，要对他们加强思想教育，逐步地改造他们的思想，以至改造他们的家庭。改造的结果，就会使他们走上《共同纲领》规定的轨道。

我们要给他们指出广阔的前途，不要向他们隐讳社会主

义的前途。《共同纲领》没有写社会主义前途，是因为当时新中国刚刚成立，虽然把这个前途写出来他们也是可以接受的，但是有点强加于他们，所以我们采取等待的政策，没有把社会主义前途写进去。但是这个前途是肯定了的。我们要向他们指出，在这个前途中，他们也是有份的，当然不是指他们那个阶级，而是指资产阶级分子说的。根据刘少奇同志去年讲的一些意见，我在一月五日的讲话里说了，经过改造，他们每一个人都有前途，并且在将来还可以保留他们的消费财产。有人说，这样一来，资本家就不把钱投资到事业上来，就要全部变成消费财产了。这是片面的说法。如果他们想到在社会主义社会还能够有前途，那么今天也就会好好经营，培养经营的本事和能力，这样的本事和能力到将来的社会主义社会还用得着。所以资产阶级分子是可以改造的。

资产阶级的思想本质是唯利是图、投机取巧、损人利己，当然不好。但就他们取得利润来说，中间还包括国家的利益。这次黄炎培〔79〕先生打算在全国工商联代表会议的致词中传达毛泽东同志的一段话，这是毛泽东同志面告他的。毛泽东同志在党内的会议上说过“四马分肥”，就是把利润分成四份，其中国家一份，就是税收；工人一份，就是福利费；还有一份是公积金，作为再生产之用；第四份就是私人应该得到的纯利。实际上，资本家得到的是一份多一些，因为公积金在将来发展生产中的所得又可分成四份，在四份中他又得到了一份。资本家得的利润如果是在这样一个范围内，就是合法的利润。我们要鼓励他们这样去取得利润。

当然，如果说资产阶级是“为崇高的目的奋斗”，那也是骗

人的。资产阶级分子经过改造，许多人是走向社会主义的，但是今天还是要唯利是图，否则他们就不是资产阶级了。这个合法利润是应该承认的，并且要鼓励他们取得这个利润。在这一点上，过去没有向他们解释清楚。毛泽东同志给黄炎培讲了这样一个道理之后，他很高兴。所以我们是应该向他们解释的。

我看了一个同志的发言，他好象认为跟资产阶级做统一战线工作就是讲“外交”、应付、说空话。这是不对的。难道毛泽东同志是在那里闲着没事做，把黄炎培找去聊天讲闲话吗？大家晓得，毛泽东同志没有这样的闲工夫。他找一个人去总是有目的的。毛泽东同志向黄炎培讲清道理后，黄炎培就给资产阶级写信，首先是给上海资产阶级写信，用他自己的口气向资产阶级传达毛泽东同志的指示，这有什么不好呢？当然有时候跟他们应酬是免不了的，但是这个应酬一定是要有要求的，有政策的，有思想的。毫无目的，毫无政策，毫无要求，简单地应酬一番，吃饭、跳舞，那是不对的，那就是混同于资产阶级。如果是有目的地应酬，有目的地团结，那是必要的。经过他们把党的政策传达到他们所代表的那一部分人民中去，这是很有效的。

为什么说黄炎培是进步分子呢？有的人还不大懂。我们说他是资产阶级的进步分子，就是因为他跟资产阶级有来往有交情，能够把他们的话说出来，又能够把我们的话经过他说给资产阶级。当然在说的时候可能会有一点说得不完全，这也不奇怪，他又不是共产党员。在政务会议上，常常有一些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反映资产阶级的思想。他们讲出来之后，

我们觉得有错的，适当地加以批评，他们能够听取并接受我们的意见，这就是进步分子。为什么政务会议每个星期要开一次呢？难道我也是闲着没事干，高兴每个星期开一次会吗？不是的。这是有好处的。那个会不象我们开会那样，意见都差不多，一个人发言之后，顶多有一点补充。在那样的会议上有的是不同的意见，有资产阶级的话，有开明士绅的话，也有小资产阶级的话；有正确的，也有错误的。我们听到这些话就能够启发思想。毛泽东同志常常讲“兼听则明，偏信则暗”〔80〕，正是这样一个道理。我们管理着这样大的一个国家，就要注意听取各种意见。对我们共产党员来说，就是要分辨出哪些意见是对的，哪些意见是不对的。这对于我们也是一个锻炼、教育和学习。所以说对资产阶级采取敷衍的态度是错误的。

还有一些同志不大愿意见党外人士，象毛泽东同志说的有些羞羞答答。这是不大好的。我们总是跟自己的同志在一起，所说的话都是相同的，有点闭塞。而跟党外人士接触，则可以听到各方面的意见。当然这对你也是一个考验，如果你的立场不稳，思想不清，人家说什么都是对的，那就要受资产阶级的影响，甚至要被糖衣炮弹击中。统一战线工作就是这样，要学习，要考验自己，要发展党的政策，又可以使自己进步。当然不能说在工作中就毫无错误，但是我们不要怕，要在工作中好好学习。我们对于资产阶级的政策是团结改造的政策，所以，在工作中不要采取畏惧的态度，不要采取草率的态度，也不要采取消极敷衍的态度，而是应该采取坚定的、稳健的、谨慎的态度。

过渡时期的总路线^{*}

（一九五三年九月八日）

我今天谈谈从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问题，题目是过渡时期的总路线。

—

这个问题本来不是一个新的问题。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起，我们就认定新民主主义要过渡到社会主义。《共同纲领》〔1〕中虽然没有写社会主义的前途，但这是因为考虑到当时写上去还不成熟。所谓不成熟，不是说在领导分子中间还不了解，而是说还要经过对广大群众的宣传教育。现在提出这个问题，是为了把它更加明确起来，使它具体化。

关于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毛主席近来在中共中央的会议上，以后又在全国财经会议上，都曾讲过。他指出：“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基本上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

^{*} 这是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四十九次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上的报告。

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应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各项工作离开它，就要犯右倾或‘左’倾的错误。”〔81〕

在过渡时期，对国家工业化，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都还只是基本上实现，而不是完全实现；只要是基本上实现了，过渡时期就算结束了。

所谓相当长的时期，究竟多少年，不可能说得那么准。毛主席说，要经过几个五年计划。过渡时期的长短，决定于是否基本上完成了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要看我们的努力。

离开了总路线，就要犯大错误。我们在工作中犯一些小错误，发生一些偏差，是难免的。但如果犯了大错误，离开了这条总路线，那就很危险，就会走上另外一条道路，即资本主义的道路。犯这种错误不仅不应该，而且是不容许的。

现在谈几个问题：

第一，什么叫做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最基本的就是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就是取消了生产资料的私人资本主义所有制，归国家所有了，就是农业、手工业集体化了。完成这个任务要经过相当长的过渡时期。

在我们的人民民主的国家制度和社会制度中，不是要等到那么一天，由国家宣布所有的生产资料都归国家所有，而在这一天以前，一切都原封不动毫无变化。这是不可能的。苏联在十月革命以后曾宣布把雇工若干人以上的企业收归国有，东欧人民民主国家在战后几年也曾宣布把几十个工人以上的工厂收归国有。我国根据国际条件尤其是国内各阶级联

盟和经济发展的情况，不采取这种激烈的突然变革的办法，而采取温和的逐步过渡的办法。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虽然是一场革命，但可以采取逐步的和平转变的办法，而不是一天早晨突然宣布实行社会主义。在过渡时期中，要使社会主义成分的比重一天一天地增加。过去我曾与盛丕华〔82〕先生说过，将来是“阶级消灭，个人愉快”。就是说采取逐步过渡的办法，做到“水到渠成”。

当然，过渡并不是没有困难，但应看到有利条件。首先是肯定了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是领导的经济，其他各种经济都要受国营经济的领导。这是在《共同纲领》中规定了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是国营经济与私人资本合作的经济，其中国营经济部分是处于领导地位的。

在过渡时期要把各种经济纳入国家的总计划中。这在《共同纲领》第三十三条里也早有规定。当然，做到这点是不容易的。把国营经济纳入计划就不容易，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到现在还没有制定出来，我们还只能边计划、边执行、边修正。至于把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个体经济纳入计划就更困难。因此，使各种经济在国营经济领导下逐步纳入国家计划的轨道，是一个相当长时期的过程。

第二，为什么现在提出这个问题？有人说，因为朝鲜停战〔26〕了。这个说法有一部分道理。如果朝鲜战争还在打，我们的军费开支就不能保证没有变动。现在朝鲜问题虽然还没有彻底解决，但战争已经停下来了。毛主席指导工作有一个原则，当一个任务完成了的时候，就要赶快提出新的任务，以免松懈下来。我们现在就应该提出新的任务。从这方面说，

强调朝鲜停战这个原因是有一部分道理的。但是这不完全。现在提出这个问题，还有国际国内的各种条件。

从国际方面看，当前世界形势的特点是：新世界诞生了三十六年，世界和平民主阵营更加巩固和扩大了；旧世界尽管叫嚣扩军备战，但困难重重。形式上是两个阵营的对立，但矛盾的焦点是在旧世界的内部。这种矛盾，有和平与战争的矛盾，有民主与反民主的矛盾。

旧世界的矛盾，无论在东方与西方，是一天一天地在增长。中朝人民在朝鲜战争中的胜利把美国企图挑起世界大战的时间推迟了，这就不仅有利于促进资本主义阵营内部矛盾的增长，有利于和平民主阵营的巩固和扩大，有利于资本主义世界各国中民族民主运动力量的增长，有利于世界人民的和平民主运动的发展，同时也有利于我国进行建设工作。

从国内方面看，开国快四年了，人民民主专政更加巩固，国防力量愈益增强，各种社会改革也已基本上完成。尤其是这四年来，财政经济状况已经基本好转，社会主义成分的比重一天一天增加，国营经济的领导地位一天一天加强，人民的积极性也更加发挥出来了。

工业生产方面，总产值如以一九四九年为一百，一九五二年则为二百四十五。今年生产如能完成或超过计划，就可达三百零四以上。农业生产方面，总产值如以一九四九年为一百，一九五二年则为一百四十八。今年的农业生产，由于去冬受冻，今年又有霜灾和虫灾，加上南旱北涝，按原定计划增产百分之六已不可能，估计可稳定在去年的水平或者略少于去年，也可能略多于去年。

关于我国工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一九四九年，机器工业占百分之十七点四，工场手工业占百分之七，个体手工业占百分之六点八，农业及副业占百分之六十八点八。一九五二年，机器工业占百分之二十七点八，工场手工业占百分之六，个体手工业占百分之六，农业及副业约占百分之六十。这些数字表明，工业比重已经大大增加，今年还会有所增长。

关于工商业中的公私比重。工业方面（包括现代工业与工场手工业，不包括个体手工业）：一九四九年，国营占百分之三十三点九，私营占百分之六十二点七，公私合营占百分之二点四，合作社占百分之一；一九五二年，国营约占百分之五十，私营约占百分之四十二，公私合营约占百分之五，合作社占百分之二点六。从相对数字看，国营的比重上升，私营的比重下降，但从绝对数字看，则国营私营都有增加。商业方面：按商品流转总额计，一九五二年国营已占百分之五十，今年还会增加；按零售计，一九五二年国营与合作社占百分之三十二。

以上情况说明：现在开始五年计划经济建设，国际国内形势都是有利的；提出过渡时期的问题，也是适时的。

但必须承认还有困难。我们的经济遗产落后，发展不平衡，还是一个农业国，工业大多在沿海。我们的文化也是落后的，科学水准、技术水准都很低。例如地质专家很少，自己不能设计大的工厂，文盲相当多。这些落后状况会使经济建设发生困难。我们还有五种经济〔64〕并存，要使其能够均衡发展，并在新情况下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关系非常复杂。不估计到这些困难，就会产生盲目冒进情绪；另一方面，如不估计到有利条件，就会产生保守倾向。

农业、手工业的合作化和对私营工商业的改造，是一件极大的工作。毛主席说，对私营工商业改造，只要把问题说通了，还是比较容易的，更繁重的还是农业和手工业问题。对于农业、手工业和私营工商业进行改造，需要用不同的形式和速度。农业和手工业是走合作化的道路，私营工商业是经过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我们既然确定走社会主义道路，就要相信自己的力量能够完成这个重要的任务。

二

我们要在总路线的指引下，确定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的基本任务。

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的基本任务是：首先集中主要力量发展重工业，建立国家工业化和国防现代化的基础；相应地培养技术人才，发展交通运输业、轻工业、农业和扩大商业；有步骤地促进农业、手工业的合作化和对私营工商业的改造；正确地发挥个体农业、手工业和私营工商业的作用。所有这些，都是为了保证国民经济中社会主义成分的比重稳步增长，保证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水平。

重工业是国家工业化的基础。我们虽然还有一点重工业的底子，但是作为工业化的基础，是很不够的。因此，不能不首先集中主要力量来发展重工业。苏联在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开始时，重工业的基础比我们大，但他们仍然是集中主要力量发展重工业。我们更需要集中主要力量发展重工业，因为

我们的底子不行。国防工业是要在重工业的基础上发展的。我们现在还不能制造坦克、飞机、汽车、拖拉机和高级的炮。苏联从一九二八年开始计划建设，当时许多资本主义国家还把机器卖给苏联，国际形势还不象后来那样紧张，希特勒还没有上台，还可以按部就班地做。我们现在的情况与苏联当时的情况不同，更要加速发展重工业以加强国防。当然，我们说“集中主要力量”，并不等于冒进。

培养技术人才是我们国家建设的关键。我们的技术人才还很不够，培养人才是一个重大的任务。要从各方面培养人才。除各种专门学校外，还要在工厂中培养技术工人，要使干部学习业务，学习技术。

交通运输是建设中一种先行部门，不发展交通运输业，工业也无法有大的发展。当前特别是要把西南、西北和华北之间的铁路线连结起来。

相应地发展轻工业是为了保证需要。现在人民的购买力在逐步提高，人口的增长也很快，一年增加一千万，我们要设法逐步满足人民的需要。发展轻工业也有利于国家积累资金。当然，应该是有计划、有步骤、有重点地来做，首先要注意急需的产品，如棉纱、布匹等。如果我们只看到重工业而不看到轻工业，那就会犯错误。

必须相应地发展农业，否则无法增产粮食。我们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还会感到粮食不足。所谓不足，不是和过去的水平比较，而是从逐步提高人民生活的水平来要求。我们的农业早已恢复到战前的最高水平，但要逐步改善人民的生活，则必须随时注意粮食问题，不能疏忽。国家对粮食的管理应该

继续加强。发展农业要稳步前进，不能要求太急，因为耕地面积有一定的限度，开垦荒地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农业发展的速度要与工业发展相适应，首先要在原有基础上提高单位面积产量。我国农业生产的手工技术很高，这是可贵的条件。我们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还不能自制拖拉机。将来对拖拉机的使用，也要考虑到不同地区不同情况，如山地即不便使用。现在还用不着顾虑使用拖拉机以后劳动力过剩的问题。粮食的需要是多方面的，农业人口需要粮食，工矿区和经济作物区的发展也会增加对粮食的需要。此外，还要备荒，还要出口一部分粮食用来平衡对外贸易。

必须相应地扩大商业，否则也要犯错误。

对于农业、手工业的合作化和对私营工商业的改造，要有步骤地进行。

总之，要使各个方面都能全面地有配合地向前发展，才能保证我们计划建设的胜利。

三

关于社会主义改造和国家资本主义的问题。在过渡时期中，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都要实行社会主义改造。这种改造，在当前还不是最后的改造，而是逐步过渡中的改造。最后的改造是取消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制，把它变成国家所有制或集体所有制；而逐步过渡中的改造，是使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制受到限制，成为不完全的私人所有制。这种限制是在《共同纲领》中规定了的。孙中山先生提出过“节制资

本”，也就是限制私人资本主义，使它不能无限制地自由发展。资本主义经济是唯利是图的。在中国，私人资本主义也有黑暗的一面，如搞“五毒”〔75〕。对于这一面，我们必须反对。生产资料的私人资本主义所有制是要受到限制的，但限制私人所有制并不是取消私人所有制，并不是取消利润。利润分配是“四马分肥”〔83〕，资本家还有一份。农业也有同样情况。农业生产合作社〔84〕是土地入股，可以分红，但要提公积金，也是不完全的私人所有制。手工业合作社也是如此。这些都不是最后的改造，而是逐步纳入总路线的轨道，逐步引导到社会主义。这样的逐步改造，要有领导有计划地进行，以达到“水到渠成”的地步。

毛主席说：“经过国家资本主义，完成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改造。”〔85〕关于国家资本主义是在《共同纲领》第三十一条中规定了的。三年多来，我们在这方面做了一些工作，但因忙于三大运动〔86〕、“三反”〔77〕“五反”〔74〕和思想改造〔87〕这方面还用力不多。忙于其他方面的工作也是必要的，不然就不能为社会主义改造打下基础。过去的经验已经可以肯定，经过国家资本主义完成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比较健全的方针和办法。现在进入计划建设时期，应该将这个方针和办法进一步明确化并具体化。首先要在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以及各党派、团体的领导人物的头脑中明确起来，承认国家资本主义是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和逐步完成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必经之路。这一点无论在共产党员或民主人士中都没有明确起来。这次财经会议对这个问题又好好研究了一下，现在要在政协和政府委员会中提出讨论。首先要在领导

人物中讲清楚；在共产党内，也是先要在各级领导机构中搞清楚。不要忙于在社会上作广泛的宣传。因为“社会主义改造”、“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这些话，如果不讲清楚，很容易被误会为马上要实行社会主义。我们进行工作时要稳步前进，不能急躁。毛主席说，把社会主义改造看成遥遥无期而停止不进步是不许可的，盲目冒进也是不许可的。

关于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在工业方面，高级的形式是公私合营，即企业中有公股参加，公私共同管理，公方处于领导地位，私人所有制是被承认的，但已经受到限制。中级的形式是加工订货，即原料由国家供给，产品由国家收购，由私人进行生产，私人所有制也受到限制，不能到自由市场去购买原料和销售产品了。低级的形式，一般是原料主要由私人购买，由私人进行生产，国家收购其产品的大部分，私人还能保留一小部分自销。现在已有这三种形式，将来也许还会有别的形式。

商业方面有没有国家资本主义？毛主席说，对私营商业不能简单地以“代替”或“排除”了事。当然，对私营商业中投机倒把、有害于国计民生的部分应该排除。但我们认为，商业方面也有可能实现国家资本主义。如对国计民生确有作用的大的私营商业公司，可以实行公私合营，利用其合理的经营管理，改革其不合理的部分，使其能为国家服务。此外，私营商业可以依照国家规定的价格替国家批发，或代购代销。私营商业的数量很大，从大的公司到小的摊贩有几百万户，我们必须带着它们前进。至于采取什么具体形式，这方面的经验较少，还要研究。

我们要使全国私营工商业走上国家资本主义轨道。毛主席说：“将全国私营工商业基本上引上国家资本主义轨道，至少需要三年至五年的时间”〔85〕。这还不是最后的改造。这样做，在领导人物中应该不会发生震动和不安了。

目前私营工商业的比重还不小，在工业中占百分之四十二，在零售商业中占百分之六十八，在私营工商业（不包括手工业和夫妻商店）中的工人和店员约有三百八十万人（在国营工厂和商业中的工人和店员是四百二十万人）。这是国家的一大财富，对国计民生还有很大的作用。毛主席说：“私营工商业不仅对国家供给产品，而且可以为国家积累资金，可以为国家训练干部。”〔85〕因此，我们应该重视它，加以领导，国家建设工作应该把它计算在内。

我们还应该看到两种现象。第一，有些工商业家对国家还保持着很大的距离，没有改变唯利是图的思想。新民主主义经济是不允许唯利是图的，对此必须限制。第二，在工人群众中，有些人也没有看清楚这个问题，前进得太快了，他们不允许资本家有利可得。这样就不好了。毛主席说：“我们应向这两方面的人们进行教育，使他们逐步地（争取尽可能快些）适合国家的方针政策”〔85〕。要使他们认识到，中国的私人工商业如能按照国家的方针政策办事，就基本上是为国计民生服务，部分地为资本家谋利，这样就走上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了。关于利润分配问题，最近毛主席找在工会工作的同志和在大城市工作的同志进行了研究，如将赢利作为百分之一百，比较合理的分配是：所得税占百分之三十四点五，工人福利占百分之十五，公积金占百分之三十，资本家的所得占百分之二

十点五。关于资本家的所得，还可以再多一些，如能达到百分之二十五上下就更合适一些。所谓“四马分肥”，实际上是“三马”，因为公积金是三方面的。如果能这样做，不论是否实行了国家资本主义，也就是基本上为国计民生服务，部分地为资本家谋利。当然如果采取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就能更好地实现这种分配。我们这种国家资本主义，既不同于一般的私人资本主义，更不同于帝国主义国家的国家资本主义，而是中国型的国家资本主义。

要对工人和资本家两方面进行教育。在工会方面，今年五月间开了第七次代表大会〔88〕，刘少奇同志讲了话，会议讨论了国家资本主义的问题，对工人在资本主义工商业中的工作问题也进行了讨论。我们这一次会，邀请了各地的工商业家来参加，目的就是要使工商业家也能了解这个问题。我们要在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中培养核心分子，团结起来为经过国家资本主义实现社会主义的改造而奋斗。毛主席说：“需要在资本家中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为此需要有计划地培养一部分眼光远大的、愿意和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靠近的资本家，以便经过他们去说服大部分资本家。”〔85〕

大部分资本家会接受社会主义改造，还有一部分会抵抗，对这点必须估计到。毛主席说：“实行国家资本主义，不但要根据需要和可能（共同纲领）而且要出于资本家自愿”〔85〕。要区别强制与自愿，对反动阶级要强制，对民主阶级内部的事情要根据自愿，这是合作的事业，既是合作就不能强迫。当然，也要造成一种有利的形势，要“因势利导”。现在的劳动生产率以国营企业为最高，公私合营的次之，加工订货的又次之，

这说明国营工业的优势和优越性；另一方面，还应该使私营企业有利润，使资本家对其私人所得完全可以自由支配。毛主席说：“全国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在过去几年中已有很大的进步，相信再有三年至五年，这种进步将更大，所以三年至五年内基本上完成将私营工商业引上国家资本主义轨道是有可能的。”〔85〕

有人问，财经会议开了两个月之久，不知道做了什么文章，会不会搞“小五反”？毛主席说，没有所谓“小五反”。现在不需要搞“小五反”。上海偷税漏税的事有十六万件，其中以中小的为多。偷税、漏税性质也有不同，税制上也有毛病，这些都要整顿处理，但并不需要搞“小五反”。现在要大家商量一个办法，政府来做，大家支持。文章就是一篇——过渡时期的总路线。

总结起来说，至少要三年到五年，才能基本上纳入国家资本主义轨道。这并不是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完成社会主义改造还要几个五年计划，两者不可混同。一方面，我们反对把社会主义改造看成遥遥无期、停止不前。现在不动将来就要痛，现在向前将来就会愉快。另一方面，急躁冒进，想一步登天，也是错误的。

国营经济是领导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是被领导的，这点必须确定。国营经济不谋私利，只谋公利，合作社经济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而私人资本主义还要谋一部分私利。所以，不能在一切问题上一律对待，要有所不同。另一方面，私人工商业基本上是为国计民生服务的，所以又要一视同仁。这就要说服工人，和国营企业一样，实行增产节约、劳动竞赛、提高

劳动生产率、降低成本、提高产品的数量质量等等。这样就会使工人感到，不论在国营企业或私营企业中，工作都是光荣的。资本家按照国家的方针政策办事，不投机倒把，不搞“五毒”，其任务也是光荣的。这样两方面就能合作了，就能实行在国营经济领导下的公私兼顾、在工人阶级领导下的劳资两利了。

现在这样做，还不是多数人都懂得的，我们要做很多的教育工作，把这些道理说清楚。共产党当然首先要担负起这个责任，同时还要动员工会、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和工商业家，大家来做这件工作。政府部门也准备设立一个专门的机构来管理私营工商业方面的事情，使这方面的工作更加有领导有计划地进行。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中印两国的谈判在今天，十二月的最后一天，开始了。我们说过要在一九五三年开始这一谈判，现在实现了。

我们相信，中印两国的关系会一天一天地好起来。某些成熟的、悬而未决的问题一定会顺利地解决的。新中国成立后就确立了处理中印两国关系的原则，那就是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和平和平共处的原则。

两个大国之间，特别是象中印这样两个接壤的大国之间，一定会有某些问题。只要根据这些原则，任何业已成熟的悬而未决的问题都可以拿出来谈。

^{*} 中国政府代表团和印度政府代表团就中印两国在中国西藏地方的关系问题，于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至一九五四年四月二十九日在北京举行了谈判。这是周恩来同志在谈判开始时同印度政府代表团谈话的一部分。这五项原则后来正式写入双方达成的《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的序言中。一九五四年六月下旬，周恩来同志访问了印度、缅甸。在中印和中缅会谈联合声明中，中印、中缅共同倡导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增强党的团结， 反对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一九五四年二月十日）

同志们：

我完全同意刘少奇同志的报告〔89〕。我提议四中全会批准这个报告，并通过《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

毛泽东同志和中央政治局向全党敲起警钟，反对任何共产党员由满腔热忱地、勤勤恳恳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高贵品质堕落到资产阶级卑鄙的个人主义。刘少奇同志在报告中指出：“只要党内出现了个人主义的骄傲的人们，只要这种

* 一九五四年二月六日至十日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进行了反对高岗、饶漱石阴谋分裂党、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重大斗争，增强了党的团结。本文是周恩来同志在这次会议上的发言节录。同月二十五日，周恩来同志又在关于高岗问题座谈会上发言，历数了高岗散布“军党论”（“党是军队创造的”、“枪杆子上出党”）的谬论和进行宗派活动，大搞独立王国等罪行，严肃指出：“从高岗的事件中应该吸取的教训是：一切骄傲情绪、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宗派情绪、小团体习气、分散主义、地方主义、本位主义都应受到批判。‘军党论’的荒谬思想必须肃清。个人主义野心家必须防止。党内非法活动必须禁止。派别性的干部政策必须反对。独立王国的思想必须消灭。党的统一领导和集体领导的原则必须坚持。党内民主及批评和自我批评必须发展，党内任何干部必须无例外地受到党的组织和人民群众的监督。共产主义的人生观必须确立。马列主义的教育必须加强。”

人的个人主义情绪不受到党的坚决的制止，他就会一步一步地在党内计较地位，争权夺利，拉拉扯扯，发展小集团活动，直至走上帮助敌人来破坏党分裂党的罪恶道路。”我认为敲起这种警钟是适时的，绝对必要的，哪怕只发现了这种危险状况的萌芽。

为什么把问题提得这样严重呢？这是由于中央政治局考虑到如决议草案和少奇同志报告中所提到的党内党外的各种状况，并从苏联共产党、各国共产党乃至我们党自己的历史中吸取教训而得出的结论。如果不把问题提得这样严重，全党、首先是高级干部便不会认识这种状况的危险性，甚至还会自觉地或者不自觉地听任这种危险的萌芽蔓延滋长，这样，必致贻害全党。

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我们的党已是胜利的党、执政的党，因为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领导正确，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的威信又是这样高，所以个人主义的反党活动已不甚可能以公开面目反对党的领导，而会是躲藏在党的正确路线的旗帜下，利用某些领导同志的缺点和个别错误以及党内某些不同的意见，进行暗中挑拨和散布流言，有时更假借名义，进行非法活动，以便达到个人企图。如果我们嗅觉不灵，就大有上当的可能。因此，中央政治局指出这一危险，重申党的纪律，作了六条规定〔90〕，以保证党的团结的增强。

这样做，大家都遵守六条规定，是不是要损害我们党内政治生活的生气勃勃、上下通气的优良传统，而变成死气沉沉、闭塞言路的官僚主义呢？不会的，也不应该的。我们所反对的是那种不利于党的团结和损害中央威信的言论和行动，我们

并不反对干部中间进行有关增强党的团结和提高中央威信的意见的酝酿和交换。最近有这样一种意见，认为既然要防止挑拨，防止流言，那就什么话也不敢讲了，也不敢听了。这对不对呢？不对的。因为这样又犯了毛泽东同志在《反对自由主义》中所说的“事不关己，高高挂起”那一条的错误了，变成旁观者了。这不是共产党员应该采取的态度。同时，我们反对的是避开中央和各级党的组织进行个人和小集团的非法活动，我们并不反对全党高级干部直接向中央、毛泽东同志或者经过自己所属的党组织提出个人的政治意见或积极的建议。可以这样说，我们反对个人主义的反党的言论和行动，正是使党内的政治生活更加健康起来，利于党的团结。

这样做，大家都遵守六条规定，是不是要缩小我们党内民主及党内批评和自我批评呢？不会的，也不应该的。我们所反对的是“当面不说，背后乱说；开会不说，会后乱说”的个人攻击，而不是反对“为了团结，为了进步，为了把事情弄好，向不正确的意见斗争和争论”。这是毛泽东同志在《反对自由主义》中指出来的。这一次《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草案）》在省、市委以上的各级党组织中进行了普遍的讨论，反应很迅速，和这次四中全会上各同志发言中充满了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精神，就足以证明我们党内的民主不是缩小，而是发展。今后我们要发扬这种精神，特别是要在高级领导同志中间加强集体生活，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来保证我们党的团结。这样也就可以竭力避免给个人主义野心家以利用和挑拨的机会。

我们反对把自己领导的地区和部门当做独立王国，反对把个人放在组织之上，反对分散主义、地方主义和本位主义等

等，反对这些，决不会影响中央政治局过去对六大行政区的中央局在执行党中央的路线上是正确的、是有很大大成绩的这个估计，并不取消这个估计。这次各大区负责同志的发言，一般也说明自我批评的精神是好的，对上述这种倾向是一致反对的。中央党、政、军各部门的分散主义，经过一年多来毛泽东同志在中央会议上的亲自检查和批判，也多有了改正。但所有这些，仍不能丝毫减弱我们反对分散主义、地方主义和本位主义的严重任务，因为这些错误是与党的民主集中制、党的统一领导和集体领导原则完全不相容的。

我们之所以特别着重地反对党内一部分干部中首先是高级干部中滋长着的一种极端危险的骄傲情绪，是因其如不受到严厉的批评和纠正，这样的干部就会一步一步地发展成为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野心家，或者被这种野心家所利用。个人主义可以有各种不同形式和不同程度的表现，但是个人主义总是与集体主义对立的；不管你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或者是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它的思想根源都是从属于资产阶级的。当着我们党正处在过渡时期，与城乡资产阶级分子又联合又斗争并须对他们逐步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历史紧要关头，这种阶级斗争将不可避免地反映到党内思想斗争上来。而小资产阶级还象汪洋大海似地包围着我们，党内有着占大多数的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党员，小资产阶级如不接受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就必然要受资产阶级的思想影响。因此，我们党内目前主要的危险就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而党内干部中首先是高级干部中的骄傲情绪，正好是这种思想滋生的温床。

骄傲的起因，多由于在工作中有了一些成绩就沾沾自喜，忘记了共产党员所必须具有的谦逊态度和自我批评精神。我们高级干部中若有这种骄傲情绪，又不加以制止，其危险性就最大，因为就他的地位、权力、威信、影响来说，最容易生长出个人主义野心，对党、对共产主义的事业也就危害最大。所以毛泽东同志在全国的胜利局势已定、进入城市前夕召开的二中全会〔3〕上，特别提出力戒骄傲，禁止给党的领导者祝寿，禁止用党的领导者的名字作地名街名和企业的名字，保持艰苦奋斗作风，制止歌功颂德现象。这正是一种防微杜渐的警告。毛泽东同志又常常告诫我们：要在捧场、鼓掌、喊万岁的声浪中听出不满意和反对的声音；要常常从反面听一听、想一想，要常常听一些逆耳之言，不要只听顺耳之言。可惜这些告诫常常被一些同志遗忘了。在七大前整风〔14〕时，毛泽东同志特别推荐了郭沫若著的《甲申三百年祭》〔91〕。那个历史教训离现在三百多年了，对我们今天来说也值得重新温习一下。犯有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严重错误的同志，只能听好的，不能听坏的，成绩既冲昏了头脑，利欲就必定会熏心，蒙蔽了共产主义的良知，这是最危险不过的事了。面对着这种危险，在座的同志们都应该引起注意，提高警惕，增强团结，动员全党首先是我们高级干部来不断克服这种最容易蔓延滋长的骄傲情绪，以缩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市场，并要求和帮助犯有这种严重错误的同志迅速彻底改正自己的错误。这是在我们国家实行总路线并进行有计划建设的过渡时期，对党、对人民、对共产主义的事业都具有决定意义的。

综上所述，我们要区别不利于党的团结的言论和行动与

有利于党的团结的言论和行动。前一种是错误的，甚至是非法的，应受到批评和斗争；后一种是正确的、必须的和合法的，应受到欢迎和提倡。我们又要区别流言蜚语、个人攻击与党内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前一种，那些话是见不得人的，是拿不到桌面上来的；后一种，应该是言行一致的，表里如一的。这中间的界限就是我上边说的，属于后一种的，不管当面也好，背后也好，会里也好，会外也好，这一个地区也好，那一个地区也好，这一群人也好，那一群人也好，都是可以说的，因为都是有利的党的团结的言论和行动嘛！批评和自我批评嘛！前一种就不同了，那些话不都是可以到处说的，只可以在背后说，在会外说，在一群人说，在一个地区说，这就有了见不得人、拿不到桌面上来的短处了。这一种当然就是错误的，甚至是非法的。区别就在这里。这显然不是说，同志们以后就不要议论了。不是的，议论的标准应该是有利于党的团结，有利于维护党中央的威信。可以提出意见，也可以提出批评，但是这些议论一定要能提到组织上来，拿到桌面上来，拿到会场上来。如果说有些意见是属于机密性质的，那就直接向中央或主席报告好了，至少你的意见要见得中央或主席嘛！同时，我们要区别破坏团结的非法活动与一般性的自由主义。当然自由主义也不好，从它的思想根源来说，也是从属于资产阶级的，不过它是一般性的。毛泽东同志在《反对自由主义》里头所讲的有许多是属于一般性的。我们也要区别严重的个人主义与一般的骄傲情绪。我刚才说，有了一点点成绩就沾沾自喜，这样的骄傲情绪在我们党里是相当普遍的，那跟严重的个人主义要有区别。当然，一般的自由主义和骄傲情绪可以为个人主

义的非法活动所利用，并且可以发展成为严重的个人主义。这中间有没有界限呢？有的，决定的界限就是有没有发展到了个人野心，争夺权位，破坏党的纪律，进行反党活动。认识了和弄清楚了这一点，我们全党首先是高级干部的觉悟、警惕性和战斗力将会大大地提高。所以不仅是个人主义，就是连自由主义和骄傲情绪在内，都应受到全党首先是高级干部的反对和不断纠正。这就是我们努力的方向。

刚才说的是一般性问题，我在底下说一说特殊性问题。

在这次四中全会上，根据毛泽东同志所提议的方针，大家充分开展了自我批评，对报告和决议草案中所提出的破坏党的团结的危险状况已给了严肃的原则批判，并一致要求犯这种严重错误的同志迅速彻底改正，不要错上加错。这是七大^{〔15〕}以来党的领导干部的觉悟水平的极大提高，党的团结首先是高级干部的团结必将因而极大地增强。这是四中全会的最大收获。

我现在先对犯了不利于党的团结的严重错误的同志提一些意见。他们的初步检讨是值得欢迎的，但应该指出：还不完全，还不深刻。我们希望他们能诚恳坦率地继续反省，来满足大家对他们迅速彻底改正错误的要求。为了要达到这个目的，我以为犯这种错误的同志应该端正自己检讨错误的态度。根据我自己的经验，首先，应该依靠党。要相信毛泽东同志领导的党不仅能发觉我们的错误，而且更能指导我们如何认识和改正错误。我们每一个人，不管过去做了多少工作，现在担任什么职务，没有党和人民，就既不会有过去的成绩，也不会有今天的职务。党和人民是伟大的，我们个人是渺小

的。想通了这一点，还有什么错误不能在党的面前承认和改悔呢？从遵义会议〔92〕以来，毛泽东同志领导的党，确定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挽救了多少犯错误的同志，我就是其中的一个，难道还不足以相信吗？

其次，应该求教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这次全会印发的《列宁、斯大林论党的团结》，《毛泽东选集》中的整风报告、《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这次《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以及刘少奇同志的《论党》和《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都值得好好重新学习一番，从检查自己的党性来认识自己的错误。

第三，应该努力反省。自己做错的事，自己总是知道的。有些话，有些事，一时想不起来，多回忆几次，重要的总会记起来的，同志们也可以帮助对出来的。自己反省，一定要用党的尺度来衡量，并且要准备经过一个认识、斗争和痛苦的过程。属于思想觉悟方面，可能因为认识的关系，一个时候将“是”当成“非”，或者挖得不深，等到认识进步了，自然允许修正或者改变。这在我们检讨当中是常有的事。例如认为错误路线是对的，批评了正确的同志，一旦认识自己是错了，当然很痛苦，但应该勇敢地承认错误，改正过去的看法。所以思想觉悟会有一个过程，认识上的是与非、深与浅会有改变的。可是，若属于思想本质的问题，则不能容许把有当成无，把黑的当成白的，这是一想一看就知道的啊！因为抵赖和造谣是资产阶级思想本质的反映，不是我们无产阶级的思想本质。所以等待觉悟与实事求是应该结合起来。没有想通的可以等待，但事实俱在，人证俱全，就不应该否认。只有这样，才能一

步一步地向党靠拢，向党公开，去掉抵抗和隐瞒的情绪。

第四，应该靠同志们的帮助。共产党人是靠集体生活的，一个人如果平常批评不得，或者不将心事告人，这个人的短处或弱点就很难在平时得到补救。这种人不犯错误则已，一犯就会摔大跤，犯大错误，而他的短处或弱点也正在这个时候才会彻底暴露。这次犯错误的同志恰恰就是这种情况。犯了这样严重的错误，如果欢迎同志们的帮助，就要承受得起同志们的彻底的尖锐的批评，要认识只有这样的同志才是良师益友。推动和鼓励是需要的，掩饰和隐瞒是有害的。经过同志们的帮助，揭露出更多的错误，在政治上会更加健康起来，而不是更加衰弱。应该欢迎同志们开刀治病，不应该仇恨医生。真正的共产党员不能见病不治，更不能讳疾忌医。有些同志有过某些自由主义的毛病，现在认识了就力图改正。在这次全会上有的同志已进行了自我批评，并帮助犯严重错误的同志去改正错误，这是共产党员应具有的品质。发现了错误就自己承认，并帮助犯更严重的不同性质错误的同志去改正错误，这是共产党内需要的朋友。共产党人要这样的朋友，不要那种拉拉扯扯、打掩护、打埋伏的朋友，那是资产阶级的朋友，不是无产阶级的朋友。拿我来说，我过去对于犯这种不利于党的团结的错误的同志也是很尊重的，而且把他们估计高了，一旦发现这样的人犯了这样严重的错误，我站在中央工作岗位上也觉得自己有失察之咎，因此，就要更加努力批判和帮助犯这种严重错误的同志，要求他们改正错误，来补救这个损失。犯这种严重错误的同志，如果想赖掉一些，隐瞒一些，那是不可设想的。在党的面前，怎能这样设想呢？要彻底承认和改正错误，

就必须坚决抛弃阻塞自己觉悟的那种资产阶级卑鄙的个人主义的思想。打破了这一关，就会有共产党人的勇气，向党揭露自己也认为是最丑恶的最本质的东西而不气馁。因为丢掉的是错误，留下的是正确，就是说去掉毒疮，留下健康。为革命奋斗的历史，别人是抹煞不了的，除非自己毁掉它。

四中全会本着毛泽东同志的“与人为善”、“治病救人”的方针，等待犯严重错误的同志更进一步地觉悟，以利党的团结。我要求犯严重错误的同志不要辜负这种期望。

为祖国锻炼身体^{*}

（一九五四年二月二十一日）

体育运动委员会成立一年多来，做了很多工作，全国体育运动的情况起了变化。为了实现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建设社会主义，需要增强人民的体质。我国人民的体质弱，是由于封建制度和帝国主义长期的束缚和压迫造成的。毛泽东同志特别强调要增强人民体质。我们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前进，每个人要在德、智、体、美等方面均衡发展。不均衡地发展，一定会有缺陷，不仅影响个人能力的发挥，对国家也不利。均衡发展是要思想和身体都健康。思想健康和身体健康是相互影响的。

目前的任务是要发展生产、加强国防，这都需要我们有健康的身体。实践表明，工业越发展，越需要高度的技术，而技术越高，速度越快，越需要劳动者既灵巧又有耐力。我国人民灵巧是有的，耐力则不够。同样，要掌握现代化的武器如飞机、坦克等，也必须有健康的身体。所以，开展“劳卫制”〔93〕运动不只是为了个人的身体健康，而且是为了保卫祖国、建设社会主义，这是一个政治任务。

^{*} 这是在政务院第二百零五次政务会议上的讲话。

人民体质的增强虽然不容易，但总是可以做到的。只要坚持开展体育运动，五年、十年、十五年，中国人民的体质就会大大改变。我问过专家，他们也说五年至十年左右就可以了。先天体质弱可以锻炼。我自己在未进学校以前，受封建家庭的束缚，身体很弱，进了学校以后就改变了。青年人的体质是可以改变的。我们最大的希望是三十岁以下的青年，他们在国防和生产战线上都是一支重要的力量，掌握高度的科学技术和现代化的武器，主要是依靠他们。要在工厂、学校和农村中提倡和开展体育运动，工作做得好，经过五年时间，人民的体质会起变化。毛泽东同志提出的“三好”，把身体好放在前面，只有身体好才能学习好、工作好，才能均衡地发展。我们一定要把体育运动和国家前途连结起来，这是一个伟大的改造。年纪大一点的人也要锻炼，当然比青年要困难一些。身体健康了，能够多活些年，看看社会主义不是更好吗？中国人民的体质增强了，有了健康的身体，能够掌握现代化的武器，有了这样的国防，帝国主义还敢不敢侵略我们？它就得考虑。所以，健康的身体是建设和保卫祖国的一个重要条件。这样看问题，就可以促进体育运动的发展。

当前体育运动的方针是要普及和经常化。在普及的基础上才能提高，经常化了才会出人才。我们的国家大，人口多，要普及比较困难，但如能普及到几千万人，肯定会出很多人才。只要体育运动做到普及和经常化并加以正确的指导，人民的体质一定会大大增强。今后两三年内，我们不可能在国际比赛中得到多少冠军，因为没有经常锻炼的基础。吴传玉^{〔94〕}是个华侨，他是经过长期锻炼才取得成功的，没有长期

的锻炼是不会得到冠军的。后年的奥林匹克运动会，我们不要希望参加太多的项目。我们的体育运动如果发展得当，六年以后，到一九六〇年，一定会出现许多好选手。我们的体育运动与资本主义国家的不同。我们的体育运动是有群众基础的，是有远大前途的。

实现上面这个方针，关键在于领导，不仅是体委，两个教育部〔95〕、各个行政部门也有责任。政务院可考虑发个通知，提倡早操和工间操，先在北京的中央各机关试行。今天会议的精神，两个教育部、工青妇各团体都要传达。做工作要上下结合，由上而下，由下而上。今天的会议是由上而下。由下而上是群众监督。还要授权体委进行检查，检查出哪个机关妨碍体育运动，就提出来“将他一军”。检查不仅是看他们开展体育工作有无缺点，而且要配合卫生部门检查健康状况，看效果如何。机关干部的身体好坏，部门行政领导起码是办公厅主任要负责任。在体育运动普遍开展的基础上，还可以进行业余比赛。看打球虽好，但主要的是自己参加体育锻炼。宣传也很重要，从政治上到技术上都要广泛宣传。

把我国建设成为强大的 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工业国家*

（一九五四年九月二十三日）

我国伟大的人民革命的根本目的，是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下面，最后也从资本主义的束缚和小生产的限制下面，解放我国的生产力，使我国国民经济能够沿着社会主义的道路得到有计划的迅速的发展，以便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水平，并且巩固我们国家的独立和安全。我国的经济原来是很落后的。如果我们不建设起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我们就不能摆脱落后和贫困，我们的革命就不能达到目的。在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五二年间，中央人民政府按照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1〕}的规定，先后完成了全国大陆的统一，完成了土地制度的改革^{〔10〕}，进行了广泛的和深入的镇压反革命运动^{〔68〕}和各种民主改革运动，恢复了遭受长期战争破坏的国民经济，着重地发展了社会主义的国营经济和各种类型的合作社经济，初步地调整了公私营工商业之间的关系，这一切都为有计划地进行经济建设和逐步过渡

* 这是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的国内工作部分的要点。

到社会主义社会准备了必要的条件。随后，从一九五三年起，我国就开始了经济建设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着手有系统地逐步地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经济建设工作在整个国家生活中已经居于首要的地位。

制定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全部工作现在还没有最后完成，对于计划的许多细节还在进行补充和修订。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方针是大家已经知道的，这就是：集中主要力量发展重工业，建立国家工业化和国防现代化的基础；相应地发展交通运输业、轻工业、农业和商业；相应地培养建设人才；有步骤地促进农业、手工业的合作化；继续进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保证国民经济中社会主义成分的比重稳步增长，同时正确地发挥个体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作用；保证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水平。第一个五年计划所以要集中主要力量发展重工业，即冶金工业、燃料工业、动力工业、机械制造工业和化学工业，是因为只有依靠重工业，才能保证整个工业的发展，才能保证现代化农业和现代化交通运输业的发展，才能保证现代化国防力量的发展，并且归根结底，也只有依靠重工业，才能保证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不断提高。当然，重工业需要的资金比较多，建设时间比较长，赢利比较慢，产品大部分不能直接供给人民的消费，因此在国家集中力量发展重工业的期间，虽然轻工业和农业也将有相应的发展，人民还是不能不暂时忍受生活上的某些困难和不便。但是我们究竟是忍受某些暂时的困难和不便，换取长远的繁荣幸福好呢，还是贪图眼前的小

利，结果永远不能摆脱落后和贫困好呢？我们相信，大家一定会认为第一个主意好，第二个主意不好。

我国在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五二年迅速地完成了工业恢复的任务，在恢复期间工业总产值平均每年递增百分之三十六点九。在建设期间，工业发展的速度当然要低些，但是一九五三年工业总产值仍然比一九五二年增加了百分之三十三。一九五四年预计现代工业的总产值将等于一九四九年的四点二倍，如果再加上农业和手工业，那么今年的工农业总产值将等于一九四九年的二点二倍。这样的发展速度，在旧中国是不能够设想的。

在工业的发展中应当指出三个值得特别注意的地方。第一是现代工业的产值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迅速上升。在一九四九年，这个比重大约是百分之十七，而在一九五四年预计将近百分之三十三。第二是生产资料的产值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迅速上升。一九五四年消费资料的生产预计将等于一九四九年的三点一倍左右，而生产资料的产值却将等于一九四九年的五点七倍左右。生产资料的产值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在一九五四年预计将由一九四九年的百分之二十八点八上升为百分之四十二点三。第三是国营、合作社营和公私合营工业的产值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迅速上升。由于国营工业和合作社营工业一年一年壮大，由于资本主义工业开始成批地转为公私合营工业，这一比重在一九五四年预计将由一九四九年的百分之三十七上升为百分之七十一左右。这就是说，没有转为公私合营的资本主义工业的产值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将只占百分之二十九左右了。

这些统计表明我们的国家正在向着工业化的目标前进，正在向着社会主义的目标前进。

我们原有工业的基础虽然薄弱，却是目前我国工业产品、工业利润和工业人才的主要来源，忽视这个基础是完全错误的。我们必须充分利用原有的工业基地和工业企业，发挥它们的潜在力量，增加生产品的产量和品种，使它们在国家建设中发挥重大的作用，为国家建设积累资金、培养人才和供应设备，并且供应人民的需要。但是我国原有的工业究竟是非常落后的、零散的、不平衡的，因此，为了实现我国的工业化，就必须主要地依靠新的工业特别是重工业的建设。

我国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新建和改建的重大工业建设项目约有六百个，大家知道的苏联协助我国建设的一百四十一个项目就是其中的骨干。这些建设项目的完成将使我国的工业生产水平和技术水平大大地提高一步，使我们可以自己生产冶金设备、发电设备、采油设备、锻压设备，自己生产汽车、火车头、拖拉机、飞机，并且将使我们有新的工业区域和工业基地，使我国目前工业分布上的不合理状态开始发生变化。这些项目的大部分将在一九五八年完成，其余部分需要将近十年的时间才能完成。

根据上述的情况，我们可以看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关于逐步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规定，关于用经济计划指导国民经济的发展和改造、使生产力不断提高的规定，关于优先发展国营经济、鼓励和引导资本主义经济转变为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的规定，并不是空谈，而是我们正在实现着的活生生的事实。全国的劳动人民正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英

勇奋斗，迅速地改变着我们的祖国的面貌。我们一定可以经过几个五年计划，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工业国家。

有计划的工业生产和工业建设对于我们是一个完全新的课题，我们必须一面工作，一面学习。从最近几年的事实看来，我们的工作和学习是有进步的。但是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可以自满。我们既然是在开始学习，必然要遇到许多困难，而且已经遇到不少困难。我们还必须克服许多工作上的缺点。

目前工业方面的重要问题之一是计划性不足。我们现在还有许多计划不够准确，不够完整，常常互相脱节，并且常常变动。很明显，这里有很多客观的困难不容易在短时期内克服。但是毕竟有不少供应、生产、销售之间的不平衡，不少产品的品种、规格的不合需要，不少建设工作中的勘探、设计、施工的不能衔接，不少交通运输、工业城市规划和工业建设的不相配合，是由于主观努力的不足和工作中的错误而来的。这方面的状况必须尽可能改善，以减少国家的损失。

工业方面另一个重要的问题是由于许多部门和企业不重视节约资金、不重视管理财务成本而形成的巨大的浪费。为了增加国家资金的积累，为了消灭浪费，一切国营企业和建设单位必须全面地完成和争取超额完成国家的计划，贯彻经济核算制，建立严格的节约制度，力求降低成本。

技术力量的不足和技术管理的不善，也是工业方面的重要问题。没有现代化的技术，就没有现代化的工业。我国工业中原有的技术力量很弱。我们现有的高等学校所能培养出来的技术干部，在数量上、门类上和质量上都还不能在短时期

内满足工业和基本建设的需要。在这个情况下必须更加合理地有效地使用和提高现有的技术人才，加强技术组织工作和在企业中培养技术人才的工作，以便提高现有的技术水平和企业管理的水平，提高产品质量，增加新产品的品种和数量，并保证完成现代化的新企业的建设和掌握这些新建企业的生产技术。

加强计划工作，加强节约，加强技术管理，这些就是工业部门的迫切任务，也是交通运输业、邮电业、水利、林业和各个进行基本建设的部门的迫切任务。这些任务，大部分也是商业部门和国营农业的管理机关所必须注意实现的。

我国的农业在土地改革以后有了新的发展。一九五二年粮食和棉花的产量都超过了解放前的最高年产量。预计今年的粮食产量可以等于一九四九年的一点五倍，棉花产量可以等于一九四九年的二点八倍。

农业的发展对于工业的发展有多方面的影响。许多工业特别是纺织业和食品工业的原料是由农业供给的。工业人口和其他城市人口所需要的粮食、油类和其他副食品都依靠农业。工业所需要进口的机器大部分需要用出口农产品去交换。许多工业产品的主要市场是农村。因此，中央人民政府历年都用很大的力量在经济方面、水利方面和技术方面帮助农业的发展，而农民也积极响应政府的号召，发展互助合作，努力增产粮食和各种技术作物，并且踊跃地把他们的产品供应给国家。我国在过去两年内不但战胜了灾害，而且农业生产能继续有所发展，市场能继续保持稳定，在这方面，我们不能不向全国五万万农民表示感谢。

但是农业的发展显然还赶不上人民和国家对于农产品的需要。为了使农业能够更快地和更有计划地发展，必须逐步实行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就是逐步改变农业中的落后的个体经营，按自愿的原则用互助组和合作社的形式把农民组织起来进行集体的生产。

为了保证增加农业的产量以适应整个经济发展的需要，还必须在发展合作化的同时有系统地推广新式农具，推广抽水机和水车，推广良种，改进农作技术，增施肥料，防治病虫害，并且尽可能扩大耕地面积。必须适当地增加棉花和油料作物的播种面积，使棉花的生产能够赶上工业需要，油料的生产能够迅速达到和超过解放前的最高年产量。

为了解决耕畜役畜不足、肉食供应不足和肥料不足的困难，并且为了扩大皮毛的生产，必须努力发展畜牧业和饲养业。对捕鱼养鱼事业，也应当注意发展。

在水利方面，国家在过去几年内修建了很多大规模的水利工程，对减轻水旱灾害、保障农业生产起了很大的作用，在今年的防汛斗争中的作用更为显著。对自然灾害的斗争是我国人民的一个长期的艰苦的任务，我们在水利方面必须作更多更大的努力。

林业对供应建设事业所需木材和防止水旱风沙灾害都有重大的意义。我国的森林资源是不足的，除了必须加强国家的造林事业和森林工业、有计划有节制地采伐木材和使用木材以外，还必须在全国有效地开展广泛的群众性的护林造林运动。

手工业在我国国民经济中有重要的作用。同农民一样，

手工业者也正在迅速地组织生产合作社。这样的合作社今后应当更有计划地积极发展。

交通运输业和邮电业在过去五年内也得到了恢复和发展。不断提高运输能力以适应国民经济迅速增长的需要，是交通运输业的主要任务之一。

五年以来，国内商业和对外贸易有了巨大的发展。国营商业已经可以掌握有关国计民生的主要商品的全部或大部，并且管制了全部对外贸易。目前，国营和合作社营商业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中的比重已占百分之五十左右，在批发总额中的比重已占百分之八十左右。

由于人民消费力增长的速度超过了消费品生产发展的速度，形成了供应和需要之间的不平衡。中央人民政府先后实行了粮食、油料、棉布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以及棉花的计划收购，以便调节供需关系，稳定市场物价，保障人民的生活和国家的建设。这些措施完全是必要的、适时的。这些措施既保障了广大城乡消费者的利益，也保障了广大农业生产者的利益，仅仅对于少数投机者不利，因此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拥护。

对于重要消费品的计划供应，在消费品生产没有充分发展的一个时期内，不但需要继续实行，而且品种和范围还可能扩大；对于重要生产品的计划收购，更将随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而发展。当然，这是极其复杂的工作，也是人民生活和社会经济中的巨大的变化；在开始实行的时候，工作中难免发生暂时的缺点，而人民也难免感觉暂时的不便。但是，如果我们希望不再受奸商投机倒把所形成的物价飞涨和生产停顿的痛苦，希望用合理保证供应全国人民需要的社会主义商业来代

替资本主义的投机商业，那么，我们就会承认，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是国家所必须采取的办法了。

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工作的发展以及加工、订货、包销、收购的发展，根本改变了国营商业的地位。国营商业在过去几年只占了国内市场的一小部分，现在已经占了主要部分，成为全国商业活动各方面的领导力量了。商业部门现在必须担负起计划和安排全部国内市场的责任，必须根据社会购买力和社会商品之间的平衡，根据国营商业、合作社商业和私营商业的经营比重和相互关系，决定社会商品的流转计划，决定对整个私营商业的改造和安排的步骤。

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是我国过渡时期总任务的一个重要部分。经过几年来的工作，资本主义工业的主要部分现在已转变为各种不同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企业。根据客观的发展来看，对资本主义工业的改造主要将经过国家资本主义的高级形式——公私合营来进行。但是中级形式的加工、订货和包销可以替公私合营准备有利的条件，所以也是很重要的。这方面已经得到了更大的发展。随着粮食、油料、棉布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实施，大批私营的粮食店、食油店和棉布店已经改为国营商业的代销店和经销店，使私营商业中的国家资本主义成分得到迅速的增长，并且开辟了逐行逐业改造资本主义商业的道路。

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是一个斗争和教育的过程。为了做好这个工作，还需要积累更多的经验。在这里应当指出的是，在这个过程中，必须把对企业的改造和对人的改造结合起来。这就是说：一方面，我们要改造资本主义企业使它们最

后成为先进的社会主义企业；另一方面，我们还要改造资本家和资本家代理人的思想，尽可能使他们在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起积极的有益的作用。

五年以来，国家的财政状况有了显著的变化。我们不但很快地改变了收入不敷支出的不利情况，实现了财政的收支平衡，每年还保持有一定的结余以充实国家的信贷基金。国家财政的收支平衡，是在收入和支出都有了很大增长的情况下取得的。同时，财政收入的来源也有了很大的改变：从一九五〇年到一九五四年，农民缴纳的税款所占的比重从百分之二十九点六降低到百分之十三点四，而社会主义的国营企业和合作社缴纳的税款和利润所占的比重却从百分之三十四点一增加到百分之六十六点一。财政支出随着收入的增加也有了很大的增加。一九五四年预算中经济建设的支出等于一九五〇年的六倍半；经济建设费占整个财政支出的比重也从一九五〇年的百分之二十五点五增加到一九五四年预算的百分之四十五点四。五年来国家财政用于经济建设的经费共达三百二十八万亿元，其中在一九五三和一九五四两年合计就有二百万亿元。这说明我们依靠全国人民的支持，已经为工业化事业积累了必要的资金，那些幸灾乐祸地断定我们不能克服财政困难的帝国主义的预言家们是完全破产了。

财政工作中的迫切任务，是继续贯彻合理的税收政策，鼓励人民以多余的资金存款、储蓄和购买公债，加强企业的财务管理，节约国家的行政经费，加强财政监督和财政纪律，保证建设时期所必需的后备，总之，就是努力为国家工业化事业积累更多的资金，并更合理地使用这些资金。为了完成这些任

务，我们还需要进行一系列的斗争。我们的财政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人民的财政，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都有监督我们的财政收支的权力和责任。我们希望各位代表监督政府工作人员并同政府工作人员合作来反对浪费资金的现象，反对机构庞大的现象，反对违反财政制度的现象，反对不爱护国家财产、不严格节约和不努力增加资金积累的现象，反对偷税漏税和盗窃国家资财的行为，反对贪污的行为。反对这些现象和行为，也就是拥护社会主义，争取社会主义社会的早日实现。

我们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人民的。我们的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直接地或者间接地都是为着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改善。大家都看到，我们在这方面的工作是有成绩的。

过去几年来我们在改善人民生活方面的一个重大收获，是稳定了金融和物价，保证了广大人民生活的稳定。今后国家应该继续努力，保持物价稳定，使人民生活继续得到改善。

由于国家建设的需要和生产的发展，劳动就业的人数逐年增加。旧中国遗留下来的严重失业现象已经大大减轻。人民政府不但对于原来的国民党政府机关中的人员和官僚资本企业中的职工采取了“包下来”的政策，避免了失业现象的增加，而且大力地进行了帮助失业者就业的工作。但是，由于我国生产还不发达而又人口众多，劳动就业的问题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还是会存在的。我们将在今后继续执行过去几年来行之有效的政策，使这个问题逐步得到解决。

几年来，职工的生活有了很大改善。职工的劳动条件和福利设施也有重大的改善。由于国家用了很大的资金改进工

矿企业的安全卫生设备，职工因工伤亡率正在逐年减少。

很明显，在我们的国家里，经济建设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不能不是互相一致的，因为社会主义经济的唯一目的，就在于满足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而为了充分满足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又必须不断发展社会主义经济。从任何一方面把这两件事对立起来都是错误的：或者不顾目前生产水平，把工资和福利提得过高过快，违反了工人阶级的长远利益，这是一种经济主义的表现；或者对于职工福利甚至职工安全漠不关心，不注意或者不愿意解决那些必需而又可能解决的问题，这是一种官僚主义的表现。我们应当同时反对这两种错误。

工资制度在过去几年内有了一些改进，但是目前仍然相当混乱，而且平均主义现象还没有克服。平均主义是一种鼓励落后、阻碍进步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同马克思主义思想和社会主义制度毫无共同之点。平均主义妨害职工学习技术和提高劳动生产率的积极性，对于发展经济建设很有害，因此我们必须坚决反对平均主义。企业中的奖励制度现在也很混乱，必须加以整顿。同时，在政府机关和某些国营企业中，同工资制并存的还有供给制的待遇办法，这种办法在革命战争时期曾经起过重大的作用，但是它同按劳付酬原则和经济核算制是矛盾的，在今天已经是害多利少了。因此，必须根据社会主义建设的要求，订出妥当的方案，争取在几年内使全国工资制度和奖励制度达到基本上统一合理，并且把供给制逐步改变为工资制。

几年来，由于土地改革的完成，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

国家对农产品收购价格的提高，农业税法的改进，农业贷款的增加和农村信用合作的发展，广大农民的生活在衣食住等方面都有了显著的改善。

各位代表！如上所说，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是我们的经常性和根本性的任务。我们现在所做的工作当然是不够的，必须继续加强。但是我们在目前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必须首先把它同我们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联系起来。大家知道，我国原来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现在要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工业国家，这是一个很伟大而艰巨的任务。毫无疑问，为了实现这个任务，无论在经济方面或者财政方面，都是有很多困难的，我们决不能够轻视这些困难。什么是我们克服困难的道路呢？从最根本的方面说来，这就是要依靠我们全国人民同心协力，艰苦奋斗。当目前国家需要集中主要力量建设重工业、奠定社会主义基础的时候，我们全国人民都必须把注意的重点放在长远利益上面。我们不能够只看到眼前的利益而忽视了长远的利益。为着我们子子孙孙的幸福，我们不能不暂时把许多困难担当起来。我们是有充分的信心来克服一切艰难困苦的。我们必须用全力来实现宪法所规定的我们在过渡时期的总任务，而这里最主要的事情，就是我们人人都要关心提高我们国家的生产力。我们必须了解，增加生产对于我们全体人民，对于我们国家，是具有决定意义的。只有生产不断地增加，不断地扩大，才能逐步地克服我们人民的贫困，才能巩固我们革命的胜利，才能有我们将来的幸福。一切破坏经济纪律、劳动纪律、财政纪律和损害公共财产、浪费国家资金的现

象，在我们这里都是不能容许的；一切只顾个人不顾社会、只顾局部不顾全体、只顾眼前不顾将来、只顾权利不顾义务、只顾消费不顾生产的观点和行为，都是必须反对的。因为这些都损害我们国家的生产发展，因而也就是损害我们将来的幸福。

在亚非会议全体会议上的发言^{*}

（一九五五年四月十九日）

主 要 发 言

主席、各位代表先生：

举世瞩目的亚非会议〔96〕已经开始。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能同与会的各国代表团一起在这个会议上讨论我们亚非国家的共同问题，感到非常高兴。我们能够在这里会晤，首先要感谢缅甸、锡兰、印度、印度尼西亚和巴基斯坦五个发起国家的倡议和努力，我们还应当感谢这次会议的主人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政府为会议作了很好的安排。

亚非两洲有这么多的国家在一起举行会议，这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在我们亚非两洲的土地上生活着全世界半数以上的人民。亚非人民曾经创造过光辉灿烂的古代文化，对人类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近代以来，亚非两洲的大多数国家在不同程度上遭受了殖民主义的掠夺和压迫，以致被迫处于贫困和落后的停滞状态。我们的呼声受到抑制，我们的愿望受到摧残，我们的命运被旁人摆布，因此我们不得不起而反对殖

^{*} 这两个发言分别刊载于一九五五年四月二十日、二十一日《人民日报》。

民主义。由于同样的原因而受到的灾难和为了同样的目的而进行的斗争，使我们亚非各国人民容易互相了解，并在长期以来就深切地互相同情和关怀。

现在亚非地区的面貌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越来越多的亚非国家摆脱了或正在摆脱着殖民主义的束缚。殖民国家已经不能用过去那样的方式来进行掠夺和压迫。今天的亚洲和非洲已经不是昨天的亚洲和非洲。亚非两洲的许多国家，经过长期的努力，已经把他们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我们的会议反映了这一深刻的历史变化。

虽然如此，殖民主义在这个地区的统治并没有结束，而且新的殖民主义者正在谋取旧的殖民主义者的地位而代之。不少亚非人民还在过着殖民地的奴隶生活，不少亚非人民还在受着种族歧视，他们的人权遭受着摧残。

我们亚非各国人民争取自由和独立的过程是不同的；但是，我们争取和巩固各自的自由和独立的意志是一致的。不管我们每一个国家的具体情况如何不同，我们大多数国家都需要克服殖民主义统治所造成的落后状态，我们都应该在不受外来干涉的情况下按照我们各国人民的意志，使我们各自的国家获得独立的发展。

亚非人民曾经长期遭受侵略和战争的苦难。许多亚非地区的人民曾经被殖民主义者强迫充当进行侵略战争的炮灰。亚非人民不能不痛恨侵略战争。他们知道，新的战争威胁不仅危害到他们国家的独立发展，而且还要加强殖民主义的奴役。因此，我们亚非人民更加深切地感觉到世界和平和民族独立的可贵。

基于这些情况，保障世界和平、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并为此目的而促进各国间的友好合作就不能不是亚非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

接着朝鲜停战^{〔26〕}之后，日内瓦会议^{〔97〕}曾经在尊重民族独立的基础上，得到科伦坡五国会议^{〔98〕}的支持，达成了印度支那的停战^{〔99〕}。当时，国际的紧张局势确曾得到一定程度的缓和，给全世界人民特别是亚洲人民带来了新的希望。但是，跟着而来的国际形势的发展却和人民的希望相反。无论在东方和西方，战争危机都在增加。朝鲜人民和德国人民要求和平统一的愿望受到阻挠。日内瓦会议关于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的协议^{〔100〕}有被破坏的危险。美国在台湾地区继续制造紧张局势。亚非以外国家在亚非地区建立的军事基地越来越多。他们公开鼓吹原子武器是常规武器，准备原子战争。亚洲人民不能忘记第一颗原子弹是落在亚洲的土地上^{〔101〕}，第一个死在氢弹试验下的是亚洲人^{〔102〕}。亚非各国人民和世界其他地区的人民一样，不能不关切日益增长的战争威胁。

但是进行侵略、准备战争的人究竟是极少数。世界上不论是生活在哪一种社会制度中的绝大多数人民都要求和平，反对战争。世界各国人民的和平运动有了更加广泛和深入的发展。他们要求终止扩军备战的竞赛，首先各大国应该就裁减军备达成协议。他们要求禁止原子武器和一切大规模毁灭性武器。他们要求将原子能用于和平用途，为人类创造幸福。他们的呼声已经不能被忽视，侵略和战争的政策已经日益不得人心。战争策划者日益频繁地诉之于战争威胁，作为推行侵略政策的工具。但是，战争威胁是吓不倒任何具有抵抗决

心的人的，它只能使威胁者自己陷于更加孤立和更加混乱的地位。我们相信，只要我们同世界上一切愿意和平的国家和人民一道，决心维护和平，和平是有可能维护得住的。

我们大多数亚非国家，包括中国在内，由于殖民主义的长期统治，经济上还很落后。因此，我们不仅要求政治上的独立，同时还要求经济上的独立。当然，我们要求政治独立并不是要对亚非地区以外的国家采取排斥的政策。但是，西方国家控制我们命运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亚非国家的命运应该由亚非各国人民自己掌握。我们要努力实现各国的经济独立，这也并不是要排斥同亚非地区以外的国家的经济合作。但是，我们要求改变西方殖民国家对东方落后国家的剥削状态，我们要求发展亚非各国独立自主的经济。争取完全独立是我们大多数亚非国家和人民长期奋斗的目标。

在中国，自从人民作了自己国家的主人以后，我们的一切努力就是要消除长期的半殖民地社会遗留下来的落后状态，把我们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国家。五年以来，我们恢复了遭受长期战争破坏的国民经济，并且从一九五三年起开始了经济建设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由于这些努力，我们在各个主要生产部门，例如钢铁、棉布、粮食的生产量，都已经超过了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的水平。但是，这些成就比之于我们的实际需要还微小得很，比之于工业高度发展的国家，我们还落后得很。正象其他的亚洲国家一样，我们迫切地需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来发展我国独立自主的经济。

反对殖民主义、维护民族独立的亚非国家更加珍视自己的民族权利。国家不分大小强弱，在国际关系中都应该享有

平等的权利，它们的主权和领土完整都应该得到尊重，而不应受到侵犯。所有附属国人民都应该享有民族自决的权利，而不应遭受迫害和屠杀。各族人民不分种族和肤色都应该享有基本人权，而不应该受到任何虐待和歧视。但是，我们不能不注意到：对突尼斯、摩洛哥、阿尔及利亚和其他争取独立的附属国人民的暴力镇压还没有停止；在南非联邦和其他地区进行着的种族歧视和种族主义的迫害还没有制止；巴勒斯坦的阿拉伯难民问题还没有解决。

现在，应该说，反对种族歧视、要求基本人权，反对殖民主义、要求民族独立，坚决维护自己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已经是觉醒了的亚非国家和人民的共同要求。埃及人民为收复苏伊士运河地区的主权和伊朗人民为收复石油主权而进行的斗争，印度对果阿和印度尼西亚对西伊里安岛恢复领土权利的要求，获得了亚非地区许多国家的同情。同样，中国解放自己领土台湾的要求也获得了亚非地区一切具有正义感的人民的支持。这证明我们亚非各国人民是互相了解、互相同情和互相关切的。

只有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和平才有保障。对于任何一个国家主权和领土的侵犯，对于任何一个国家内政的干涉，都不可避免地要危及和平。如果各国保证互不侵犯，就可以在各国的关系中创造和平共处的条件。如果各国保证互不干涉内政，各国人民就有可能按照他们自己的意志选择他们自己的政治制度和生活方式。日内瓦会议关于恢复印度支那和平的协议就是在有关各方保证尊重印度支那各国的独立、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并对其内政不予任何干涉的基础上达

成的。据此，日内瓦会议并规定，印度支那各国不参加军事同盟和建立外国军事基地。这就是为什么日内瓦会议能够为建立和平地区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但是在日内瓦会议之后，我们却看到了一种相反的情况在发展，这是不利于印度支那各国人民的利益的，也是不利于和平的。我们认为，日内瓦会议关于恢复印度支那和平的协议应该严格地和忠实地予以履行，任何方面不得加以干涉和阻挠。朝鲜的和平统一问题也应该按照同样的原则予以解决。

我们亚非国家需要在经济上和文化上合作，以便有助于消除我们在殖民主义的长期掠夺和压迫下所造成的经济上和文化上的落后状态。我们亚非国家之间的合作应该以平等互利为基础，而不应该附有任何特权条件。我们相互之间的贸易来往和经济合作应该以促进各国独立经济发展为目的，而不应该使任何一方单纯地成为原料产地和消费品的销售市场。我们相互之间的文化交流应该尊重各国民族文化的发展，而不抹煞任何一国的特长和优点，以便互相学习和观摩。

在我们亚非地区的各国人民日益掌握了自己命运的今天，即使我们在目前经济和文化的合作规模还不可能很大，但是，可以肯定地说，这种建立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的合作是有远大的发展前途的。我们深信，随着我们亚非国家工业化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随着各国间贸易关系中人为的外来的障碍的消除，我们亚非各国间的贸易来往和经济合作将会日益增进，文化交流也将日益频繁。

根据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的原则，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是可以实现和平共

处的。在保证实施这些原则的基础上，国际间的争端没有理由不能够协商解决。

为了维护世界和平，我们处境大致相同的亚非国家首先应该友好合作，实现和平共处。过去殖民统治在亚非国家间所造成的不和和隔阂，不应该继续存在。我们应该互相尊重，消除互相间可能存在的疑虑和恐惧。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完全同意南亚五国总理在茂物会议〔103〕联合公报中所确定的关于亚非会议的目的。我们并认为，为了对于促进世界和平和合作作出贡献，亚非各国应该首先根据共同的利益，谋求相互间的亲善和合作，建立友好和睦邻的关系。印度、缅甸和中国曾经确定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104〕作为指导相互关系的原则。这些原则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国家的支持。本着这些原则，中国同印度尼西亚关于两国侨民国籍问题的初步谈判已经取得了良好的结果。在日内瓦会议时，中国也曾表示愿意在这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印度支那各国发展友好的关系。根据这五项原则，中国同泰国、菲律宾等邻国的关系没有理由不能获得改善。中国愿以严格遵守这些原则作为它同亚非其他国家建立正常关系的基础，并愿促进中国和日本关系的正常化。为了增进我们亚非各国间的相互了解和合作，我们建议亚非各国的政府、国会和民间团体实行互相的友好访问。

主席，各位先生，任意摆布亚非人民命运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我们相信，如果我们决心维护世界和平，就没有人能够把我们拖入战争；如果我们决心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就没有人能够继续奴役我们；如果我们决心友好合作，就没有人

能够分裂我们。

我们亚非国家所需要的是和平和独立，我们并无意于使亚非国家同其他地区的国家对立，我们同样需要同其他地区的国家建立和平合作的关系。

我们的会晤是难得的。尽管我们中间存在着许多不同意见，但是这不应该影响我们所具有的共同愿望。我们的会议应该对于我们的共同愿望有所表示，使它成为亚非历史值得珍贵的一页。同时，我们在这次会议中建立起来的接触应该继续保持，以便我们对于世界和平能够作出更大的贡献。

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总统苏加诺阁下说得对，我们亚非人民必须团结起来。

让我们预祝会议成功。

补 充 发 言

主席，各位代表：

我的主要发言现在印发给大家了。在听到了许多代表团团长的一些发言之后，我愿补充说几句话。

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我们共产党人从不讳言我们相信共产主义和认为社会主义制度是好的。但是，在这个会议上用不着来宣传个人的思想意识和各国的政治制度，虽然这种不同在我们中间显然是存在的。

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同而不是来立异的。在我们中间有无求同的基础呢？有的。那就是亚非绝大多数国家和人民自近代以来都曾经受过、并且现在仍在受着殖民主义所造成的灾

难和痛苦。这是我们大家都承认的。从解除殖民主义痛苦和灾难中找共同基础，我们就很容易互相了解和尊重、互相同情和支持，而不是互相疑虑和恐惧、互相排斥和对立。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同意五国总理茂物会议所宣布的关于亚非会议的四项目的，而不另提建议。

本来，对于美国一手造成的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我们很可以在这里提出如同苏联所提出的召开国际会议谋求解决的议案，请求会议加以讨论。中国人民解放自己领土台湾和沿海岛屿的要求是正义的，这完全是内政和行使自己的主权，并得到许多国家的支持。我们也很可以提议会议讨论承认和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问题。去年，科伦坡五国总理会议，还有亚非其他国家，都曾经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地位。而且，中国在联合国所受的不公正待遇，也可以在这里提出批评。但是，我们并没有这样做。因为这样一来，就很容易使我们的会议陷入对这些问题的争论而得不到解决。

我们的会议应该求同而存异。同时，会议应将这些共同愿望和要求肯定下来。这是我们中间的主要问题。我们并不要求各人放弃自己的见解，因为这是实际存在的反映。但是不应该使它妨碍我们在主要问题上达成共同的协议。我们还应在共同的基础上来互相了解和重视彼此的不同见解。

现在，我首先谈不同的思想意识和社会制度问题。我们应该承认，在亚非国家中是存在有不同的思想意识和社会制度的，但这并不妨碍我们求同和团结。第二次大战后，亚非两洲兴起了许多独立国家，一类是共产党领导的国家，一类是

民族主义者领导的国家。前一类国家并不多。但是某些人所不喜欢的，就是六万万中国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属于社会主义体系的政治制度，而不再为帝国主义所统治了。后一类国家很多，象印度、缅甸、印度尼西亚和亚非许多国家都是。我们这两类国家都是从殖民主义的统治下独立起来的，并且还在继续为完全独立而奋斗。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可以互相了解和尊重、互相同情和支持呢？五项原则完全可以成为在我们中间建立友好合作和亲善睦邻关系的基础。我们亚非国家，中国也在内，不论在经济上或文化上都很落后。我们亚非会议既然不要排斥任何人，为什么我们自己反倒不能互相了解、不能友好合作呢？

次之，我要谈有无宗教信仰自由的问题。宗教信仰自由是近代国家所共同承认的原则。我们共产党人是无神论者，但是我们尊重有宗教信仰的人。我们希望有宗教信仰的人也应该尊重无宗教信仰的人。中国是有宗教信仰自由的国家，它不仅有七百万共产党员，并且还有以千万计的回教徒和佛教徒，以百万计的基督教徒和天主教徒。中国代表团中就有虔诚的伊斯兰教的阿訇。这些情况并不妨碍中国内部的团结，为什么在亚非国家的大家庭中不能将有宗教信仰的和没有宗教信仰的人团结在一起呢？挑起宗教纷争的时代应该过去了，因为从挑起那种纷争中得到利益的并不是我们中间的人。

第三，我要谈所谓颠覆活动的问题。中国人民为反对殖民主义所进行的斗争超过一百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族、民主的革命斗争也经历了近三十年的艰难困苦的过程，才终于达到了成功。中国人民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蒋介石统

治下所受的苦难是数也数不尽的，最后才选择了这个国家制度和现在的政府。中国革命是依靠中国人民的努力取得胜利的，决不是从外输入的，这一点连不喜欢中国革命胜利的人也不能否认。中国古话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们反对外来干涉，为什么我们会去干涉别人的内政呢？有人说，中国在国外有一千多万华侨，可能利用他们的双重国籍来进行颠覆活动。但是，华侨的双重国籍问题是旧中国遗留下来的，蒋介石至今还在利用极少数的华侨进行对所在国的破坏活动。新中国的人民政府却准备与有关各国政府解决华侨的双重国籍问题。又有人说，在中国境内有傣族自治区威胁了别人。中国境内有几十种少数民族共四千多万人，其中傣族和相同系统的壮族将近千万人。他们既然存在，我们就必须给他们自治权利。好象缅甸有掸族自治邦一样，在中国境内各个少数民族都有他们的自治区。中国少数民族在中国境内实行自治权利，如何能说威胁邻邦呢？我们现在准备在坚守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与亚非各国，乃至世界各国，首先是我们的邻邦，建立正常关系。现在的问题不是我们去颠覆别人的政府，倒是有人在中国的周围建立进行颠覆中国政府的据点。比如在缅甸边境就存在着蒋介石集团的残余武装分子，对中缅两国进行破坏。因为中缅友好，我们一直尊重缅甸的主权，信任缅甸政府去解决这个问题。

中国人民选择和拥护自己的政府，中国有宗教信仰自由，中国决无颠覆邻邦政府的意图。相反的，中国正在受着美国政府公言不讳地进行颠覆活动的害处。大家如果不信，可亲自或派人到中国去看。我们是容许不知真相的人怀疑的。中

国俗语说：“百闻不如一见。”我们欢迎所有到会的各国代表到中国去参观，你们什么时候去都可以。我们没有竹幕，倒是别人要在我们之间施放烟幕。

十六万万亚非人民期待着我们的会议成功。全世界愿意和平的国家和人民期待着我们的会议能为扩大和平区域和建立集体和平有所贡献。让我们亚非国家团结起来，为亚非会议的成功努力吧！

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

（一九五六年一月十四日）

同志们：

为着加强党对于知识分子的领导，加强党对于整个科学文化工作的领导，中央决定召集一次会议讨论知识分子问题。

中央的这个决定，是中央领导全党反对保守思想、努力完成过渡时期总任务的整个斗争的一部分。

大家知道，在一九五五年内，根据毛泽东同志的倡议，党中央曾经对于党内的右倾保守思想，进行了一系列的斗争。这一系列的斗争的最重要的结果，就是肃清反革命分子运动在机关内在社会上都有步骤地彻底展开，预计今后两年内将在全国范围内基本上完成；就是农业合作化运动在群众觉悟迅速增长的基础上突飞猛进，今年将在全国范围内基本上完成半社会主义的合作化，并且正在向着全社会主义的合作化发展；就是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全行业公私合营迅速发展，今年也很有可能在全国范围内基本上完成；就是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整个地将要提前和超额完成，预计某些生产部门可以在一九五六年完成一九五七年的生产计划，其他各

^{*} 这是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的报告，刊载于一九五六年一月三十日《人民日报》。

部门也都有可能提前和超额完成五年计划。

所有这些巨大的动人的成就，在一年以前还是不可想象的；如果不展开反对右倾保守思想的斗争，那么这些成就，到现在也还是不可能获得的。由此可见，右倾保守思想在我们党内的危害是多么严重。

反对右倾保守思想的斗争的基本要求，是应该更加巩固和发展我国人民民主专政，提早完成社会主义改造，超额完成国家工业发展计划和加速进行国民经济的技术改造。这个斗争有重大的世界意义。在我们六亿人口的大国中，能够提前完成和加速进行这些任务，把这些任务完成和进行得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就将使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得到更快更大的加强，就将更有利于我们阻止新的战争的爆发，而如果疯狂的侵略者敢于发动新的战争，我们也将处于更有力的地位。因此，党中央决定，把反对右倾保守思想作为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中心问题，要求全党在一切工作部门中展开这个斗争。

知识分子问题，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提出来的。

知识分子问题，同我们目前的加速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究竟有什么关系呢？

我们所以要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归根结底，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而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不断地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地提高劳动生产率，就必须在高度技术的基础上，使社会主义生产不断地增长，不断地改善。因此，在社会主义时代，比以前任何时代都更加需要充分地提高生产技术，更加需要充分地发展科学

和利用科学知识。因此，我们要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地发展社会主义建设，除了必须依靠工人阶级和广大农民的积极劳动以外，还必须依靠知识分子的积极劳动，也就是说，必须依靠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密切合作，依靠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兄弟联盟。我们现在所进行的各项建设，正在愈来愈多地需要知识分子的参加。比方说，我们要找矿，就得有一批地质专家，带上大批大学毕业生和中学毕业生，到各处的荒山僻野去进行测量、普查、详查和钻探。我们要建设矿山、工厂、铁路和水利工程，就得有一批工程师和一大批技术员来勘测、设计、建筑和安装。工厂要生产，生产中从产品设计到成品检验的每一个环节，都需要一定数量和一定水平的技术力量。工业和商业的管理，愈来愈需要各种专门的知识。要建设现代化的国防，就需要各种科学专家。没有教师和医生，我们就不能有学校和医院。没有文化艺术工作者，我们就不能有文化生活。在农村里，实现农业机械化和电气化以后，固然需要有大批的农业机器工程师、电站工程师、农学家、会计师等等；就在目前，为着实现从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105〕中的许多马上就要着手的项目，例如为着生产新式畜力农具、化学肥料和抽水机，消灭主要的病虫害，消灭严重的人类疾病和畜疫，也必须依靠科学技术工作者、植物保护学者、医务工作者和兽医的积极参加。因此，知识分子已经成为我们国家的各方面生活中的重要因素。而正确地解决知识分子问题，更充分地动员和发挥他们的力量，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也就成为我们努力完成过渡时期总任务的一个重要条件。我们党的各个部门，党的各级组织，都应该重视这

个问题。

什么是当前的知识分子问题呢？当前的根本问题，就是我们的知识分子的力量，无论在数量方面，业务水平方面，政治觉悟方面，都不足以适应社会主义建设急速发展的需要；而我们目前对于知识分子的使用和待遇中的某些不合理现象，特别是一部分同志对于党外知识分子的某些宗派主义情绪，更在相当程度上妨碍了知识分子现有力量的充分发挥。我们必须加强领导，克服缺点，采取一系列有效的措施，最充分地动员和发挥现有的知识分子的力量，不断地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大规模地培养新生力量来扩大他们的队伍，并且尽可能迅速地提高他们的业务水平，以适应国家对于知识分子的不断增长的需要。这就是我们党目前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根本任务。

—

为了讨论党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任务，我们首先要把目前知识分子的情况考察一下。

我们党向来是重视知识分子问题的。还在一九三九年，党中央就通过了毛泽东同志所起草的关于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106〕，并且在各个抗日根据地有效地实施了。全国解放以后，党在全国范围内对于知识分子实行了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党中央认定：革命需要吸收知识分子，建设尤其需要吸收知识分子。特别是由于解放前的我国是一个文化落后科学落后的国家，我们就更必须善于充分地利用旧社会遗留下

来的这批知识分子的历史遗产，使他们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党中央又认定：我国旧时代的知识分子在过去虽然受了帝国主义和反动阶级的种种影响，但是他们中间的绝大多数同时也受着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压迫，因而一部分参加了革命，一部分同情于革命，多数对于革命抱着中立的观望的态度，反革命分子只占极少数。事实日益给中国知识分子提出证明：他们除了同工人阶级和共产党一道，并没有什么别的出路。因此，团结知识分子是必要的，也是完全可能的。从这个认识出发，党中央对于旧时代的知识分子采取了“包下来”的方针，绝大多数都继续给以适当的工作，其中一部分还分配了负责的工作；对于原来失业的知识分子也努力帮助他们就业，或者给以其他的适当的安排。在政治方面，党给了许多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以应有的地位。党中央认为：对于旧时代的知识分子必须帮助他们进行自我改造，使他们抛弃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思想，接受工人阶级的思想。为了这个目的，党采取了一系列的步骤。党组织他们去参加土地改革〔10〕、镇压反革命〔68〕、抗美援朝〔26〕、“三反”〔77〕“五反”〔74〕的斗争，参观工厂和农村，访问苏联，参加各种国际活动，领导他们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知识，批判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观点，进行反对胡风反革命集团〔107〕和其他反革命分子的斗争，并且在学习的基础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在业务方面，党也采取了许多步骤，帮助他们改进工作方法，提高业务能力。他们中间的绝大部分已经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在团结、教育、改造旧知识分子的同时，党又用了很大的力量来培养大量的新的知识分子，

其中已经有相当数量的劳动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由于这一切，我国的知识界的面貌在过去六年来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关于知识分子的目前的政治状况，许多单位作了统计。这些统计表明：在高级知识分子中间，积极拥护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积极拥护社会主义、积极为人民服务的进步分子约占百分之四十左右；拥护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一般能够完成任务，但是在政治上不够积极的中间分子也约占百分之四十左右；以上两部分合占百分之八十左右。在这百分之八十左右以外，缺乏政治觉悟或者在思想上反对社会主义的落后分子约占百分之十几，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约占百分之几。

同解放初期比较起来，这个变化是很快的。例如，根据北京、天津、青岛四所高等学校对于一百四十一个教师的统计，过去六年中，进步分子由百分之十八增为百分之四十一，落后分子由百分之二十八减为百分之十五。许多知识分子在我国伟大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事业面前，不能不日益受到强烈的影响，并且从中国的新生中看到全民族和他们自己的互相关联的命运。

在这里需要注意的是，知识分子的思想状态同他们在政治和社会地位上的变化并不是完全相适应的。许多进步分子也还有程度不同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和个人主义的思想作风，更不要说中间分子了。此外，有不少单位的知识分子、特别是其中比较落后的部分的变化很慢，也反映我们在他们中间做的工作很少。

知识分子的队伍在过去六年中在数量上也有了很快的扩

大。目前全国在科学研究、教育、工程技术、卫生、文化艺术和其他方面的高级知识分子根据估计约为十万人，其中在解放以后增加的数字，根据一部分材料统计，约占三分之一左右。有些部门增加得特别快。例如，地质工作人员在解放初期不满二百人，而在一九五五年，根据地质、重工业、石油工业、煤炭工业等四个部的统计，只是工程师就已经增加到四百九十七人，而高等学校毕业的技术员就达到三千四百四十人。

解放以后六年中，全国高等学校毕业生已经达到二十一万七千九百人。他们虽然并不都合乎我们所说的高级知识分子的标准，但是他们是知识界的新生力量，并且是专家的后备军。而且必须指出，有许多青年虽然在等级上还不是专家，却已经担任了专家的工作，并且一般地担任得不坏。在高等学校的四万二千教学人员中，教授和副教授只占百分之十七点八，讲师占百分之二十四，助教占百分之五十八点二，而一部分助教现在已经参加了教课的工作。在工程界也是一样。全国各级工程师只有三万一千多人，而高等学校毕业的各级技术员却有六万三千六百人，他们中间的很多人实际上是担任着工程师的工作，其中有些人早已应该被提升为工程师了。除此以外，作为高级知识分子的后备军的，还有其他知识分子的广大队伍，他们正在实际工作和业余自学的过程中不断地提高他们的知识水平。

所谓高级知识分子和一般知识分子，中间并没有严格的界限。现在就已经有统计数目的科学研究、教育、工程技术、卫生、文化艺术五个方面的知识分子来看，共有三百八十四万人。他们是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一支伟大的力量。正确地估

计和使用这些知识分子，有计划地帮助他们在政治上和业务上不断进步，是党和国家的极其重要的任务。在我的报告中，虽然着重地讨论有关高级知识分子的问题，但是大部分原则同样地适用于一般知识分子。

如上所说，我国知识分子现在已经成为一支很大的队伍。但是，我们的国家是这样地大，我们的建设事业发展得这样地快，今后还要发展得更快，因此，我们不能不更快地扩大知识分子的队伍，尤其是高级知识分子的队伍，以满足社会主义建设的迫切需要。应该承认，我们培养和提拔新生力量的工作也还有很多缺点，这些缺点阻碍着知识分子队伍的更快的扩大。

我国知识分子的业务水平在过去六年中也有了显著的提高。全国的高等学校进行了教学改革，新设了许多以前全国所没有的系和专业，新编和翻译了大量的教材，提高了教学的质量。全国的科学技术界在地质勘探方面、基本建设设计和施工方面、新产品设计和试制方面，都进行了巨大的工作，得到了显著的成就。由于努力向苏联学习的结果，我国工程界现在已经学会了许多现代化的工厂、矿井、桥梁、水利建设的设计和施工，在设计大型机械、机车、轮船方面的能力也有很大的提高。从一九五二年到一九五五年试制成功的新的机械产品，已经有三千五百种左右，少数已经达到世界水平。在冶金方面，我国能够冶炼的优质钢和合金钢，已经有二百四十多种；我国高炉和平炉的利用系数已经达到苏联一九五二年的水平。在理论科学方面，我国在数学、物理学、有机化学、生物学的若干部门中的成就，也受到了世界科学界的重视，其中一

部分已经对生产的实践有了贡献。

但是整个说来，我国的科学和技术的状况仍然是很落后的。不但世界科学的很多最新成就，我们还没有能够掌握和利用，而且就是目前我国建设中的许多复杂的技术问题，我们也还不能离开苏联专家而独立解决。可是直到最近以前，我们对于提高我国科学技术水平的问题，还没有作出全面规划；甚至现有的力量，也还没有完全有效地利用。技术科学上的落后同理论科学基础的薄弱是分不开的，而正是在科学研究方面，我们投入的力量最少。

从以上的简单叙述可以看出：我们的成绩很大，但是还有不少缺点。

那么，我们在知识分子问题上应该采取怎样的方针呢？应该防止和纠正什么倾向呢？

目前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主要倾向是宗派主义，但是同时也存在着麻痹迁就的倾向。前一种倾向是：低估了知识界在政治上和业务上的巨大进步，低估了他们在我国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大作用，不认识他们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认为反正生产依靠工人，技术依靠苏联专家，因而不认真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不认真研究和解决有关知识分子方面的问题；对于怎样充分地动员和发挥知识分子的力量，怎样进一步改造知识分子、扩大知识分子的队伍、提高知识分子的业务能力等迫切问题，漠不关心。后一种倾向是：只看到知识界的进步而不看到他们的缺点，对他们过高地估计，不加区别地盲目信任，甚至对坏分子也不加警惕，因而不去对他们进行教育和改造工作，或者虽然看到他们的缺点，但是由于存在着各种不应有

的顾虑，因而不敢对他们进行教育和改造工作。这两种倾向在形式上是相反的，而实际的结果却都是一种右倾保守主义，都是放弃领导，缺乏积极的斗争精神，都妨碍着我们正确地解决知识分子问题和科学文化问题，都妨碍着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

我们必须同时反对这两种不正确的倾向。我们既不能对知识界的现有力量加以忽略，更不能认为可以满足；既不能无限期地依赖苏联专家，更不能放松对苏联和其他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进行最有效的学习。我们所应该采取的唯一正确的方针，就是为了使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进行得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必须尽一切努力最充分地动员和发挥知识分子的现有力量，同时尽一切努力尽可能迅速地给以进一步的改造、扩大和提高，使这种改造、扩大和提高的速度和规模能够真正符合我们国家的各方面伟大发展的巨人式的步伐。

二

最充分地动员和发挥知识分子的现有力量，不但是我国目前紧张的建设事业所必需的，而且也是对知识界加以进一步的改造、扩大和提高的前提。

一般地说，知识分子是在我们党的领导下被大量地动员起来了。要不然，我们前面说的知识分子的巨大进步和他们对于国家的巨大贡献，就都是不可思议的了。我们必须首先肯定这一点，这是事物的主要方面。

但是在我们的工作中，也的确存在着不少缺点，包含一些

严重的缺点。在目前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造的高潮当中，需要我们加强领导，迅速地克服这些缺点，才能更充分地动员和发挥知识分子的力量。

为了最充分地动员和发挥知识分子的力量，第一，应该改善对于他们的使用 and 安排，使他们能够发挥他们对于国家有益的专长。

在知识分子的使用和安排方面，我们在大多数的情形下都做得不坏。许多知识分子已经在国家建设中负担了很多很重大的任务，而他们的能力在实践中也不断地得到了提高。

但是究竟不能说，我们已经把知识分子使用和安排得都恰当了，而没有闲置任何力量。例如在许多机关里，因为工作分配得不适当，或者工作组织得不好，也还有使少数知识分子“闲得发慌”的情形，而这些知识分子往往正是因为有某种专门知识，才被分配到这些机关里来的。这种浪费国家最宝贵的财产的情形，必须加以消灭。又如在全国高等学校里，还有极少数教师没有开课。这些人里面有一些并不是不能开课，或者只需要组织他们学习一下就可以开课，这就应该让他们开课；如果确实不能开课，也应该设法分配给他们所能担任的工作，例如编译工作、出版工作、图书馆工作等，而不应该让他们闲着。又如在社会上也还有极少数失业而还有相当劳动能力的知识分子，也应该根据情况，由地方或者由中央给他们分配一定的工作。

有些地方，在对知识分子的安排和使用上，用非所学的情形也还存在。有一部分科学家，本人愿意作科学研究工作，也以做科学研究工作对国家最有利，却被分配做机关行政工作

或者学校行政工作。还有一部分专家，由于工作分配中的错误，完全没有理由地被指定担任他们所没有学过的工作，有时今天叫干这个，明天又叫干那个，可是就不让他们调回本行。根据国务院第四办公室就轻工业部的所属五个单位统计，这种用非所学的情况，在高级知识分子中就约占百分之十，这是多么严重的损失！我们必须采取坚决的步骤，来纠正这种对待人才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本位主义的错误，以便把专门人才用在最需要的地方。

为了最充分地动员和发挥知识分子的力量，第二，应该对于所使用的知识分子有充分的了解，给他们以应得的信任和支持，使他们能够积极地进行工作。

知识分子对于我们所给予的信任和支持，一般地是满意的，但是我们仍然应该看到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在对于知识分子的信任问题上，如前所说，一种倾向是在政治上和业务上不加区别地过分地信任，以至把一些国家的机密没有必要地告诉给一些不相干的人或者泄露给一些不可靠的人，或者对于完全不称职的人加以重用，使工作遭到损失。这种情形是存在的，必须加以纠正。另一种倾向是没有给他们应有的信任，例如可以去的工厂不让他们去，可以看的资料不让他们看。这种情形也是存在的，也必须加以纠正。国家的机密必须无条件地保守，任何放松都是不允许的；问题是在正确地划清机密的界限，而不要任意地扩大机密的范围，使工作受到损失，使工作人员遇到困难。同时，对于知识分子的历史要有一个正确的估计和了解，以免一部分人由于“历史复杂”而受到长时期的不应有的怀疑。现在的高级知识分子中许多人历史

是比较复杂的，这并不奇怪。但是只有少数人有政治问题，只有极少数人有现行的政治问题。不少有历史问题没有作出结论的知识分子，是由于领导同志没有认真负责、实事求是地弄清他们的问题，因而使问题长期迁延不决。应该集中比较强的力量，分别轻重缓急，尽可能迅速地清理他们的悬案，以利于今后对他们的使用。

党外的知识分子除了需要应得的信任，还需要应得的支持。这就是说，应该让他们有职有权，应该尊重他们的意见，应该重视他们的业务研究和工作成果，应该提倡和发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学术讨论，应该使他们的创造和发明能够得到试验和推广的机会。有少数党团员不尊重他们上级的党外知识分子的领导，这种情形，我们应该负责加以纠正。

对于一部分知识分子信任和支持不够，这是我们有些同志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宗派主义的主要表现。不少的同志还不习惯于同党外知识分子遇事商量，并在事前给以及时的指导和帮助。有的同志对于党外知识分子甚至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这样，彼此既缺乏了解，也就容易形成隔膜。但是，他们是我们国家的重要工作人员，他们的工作好坏直接地影响着国家的建设，所以我们有责任学会用同志的态度去接近他们，正确地了解他们，从而给他们以指导和帮助，使他们能够在工作中发挥积极的作用。

为了最充分地动员和发挥知识分子的力量，第三，应该给知识分子以必要的工作条件和适当的待遇。

知识分子目前的工作条件和待遇，比解放以前有了很大的改善。但是也象前面所说的一样，这一方面也还有一些急

待解决的问题。

在知识分子的工作条件方面，目前的一个重要问题是他们中间的许多人不能最有效地支配自己的工作时间。许多知识分子深感他们用在非业务性会议和行政事务上的时间太多，这些会议和有许多事务本来是可以不要他们参加的。差不多愈是著名的科学家、文学家和艺术家，被各种会议、事务和社会活动所占去的时间愈多，这是我国文化战线上的一个严重现象。中央认为，必须保证他们至少有六分之五的工作日（即每周四十小时）用在自己的业务上，其余的时间可以用在政治学习、必要的会议和社会活动方面。这个要求，应该坚决贯彻实现。知识分子参加社会活动是有益的，目前的缺点是这些活动往往集中在少数人身上。今后应该加以调整，尽可能使多数人可以参加，对于大家不成为负担。有不少专家兼职太多，也应该迅速地加以调整。

一部分知识分子在工作中感觉缺乏必要的图书资料和工作设备，或者缺乏适当的助手，以致工作效率很低。这种情形确实是存在的。例如许多拥有大量图书资料的单位，没有充分重视这些宝贵财产，没有派适当干部去进行整理，因而使一些专家不能够利用这些图书资料进行研究。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我们对于他们的需要不熟悉，或者虽然听说了多次，而没有负责地给以解决。有些工作人员不愿意为这些“小事情”麻烦，这是错误的。这不是“小事情”，我们应该迅速地认真地解决这些问题。

知识分子的生活待遇，一般地说比解放以前已经有了改善，但是为了使高级知识分子能够把更多的精力用于工作，他

们的生活待遇应该适当地提高。一部分高级知识分子为了日常生活琐事，往往不必要地费去太多的时间，这应该看作是国家劳动力的损失。有些高级知识分子的居住条件太差，在北京和其他人口增加特别快的城市，都有一家几口合住一间小屋的情形。他们的休息娱乐生活也组织得不好。所有这些问题，都应该由主管的部门认真地加以解决。

为了更好地解决知识分子的生活待遇问题，主要地需要从三方面着手：第一，应该教育各有关单位的行政管理人员从思想上重视知识分子的生活条件，特别是要打破那种只注意行政负责人的生活，而对于知识分子就觉得“你有什么值得照顾，我为什么要侍候你”一类的错误观念。只要这样，问题就可以差不多解决一半。第二，应该教育各有关单位的工会组织和消费合作社组织努力扩大为本单位的知识分子服务。工会的会费应该在很大的程度上用于本单位的文化活动和物质福利事业。工会的工作人员应该深入群众，用顽强的精神为本单位的会员解决各种生活困难，这应该是各种知识分子工会的一项重要任务。第三，应该根据按劳取酬的原则，适当地调整知识分子的工资，使他们所得的工资多少同他们对于国家所作的贡献大小相适应，消除工资制度中的平均主义倾向和其他不合理现象。此外，有少数不属于国家工作人员范围的知识分子，例如一部分戏曲艺人、国画家和中医，目前收入比较少，这种问题也应该由主管部门另行设法解决。

有关知识分子生活待遇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升级制度。我们现在的升级制度有很多不合理的地方：等级多而等距小；高等学校毕业生的等级太低；没有确定的升级办法和升级标

准；许多单位几年不评级，因此也就有一部分人没有能够升级。这种不合理的升级制度，大大地妨碍了知识分子在业务上的上进心，特别是妨碍了新生力量的培养和一般知识分子的提拔。这个制度必须迅速地加以修改。此外，关于学位、学衔、知识界的荣誉称号、发明创造和优秀著作奖励等制度，也是鼓励知识分子上进和刺激科学文化进步的一个重要方法。这些制度正在由有关部门拟定，应该在最近期间确定公布。

对于知识分子的政治待遇，也有一些地方需要加以改善。这里的主要问题，是要消除许多单位对于知识分子的政治生活的不关心。有些知识分子埋怨我们一个长报告要他们听好几次，但是更多的知识分子埋怨我们一年不让他们听一次报告。同样，有许多社会活动，有人觉得参加太多，但是更多的人认为，如果他们能够得到参加一次的机会，他们将感到很大的鼓舞。这些方面，我们都应该注意加以适当的调整。此外，我们还应该在工作人员进行教育，让他们懂得怎样正确地对待知识分子，而不要在无意之间伤害了他们的正当的自尊心，这种自尊心是任何一个正直的劳动者都应该有的。

以上所说的，是充分地动员和发挥知识分子力量的一些必要的条件。当然，为了这个目的，还需要给他们以教育和改造，给他们以政治上和业务上的领导，这我们在后面还要谈到。但是，无论如何，以上所说的这些条件都是必不可少的。有了这些条件，才便于更充分地动员知识分子在伟大的祖国建设事业中发挥力量，也才便于推动他们在政治上和业务上的进步。

三

继续帮助知识分子进行自我改造，是党在过渡时期的重要的政治任务之一。

我国现在正处在过渡时期，这是最深刻的社会改造的时期。几千年的生产资料私有制，要一变而成为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几千年的剥削制度，要从此永远消灭；所有的人们，都要变成不同类型的劳动者。这种翻天覆地的变化，不能不在我国社会生活和思想领域的各个方面，引起激烈的反应。因此，这个时期的一切社会问题，其中也包括知识分子问题，都不能离开阶级斗争来观察。知识分子在政治上的各种分野和变化，正是阶级斗争的进展在知识分子队伍中的反映。我们已经看到，在目前的知识分子中，还有百分之几的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例如骗子和流氓），这些人是需要从知识分子队伍中清除的。除此以外，还有少数思想上反对社会主义和完全不了解社会主义的人们。对于这些人，应该批评他们的错误思想，并且尽可能争取他们转变到社会主义方面来。

肃清暗藏在知识界中的反革命分子的工作，在过去一年中已经得到巨大的成绩。我们应该继续努力，争取在今后两年内达到基本上肃清反革命分子的目的。

在同反革命分子作斗争的时候，不要把只同反革命分子有过普通社会关系的人牵连在一起，这一点很重要，因为知识分子中这样的人是很多的。过去如果曾经不正确地把他们同反革命分子混淆在一起，应该向他们解释清楚。对于只在

历史上同反革命组织有过关系，解放以后确实已经改变立场的人，在他们作了适当的交代以后，也应该同普通的人一样看待。

我们在前面说到，在一部分知识分子同我们党之间，还存在着某种隔膜。我们必须主动地努力消除这种隔膜。但是这种隔膜常常是从两方面来的：一方面是由于我们的同志没有去接近他们，了解他们；而另一方面，却是由于一部分知识分子对于社会主义采取了保留态度甚至反对态度。在我们的企业、学校、机关里，在社会上，都还有这样的知识分子：他们在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中国人民和帝国主义之间不分敌我；他们不满意党和人民政府的政策和措施，留恋资本主义甚至留恋封建主义；他们反对苏联，不愿意学习苏联；他们拒绝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并且诋毁马克思列宁主义；他们轻视劳动，轻视劳动人民，轻视劳动人民出身的干部，不愿意同工人农民和工农干部接近；他们不愿意看见新生力量的生长，认为进步分子是投机；他们不但常常在知识分子和党之间制造纠纷和对立，而且也在知识分子中间制造纠纷和对立；他们妄自尊大，自以为天下第一，不能够接受任何人的领导和任何人的批评；他们否认人民的利益、社会的利益，看一切问题都从个人的利益出发，合乎自己利益的就赞成，不合乎自己利益的就反对。当然，所有这些错误一应俱全的人，在现在的知识分子中是极少数；但是有上述一种或者几种错误的人，就不是极少数。不但落后分子，就是一部分中间分子，也常有以上所说的某一些错误观点。胸怀狭窄、高傲自大、看问题从个人的利益出发的毛病，在进步分子中也还不少。这样的知识分子如果不改变

立场，即使我们努力同他们接近，他们同我们之间也还是会有隔膜的。

因此，我们不但应该改造落后分子，而且对于中间分子也应该尽可能地教育他们脱离中间状态，变为进步分子；对于进步分子，也必须帮助他们继续进步，帮助他们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扫除他们思想上的资本主义、个人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影响。我们应该在高级知识分子中间培养出大批的坚决为社会主义奋斗的红色专家。目前有些高级知识分子已经成为红色专家，还有很多人具有这种愿望。我们应该热情地帮助他们进行自我改造，实现他们的这种愿望，任何排斥和歧视他们的态度都是错误的。

总起来说，彻底肃清暗藏在知识界中的反革命分子，使落后分子减少到最低限度，使中间分子尽可能地变为进步分子，使进步分子成为完全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这就是我们在目前阶段继续改造知识分子的斗争纲领。

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我们已经有了丰富的经验和巨大的成绩。因此，关于知识分子能否改造的问题，已经不需要详细的讨论了。我们现在的任务，是总结过去的经验，克服过去工作中的某些缺点，使今后的工作能够进行得更有计划。我们既然看到知识分子中的各种政治的分野，就应该大体上按照这种状况，分别地定出教育进步分子、中间分子、落后分子的计划，采取各种已经证明有效的办法，加以实施。

知识分子的改造通常经过三条道路：一条是经过社会生活的观察和实践；一条是经过他们自己的业务的实践；一条是经过一般的理论的学习。这三个方面是互相联系的，一个人

的思想的转变常常在三方面都受了影响。但是一般地说来，社会生活的教育作用最为广泛和直接。大家知道，许多知识分子的思想转变都是从参加土地改革和抗美援朝开始的。近几年对于工厂农村的参观，也极有力地帮助了知识分子获得对于社会主义的信心。但是我们还没有有系统地组织这个工作，特别是许多中间分子和落后分子常常没有放在我们的计划之内。在今后，应该把组织知识分子参观社会主义建设作为一项重要任务，加以通盘的安排，使凡是没有参观过的人在最近几年中都得到参观的机会。

业务的实践对于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也有重大的作用。过去几年中，教学方法的改革和苏联教材的采用，使许多原来不相信苏联和不相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师改变了认识。同样，我国工农群众在生产技术上的创造，苏联科学技术在我国的推广，苏联专家的实际示范，也使很多科学技术人员信服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今后应该继续发展这一方面的经验。但是在学习苏联的问题上，过去也有过于急躁、生硬和机械照搬的缺点，有的同志甚至武断地否定资本主义国家的科学技术成果。这些缺点今后应该避免。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对于确立知识分子的革命的人生观和科学的世界观，具有决定的意义。但是现在有些地方这种学习组织得不好，或者是指导的人水平太低，或者是学习的计划和方法不合于高级知识分子的需要。今后应该克服这些缺点，按照自愿和联系业务的原则，规定一些必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课程，着重采取自学、夜大学、函授学校、科学讨论会等方法，来帮助知识分子学习理论。

知识分子的改造既然是阶级斗争的一种反映，这个改造过程本身就不可能没有相当的斗争。首先，我们必须要求所有的知识分子站在爱国的立场上，遵守宪法，分清敌我的界限。如果一个人违反爱国的立场，违反宪法，在言论和行为上混淆敌我，那么，人们同这样的人进行斗争是不可想象的。其次，在社会主义的思想和资本主义的思想、唯物主义的和唯心主义的思想之间，也不可能没有尖锐的斗争。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过程，同知识界思想斗争的发展是分不开的。解放以来，党所领导的思想改造运动和对于唯心主义思想的批判，对于知识分子的进步产生了很大的效果。在思想斗争中应该注意的是，一个人的思想的转变，必须通过他本人的自觉。用粗暴的方法进行思想改造，是不能解决问题的。但是用粗暴的方法对待科学家和科学问题的现象，最近还有发现，各地必须注意纠正。此外，有的人虽然在思想上坚持自己的错误，但是只要他并不在言论和行动上反对人民，甚至还愿意用自己的知识和精力为人民工作，那么，我们在批判他的错误思想的同时，就还要善于耐心地等待和帮助他逐步地觉悟起来。

为了帮助知识分子求得进步，党的领导者同他们进行直接的接触有重要的意义。很多知识分子期望我们能够在思想上政治上多给他们以帮助和批评，并且觉得我们给的这种帮助太少了。有不少的知识分子，不但很难接触到地方党委的领导同志，甚至同本单位的党委委员住在一起，也很难有机会谈话。他们说我们对他们是“使用多，帮助少”，或者是“只使用，不帮助”。还有人说，我们的工作人员只在三件事上找他

们(一)调动工作(二)交代历史(三)犯了错误。这些批评是尖锐的，应该引起我们注意。我们应该把同他们进行思想上政治上的谈话，对他们进行同志式的批评，定在改造知识分子的计划以内。组织一些座谈会同他们交换意见，这是他们所欢迎的，以后应该经常举行。此外，还应该按照具体情况，吸收一些党外的知识分子列席一定的党组会和支部会，让他们进一步了解党的意图，接受党的教育。

为了帮助知识分子的进步，除了依靠共产党员以外，还要组织已经占知识分子中百分之四十左右的进步分子参加工作。青年团、工会和各民主党派在过去几年中，在这一方面作了不少工作，今后应该更有计划地使用他们的力量。

由于我们在改造知识分子方面已经有了更多的经验，又有了进步力量的支持，而一般知识分子在祖国的突飞猛进的建设中，又愈来愈深刻地受着社会主义的教育，他们的进步必然会比过去几年更快。只要全国每一个单位对于知识分子改造都作出计划，包括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二年的七年计划和年度计划，坚持地实行起来，那么，我们一定可以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末，使积极为社会主义奋斗并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观点的进步分子，在高级知识分子中占到四分之三以上，而使落后分子降到百分之五左右。

关于在知识分子中吸收党员的工作，也应该作出计划。现在已经有很多的进步的分子要求入党。例如，重工业部有色冶金设计院的工程技术人员共有一千九百二十人，申请入党的有六百零五人，占百分之三十一。天津六所高等学校讲师以上教师二百九十一人，申请入党的有一百零六

人，占百分之三十六点四。华北农业科学研究所研究人员一百三十一人，申请入党的有五十三人，占百分之四十。但是，过去几年中我们很少在他们中间吸收党员，这是一种关门主义的倾向。这种倾向必须纠正。当然，必须注意严格按照党员条件接收党员，但是可以相信，在这些申请入党的人中间，合乎党员条件的是不少的。估计到高级知识分子中进步力量的增大，估计到新生力量不断地加入高级知识分子的队伍，我们认为，计划在一九六二年做到党员占高级知识分子总数三分之一左右，是适当的。

实现以上的规划，我国知识界的思想政治状况就将有进一步的根本变化。我们将有可能在我国过渡时期基本上完成改造知识分子这样一个特定的历史任务。在那个时候以后，知识分子同所有的人一样，仍然要在学习和实践中不断地改造自己，并且要在新的水平上，向更高的进步的标准前进。但是，那是一种经常性质的任务了。

四

为着适应国家建设的急速发展的需要，我们的知识分子队伍必须在数量上加以扩大，在业务水平上加以提高。

我国的科学文化力量目前是比较苏联和其他世界大国小得多，同时在质量上也要低得多，这是同我们六亿人口的社会主义大国的需要很不相称的。我们必须急起直追，力求尽可能迅速地扩大和提高我国的科学文化力量，而在不太长的时间里赶上世界先进水平。这是我们党和全国知识界、全国人民

的一个伟大的战斗任务。

我们经常说我国科学文化落后，但是并不经常去研究究竟落后在哪些地方。同志们！我想在这里稍微多说一点科学方面的事情，这不但因为科学是关系我们的国防、经济和文化各方面的有决定性的因素，而且因为世界科学在最近二三十年中，有了特别巨大和迅速的进步，这些进步把我们抛在科学发展的后面很远。

现代科学技术正在一日千里地突飞猛进。生产过程正在逐步地实现全盘机械化、全盘自动化和远距离操纵，从而使劳动生产率提高到空前未有的水平。各种高温、高压、高速和超高温、超高压、超高速的机器正在设计和生产出来。陆上、水上和空中的运输机器的航程和速率日益提高，高速飞机已经超过音速。技术上的这些进步，要求各种具备新的特殊性能的材料，因而各种新的金属和合金材料，以及用化学方法人工合成的材料，正在不断地生产出来，以满足这些新的需要。各个生产部门的生产技术和工艺规程，正在日新月异地变革，保证了生产过程的进一步加速和强化，资源的有用成分的最充分利用，原材料的最大节约和产品质量的不断提高。

科学技术新发展中的最高峰是原子能的利用。原子能给人类提供了无比强大的新的动力源泉，给科学的各个部门开辟了革新的远大前途。同时，由于电子学和其他科学的进步而产生的电子自动控制机器，已经可以开始有条件地代替一部分特定的脑力劳动，就象其他机器代替体力劳动一样，从而大大提高了自动化技术的水平。这些最新的成就，使人类面临着一个新的科学技术和工业革命的前夕。这个革命，正如

布尔加宁〔108〕同志所说过的，“就它的意义来说，远远超过蒸汽和电的出现而产生的工业革命”。

我们必须赶上这个世界先进科学水平。我们要记着，当我们向前赶的时候，别人也在继续迅速地前进。因此我们必须在这个方面付出最紧张的劳动。只有掌握了最先进的科学，我们才能有巩固的国防，才能有强大的先进的经济力量，才能有充分的条件同苏联和其他人民民主国家在一起，无论在和平的竞赛中或者在敌人所发动的侵略战争中，战胜帝国主义国家。

现在还很难确切地估计，需要多长时间，才能使我们的科学赶上世界先进水平。但是我们现在就必须提出这样一个任务，就是要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期末，使我国最急需的科学部门接近世界先进水平，使外国的最新成就，经过我们自己的努力很快地就可以达到。有了这个基础，我们就可以进一步解决赶上世界水平的问题。

为了完成这个伟大的任务，我们必须首先打破那种缺乏民族自信心的依赖思想。“中国在科学方面的落后反正不能马上改变，反正需要靠苏联的援助。”不错，我们需要靠苏联的援助来改变我们的落后。但是我们应该用什么办法来利用这种援助呢？一种办法是没有全面规划，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碰到什么问题就去请教苏联。派到苏联去学习的，不是科学家，而大部分是中学毕业生。其结果是一辈子不能脱离依赖和模仿的状态，是无限期地加重苏联科学界的负担，是妨害了我国科学的有计划的迅速的发展，也就是影响了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科学力量、经济力量、防卫力量增长的速度。另一种办法是

作出全面规划，分清缓急本末，有系统地利用苏联科学的最新成果，尽可能迅速地赶上苏联水平。这就是说，除了紧迫任务请求苏联援助，并从苏联援助中学习技术以外，对于凡是我国科学上需要向苏联学习的部门，都应有计划地派出比较成熟的科学人才向苏联学习，或者请苏联专家来我国帮助我们建立科学研究的基础，务求最短期间可以在苏联已经达到的水平上，在国内展开继续研究和培养干部的工作。这样，就可以最有效最合理地利用苏联的援助，促进我国科学的有计划的发展，使两国科学事业有可能比较快地建立互相协作的关系，也就是促进了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科学力量、经济力量、防卫力量的增长。后一种办法是中苏两国科学家所多次建议的、也是我们所应该采取的唯一正确的办法。

为了有系统地提高我国科学水平，还必须打破近视的倾向，在理论工作和技术工作之间，在长远需要和目前需要之间，分配的力量应该保持适当的比例，并且形成正确的分工和合作，以免有所偏废。在过去几年中间，我国的各种工作都在开始，我们在目前需要和技术工作方面多投一些力量，而对于长远需要和理论工作方面注意得比较少，这是难免的，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到了现在，如果我们还不及及时地加强对于长远需要和理论工作的注意，那么，我们就要犯很大的错误。没有一定的理论科学的研究作基础，技术上就不可能有根本性质的进步和革新。但是理论力量的生长，总是要比技术力量的生长慢一些，而理论工作的效果一般也是间接的，不容易一下子就看出来。正因为这样，有许多同志现在还有一种近视的倾向，他们不肯在科学研究方面拿出必要的力量，并且经常

要求科学家给他们解决比较简单的技术应用和生产操作方面的问题。当然，理论决不可以脱离实际，任何脱离实际的“理论研究”都是我们所必须反对的，但是目前的主要倾向，却是对于理论研究的忽视。这种情况不但表现在自然科学方面，同样地也表现在社会科学方面。目前我们在社会科学方面分配的力量，比在自然科学方面分配的力量，按照我们国家的需要说来，更加薄弱得不相称。例如中国科学院的学部委员，在自然科学方面是一百七十二个人，目前实际上能用大部分时间进行科学工作的有半数以上；在社会科学方面是五十一个人，目前实际上能用大部分时间进行科学研究工作的却只有几个人！

上述的这两种倾向是互为因果、互相结合的。我们必须彻底纠正这些不正确的倾向，改变这些不利于科学发展的状况。

国务院现在已经委托国家计划委员会负责，会同各有关部门，在三个月内制定从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科学发展的远景计划。在制定这个远景计划的时候，必须按照可能和需要，把世界科学的最先进的成就尽可能迅速地介绍到我国的科学部门、国防部门、生产部门和教育部门中来，把我国科学界所最短缺而又是国家建设所最急需的门类尽可能迅速地补足起来，使十二年后，我国这些门类的科学和技术水平可以接近苏联和其他世界大国。

什么是最迅速最有效地达到这个目的的道路呢？

这样的道路就是：第一，按照我们所最急需的门类，最迅速地派遣若干组专家、优秀的科学工作人员和优秀的大学毕

业生到苏联和其他国家去作一年到两年的实习，或者当研究生，回国以后立即在科学院和政府各部分别建立发展这些科学和技术的基础，并且大量培养新的干部。同时，按照需要，每年陆续派人去实习和研究。第二，对于一部分学科，向苏联和其他有关的国家聘请若干组专家，请他们负责在最短期内帮助我们在科学院和有关各部门建立科学研究机构，培养干部，或者同我国科学界进行全面的合作。第三，有计划地组织大批科学工作人员和技术人员向现在在中国的苏联专家学习，把他们当作导师来利用，而不要当作普通工作人员来利用。在苏联援助我国建设的一百五十六项企业的建设和生产过程中，有系统地组织大批技术人员研究和掌握其中的新的技术原理，并且加以迅速的传授。第四，集中最优秀的科学力量和最优秀的大学毕业生到科学研究方面。用极大的力量来加强中国科学院，使它成为领导全国提高科学水平、培养新生力量的火车头。第五，各个高等学校中的科学力量，占全国科学力量的绝大部分，必须在全国科学发展计划的指导之下，大力发展科学研究工作，并且大量地培养合乎现代水平的科学和技术的新生力量。第六，政府各部，特别是地质、工业、农业、水利、运输、国防、卫生各部门，应该迅速地建立和加强必要的研究机构，同科学院进行合理的分工和合作，共同扩大科学界的队伍，并且负责把世界科学的最新成就，有计划地、有系统地介绍到实际应用中去，以便尽可能迅速地用世界最新的技术把我们国家的各方面装备起来。

为了认真地而不是空谈地向现代科学进军，我们必须抓紧时间。一年的时间是很容易在空谈和拖延不决中间浪费了

的。因此，党中央要求：在今年四月底以前，必须确定科学发展的远景计划，适合于这个远景计划的今明两年的具体计划，以及为了实现这个远景计划和今明两年计划需要马上调集的第一批科学力量（包括需要派遣出国的科学人员的名单，需要聘请苏联专家的人数，需要由其他岗位调到科学研究岗位的人数和主要人员名单等），并且尽一切可能，争取在今年六月底以前实现派遣和调动的计划。关于在全国高等学校中扩大科学研究工作和扩大培养科学力量的计划，必须在今年暑假以后，就着手加以实现。

为了实现向科学进军的计划，我们必须为发展科学研究准备一切必要的条件。在这里，具有首要意义的是要使科学家得到必要的图书、档案资料、技术资料和其他工作条件。必须增加各个研究机关和高等学校的图书费并加以合理的使用，加强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的工作，极大地改善外国书刊的进口工作，并且使现有的书刊得到合理的分配。必须扩大外国语的教学，并且扩大外国重要书籍的翻译工作。

以上所说的原则，一般地也同样适用于文化教育的其他部门。一切文化教育部门都应该作出从一九五六到一九六七年的发展规划，并且采取最有效的措施加以实现。

我们的发展科学文化力量的计划，必须是一个既提高而又扩大的计划，因为不但我们的国家是一个大国，必须有一定的数量才能适应各方面的需要，而且质量一般地也只能在一定的数量的基础上产生。

为了扩大我国的科学文化力量，首先必须按计划增加高等学校学生的名额，还必须注意培养现有的一般知识分子，不

断地提高他们的业务水平。他们不但是高级知识分子极为重要的后备军和合作者，而且如前所说，在数量上比高级知识分子多得多；他们分布在全国各地区和各个工作部门中，对于国家建设担负着巨大的责任。中央各个部门和各省市必须分别定出专门的计划，帮助他们的进修，使他们的业务能力得到迅速的增长，并且把他们中间的优秀分子提拔到高级知识分子的队伍中去。

五

我们党正在胜利地解决农业合作化和手工业合作化的问题，并且正在胜利地解决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问题。全党和全国劳动人民，正在为着提前和超额完成五年计划而努力。全国人民充满着胜利的信心和斗争的积极性。随着汹涌澎湃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高潮而来的，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在这个时候，我们把关于知识分子的一系列问题加以全面的解决，这对于我们的社会主义改造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无疑是非常必要的。

在我们所提出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任务中，不能说没有一些困难。但是这些困难不会比我们改造五亿农民和改造全国资本主义工商业者更加困难，不会比我们实现第一个五年计划更加困难。我们党在过去六年中，在领导知识分子和领导科学文化事业方面，已经得到了巨大的成就。现在我们是比过去更有经验更有办法了，在过去的经验的基础上，我们党一定能够领导知识分子在科学文化事业中取得新的更大的

胜利。那种认为党不能够领导知识分子进行科学文化建设的想法，是毫无根据的。

问题是在善于学习。无论中央各部门或各地区都必须学会更好地领导知识分子和领导科学文化事业。我们不应该设想，既然我们是共产党员，我们就天然地会领导知识分子进行文化建设，我们就天然地不会犯错误。这是一种很危险的想法。而在有些地方，我们有一些同志正是因为抱着这种狂妄的态度，使党的工作遭到了损失。我们对待任何问题，都必须坚持“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老实态度，不懂决不要装懂，但是必须由不懂变为懂。我们党必须培养出一大批精通科学和文化各部门知识的干部。只要我们认真地钻进去，我们就一定可以学会。

在报告里提到的各项任务，许多是需要由中央统一解决的。关于这些问题，我们提议作如下的分工：

关于对待知识分子的各种行政性质的问题，因为需要作一些统一的规定和管理，国务院准备设一个中国专家局来负责处理。但是在这个机构成立以前，各有关部门就应该根据中央的指示，立即着手解决知识分子方面的各项问题。在这个机构成立以后，各个部门也不能减轻他们所应负的直接处理的责任，因为专家局一般地只负责解决那些不便于由一个部门单独处理的问题。专家局在关于高级知识分子的各项行政性质的问题上，负有统一计划、统一调整、统一检查督促的责任。对于各部门在高级知识分子问题上处理不当的地方，专家局有权按照一定的程序加以纠正。

关于对待知识分子的各种政治性质的问题，关于在知识

分子中继续进行思想改造和处理有关反革命分子的问题，也由各个有关部门直接负责，而由中央宣传部负责进行统一的监督。中央宣传部应该经常检查各部门各地区执行中央关于知识分子政策的状况，检查他们的工作计划和执行计划的状况，克服他们的工作中的缺点，传播他们的工作中的先进经验，并且及时地向中央提出问题和建议。

在知识分子中吸收党员的工作由中央组织部负责。知识分子中的民主党派工作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负责。知识分子中的工会工作由全国总工会负责。但是在解决这些工作中的重要问题的时候，应该同中央宣传部联系。

为了加强领导，处理和检查有关知识分子的问题，各级党委和各个部门都应该分别指定适当的机构担负经常的责任，并且要定期地召集一些专门的会议，经常地交流经验，不断地争取工作状况的改善。

同志们！我们相信，经过我们的工作，知识分子将更进一步地团结在党的周围，并且在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中更积极地贡献他们的力量。全国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事业中所形成的联盟，将随着我们的工作的发展，而一天比一天更巩固，更强大。依靠这个联盟，我们一定可以在不很长的时间内，把我们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完全现代化的、富强的社会主义工业大国，一定可以在不很长的时间内，实现毛泽东同志的伟大号召——“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109〕。

经济工作要实事求是^{*}

（一九五六年二月八日）

商业部、手工业合作总社、供销合作总社等单位应重视私营工商业和手工业的改造工作。不要光看到热火朝天的的一面。热火朝天很好，但应小心谨慎。要多和快，还要好和省，要有利于提高劳动效率。现在有点急躁的苗头，这需要注意。社会主义积极性不可损害，但超过现实可能和没有根据的事，不要乱提，不要乱加快，否则就很危险。毛主席说：“大约再有三年时间，社会主义革命就可以在全国范围内基本上完成。”〔110〕这只是讲大体上完成，如少数民族地区，农业、手工业、私营工商业的改造都可能拖长一些。所以不论从地区或从部门看，都会有不少尾巴，彻底实行民主改革的工作也还很多，条件不成熟的等一下不要紧，因为政权在我们手中，这是很大的保证。我们要使条件成熟，做到“瓜熟蒂落，水到渠成”。

绝不要提出提早完成工业化的口号。冷静地算一算，确实不能提。工业建设可以加快，但不能说工业化提早完成。晚一点宣布建成社会主义社会有什么不好，这还能鞭策我们更

^{*} 这是在国务院第二十四次全体会议讨论《关于目前私营工商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若干事项的决定（草案）》时的发言。

好地努力。要真正巩固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成果，必须实现工业化才行。如果没有工业化，农业即使合作化了，也不巩固。手工业也是如此。

各部门订计划，不管是十二年远景计划，还是今明两年的年度计划，都要实事求是。当然反对右倾保守是主要的，对群众的积极性不能泼冷水，但领导者的头脑发热了的，用冷水洗洗，可能会清醒些。各部专业会议提的计划数字都很大，请大家注意实事求是。

关于昆曲《十五贯》的两次讲话^{*}

（一九五六年四月、五月）

四月十九日的讲话

你们浙江做了一件好事，一出戏救活了一个剧种。《十五贯》^{〔111〕}有丰富的人民性和相当高的艺术性。

我们不但要歌颂劳动人民，揭露反动的统治阶级，也需要象《十五贯》这样的戏。不要以为只有描写了劳动人民才有人民性。历史上的统治阶级中也有一些比较进步的人物。人民在那个环境中，没有办法摆脱困难，有时就把希望寄托在这些人物身上。我们不能用现在的眼光去看历史上的事情，正如我们现在所做的一些事，到了共产主义社会看起来也是很可笑的，但是我们现在还是需要做的。比如打仗，到那时人们看起来会感到很奇怪，可是我们现在有时还得打仗。

我们都是从旧社会过来的，犹如小孩从母体中生产出来一样。我们还或多或少地带有封建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的残余，官僚主义就是这种残余的一种表现形式。我们有的官僚

^{*} 这是观看浙江省昆苏剧团演出《十五贯》后的两次讲话：第一次是四月十九日看完演出后对剧团同志的讲话，第二次是五月十七日在关于《十五贯》的座谈会上的讲话。

主义者比戏中的巡抚^{〔112〕}还严重，这巡抚是我们的镜子。《十五贯》中《见都》一场那面堂鼓就很好嘛。你要见他，他官僚主义，不见你；你一击鼓，他就只好出来了。虽然这并不完全是事实，但是反映了人民群众的一种愿望。我们现在有些官僚主义者甚至在“击鼓”后还不出来，我们有的官僚主义者恐怕连这个巡抚都不如呢！这很危险。况钟^{〔113〕}实事求是，重视调查研究，这是符合于唯物主义思想的。

毛主席说的百花齐放，并不是要荷花离开水池到外边去开，而是要因地制宜。有的剧种一时还不适应演现代戏的，可以先多演些古装戏、历史戏。不要以为只有演现代戏才是进步的。昆曲的一些保留剧目和曲牌不要轻易改动，不要急，凡适合于目前演的要多演，熟悉了以后再改。改，也要先在内部试改，不要乱改，不要听到一些意见就改。

老演员年岁大了就要走下坡路了。我们希望下一代比我们好，要好好教他们。我们犯过的错误，不要让他们再犯。青年的热情很可贵，但没有经验，有时象一阵风。舵还得要老同志把。

演员学习文化很重要。主要学语文，结合学些历史、地理、数学等。

昆曲的表演艺术很高，只要你们好好努力，将会取得更大的成就。

五月十七日的讲话

《十五贯》轰动了全国，是有它的历史原因的。昆曲受过长期的压抑，但是经过艺人们的努力奋斗，使得这株兰花更加芬芳了。由于它土生土长，到底还是经得起风吹霜打的，现在又引起了人们的重视。应该承认，“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提出后，我们还没有圆满地执行，昆曲在解放后多年来受轻视，就是一例。这说明我们的成见还很多。北京有两个著名的北昆演员，我们虽也叫这些老艺人教徒弟，但没有提倡昆曲。浙江昆苏剧团是自己奋斗出来的。在解放前，他们为了继承发扬昆曲艺术，曾组织了个小剧团，到处流浪。解放后，他们继续奋斗，终于受到了重视。这也说明一个道理：只要奋斗，就有出路；不奋斗，就无法生存。在我们的新社会，只要你在正确的道路上奋斗，是会产生成果的。决定性条件是自己奋斗。当然，基本的大前提是现在社会变了，但主要还得靠自己努力。粤剧也是受了批评以后奋斗出来的。广东粤剧团代表在中南区会演时受了批评，参加全国戏曲观摩演出后，回去就革新。一九五四年我看了粤剧，演得比较好，有很大进步。现在行家马师曾回来了，气象就更不同了，更提高了。粤剧也有它自身的发展历史。过去我们只看到它的缺点，要求过高，对粤剧的艺术性和人民性忽视了。现在他们埋头苦干，不怕受挫，和老艺人结合搞改革，局面立即改观，使粤剧发出了新的光彩。两个剧种的成绩，都是奋斗不息的结果。《十五

贯》和《搜书院》在政协礼堂演出很受欢迎，剧场加座了，真是公道在人心。昆曲是江南兰花，粤剧是南国红豆，都应受到重视。

昆曲的改革可以推动全国其他剧种的改革。你们的奋斗可以转变社会的风气。《十五贯》的演出复活了昆曲，为“百花齐放，推陈出新”奠定了基础。全国戏曲观摩演出有收获，但这次演出更有典型性，应该庆贺和传播，在报纸上多加宣传，予以表扬。这是第一点。

第二，《十五贯》是从传统剧目的基础上改编的，改得切合了历史主义的要求。它改得恰当，没有把不符合历史的思想 and 现代词句硬加进去。原来的本子从“熊氏二难”^{〔114〕}写起，改编后发展了。况钟、周忱在历史上是有的。周忱写得到家，况钟的实事求是合乎历史，过于执也写得恰当。剧本的水准很高，文化部评价低了。《十五贯》有着丰富的人民性，相当高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它不仅使古典的昆曲艺术放出新的光彩，而且说明了历史剧同样可以很好地起现实的教育作用。有人认为，历史题材教育意义小，现代题材教育意义大。我看不见得，要看剧本如何。现代戏如果写得不好，教育意义也不会大。比如最近演的一个话剧，写得很实际，但严格要求，思想性和艺术性都还不够高。有的戏过了一个时候再看，就不那么动人了，不能持久。这说明加工修改的重要，要继续丰富和提高。同样，《十五贯》还可以再改，但大体上水平是高的。《十五贯》一针见血地讽刺了官僚主义、主观主义，是成功的。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在现在不是个别的。现代戏还没有一个能这样深刻地批判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的。这个戏，公安人员

看后感动极了，对党政各级干部，对广大群众都有教育意义。

第三，《十五贯》具有强烈的民族风格，使人们更加重视民族艺术的优良传统。这个戏的表演、音乐等，既值得戏曲界学习，也值得话剧界学习。我们的话剧总不如民族戏曲具有强烈的民族风格。有些外国朋友认为，中国话剧还没有吸收民族戏曲的特点。现在有些话剧团准备演《十五贯》，这是好的。中国话剧的好处是生活气息浓，但不够成熟，话剧台词就象把现在我们的说话搬上了舞台。演员要注意基本训练和艺术修养。戏曲要能听，还要能看，这才算全面。演戏曲要有很好的修养。要有领导。要集中人才。现在有些老演员不演戏了，但仍要尊重他们。要有“种子”，每个剧团有三几个好演员。主角可将配角带动，传淞、传瑛^[115]是这样做的。我们提倡集体性、统一性，演出要互相配合，个人与集体结合起来，在集体中发挥个人作用。过去的宫廷供奉只是个人表演，是最糟糕的。

第四，《十五贯》为进一步贯彻执行“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树立了良好榜样。这个剧本是改编古典剧本的成功典型。它不只在昆苏剧团可以采用，在有条件的时候，其他剧种也可以采用，但不要勉强。如果真的所有剧团都来演，也就没有人看了。可以先后不同地试试，能演则演，也可修改。老舍^[116]已经改了，可以试一下。不能说昆苏的就是标准本，各种版本都许可。这个戏在国外也有影响，有些国家的大使和政法专家也来要剧本。可以出国去演，首先是昆苏剧团，其他剧团也可以去。

古今中外都有好东西，都要学，不要排斥。不要认为古的东西没有演头。昆曲有很多剧目，要整理改革。很多民族财

富要好好发掘、继承，不能埋没。只要大体好，有些缺点也无妨。首先要有人民性，要站在同情广大人民的方面。我们把历史的东西搬出来，是否就背离了现实呢？要看作品的内容。封建制度是坏的，但统治阶级中也不是一无好人，尽管他们对人民的同情是有局限性的，但是那时的人民对这些人还是歌颂的。况钟是官，但同情人民，这就难能可贵。林冲逼上梁山，延安时称赞了这出戏。革命是逼出来的，从统治阶级营垒中背叛出来的人更是逼出来的，这有什么奇怪呢？写历史题材，不一定光写劳动人民。

历史剧总是塑造典型，不是照搬历史上的真人。况钟在历史上实有其人，但戏里的况钟是典型的，没有受真人真事约束。正史上的周忱是好的，但戏中的周忱有些不同。人们可以根据传说进行修改。批判戏里的周忱是对的。不一定完全符合历史，还是要塑造典型。宋景诗^{〔117〕}也是如此，人民对他的看法和史书上的记载并不完全相同。我们不能拘泥于历史。迁就事实塑造不出典型。剧本受事实束缚，就难以写好。现代革命斗争的史实，不一定都照搬到舞台上和银幕上，这有困难，写出典型就行了。《十五贯》没有受这种束缚。

我们搞艺术，不要只是搞一种单调的东西，要善于吸收，对外国的也是这样。一个民族和国家，其所以能够存在，总有它一些长处。尽管以往的社会制度一再改变，但人民是永生的，不同时代不同民族的人民总是有自己的优秀的东西。我们要学习别人的东西，但要防止盲目性。只有学到了家，才能说是吸收。昆曲和其他剧种都要保持和发扬自己的特点，也要把别人的长处吸收过来。要把人家的化为自己的，化得

使人家不觉得。出国访问是个学习的好机会。以前常出国的只是京剧，以后其他许多剧种经过努力也可出去。出国剧目不能光是那几个。几十个国家都来邀请我们，我们的外交也要靠文化和贸易，这是件重要任务。

第五，《十五贯》的思想性很强，反对主观主义，也反对官僚主义。封建时代的官僚主义是很坏的，主观主义也草菅人命。今天干部的主观主义也很误事，性质是一样的，思想方法差不多。主观主义需要官僚主义的庇护，如没有官僚主义，主观主义不能这么厉害。巡抚是个官僚主义者，代表了朝廷。戏通过两相对照，称赞了实事求是严肃认真的作风，正义的作风。提倡实事求是，是戏的一条主线。这个戏还批判了旧社会的五毒（赌、嫖、偷、杀、骗）恶习。娄阿鼠是很毒的，我们不须问他的出身。这种人在破落地主中往往更多些。五毒恶习尽管更多地存在在剥削阶级中，但在一些劳动人民身上也是有的，这是受了剥削阶级的影响。不能说凡是坏人都是封建剥削阶级出身。所以，娄阿鼠的家谱可以不交代。这个戏还赞扬了群众公论和社会同情的力量。群众本质上是实事求是的，但有时也会被大浪压下去。所以我们要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这个戏也批判了酗酒等坏习气。油葫芦的性格写得好，他乱开玩笑，闹出了乱子。

正义的线贯串在人民身上。在旧社会，劳动人民身上有不少好东西，但在统治阶级中的一些人身上也有好的东西。尽管我们对整个封建的剥削制度是否定的，但他们有些制约的办法也还有可取之处。如戏中这样表现，况钟去见周忱，周忱不见，况钟击鼓，他就不敢不见了。我们国务院，人民群众

要见我们，有的也难见。况钟把金印拿出来，周忱不敢接受。击鼓、退印，就是况钟对付周忱的办法。现在有个风气，对领导不称首长就会有人怪。目前我们所谓保卫首长的某些办法是有缺点的，老百姓想见做“官”的是多难啊！我们也需要一套制约的办法。《十五贯》教育我们做“官”的人，让我们想一想，是不是真正在为人民服务。

最后，希望你们这次成功不要带来了骄傲，要在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指引下继续前进。希望各个剧种都能发展，在世界的文艺花园里增添我们的花朵。

台湾的解放一定能够实现^{*}

（一九五六年六月二十八日）

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这是我国六万万人不可动摇的共同意志。

我国政府曾经再三指出：中国人民解放台湾有两种可能的方式，即战争的方式和平的方式；中国人民愿意在可能的条件下，争取用和平的方式解放台湾。毫无疑问，如果台湾能够和平解放，那么，对于我们国家，对于我们全体中国人民，对于亚洲和世界的和平，都将是最为有利的。

现在，和平解放台湾的可能性正在增长。这首先是因为目前国际形势肯定地趋向和缓，美国使用武力侵占台湾和干涉中国内政的行为，遭到了越来越多的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的反对。从国内形势说，我们伟大的祖国是更加壮大和巩固了，它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使所有爱国的中国人感到自豪。现在，不但具有革命传统的台湾同胞，已经不愿意继续过那痛苦的奴隶生活，而希望早日回到祖国的怀抱；就是在那些从大陆上跑到台湾去的国民党军政人员当中，也有越来越多的人看到，只有实现祖国的和平统一，才是他们的唯一出路。自从

^{*} 这是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的报告的第三部分。报告全文刊载于一九五六年六月二十九日《人民日报》。

我们发出争取和平解放台湾的号召〔118〕以后，在台湾和海外的国民党军政人员中，已经有不少人表示了他们的爱国愿望。我们相信，愿意促成台湾和平解放和祖国完全统一的人，必然会一天比一天增加，这将是不可抗拒的趋势。

大势非常清楚，台湾当局追随美国苟延残喘的局面是决不能持久的。他们所追随的外国势力，决不是什么可以依靠的力量；相反地，引狼入室的结果，不但会使他们失掉自己所有的一切，并且随时有被人暗算和遗弃的可能。人们可以从中美两国在日内瓦会谈〔119〕的不同态度中，得出重要的教训。中国政府始终坚持，只有中美两国在台湾地区的国际争端，才能由中美两国讨论和解决；至于台湾回到祖国的问题，不论采取什么方式，都只能而且完全可以由我们中国人自己处理，决不容外国干涉。可是，美国在谈判中却完全采取另外一种态度。它把台湾当作自己的殖民地，同中国讨价还价。人们还可以看到，现在美国不但侵占了台湾，把它的势力渗透到台湾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各个方面，并且还在施展它所惯用的分裂阴谋，在台湾内部制造猜疑倾轧，企图加强控制，从中渔利。但是，美国侵略势力的这种愚弄中国人民、干涉中国内政和分裂中国民族团结的行为，已经引起了台湾国民党军政人员愈来愈强烈的不满。他们当中有不少人，已经表示再也不能忍受那种寄人篱下、随人俯仰的生活。他们要求提高民族自尊心，维护民族尊严，摆脱美国控制，并且要以独立自主的精神，处理自己的内部问题。我们欢迎他们的这种爱国主张。

我们是一贯主张全民族团结、一致对外的。为了我们伟

大祖国和人民的利益，中国共产党人和国民党人曾经两度并肩作战，反对帝国主义。在抗日战争结束以后，我们也曾经努力争取实现国内的和平。中国人民即使在被迫拿起武器进行国内解放战争期间，甚至在大陆解放以后，也没有放弃和平谈判的努力。尽管这些年来，由于美国的武装干涉，我们和台湾的国民党军政人员走上了不同的道路，但是，只要大家以民族和祖国的利益为重，我们仍然可以重新携手团结起来。我们相信，我们久经忧患的伟大民族一定能够依靠我们自己的努力，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

现在，我代表政府正式表示：我们愿意同台湾当局协商和平解放台湾的具体步骤和条件，并且希望台湾当局在他们认为适当的时机，派遣代表到北京或者其他适当的地点，同我们开始这种商谈。

为了团结一切爱国力量早日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我愿意在这里再一次宣布，我们对于一切爱国的人们，不论他们参加爱国行列的先后，也不论他们过去犯了多大罪过，都本着“爱国一家”的原则，采取既往不咎的态度，欢迎他们为和平解放台湾建立功勋，并且还将按照他们立功大小，给以应得的奖励和适当的安置。

台湾的同胞从来就是中国人民不可分离的一部分。我们不但时时刻刻关怀着他们，从各方面支持他们反抗外国统治的斗争，而且随时准备欢迎他们参加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共享我们民族的荣誉。

我们了解一切家在大陆、身在台湾的国民党军政人员的处境，希望他们能够早日实现同家人团聚的愿望。他们可以

同大陆上的亲友通讯，他们也可以回到大陆来作短期的省亲会友，我们准备给以各种方便和协助。

我们希望台湾的国民党军政负责人员，在和平解放台湾的事业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只要朝着这个方向努力，他们将来的地位就会得到肯定的保证。如果他们还有疑问的话，他们可以通过大陆上的亲友得到解释，或者派人来大陆考查，我们保证他们来去自由。

我们希望台湾的国民党军队人员积极地促成台湾的和平解放。如果这样做，他们就一定能够得到祖国和人民的信赖和照顾。过去在大陆上和平起义的将士所得到的待遇，可以作为先例。

我们也同样希望一切身在海外其他地方的国民党军政人员，为促进和平解放台湾而努力。只有这样，他们才能使自己免于流落异乡、受人轻视的命运。

我们重视海外广大的爱国侨胞在推动和平解放台湾的事业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我们希望曾经或者还在对祖国采取对立态度的少数海外华侨，认清是非，省察大势，跟广大的爱国侨胞站在一起，为促进和平解放台湾的爱国事业作出贡献。

祖国的大门对于所有的爱国分子都永远是敞开着的。任何一个中国人对于祖国统一的神圣事业都有权利和义务作出自己的贡献。依靠全民族的团结和全国人民的努力，台湾的解放是一定能够实现的。

专政要继续，民主要扩大^{*}

（一九五六年七月二十一日）

我们的国家政权是人民民主专政，实质上是无产阶级专政。人民民主专政有民主和专政两个方面。对谁民主，对谁专政，毛泽东同志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已经讲得很清楚了。

革命胜利后，专政问题首先是肃清反革命的问题。我们在农村中进行了清匪反霸斗争〔120〕，然后在全国城乡开展了镇压反革命运动〔68〕，清除五种反革命分子。国内形势的变化，使反革命分子的活动余地越来越小了，也就是说专政的威力把反革命打垮了。现在，虽然反革命残余分子还存在，今后也还会新产生一些进行反革命活动的分子，但是比起解放初期的情况来是大大不同了。我们必须有这样的估计，必须认识到我们人民民主专政的巩固性。

根据这样的形势，今后处理反革命分子，在政策上会比从前更宽一点，而不是更严一点。我们在解放后第一次镇压反革命时，用杀、关、管、放四种办法处理反革命分子。对那些站在人民头上直接压迫人民，有血债，民愤很大又拒不坦白的，实行严厉镇压。在严厉镇压的同时，又执行了改造的方针，用

^{*} 这是在中国共产党上海市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节录。

徒刑、劳动改造等办法处理的人，大大多于处死刑的人。对罪行轻微又已经坦白的，从宽释放，对劳动改造中表现好的也提前释放。从去年开始的机关肃反和社会肃反〔121〕，在政策上比上一次镇反运动更宽一些。机关肃反工作，中央与省市两级已基本结束，正向专县、厂矿发展。由于我们有了抗日战争时期延安的机关肃反、审干〔122〕和解放后社会镇反的经验，这次就比以前做得好一点。我们要肯定成绩，同时也要承认还有缺点错误。我们的肃反工作是在党领导下走群众路线的，有了错误可以及时纠正。毛泽东同志提出：提高警惕，肃清一切特务分子；防止偏差，不要冤枉一个好人。就是说，进行肃反运动，先要引起注意，提高警惕；运动开展后，可能出现某些偏差，有了偏差就纠正。我们遵守这样的原则，一个没杀，大部分没有捉，这样就使机关肃反能够比较健康地进行下去。

关于社会肃反，这一次跟上一次镇反不同。上一次是大张旗鼓地镇压五种公开活动的历史上有严重罪行的反革命分子，这一次主要是清查过去没有发现的，隐瞒历史罪行的，或者新钻进来的暗藏的反革命分子。从去年到今年的工作来看，情况比上一次好，反革命分子的数目少了，自首坦白的多了。这也说明，我们的专政更加巩固了，尤其是在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中，进行社会肃反的有利条件更多了，我们应该更有秩序、更有步骤、更有准备地把它做完做好。在处理反革命分子从严从宽的问题上要解决得更确当。从严从宽是两方面，两方面都要有，但在从宽方面要比较多一些，这样可以使反革命分子中接受改造的人更多，不可救药、无法改造的只是极少数。这对于我们的社会改造是有利的。不仅对于这些反革命

分子，就是对于现在关押着的战犯，包括日本战犯、国民党的高级将领以及伪满皇帝溥仪等，我们也准备逐步采取宽大的办法。对他们宽一些，有利于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和祖国的完全统一，有利于争取日本人民走向中国友好的道路。

专政的另一方面是对剥削阶级。这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对地主阶级，我们采用专政的办法，直接没收他们的土地分给农民，这在彻底实行民主革命的步骤中已经实现了。现在，地主分子经过了劳动改造，可以吸收他们加入合作社，或者做个候补社员观察一个时期，或者管制他们进行生产。对另一个剥削阶级即民族资产阶级，情况就不同了，因为在民主革命阶段，特别是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民族资产阶级对革命采取同情、中立或合作的态度，这与地主阶级、官僚资产阶级不同。解放后，他们又进一步同我们合作。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是经过合作来实现改造，就是通过利用、限制、改造资本主义经济，通过改造资产阶级分子，来达到消灭这个阶级的目的。所以从实行人民民主专政而言，对资产阶级的改造有两方面的意思。一方面，对于阶级的消灭来说是专政；另一方面，对企业改造、所有权的转移，一直到对个人的改造、个人的安排，都是用民主的形式来进行的。民族资产阶级参加了人民政权，从政协到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府里都有他们的代表。在经济组织、文教组织及其他各种组织中，我们都跟他们合作，这都是民主。对民族资产阶级有专政、有民主，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是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一个特点。至于对城乡小资产阶级的改造，那是另外一回事。这种改造是民主的，因为他们不是剥削阶级，而是劳动阶级，我们只能采取民主的改造

方式。

现在我们的人民民主专政应该是：专政要继续，民主要扩大。从国内来说，残余的反革命分子没有完全肃清，从国外来说，帝国主义还敌视着我们，因此，我们的专政应该继续。但是，由于我们的专政更加巩固了，工人阶级的力量更加强大了，所以我们的民主就应该更扩大，而不应该缩小。这一方面是形势许可，另一方面是从整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中得来的经验。我们的人民民主专政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消灭剥削阶级。专政的权力虽然建立在民主的基础上，但这个权力是相当集中相当大的，如果处理不好，就容易忽视民主。苏联的历史经验可以借鉴。所以我们要时常警惕，要经常注意扩大民主，这一点更带有本质的意义。

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在我们的国家制度上想一些办法，使民主扩大。比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我们现在还不是普遍实行直接的、秘密的选举，全国的经济和文化水平还没有发展到具备这样的条件。但是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些方面来扩大民主，例如：

第一，使人大代表经常去接触人民。我们的人大代表，还有政协委员，每年应有两次到人民中去直接视察工作。他们可以从与政府不同的角度去接触广大人民群众，接触实际，看我们的工作是否做得恰当，做错了没有，有什么缺点，有什么偏差。就是说可以去找岔子。我们不要怕，我们有信心，不仅敢让党员，还敢让非党员、民主人士和资产阶级代表看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偏差。只要不是恶意的，即使看错一点看偏一点也不要紧。这种方式已采用一年半了，要继续坚持下去。

第二，今年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已经开了一个先例，就是把所有代表的发言，包括批评政府工作的发言，不管对的、部分对的甚至错的都发表出来。这就在人民中揭露了政府工作的缺点。我们不怕揭露，即使揭露错了一点也不要紧，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有好处。政府应该让人民代表批评自己的错误，承认应该承认的错误。明年还准备进一步允许辩论，当然现在也允许辩论，小组会上就辩论得很热烈，将来在大会上也可以辩论。就是说，人民代表提出的意见，政府要出来回答。回答对了，人民满意；不对，就可以起来争论。资本主义国家的制度我们不能学，那是剥削阶级专政的制度，但是，西方议会的某些形式和方法还是可以学的，这能够使我们从不同方面来发现问题。换句话说，就是允许唱“对台戏”，当然这是社会主义的“戏”。我们共产党人相信真理越辩越清楚。我们共产党人要有勇气面对真实，面对错误，有错误就不怕揭露，就勇于承认和改正。

第三，我们还要进一步使人大代表参加对政府工作的检查，一直到检查公安、司法工作。应该承认，我们的工作基本上是有利于人民的，是为人民服务的。二十年来，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我们的事业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不过我们也有缺点错误，必须经常检查我们的工作，发现了缺点错误就要改正。在检查工作中，即使有的人看法有偏差，有资产阶级观点，但是从这个观点也许会发现一些我们还没有发现的问题。

不仅这样，中央与地方也要互相影响。中央包括党中央和国务院，处在领导地位，可以比较全面地看到大局的发展，但也比较容易忽视某些实际问题、局部利益和群众的眼前利

益，而在这方面地方是处在有利地位的。地方比较容易接触群众，接近实际，能更多地看到实际问题、局部问题和群众的眼前利益，这正好弥补中央的不足。单靠一方面不能够很好地实行领导，必须双方合作，互相影响，才能很好地领导。因此，中央与地方尽管是上下关系，必要时也要唱“对台戏”。比如我们在北京坐久了，政治的语言就是“北京话”，没有地方话，到上海来听一听，也学了一些“上海话”，知道了一些地方上所了解的情况。我来了两天就得到不少知识，坐在北京就得不到。党中央、毛泽东同志告诉我们要经常出来，坐在北京的人一年总要集中或分散出来一两个月。两方面多接触，对问题就比较容易看得全面一点。如果在中央呆久了，又不接触群众和实际，就会比地方容易犯官僚主义。因此，中央与地方要相互影响，相互监督，不要以为只是上面对下面监督，下面同样要监督上面，起制约的作用。唱“对台戏”就是从两个方面看问题，来完成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中央的同志要常到地方来看，有时要邀请地方同志到中央开会，还要摸典型。这样做能够推动我们的工作，减少官僚主义。要使人民民主专政的制度实行得更好，必须同官僚主义作斗争，经常反对官僚主义。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要求在中央工作的同志以及省、地、县、区的各级领导，思想上一定要警惕，要接触实际，接触群众。官僚主义不是能够一下子彻底反掉的，今天反掉了，明天它又来了。你掌握政权，总有这个问题，权力过分集中时就会有偏向。特别是因为我们搞社会主义，为最大多数人民谋最大利益，集中最大权力，做最大的好事，人民比较满意，在这样的情况下做错了一点事情，容易为人民谅解，这就使我

们很容易忽视发扬民主而犯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的错误。今天在座的同志，一级一级算下去，都是做领导工作的，区的工作、支部的工作也都是领导工作，大家要经常警惕这一点。

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执行情况 和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基本任务^{*}

(一九五六年九月十六日)

—

我在说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以前，要说一说关于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基本情况。

在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过程中，由于全国人民首先是劳动人民的努力，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工作和社会主义改造工作都取得了比预想还要快还要大的胜利。我们的成就是巨大的，但是在工作中也发生了一些缺点和错误，需要我们努力加以克服。

在基本建设方面。预计到一九五七年底，全国基本建设的投资额，有可能比原计划超额完成百分之十以上。计划所规定的限额〔123〕以上的建设单位，除了少数的以外，都有可能如期完成或者提前完成建设进度，而且在各个年度中又增加

^{*} 这是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做的《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第一、二部分。报告全文最先刊载于一九五六年九月十九日《人民日报》。

了一些新开工的建设单位。到一九五七年底，预计大约有五百个新建和改建的限额以上的工业企业建设完工，这样，就会提高我国的工业生产能力，为我国的工业创立某些新的部门和在一定程度上革新某些原有的部门，从而开始改变我国工业原来极端落后的面貌。经过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建设，我国以鞍山钢铁联合企业为中心的东北工业基地就会大为加强，在内蒙古、西北、华北各地，就会开始出现许多新的工业城市。五年内新建和恢复的铁路将达到五千五百公里左右，重要的干线如集宁到二连、宝鸡到成都等线都已经修通，鹰潭到厦门的铁路也将要修通，兰州到新疆的铁路已经修到玉门以西。重要的公路如康藏线和青藏线等也都已经全部通车。这些铁路和公路的建成，加强了我国西北、西南广大地区同全国各地区的联系。关于水利建设，我们正在继续根治淮河，开始兴建黄河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并且举办了其他一些大型和很多中、小型的水利工程。许多建设完工的水利工程，对于防御洪水和灌溉田地已经开始发挥一定的作用。这几年来，地质工作也做出了很大的成绩，保证了我国基本建设的需要。如上所说，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基本建设，从投资额和多数重要建设单位的进度说，将有可能达到我们预定的要求。但是也应该指出，某些部门有可能完不成原定的投资额计划，少数重要建设单位的部分工程，也有可能完不成原定的进度计划。这些部门和这些建设单位，在今后一年多的时间内，应该加强工作，尽可能地争取完成原定的计划。同时还应该指出，有一些建设单位只注意赶进度，忽视质量和安全，以致工程质量低劣，事故很多，并且造成浪费，这是应该引以为戒的。

在工业生产方面。工业总产值（包括现代工业和手工业的产值在内，按一九五二年的不变价格计算，下同）历年都超额完成了年度计划，一九五六年，将达到五年计划规定的一九五七年的水平；到一九五七年，将有可能比原计划超额完成百分之十五左右。从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说，到一九五七年，绝大多数产品都将超过原定的计划指标。例如钢将达到五百五十万吨，发电量将达到一百八十亿度，煤将达到一亿二千万吨，金属切削机床将达到三万台，发电设备将达到三十四万千瓦，原木将达到二千四百万立方米，棉纱将达到五百六十万件，机制糖将达到八十万吨，机制纸将达到八十万吨。从重要的工业新产品说，我国过去不能够制造的某些发电设备、冶金设备、采矿设备和新型号金属切削机床，现在已经能够制造了；我国过去不能够制造的汽车和喷气式飞机，现在已经能够开始制造了；我国过去不能够生产的大型钢材和合金优质钢，现在也已经开始部分生产了。但是，也有几种产品，如石油、硫化青、食用植物油、卷烟、火柴等，由于原料不足、销路不畅或者技术的原因，可能完不成原定的产量计划。

在农业生产方面。一九五三年和一九五四年，我国许多地区受到了较大的自然灾害，这两年的农业生产计划都没有全部完成，但是粮食产量仍比丰收的一九五二年有所增加。一九五五年我国农产品丰收，粮食产量（不包括大豆，下同）达到三千四百九十六亿斤，棉花产量达到三千零三十六万担，其他农产品的产量也都有增加。一九五六年许多地区遭受了洪水、内涝、台风和干旱的严重灾害，某些农作物特别是棉花受了一定的损失。但是由于全国农村正处在合作化的高潮中，

没有遭受灾害的地区将会增加生产，一九五六年全国的粮食总产量，仍然有可能达到第一个五年计划规定的一九五七年的水平。只要今后一年多的时间内不发生特大的自然灾害，一九五七年主要的粮食作物和某些经济作物的产量，就有可能超额完成原定的计划。但是大豆、花生、油菜籽、黄麻、洋麻的产量和某些牲畜的数量，有可能完不成原定的计划，我们必须采取有效的措施来加强这些薄弱的环节。

在运输和邮电方面。随着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基本建设规模的扩大，运输量和邮电业务量每年都有增长。预计到一九五七年，主要运输部门的货物运输周转量计划，都有可能超额完成。但是由于某些原有线路和设备的技术改造没有完成计划，某些线路和交通枢纽目前发生了运输紧张甚至堵塞的现象，这种情况正在努力加以改善。

在商业方面。随着社会主义商业的日益发展，一个有计划有组织的市场已经在国内形成，它的领导地位已经日益巩固。一九五六年比一九五二年，国内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将增长百分之六十六点三，对外贸易的进出口总值将增长百分之六十五。预计到一九五七年，国内的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和多数商品销售量的计划，对外贸易的出口和进口的计划，都有可能完成，有的可以超额完成。几年来，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扩大了国内商品的流转额，并且对于最主要的几种生活必需品，实行了统购统销的政策，保证了人民生活必需品的供应，因而基本上保持了物价的稳定，促进了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目前商业工作中的缺点，主要是商品供应的组织工作做得不好和经营管理不善，因而发生商品有时积压有

时脱销的现象。

在文化教育、科学研究和保健事业方面。这几年来，这些事业都有相当大的发展。预计到一九五七年，除了个别的以外，高等教育、中等教育、初等教育、科学研究、新闻、出版、广播、文学、艺术、电影、体育和卫生医疗等事业，都有可能超额完成原定的计划。例如，到一九五七年，高等学校在校学生将达到四十七万人左右，超过原定指标约百分之九；中国科学院的研究机构将达到六十八所，比原定指标多十七所。

在农业和手工业的合作化方面。到一九五六年六月底为止，全国已经组织起九十九万二千个农业生产合作社〔84〕，入社农户占全国农户总数的百分之九十一·七，其中加入高级社的占全国农户总数的百分之六十二·六。组织起来的手工业者，约占手工业者总数的百分之九十。我们预计，再经过一年多的工作，即到一九五七年底，在全国范围内，除了个别边疆地区以外，可以基本上实现农业和手工业的合作化。

在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方面。到一九五六年六月底为止，在资本主义工业中，已经有占产值百分之九十九和占职工人数百分之九十八的企业实现了公私合营；在私营商业和饮食业中，转变为公私合营商店、合作商店和合作小组的，已经占总户数的百分之六十八，占从业人员总数的百分之七十四。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和定息〔124〕制度，就为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的国有化准备了条件。

这里，我还要简略地叙述一下人民物质生活改善的状况。

这几年里面，从总的情况看，职工工资的增长速度同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基本上是相适应的。但是有一段时间，工

资的增长速度过分地低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例如，一九五五年比一九五四年，工业部门（不包括私营工业）的劳动生产率，约提高了百分之十，而职工的平均工资只提高了百分之零点六。其他部门也有类似的情况。这个工作中的错误，我们在一九五五年底发现以后，就着手纠正。从一九五六年四月份起，我们在全国范围内实行了工资制度的改革，并且确定一九五六年职工的平均工资比一九五五年提高百分之十三左右。这样，一九五六年职工的平均工资，就比一九五二年提高了百分之三十三点五，超过了五年计划规定的五年内工资增长百分之三十三的指标。而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也将超过原定的计划，例如，在国营工业部门，一九五六年将比一九五二年提高百分之七十四点四，超过五年计划规定的五年内劳动生产率增长百分之六十四的指标。

这几年里面，我们稳定了农民的农业税负担，并且适当地提高了粮食的收购价格，因而使农民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逐步地改善了生活。但是我们也犯过错误，在一九五四年，由于我们没有完全弄清楚全国粮食产量的情况，向农民多购了一些粮食，引起了一部分农民的不满。在一九五五年，我们实行了定产、定购、定销^{〔125〕}的粮食政策，从而安定了农民的情绪和提高了他们的生产积极性。现在预计，五年内农民的全部收入有可能增长百分之三十左右。

由上面列举的情况可以看出，我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是一定能够胜利完成的。只要我们加紧努力，并且今后不发生特大的自然灾害和意外事故，大多数指标都可以超额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执行和它的超额完成，已经

使并且将继续使我国国民经济发生深刻的变化。这主要表现在：工农业的生产水平有很大的提高。预计到一九五七年，工农业总产值（包括现代工业、手工业和农业的产值在内）将比一九五二年增加百分之六十以上。在工农业总产值中，工业总产值（包括手工业的产值在内）的比重将达到百分之五十左右，而在工业总产值中，生产资料工业产值的比重将达到百分之四十以上，这就加强了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领导作用。由于社会主义改造事业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无论在工业、农业、运输业和商业中，社会主义的经济成分都已经处于绝对统治的地位。目前，我国国民经济的各个部门都出现了欣欣向荣的景象，文化教育和科学研究的事业，也正在进入一个繁荣时期，因而也就为人民生活水平的继续提高创造了条件。

应该指出，全国各族人民、各民主党派和一切爱国人士，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的团结一致，对社会主义改造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所表现的积极性和热情，是我们取得上述伟大成就的基础和保证。

还应该指出，在我国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过程中，伟大的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给了我们巨大的援助。在这期间，苏联给予我国以优惠的贷款，帮助我国设计二百零五项工业企业和供应大部分设备，派来了大批的优秀专家，并且给了其他方面的许多技术援助。各人民民主国家在设备、材料和技术力量等方面也给了我们很大的援助。在我国工作的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的专家，对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我们愿意乘这个机会，对于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的这种真诚的兄弟般的援助，表示深切的感谢。

我们在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过程中，取得了不少的经验教训。吸取这些经验和教训，就使我们有可能把社会主义建设的工作做得更好。现在，我只就近年来我们在领导经济工作中所感到的几个比较突出的问题，提出一些意见。

第一，应该根据需求和可能，合理地规定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把计划放在既积极又稳妥可靠的基础上，以保证国民经济比较均衡地发展。由于在编制长期计划的时候，难以完全预计到在执行计划过程中可能发生的各种新的情况和问题，因此，应该把长期计划的指标定得比较可靠，而由年度计划加以调整。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所规定的各项指标，基本上是正确的，过去四个年度计划的安排，大体上也是符合于当时的具体情况的，因而有可能保证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超额完成。但是应该指出，一九五五年和一九五六年的计划，部分地发生了偏低或者偏高的缺点，造成了工作上的一些困难。

我们在制定一九五五年计划的时候，由于前两年农业歉收，把基本建设的规模定得比较小了一些，而且在当年的节约运动中，又不适当地削减了某些非生产性的基本建设的投资。同时，还由于基本建设计划变动的次数多，下达迟，因而计划完成得比较差。结果，不但在财政上出现了过多的结余，并且在重要的建筑材料方面，如钢材、水泥、木材等，也出现了一时的虚假的过剩现象。如果我们能够更早地准备一些预备项目，及时地扩大建设规模，或者有计划地增加某些物资的储备，物资一时积压的问题是可以解决的。可是我们对以后发展的情况估计不足，把一时的物资过剩当作一个比较长期的趋势，因而用出口的办法来解决钢材和水泥一时多余的困难。

显然，这是不恰当的。

当我们制定一九五六年计划的时候，由于上年度农业丰收，社会主义改造又取得了巨大的胜利，因而有必要也有可能把国民经济发展的速度定得比较高些。但是我们没有很好地对于基本建设规模和物资供应能力进行适当的平衡，因而把基本建设的规模定得大了一些。同时，国民经济的某些部门也出现了齐头并进和急于求成的倾向。结果，不但财政上比较紧张，而且引起了钢材、水泥、木材等各种建筑材料严重不足的现象，从而过多地动用了国家的物资储备，并且造成国民经济各方面相当紧张的局面。

经验证明，我们在编制长期计划的时候，应该按照我们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根本要求和国家物力、财力、人力的可能条件，实事求是地规定各项指标，同时，还应该保留一定的后备力量，使计划比较可靠。而在编制年度计划的时候，就应该根据当年和以后年度的可能的发展条件，积极地发挥潜在力量，以保证长期计划的完成和超额完成。经验还证明，我们在编制年度计划的时候，在有利的情况下，必须注意到当前和以后还存在着某些不利的因素，不要急躁冒进；相反地，在不利的情况下，又必须注意到当前和以后还存在着许多有利的因素，不要裹足不前。这就是说，我们应该对客观情况作全面的分析，同时尽可能地把本年度和下年度的主要指标作统一的安排，以便使每个年度都能够互相衔接和比较均衡地向前发展。

第二，应该使重点建设和全面安排相结合，以便国民经济各部门能够按比例地发展。在过去几年里，我们在优先发展

重工业的同时，采取了加速发展农业合作化的方针来促进农业的增产，并且相应地发展了轻工业的生产，这就使国民经济的几个主要部门在发展中避免了互相脱节的危险。

但是我们在处理重点建设和全面安排这个关系的时候，也曾经部分地犯过错误。例如，在一九五三年，有些部门和有些地方，在建设工作中曾经发生过到处铺开、百废俱兴、不顾条件、盲目冒进的偏向，结果，影响到国家的重点建设，并且造成了财政上的困难和人力、物力的浪费。在一九五六年初，当《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105〕公布以后，又一次发生了这样的偏向。有些部门和有些地方，急于求成，企图把在七年或者十二年内才能够做完的事情，在三年、五年甚至一年、二年内做完。这些偏向，都被党中央及时地发现和纠正了。

在这个时期中间，也曾经出现了另一种偏向，就是某些重要工作过分突出，以致同有关方面脱节。例如，在一九五六年初，我们为着加速发展农业，曾经过高地估计了双轮双铧犁和锅驼机的当年需要量，制定了过高的生产计划，虽然这两种产品的计划经过一再修改，压缩产量，但是计划仍然过高，结果不但消耗了过多的钢材，造成一九五六年钢材供应更加紧张的情况，而且使某些机械工厂发生了一时赶工增产、一时闲工减产的现象。又例如，在我们的建设中，某种工业企业由于前进过快，所需要的原材料无法全部供应，因而发生了生产能力不能充分发挥的困难。当然，在我们开始进行工业建设的时期，这种情况是难以完全避免的，但是预料到这样的困难而更加妥善地进行安排，也并不是不可能的。

这几年来，我们在建设事业中，对中央和地方的关系、近海地区和内地的关系，也作了大体适当的安排，但是我们在这方面还是有缺点的。有一段时间，我们重视了中央建设事业的发展，而对地方建设事业的发展注意得不够；我们重视了内地建设事业的发展，而对近海地区建设事业的发展注意得不够。今后，我们应该经常地注意调整上述的关系，避免发生片面性。

以上说明，我们强调重点建设，并不是说可以孤立地发展重点，而不要全面安排；我们要求全面安排，也不是说可以齐头并进，而不要保证重点建设。我们在制定计划和安排工作的时候，必须把重点和全面很好地结合起来。

第三，应该增加后备力量，健全物资储备制度。在国民经济的发展中，不平衡的现象是经常会出现的，这就必须保持必要的物资、财政、矿产资源、生产能力等的后备力量，特别要增加国家的物资储备，以保证国民经济的均衡发展和年度计划的顺利执行，并且应付可能遇到的意外的困难。今后若干年内，我国农业生产受自然灾害的影响还会是很大的，为了应付歉收，就必须有粮食和主要经济作物的储备；为了满足我国建设和生产的规模日益扩大的需要，就必须有器材和原料的储备。此外，我们计划工作还缺乏经验，计划常常有不全和不准的缺点，即使计划当时订得比较准确，也可能由于难以预料的因素又产生新的不平衡。例如，一九五六年由于采用新技术，提高了平炉和高炉的利用效率，矿石和焦炭便供应不足。为了消除或者减少在执行计划中可能发生的各种不平衡现象，也必须保留必要的后备力量。

这几年来，国家储备的物资虽然还不很多，可是对于保证生产和基本建设的需要曾经起了一定的作用，对于一九五六年的物资供应的紧张状况也曾经起了一定的缓和作用。但是应该指出，我们过去对于物资储备的重要性还认识不够。正象我们在前面说过的那样，当一九五五年某些物资略有多余的时候，就不适当地出口了一部分；到了一九五六年，由于基本建设规模的扩大，又感到这些物资的严重不足。

必须认识，象我们这样一个经济落后人口众多的国家，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各种物资的缺乏是经常的现象，而物资的多余是暂时的现象。这就需要我们更加注意增加后备力量，建立物资储备制度，由国家储备必要的物资，特别是比较缺乏的重要物资。同时，各个国营企业也应该有适当的储备。当然，不论是国家的或者是国营企业的物资储备，都应该加强计划性，规定合理的定额，逐步增加，不能要求一下子增加很多，以免妨碍当前的生产和建设。并且，我们也要反对把由于盲目生产所造成的产品积压，当做国家的物资储备，因为这种做法，必然会造成国家资金的积压和浪费，也是对生产和建设不利的。

第四，应该正确地处理经济和财政的关系。多年来的经验是：我们的财政收入必须建立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我们的财政支出也必须首先保证经济的发展。因此，应该首先考虑经济、特别是工农业生产的发展计划，然后根据它来制定财政计划，用财政计划保证经济计划的圆满执行。不根据经济发展的情况开辟财政来源，把财政收入计算得过少，或者单从节约财政开支着想，保留过多的后备力量，都将限制经济建设的

充分发展，这是不对的。

我们在制定财政收入计划的时候，必须考虑到经济发展的可能性，考虑到积累和消费之间正确的比例关系，避免把收入定得过分紧张。在制定财政支出计划的时候，除了必须根据保证重点建设和国民经济按比例发展的要求、进行正确的分配以外，还必须考虑到建设规模和物资供应之间的平衡，考虑到意外的需要而留出一定数量的预备费，避免把支出定得过分紧张。如果只顾建设的要求，不顾财政的可能，不顾设备、器材和技术力量是否能够供应，而提出过高过大的拨款和投资的计划，显然也是不对的。

同志们常常喜欢争论应该不应该有“财政框框”的问题。我们的意见是，不考虑经济发展的需要，主观地定出一个“财政框框”来限制经济的发展，这当然是错误的，应该反对这样的“财政框框”。但是，如果财政计划符合于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体现着积累和消费之间的正确关系，重点建设和全面安排之间的正确关系，那末这样的财政计划，无疑地应该严格执行，决不能够当作“财政框框”盲目反对。

在这里还要指出，我们在工作中所发生的一些缺点和错误，有许多是同领导上的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分不开的。有些领导同志高高在上，不接近群众，不了解实际情况，主观地处理问题和布置工作，因而所作的决定就很难正确，甚至发生错误。而上级的官僚主义，又助长了下级的命令主义。

现在国务院各部门机构大，层次多，因而公文多，电报多，表格多，弄得下级机关疲于奔命。而有的部门的领导同志，甚至还不知道自己的部门发了些什么指示，作了些什么规定。

这样的官僚主义的现象，必须迅速加以纠正。

在我们政府的工作中，虽然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但是决不容许我们有丝毫的骄傲自满。应该看到，我国的国民经济正在迅速发展，情况的变化很快也很多，随时随地都有新的问题出现，许多问题又是错综复杂地联系着。因此，我们就必须经常地接近群众，深入实际，加强调查研究工作，掌握情况的变化，对有利的条件和不利条件进行具体的分析，对顺利的方面和困难的方面都要有足够的估计，以便及时地做出决定，调节国民经济各部门和各方面的活动，避免发生互相脱节或者互相冲突的现象。在我们这样一个地区广阔、情况复杂并且经济上正在剧烈变革的国家里，任何疏忽大意，都可能发生重大的错误，造成重大的损失。因此，克服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对我们有着特殊重要的意义。

二

党中央委员会认为，编制我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应该以第一个五年计划可能达到的成就作为出发点，联系到大约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期末我国要完成过渡时期的总任务这个基本要求，实事求是地估计到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国内外的各种条件，进行全面的规划。这样，才有可能使计划既积极而又稳妥可靠。

党中央委员会提出，我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基本任务应该是：（1）继续进行以重工业为中心的工业建设，推进国民经济的技术改造，建立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

巩固基础；（2）继续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巩固和扩大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3）在发展基本建设和继续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础上，进一步地发展工业、农业和手工业的生产，相应地发展运输业和商业；（4）努力培养建设人才，加强科学研究工作，以适应社会主义经济文化发展的需要；（5）在工业农业生产发展的基础上，增强国防力量，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水平。

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主要要求，就是要在大约三个五年计划时期内，基本上建成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这样的工业体系，能够生产各种主要的机器设备和原材料，基本上满足我国扩大再生产和国民经济技术改造的需要。同时，它也能够生产各种消费品，适当地满足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需要。

有人问：既然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各国的经济日益发展，并且在社会主义各国之间出现了经济和技术的广泛合作的可能性，我国是否还有必要建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呢？我们认为，我国目前的情况虽然同苏联建国初期在经济上处于孤立无援的情况有很大的不同，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的存在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极有利的条件，但是象我们这样一个人口众多、资源较富、需要很大的国家，仍然有必要建立自己的完整的工业体系。这是因为，从国内的要求来说，我们必须迅速改变国民经济长期的落后状态；从国际的要求来说，我国建立起强大的工业，可以促进社会主义各国经济的共同高涨，并且可以增强保卫世界和平的力量。因此，那种以为不必建立我国自己的完整的工业体系而专门靠国际援助的依

赖思想，是错误的。

另一种关起门来建设的想法也是错误的。不用说，我国要建立起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在长时期内还需要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的援助，同时也需要同其他国家发展和扩大经济、技术、文化的交流。而且即使我们在将来建成了社会主义工业国之后，也不可能设想，我们就可以关起门来万事不求人了。事实表明，不仅社会主义各国之间的经济和技术的协作范围将不断地扩大，而且由于各国人民争取和平、民主、民族独立的力量日益强大，国际局势日益趋于和缓，我国同世界各国在经济上、技术上、文化上的联系，必然会一天比一天发展。因此，在建设社会主义事业中的孤立思想，也是错误的。

为了建立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巩固基础，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必须继续扩大冶金工业的建设，大力推进机器制造工业的建设，加强电力工业、煤炭工业和建筑材料工业的建设，积极进行工业中的落后部门——石油工业、化学工业和无线电工业的建设。同时，还必须推进国民经济的技术改造，首先是进行工业的技术改造，以提高我国工业的技术水平。

经验证明，以重工业为中心的工业建设，是不能够也不应该孤立地进行的，它必须有各个方面的配合，特别是农业的配合。农业是工业发展以至整个国民经济发展必不可少的条件。延缓农业的发展，不仅直接地影响轻工业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而且也将极大地影响重工业以至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影响工农联盟的巩固。因此，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我们应该继续努力发展农业，求得农业和工业的发展互相配合。为了使国民经济的各个部门和各个方面按比例地互相协

调地发展，我们又应该妥善地安排重工业和轻工业之间的关系，工农业生产和运输、商品流转之间的关系，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之间的关系，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之间的关系；同时，还应该进一步地安排中央和地方之间的关系，近海地区和内地之间的关系，各个民族之间的关系，以便把一切积极的因素和有用的力量都组织到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中来。

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我国的基本建设和工农业生产将有可能继续保持比较快的发展速度。党中央委员会认为，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在财政收入增加的基础上，国家的基本建设投资在全部财政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将由第一个五年的百分之三十五左右增加到百分之四十左右，因而第二个五年的基本建设投资额，就将比第一个五年增长一倍左右。在工农业生产方面，初步计算，一九六二年比一九五七年，工业总产值将增长一倍左右，其中，生产资料 and 消费资料的产值都会有很大的增长，但是生产资料产值增长的速度将会更快一些；农业总产值将增长百分之三十五左右。到一九六二年，我国工农业总产值将比第一个五年计划规定的一九五七年的数字增长百分之七十五左右。

这里应该加以说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中所列举的增长百分数，都是以第一个五年的计划数字作为基数进行比较的，并没有把可能超额完成的因素计算进去，因而增长的百分数就显得高些；等到第一个五年计划结束以后，如果以一九五七年实际达到的数字作为基数，那末现在建议中的增长百分数将有可能相对地下降一些。例如：在建议中提出的我国的钢产量，一九六二年计划达到一千零五十万吨到一千二百

万吨，这个数字同第一个五年计划规定的一九五七年的产量四百一十二万吨作比较，将增长一点五倍到一点九倍，但是，如果同现在预计的一九五七年产量五百五十万吨作比较，那么就增长将近一倍到一点二倍。

上述关于基本建设的规模和工农业生产的发展速度，我们认为是适当的，是积极而又稳妥可靠的。应该相信，只要我们善于依靠群众，发挥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我们就能够取得伟大的力量，克服在前进道路上的一切困难，象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那样，胜利地完成第二个五年计划的任务。

经济建设的几个方针性问题^{*}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日）

八大〔126〕以后，对明年的计划数字已经修改多次。明年是很难安排的一年。必须早一点把明年计划的方针定下来，取得全会同意。今天，我想讲一讲几个方针性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根据刚才少奇同志的政治报告，我们从国际事件中所取得的教训，联系到我们的建设，有两点值得注意。

第一点，就是社会主义国家也可能犯而且有的已经犯了沙文主义〔67〕的错误。按照毛泽东同志的分析，这种错误，就是对外的**大国主义，对内的大民族主义，对人民的专制主义。这样的错误在有的社会主义国家已经产生，那么，在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国家是不是也可能产生呢？当然可能避免，而且应该尽力避免，但是也有可能产生，并且有些萌芽在过去的工作中已经发现。例如，对周围兄弟国家的大国主义的个别事件，对兄弟民族还有大汉族主义倾向，也产生过领导脱离群众不关心群众利益的事情，我们领导者的生活和工作制度有些特殊化官僚化。这就不能不使我们在建设中时常注意这些问题。

^{*} 这是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做的关于一九五七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节录。

第二点，也就是刚才少奇同志说的，苏联和其他一些社会主义国家都是优先发展重工业，这个原则是对的，但是在发展中忽视了人民的当前利益。直接与人民利益关系最大的是轻工业、农业，轻视这两者就会带来不好的后果，就会发生经济发展上的严重不平衡。毛泽东同志在这几个月常说，我们又要重工业，又要人民。这样结合起来，优先发展重工业才有基础。发展重工业，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是为人民谋长远利益。为了保卫人民的福利和社会主义成果，必须依靠人民。如果不关心人民的当前利益，要求人民过分地束紧裤带，他们的生活不能改善甚至还要降低水平，他们要购买的物品不能供应，那么，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就不能很好地发挥，资金也不能积累，即使重工业发展起来也还得停下来。所以，这一条经验也值得我们在建设中经常想到。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发生的事件值得我们引为教训。

此外，在中国还有中国的特点，那就是封建性很大。我们尽管打倒了封建主义，但封建官僚的习俗在社会上还存在着。脱离群众，高高在上，生活特殊，讲究排场，中国的统治阶级过去是这样的，我们也很容易这样做。从上到下，凡叫“长”的，就容易被人家看得特殊一点。所以，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土壤上实现以后，如果不有意识地经常地排除某些旧的社会习俗，它就会经常来侵蚀我们。

要重工业，又要人民。人民的问题对我们来说是人口众多，这有它的好处；但是人口众多也有一个困难，人多消费需要的量就大。衣食住行，首先是食。我国人口现在平均每年增长百分之二左右，每年增加一千多万人，这是一个可观的数

目，而我们的粮食平均每年增长百分之三左右，增长量并不大。农业合作化可以使我们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增加复种面积。今年这么大的灾荒，我们的收成还是比去年增加了，这就是合作化的优越性，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可是我们也要看到，耕地面积、粮食产量总是增加得慢。不能把这方面的工作看得那么容易。昨天我在政治局会议上说了，要提倡节育。这个问题的发明权本来是邓小平同志的，后来邵力子〔127〕先生在人民代表大会上讲了。我们的党和青年团要用一定的力量宣传这个问题。这实际上是广大人民所需要的，首先是城市人民所需要的。现在看得很清楚，我们在短时期内还不可能使大家都就业，工资的增长也不可能使职工养活很多的家庭人口。我觉得甚至提倡晚婚也是有好处的。

第二个问题，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十大关系〔128〕是党的八大的指导方针。在三大改造〔129〕高潮出现以后，全国人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空前高涨，各部门、各省市向中央提出了各种报告和要求。毛泽东同志到各地同各省市的同志接触，少奇同志在北京跟各部的同志接触，以后毛泽东同志又跟各部的同志谈话，觉得需要正确地解决这十大关系问题，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才能够安排得更恰当。这些关系的许多方面在八大报告中都提到了。但是我们要认识，这十大关系问题并不是一提出来就能解决得了的，具体的解决还需要今后在实践中、在采取具体措施中、在反对错误的倾向中不断努力。前五种关系直接联系到建设。比如农、轻、重的比例究竟如何才恰当？现在还不可能回答得很完满，必须经过多次反复摸索，才能使这三者的比例安排得比较恰当。一个时候恰当了，过一

个时候还要修改。

第三个问题，八大规定的建设方针是，“为了把我国由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社会主义工业国，我们必须在三个五年计划或者再多一点的时间内，建成一个基本上完整的工业体系”。这个方针，把过去的为社会主义工业化而奋斗的提法具体化了，提出了建设一个基本上完整的工业体系的要求。我们的工业化，就是要使自己有一个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任何一个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总要有一点独立的能力，更不用说象我们这样一个大国。太小的国家，原料很缺，不可能不靠旁的国家。而我们这样的大国，就必须建立自己的完整的工业体系，不然一旦风吹草动，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支援我们完全解决问题。我们所说的在我国建立一个基本上完整的工业体系，主要是说：自己能够生产足够的主要的原材料；能够独立地制造机器，不仅能够制造一般的机器，还要能够制造重型机器和精密机器，能够制造新式的保卫自己的武器，象国防方面的原子弹、导弹、远程飞机；还要有相应的化学工业、动力工业、运输业、轻工业、农业等等。但是，应该指出，基本上完整并不是说一切都完全自足。就是大国也不可能什么都有。美国算是一个有完整工业体系的大国吧，但是有的东西它也没有，橡胶就没有。苏联也有它没有的东西。另外，所谓完整的工业体系，是不是一定要有很高的产量呢？当然，产量是要高一点，但是不一定很高，这个任务的实现是决定于东西的有无，不决定于是否有很高的产量。从这样的要求来看，我们觉得八大的决议上写三个五年计划或者再多一点的时间是恰当的。现在看，时间可能要长一点。

过去设想的远景规划，发展速度是不是可以放慢一点？经过八大前后的研究，我们觉得可以放慢一点。比如，原来设想钢产量在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最后一年要达到年产三千万吨，肯定地说，照现在这个速度是不可能实现的。八大的建议已经把这个要求改变了。我们设想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指标定在二千万到二千五百万吨上，将来如果执行得好，有可能超过，但是现在不能定到三千万吨。因为定到三千万吨，其他就都要跟上去。那就会象我们常说的，把两脚悬空了，底下都乱了，不好布局，农业、轻工业也会受影响，结果还得退下来。要达到原来远景规划设想的生产指标，肯定时间要更长一些，有可能要四个五年计划，或者在第四个五年计划期间。陈云〔78〕同志曾经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既然达不到，就应该允许在三个五年计划以外再加两年。我说，甚至可以设想加两年不够再增加一两年。这样一个大国，数量上的增长稍微慢一点，并不妨碍我们实现工业化和建立基本上完整的工业体系。这样，我们的计划就好安排了。不然，讨论起来，远景规划的几个数字就把自己框住了。

此外，还有两点也想提出来请大家考虑：

第一是关于八大建议的数字。这只是个建议，有某些达不到的指标是不是可以修改？我觉得是可以的。过去说计划就是法律，这实际上行不通。当然，计划成为废纸也不对。计划不合实际就得修改，实际超过了计划也得承认，计划不能一成不变。建议中有些数字当时觉得是恰当的，现在发现还有矛盾需要解决，那就应该解决，我想这是许可的。

第二是关于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这也是一个建议，是

一个草案。在草案提出的时候毛泽东同志说，有些东西在实际执行中还要修改。实际上，某些数字已经勾掉了。草案现在执行快一年了，事实证明有些是需要重新研究的，这些并不是不可以修改的。比如扩大耕地面积，要求十二年内开垦一亿四千万亩显然是有困难的。如果每年开垦一千万亩，就要投资五亿元。这五亿元的投资，明年度无论如何也挤不出来，今后也不是每年都可以挤出来的。至于其他的组织工作、动员工作、各种条件的配合，还不去说它。

八大的建议和农业四十条，是规定了每年进度指标的。这两个文件经过我们研究以后觉得可以修改。上不去，就不能勉强，否则把别的都破坏了，钱也浪费了，最后还得退下来。凡是不合实际的都可以修改，这样就把我们的思想解脱了，不然自己圈住了自己。

第四个问题，对第一个五年计划的估计。八大已经作了简单的估计，在制定明年计划的时候，大家又很容易联想到究竟应该怎样估计第一个五年计划。经过国务院常务会议多次讨论，大家认为，第一个五年计划基本上是正确的，成绩很大，但是错误不少。这好象也是老套子了，但从实际中摸索到最后，觉得还是这样说好。

第一，从生产指标方面看，今年的多数指标都接近了五年计划的指标。到明年，四十六种工业指标中有三十九种一定会超额完成预定的计划，估计只有七种完不成，实际上，真正完不成的就是石油。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生产指标，这不就是一个成绩吗？当然，农业比工业差一点，值得我们重视。但是，尽管有两年特大的灾害，粮食和棉花还是可以完成

计划的。八种农产品中主要是麻、大豆、油料作物不能完成，这是我们没有安排好。同工业相比，我们对农业的重视和安排不够，农业量大面广，有时也不容易考虑得很恰当。

第二，从基本建设方面看，投资超过了计划数字。设计项目中，苏联设计的主要项目多数是完成了，我们自己设计的主要项目多数也都完成了。苏联设计的有一部分没有完成，主要是国防工业，我们推迟了，当然也有其他的项目。至于自己设计的项目，有些是不应该设计那么多的，这是我们工作上有错误。但总起来说，在这方面基本上也是有成绩的。

第三，从预算上看，我们打得比较更稳当一点。财政支出超过得不多。

所以，整个看起来，第一个五年计划大体上是正确的，成绩很大，这方面不多说了。

另一方面应该承认，错误也不少。这一点，我想多说几句。第一次制定五年计划，不可能一下子制定得很恰当。一九五二年提出的五年计划是粗线条的，然后一九五三年、一九五四年、一九五五年不断地修改，而且每年的年度计划还要修改。计划不那么准确是很自然的，因为我们缺乏经验和知识，是在不断地发现错误、修正错误的过程中前进的。一九五三年小冒了一下，今年就大冒了一下。去年的基本建设搞得少了一点，还有一点余力，结果是多余的器材减价出卖，钢材出口，水泥减产，木料也减价出卖了。这当然是不恰当的，是比较大的错误。至于小错误，各个部门都会有的。计划问题是值得我们研究的，就是到现在提出明年年度计划的时候，也不能说我们的缺点就都发现了。希望在全会分组讨论的时候，大家能

揭发出更多的错误缺点，这对明年度的计划和今后的建设工作有好处。明年的计划到执行的时候，还会发现有些订得不恰当，还要在摸索中不断地改正。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以后做全面总结的时候，就可以得出更多的经验教训，就会比八大时的认识更完全更深入。

现在看来，第一个五年计划中的一些变化，有的是由于形势的变化而需要修改，有的是由于经验和知识不足而犯了错误。我觉得这两点值得谈一谈。

首先是形势的变化。当我们开始订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时候，朝鲜战争〔26〕还在进行，那时候设想，应该加紧发展的不仅是重工业，国防工业也要平行发展。一九五三年停战以后，一九五四年、一九五五年又出现台湾海峡局势的紧张，整个世界局势怎样还要看一看。直到日内瓦会议〔97〕、万隆会议〔96〕以后，到去年年终和今年年初，才慢慢感到国际局势是缓和下来了。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才设想今年、明年把国防工业步子放慢，有些生产规模可以缩小。这也是很自然的。毛泽东同志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现在把国防工业步子放慢，重点加强冶金工业、机械工业和化学工业，把底子打好；另一方面，把原子弹、导弹、遥控装置、远程飞机搞起来，其他的可以少搞，比如炮，有一个厂也行，现在先打底子，将来再发展数量。设想可能有一个和平时期，容许我们把完整的工业体系建设起来，这是最好的，我们把方针摆在这上面。但是我们还要准备另外一种可能，即发生战争，这决定于敌人是否要冒险。如果今后十二年内发生了战争，那怎么样呢？那不是我们犯了错误吗？到时候打起来军火少了，后备力量动员起来又没有军火，

大家就哇哇叫了。可以设想一下，战争就是来了，敌人也不能马上解决问题。敌人打来了我们会先受一点损失，但他们爬上大陆以后，还是要打长期战争的。我们顶多犯那样的错误。毛泽东同志把这个问题提到政治局，我根据毛泽东同志的说法，把它提到中央全会，大家也想一想这个问题。如果算错误，我们大家一道犯，到那时候将功折罪，戴罪图功。只有这个办法，不然就徘徊歧路，东边走几步又回到西边走。把器材、资金统统集中搞国防工业，别的生产少了，人民的生活也不能改善，各方面紧张，而武器制造出来，仗又不打，炮不能吃，枪也不能吃，子弹生产多了还不利。所以非下决心不可。中央政治局谈到明年计划和第二个五年计划时就下了这个决心。这是由于形势的变化，我们有的步子加快了，有的步子放慢了。

第二是由于我们的经验和知识不够，在有些项目上犯了错误。现在看起来有些错误犯得有点可笑，但是当时的确没有弄清楚。比如说，请苏联设计的项目，以为能够提早给我们设备、提早一两年完成总是好的，而没有分清哪几种快对我们有好处，哪几种快会给我们背上包袱，凡是各部提出要加快的，报到国务院，报到中央，总觉得应该批准。象汽车厂就加快了，明年度可以生产一万八千辆到两万辆，可是这就要有很多的器材进口，同时要供应很多的汽油，这就要花外汇。现在汽油没有那么多，就得减少汽车产量。减少生产，劳动力就要闲置。外国朋友参观长春汽车厂时说，你们生产能力多了，一定要闲置。内行人一看就懂。原来还打算建设第二个汽车厂，现在要推迟了。再比如铝加工厂和机械厂，军工部门有

的，民用工业部门可以不搞，可以结合起来共用，现在和平时期可以用作普通的民用的机械生产。过去没有很好地考虑，这样就闲置了一些资金。

因此，第一个五年计划尽管成绩很大，可是应该承认，缺点错误也不少。缺点错误已经知道的固然不少，但可能还有我们不知道或者没有揭露出来的，希望参加这次会议的同志在这方面多提一些意见。

关于中缅边界问题的报告^{*}

（一九五七年七月九日）

各位代表：

中缅边界问题是我国在国际关系方面的一个重要问题，同时也是我国人民很关心的一个问题。因此，政府认为有必要就这个问题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作专门报告。

在我国和许多邻国之间，都存在着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未定界问题，而中缅两国之间的未定界问题特别引起人们的注意。这是由于英国在过去统治缅甸的时期在中缅边界问题上制造了长期的纠纷，而近几年来，帝国主义势力又经常利用中缅边界问题，挑拨中缅关系，企图造成紧张局势。

我国政府一贯主张，我国和其他国家之间所有悬而未决的问题，都应该通过和平协商的途径，求得公平合理的解决。中缅边界问题由来已久，问题本身也很复杂，因此，政府从着手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起，就采取了审慎从事的态度，有准

^{*} 这是在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的报告，刊载于一九五七年七月十日《人民日报》。根据这个报告中所提出的建议，经过我国政府和缅甸政府的不懈努力，双方在一九六〇年奈温总理访华时于一月二十八日签订了《关于两国边界问题的协定》，并在同年吴努总理和奈温总参谋长访华时，于十月一日签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缅甸联邦边界条约》。

备、有步骤地寻求这个问题的解决。

在我们国家成立的最初几年，政府需要把全部力量用来处理国内国外一系列重大而迫切的事务，因此不可能同时为中缅边界问题的解决进行全面的和有系统的准备工作。但是，自从中缅两国总理在一九五四年十二月十二日的会谈公报中提出“在适当时机内，通过正常的外交途径”解决中缅未定界问题以后，我国政府就为解决这个问题进行必要的准备。政府的各有关部门会同云南省当局，对有关的历史文献和实际情况进行了系统的和详细的调查研究。

在一九五五年十一月，当中缅双方为边界问题的解决分别地积极进行准备的时候，在两国的边境上，双方的前哨部队由于误会曾经发生过一次不幸的武装冲突事件。这次事件，经过中缅双方的努力，得到了适当的处理，同时也使中缅两国政府体会到及早解决中缅边界问题的必要。

从一九五六年年初起，中缅两国政府就中缅边界问题开始了频繁的接触。同年十一月，缅甸反法西斯人民自由同盟吴努主席应邀来北京同我国政府商谈。我国政府根据我国的和平外交政策和对中缅边界问题调查研究的结果，通过吴努主席向缅甸政府提出了解决中缅边界问题的原则性建议。一九五六年十一月五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第五十次会议同意了这项建议。

中缅两国的边界大部分已经划定，但是有三段还存在着未决问题。我国政府针对这三段边界提出了原则性的建议，并且认为建议中的各点应该作为一个整体联系起来加以考虑。现在，我说明一下政府提出的这项建议的内容。

第一是关于在阿佤山区的一段。中英两国在一八九四年和一八九七年签订的两个关于中缅边界的条约中，对于这一段边界都曾经有明文规定。但是，由于有关的条文自相矛盾，这一段边界长期没有划定。为了造成既成事实，英国在一九三四年初派遣军队进攻班洪部落和班老部落所管辖的地区，遭到了当地佤族人民的英勇抵抗，这就是有名的“班洪事件”。一九四一年，英国乘当时中国在抗日战争中所面临的危急情况，以封闭滇缅公路作为压力，同国民党政府于六月十八日用换文的方式在阿佤山区划定了一条对它片面有利的边界。这就是所谓“一九四一年线”。由于不久就发生了太平洋战争〔130〕，在这条线上并没有树立界桩。一九五六年，在中缅两国政府就中缅边界问题进行商谈的过程中，缅甸的领导人员曾经表示能够理解中国人民对于一九四一年线的不满情绪，但是鉴于这段边界已经通过当时负责的中英政府以换文划定，因此要求我国政府予以承认，并且要求我国政府把在一九五二年由于追剿国民党残余部队而进入一九四一年线以西地区的中国军队撤回。我国政府认为，在边界问题上，根据正式条约而提出来的要求，应该按照一般国际惯例予以尊重，但是这并不排除两个友好国家的政府通过和平商谈求得对双方都是公平合理的解决。为了促进这种公平合理的解决，为了替这种解决创造良好的气氛，我国政府在向缅甸政府提出的原则性建议中表示准备把中国军队撤出一九四一年线以西的地区。同时，我国政府要求，在中缅两国政府没有对一九四一年线问题取得最后协议并且树立界桩以前，缅甸军队不进驻中国军队自一九四一年线以西所撤出的地区，但是缅甸政府

的工作人员可以进入这一地区。

第二是关于在南畹河和瑞丽江汇合处的勐卯三角地区，又名南畹三角地区，面积约二百五十平方公里。这个地区是中国的领土，过去英国在条约中也明文承认了这一点。但是，在一八九四年中英两国签订有关中缅边界的条约以前，英国就不经中国的同意，强行通过这个地区兴修由八莫到南坎的公路。到一八九七年，中英两国再一次签订有关中缅边界条约的时候，英国又以“永租”的名义取得了对中国的这块领土的管辖权。缅甸独立以后承继了对这个地区的“永租”关系。我国政府在向缅甸政府提出的原则性建议中指出，由缅甸继续对中国的一块领土保持“永租”的关系，是同中缅两国目前的平等友好关系不相称的。我国政府表示愿意同缅甸政府商定如何废除对勐卯三角地“永租”关系的具体步骤。

第三是关于尖高山以北的一段。这一段边界过去始终没有划定。英国曾经在这个地区不断地制造纠纷，借机扩大它的殖民领域。最严重的就是一九一一年初英国对片马地区的武装侵占。“片马事件”激起了全中国人民的义愤，全国各地都掀起了风起云涌的抗议运动。在这种情况下，英国政府也不得不在一九一一年四月十日给当时中国政府的照会中正式承认，片马、岗房、古浪三处各寨是属于中国的，但是却毫无道理地继续侵占这个地区。根据对历史事实和实际情况进行调查研究的結果，我国政府对于这一段边界的划定，向缅甸政府提出以下的建议：从伊索拉希山口以北到底富山口的部分，可以按照习惯边界线划界；从伊索拉希山口到尖高山的一段，除片马、岗房、古浪地区应该归还中国以外，原则上可以按怒江、

瑞丽江（又名龙川江）、太平江为一方和恩梅开江为另一方的分水岭划定边界。我国政府同时要求，在中国军队撤出一九四一年线以西地区的同一时期内，缅甸政府也把军队从片马、岗房、古浪撤出。在这一段最后划界以前，缅甸政府可以保留在片马、岗房、古浪地区的行政管理，而中国政府保证，在这一段边界最后划定以前，中国军队将不进驻这个地区。

在我国政府提出了以上的建议以后，吴努主席表示这是照顾双方利益的公平合理的建议。在吴努主席同我国政府领导人员会谈后发表的联合新闻公报中又宣布，中缅两国政府取得谅解，从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底到一九五六年年底，中国军队撤出一九四一年线以西地区，缅甸军队撤出片马、岗房、古浪。在一九五六年年底以前，中缅两国政府分别完成了撤军的工作。这就为中缅边界问题的解决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开端。去年十二月在仰光和今年三月在昆明，中缅两国政府的领导人员又有机会对两国边界问题继续进行友好的商谈，进一步澄清了彼此的观点，在总的方面取得了一致的意见。

全国各界人士都很关心中缅边界问题的解决。为了广泛地征求国内各方面的意见，我曾经代表政府在今年三月中旬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作了关于中缅边界问题的报告。在北京的人大代表、政府成员和特邀的专家也出席了那次会议。今年三月底，我又在昆明向政治协商会议云南省委员会召集的由云南省各界和各兄弟民族代表参加的会议作了关于中缅边界问题的报告。在这两次具有广泛代表性的会议上，都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使政府有机会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并且对有关问题作了解答，这就进

一步统一了全国各方面在中缅边界问题上的看法。

以上是我国政府到目前为止处理中缅边界问题的大致经过。现在，我要说明一下政府在处理中缅边界问题中所遵循的基本政策。

我们的国家自从开国以来在国际事务中一贯奉行的政策，就是争取世界局势的和缓，争取同世界各国，特别是同我们的邻国和平共处。这个政策有利于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也符合于世界各国人民的利益。我国政府在处理中缅边界问题时所根据的，也正是这个基本的和平外交政策。

中缅两国之间的边界问题，正象其他亚非国家之间的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一样，都是帝国主义长期侵略政策所造成的。现在，中缅两国都已经取得独立，都在努力为本国的和平建设争取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中缅两国又是同印度一起首先倡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104〕}的国家，我们都珍视自己的民族独立和民族利益，我们都深刻地认识到，只有通过和平共处和友好合作，才能更好地维护我们各自的民族独立和民族利益。但是，帝国主义者却从来没有停止利用亚非国家的分歧在这些国家之间制造紧张和不和，竭力企图重新对这些国家实行“分而治之”的侵略政策。针对这样的情况，我国政府在同缅甸政府商谈中缅边界问题的过程中，一向强调双方相见以诚，按照五项原则友好协商，求得一个公平合理的解决。这样，中缅边界问题的解决，不仅会使中缅两国的友好关系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而且还将有利于亚非国家的团结。我国政府在解决中缅边界问题上所采取的立场，是从维护我国的民族利益出发的，同时也是从促进中缅友谊和亚非各国团

结的利益出发的。

中缅边界问题有复杂的历史背景。因此，在处理中缅边界问题的时候如何对待历史资料，就成为一个重要的问题。中国在封建王朝统治时期，正象封建时代的许多国家一样，四至疆界是不十分明确的。中国历代的封建王朝同边沿地区各个民族的关系也有各种性质和程度的不同。因此，要确定中国封建帝国的疆界线，几乎是不可能的。另一方面，近六十多年来，国内和国外出版的地图中，先后出现了对中缅未定界的许多很不同的画法。这些情况不能不在广大的范围内引起了对中缅未定界的混乱看法。政府认为，在处理中缅边界问题的时候，必须认真地对待历史资料，必须以正确的立场和观点对历史资料进行科学的分析和判断，把可以作为法理依据的历史资料同由于情况变化只有参考价值的历史资料加以区别。同时，更要注意到中缅两国已经发生的具有历史意义的根本变化，那就是，中国和缅甸已经分别摆脱了原来的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地位，成为独立的和互相友好的国家。缅甸政府继承了原来受英国统治的地区，不同民族的自治邦同缅甸本部组成了缅甸联邦。我国政府接管了国民党政府所管辖的地区。在处理中缅边界问题的时候，必须注意到这些历史变化，同时也要按照一般国际惯例来对待过去签订的有关中缅边界的条约。只有把以上各点结合起来考虑，才能够正确地运用历史资料，求得中缅边界问题的公平合理的解决。

中缅边界问题直接地关系到聚居在中缅边境的各民族的利益。因此，在解决中缅边界问题的时候，就特别需要照顾这些民族的利益。我们知道，两国之间的边界把聚居在边境的

同一民族划分为二，是常见的事。这是历史发展的结果。在中缅已定界的各段，在我国和许多其他邻国的边界上，我们都可以看到同一个民族分居边界两旁的情况。我们在解决中缅未定界问题的时候必须事先估计到，有关民族被边界线分隔是难以避免的。鉴于这种情况，我们就更加需要同缅甸政府协商采取措施，使将来划定的边界成为和平友好的边界，进一步发展两国边民之间的亲密联系。

各位代表，中缅两国政府根据友好的精神和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对中缅边界问题进行了多次的接触和商谈以后，已经在总的方面取得一致意见。我们相信，通过继续的协商，把双方在具体问题上的意见加以协调以后，中缅边界问题就将得到全面的和公平合理的解决。

关于我国民族政策的几个问题^{*}

（一九五七年八月四日）

各位同志：

听说民族工作座谈会开得很好，大家交换了许多意见，也提出了许多问题，有些问题已得到了解决。我想讲一讲我国民族政策的几个原则性的问题，和大家交换意见。一、关于反对两种民族主义的问题，就是反对大民族主义主要是大汉族主义和反对地方民族主义的问题；二、关于民族区域自治的问题；三、关于民族繁荣和社会改革的问题；四、关于民族自治权利和民族化的问题。

一 关于反对两种民族主义的问题

我们反对两种民族主义，就是既反对大民族主义（在中国主要是反对大汉族主义），也反对地方民族主义，特别要注意反对大汉族主义。这两种民族主义都是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表现。一方面，如果在汉族中还有大汉族主义的错误态度的话，发展下去就会产生民族歧视的错误；另一方面，如果在兄

^{*} 这是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委员会召开的民族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弟民族中存在地方民族主义的错误态度的话，发展下去就会产生民族分裂的倾向。总之，这两种错误态度、两种倾向，如果任其发展下去，不仅不利于我们民族间的团结，而且会造成我们各民族间的对立，甚至于分裂。这个问题怎样解决呢？我们认为，除了极少数人的问题以外，在民族问题上的这两种错误态度、两种倾向问题，是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应当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原则来解决，就是运用毛主席提出的公式，从民族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斗争，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我们各民族间进一步的团结。

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从民族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斗争，要在一个什么新的基础上，达到我们各民族间进一步的团结呢？我想对这个问题多讲一讲。

这个新的基础，就是我们各民族要建设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国家。建设这样的祖国，就是我们各族人民团结的共同基础。我们反对两种民族主义——大汉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的共同目的，就是建设社会主义的祖国大家庭，建设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个社会主义国家，不是哪一个民族所专有，而是我们五十多个民族所共有，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全体人民所共有。

全国解放后，经过八年来的努力，我们把全国各民族都团结在一起。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了各民族所共同遵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宪法规定我们要把独立了的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国家，就是要把我们拥有五十多个民族、六亿人口的大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强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是代表六亿人民意志的大宪章，我们必

须同心协力，努力奋斗，争取实现宪法的要求。我们各民族必须在为了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祖国这个新的基础上来达到新的团结。因此，我们就必须反对两种民族主义。大汉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都是妨碍我们在新的基础上加强民族间的团结的。

我们反对两种民族主义，必须从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祖国这个共同目标出发。如果没有这个共同目标，就反对不了这两种民族主义。比如说，站在人口最多的汉族方面批评兄弟民族中的地方民族主义倾向时，如果不想到这个共同目标，就很容易发生一些民族歧视的错误。因为兄弟民族多数是处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状态，汉族同志在批评时，就容易去指责这些客观存在的落后现象，这就变成民族歧视了。如果从为着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祖国的共同目标出发，就会想到那些落后状况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不是什么错误的倾向，而是经济、文化不发达的现象。应该去帮助各兄弟民族实现经济文化的发展，不能把这些客观现象当成兄弟民族中的地方民族主义倾向。就是有一些地方民族主义的倾向，也要研究它的来源，其中很多是有客观原因的，如果把这些客观原因改变了，这些倾向就会不存在了。比如说，处在边远地区的兄弟民族，他们对内地的情况不了解，对一些进步和发展的现象不认识，因而发生一些怀疑，不晓得汉族到底对兄弟民族的态度怎样。尤其是因为历史上汉族的反动统治者压迫少数民族，剥削少数民族，少数民族免不了带着怀疑的眼光看汉族，这是很自然的。因此，不能把这些由于历史、社会、经济的原因而产生的一些怀疑和不信任，都说成是地方民族主义倾向。不应

该简单地去批评某些地方民族主义倾向，而是应该诚恳地帮助兄弟民族了解产生这些倾向的根源，去掉他们的怀疑。当然，要去掉产生这些倾向的历史的、社会的、经济的根源，不是一天就能做到的。要在建设社会主义祖国的共同目标下，经过长期努力，发展全国各民族的经济、文化，这样才能从根本上去掉这种怀疑。这需要时间，需要工作，而不应该简单地不加分析地批评，只是简单的没有分析的批评，有时甚至会引起误会，造成错误。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站在少数民族方面批评汉族中的大汉族主义时，如果不从共同目标出发，也容易造成对立。因为历史上遗留下来的经济、文化方面事实上的不平等今天还存在，历史上反动统治压迫的后果也还存在。少数民族如果对汉族只注意这些历史痕迹，就很容易在少数民族中产生民族对立的倾向：我不信任你，你人口多，总是对我们不利，因为你是多数，经济、文化发展一些，总是会利用发展的优势继续过去的歧视和压迫。这样，怀疑的心理就增加了，甚至觉得和过去差不多，这就容易助长民族分裂、不团结的倾向。因此，我们希望少数民族的同志也一定要在共同目标下批评汉族中的大汉族主义。就是说，要把我国各民族经济、文化事实上不平等的现状逐步加以改变，为共同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祖国而努力，这就需要各民族互相团结，从团结的愿望出发来批评。汉族同志中如果确实有大汉族主义倾向和民族歧视的错误，就批评具体的人和具体的事，而不要简单地、不加分析地指责，不要对汉族的整体产生怀疑、不信任。不然就会助长民族分裂的倾向，不能达到民族间的团结。

我们的国家在历史上就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但在古代又是不完全统一的，甚至各民族彼此作战，不是你侵犯我，就是我侵犯你。民族间的互相侵犯，在我国的历史记载上是很多的。在各民族互相侵犯中，如果算总帐，汉族侵犯兄弟民族的次数多、时间长。虽然历史上汉族也被一些兄弟民族多次侵犯过，被统治的时间也不算短，如 北朝、辽、金、元、清。但从整个历史来看，还是汉族侵犯兄弟民族的时候多。站在兄弟民族的地位来想，总会想到历史上的这些痕迹。因为汉族在历史上经济、文化发展一些，就有条件向各方面发展，以致兄弟民族被挤到边远寒苦地区，生活就更困难，经济、文化也就更不容易发展。这种历史痕迹在兄弟民族中的印象是很深的。各个兄弟民族如果不想到建设社会主义祖国的共同目标，就很容易产生地方民族主义倾向，这对民族间的团结不利，对祖国的统一和发展不利。因此，各兄弟民族也必须想一想，尽管历史给我们遗留下这些痕迹，但这总是过去的事情了。这些事情在新中国诞生以前是存在着的。而在新中国诞生以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我们的宪法上，在国家的政策中，规定了民族平等。在平等友爱的民族大家庭中建设社会主义的强大的祖国，这是大家的共同目的。为着这个目的，我们要把历史上的痕迹消除掉，要把各民族在经济、文化方面事实上的不平等状况逐步消除掉。当然这不是短时间所能做到的，需要共同努力。

在现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若不强大起来，不建成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国家，就要受帝国主义的欺侮。当然，解放以来，我国人民已经站起来了，不受欺侮了，但是，这并不能保证我们

永远不受欺侮，必须把社会主义祖国真正建设强大了才有保证。处于帝国主义现在还存在的世界上，虽然我们社会主义的事业发展了，但是帝国主义还不死心。它一有机会还要用各种办法来捣乱。这就要求我们提高警惕，更要着重强调我们各民族间的团结，以利于共同努力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祖国。不如此，我们这个多民族的国家站起来以后，还会栽跟头，还会是一个落后的、贫困的、受欺侮的国家。

应该认识清楚，如果不把我们的祖国建设成为一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国家，是不能摆脱贫困落后的状态的。要摆脱这种状态，只有我们五十多个民族，大家合作起来，共同发展，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国家。要建设这样的国家，不能单靠汉族。汉族人口多，经济、文化比较发展，但是可开垦的土地已经不多，地下资源也不如兄弟民族地区丰富。兄弟民族地区的资源开发是祖国工业化的有力后盾。但是，兄弟民族地区的资源还没有开发，劳动力少，技术不够，没有各民族特别是汉族的帮助，也不可能单独发展。因此，各个民族必须互相帮助，互相支持，在共同发展的目标下建设社会主义祖国。这样，两种民族主义错误才会逐步减少，民族歧视的倾向和民族分裂的倾向也才会减少。举个例子，要把包头建设成为中国的一个工业基地，就必须把那里的铁和大同的煤结合起来。现在包钢已经开始建设了，将来会成为很大的工业中心。这就必须各个民族共同努力，首先是蒙古族和汉族共同努力。在这个共同目的之下，在积极的建设当中，即使有大汉族主义倾向，或者地方民族主义倾向，也可以逐步地减少。有了共同的、积极的发展目标，就可以克服那

些消极的、不满的对立情绪。当然，我不是说有了积极的目标，就不要注意克服消极的因素了，那还是需要克服的。我是说，有了积极的目标，消极的因素才会被积极的因素所代替。同样也可以设想，要在新疆建立起包括克拉玛依油田和乌鲁木齐地区的将来的工业中心，如果没有新疆各民族和内地汉族的共同努力，就搞不成功。首先铁路就修不成。铁路通了，劳动力不够，资金不够，也没有办法来开发。这就必须用全国的力量去支援。我只举这两个例子，就可以看得出其他了。为着一个伟大的共同发展的目的，我们就必须把由于各民族之间的偏见所产生的偏向，逐步地减少下去。

我们想到将来强大的祖国，就必须在今天强调各民族的团结，为建设社会主义共同努力。为了实现这个共同的目的，对妨碍我们团结的、妨碍我们共同努力的两种民族主义错误，都应当批判。我们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进行批判，以消除或减少民族歧视的错误和民族分裂的倾向。应该把这个问题提到新的认识上来，不要避讳这种批判，而是要从正面指出这个问题。两种错误的倾向都是对我们社会主义建设不利的。为了祖国的伟大的建设，我们就应当自觉地克服大汉族主义错误和地方民族主义错误。

二 关于民族区域自治的问题

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是我们解放以后在民族问题上的一个根本性的政策。这是我国宪法上规定了的。我国为什么要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而没有实行民族自治共和国那样的制度

呢？自治的形式在我国叫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还有民族乡，在苏联叫自治共和国、自治省、民族州。这不单是名称的不同，制度本身也有一些不同，也就是实质上有一些不同。不同的地方，不是在自治不自治的问题上。苏联的自治共和国是给民族以自治权利，我们的民族区域自治也是给民族以自治权利。不同的地方，在于苏联的区域划分与我国有很大的不同，苏联的自治共和国的权利、权限的规定也与我国有些不同。这些不同，是从两国的历史发展的不同而来的，部分地也是由于中国和当年十月革命时代的形势不同而来的。

俄罗斯在十九世纪已经发展成为资本主义国家，虽然还有很大的封建性。一方面，它比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落后，另一方面，它已经成为帝国主义国家，拥有殖民地。那个时候，在俄罗斯周围的一些民族，都是被沙皇这个俄罗斯政权统治着。这是一种殖民统治。而且，当时俄国的各民族多数都是一个一个地各自聚居在一块。

中国的历史同当时俄国的情况却完全不同。中国的民族发展在地区上是互相交叉的，内地更是如此。汉族曾经长期统治中原，向兄弟民族地区扩张；可是，也有不少的兄弟民族进入过内地，统治过中原。这样就形成各民族杂居的现象，而一个民族完全聚居在一个地方的比较少，甚至极少。我们常说，新疆是少数民族比较集中的一个地方，但是新疆也不是一个民族，而是十三个民族。西藏比较单一一些，但这指的是现在的西藏自治区筹委会管辖地区，而在其他地区，藏族也是和其他民族杂居的。我国历史的发展，使我们的民族大家庭形成许多民族杂居的状态。由于我国各民族交叉的时代很

多，互相影响就很多，甚至于互相同化也很多。汉族所以人数这样多，就是因为它吸收了别的民族。再如满族，从长白山发源，进入中原的时候，只有几十万人，到清朝最盛时，差不多有四五百万人。清朝亡了以后，满族还是存在的。满族采纳了汉族的文化，首先是文字，以后又逐渐采用了汉族的语言，把自己的语言文字丢了，好象跟汉族没有区别了，实际上还是两个民族。在清朝时候，对汉、满通婚也不是绝对限制的。到辛亥革命〔73〕以后，通婚的更多了，民族间的界限也就不是不可逾越的鸿沟了。解放以后，承认了满族。在普选进行人口调查时，填表承认是满族的有二百四十万。看来比过去少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因为有些人和汉族通婚，又算汉族，又算满族，填表就不填满族了。其实，那就看怎样填法了。这是一种同化的现象。如果同化是一个民族用暴力摧残另一个民族，那是反动的。如果同化是各民族自然融合起来走向繁荣，那是进步的。这种同化本身就有推动进步的意义。现在满族和汉族，语言文字相同，就更容易合作。满族同胞是不是主张恢复满族话呢？我看不会的，因为三四百万人从头学满族话，那不太麻烦吗？有些满族话，汉族吸收了没有？我看是有的。有许多满族语汇转为汉语，丰富了汉语。穿衣服也是这样，汉族的妇女在辛亥革命以后穿起旗袍，这还不是满族的服装？汉族吸收满族的文化很多，这也可以说是带点同化的性质。

还可以谈一谈回族的情况。回族是从阿拉伯、小亚细亚来的，并且时代并不太远，据说到现在不过一千多年，可是人口发展到三百五十多万。回族来中国有两条路，一条是从海上来的，一条是从阿富汗来的，要经过南疆，这样就不可能来

很多人。但是，现在回族散布到全国，没有一个省没有回族，几乎没有一个县没有，可靠的是三分之二以上的县都有。回族所以这样多，就是因为他能把别的民族成分吸收进去，吸收了就壮大了，这有什么不好？这不也是同化吗？回族聚居的地区在甘肃省的有吴忠、陇东、银川、陇西等地，其他地方也有聚居的。这次成立回族自治区，包括了吴忠、银川和固原等地，但大多数回民还是分布在全国。

汉族同化别的民族，别的民族也同化汉族，回族是这样，满族是这样，其他民族也是这样。这种情况，越向内地越多。历史的发展使中国各民族多数是杂居的，互相同化，互相影响。中国民族多，而又互相杂居，这样的民族分布情况，就不可能设想采取如同苏联那样的民族共和国办法。因为要构成一个民族共和国，需要构成一个独立的经济单位，绝大多数的民族人口要聚居。

历史的发展使我们的民族大家庭需要采取与苏联不同的另一种形式。每个国家都有它自己的历史发展情况，不能照抄别人的。采取民族区域自治的办法对于我们是完全适宜的。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不仅可以在这个地方有这个民族的自治区，在另一个地方还可以有这个民族的自治州、自治县、民族乡。例如内蒙古自治区虽然地区很大，那里的蒙古族只占它本民族人口的三分之二左右，即一百四十万人中的一百多万人，另外占三分之一弱的几十万蒙古族人就分在各地，比如在东北、青海、新疆还有蒙古族的自治州或自治县。即将建立的宁夏回族自治区，那里的回族人口只有五十七万，占自治区一百七十二万人口的三分之一，只是全国回族三百五十多

万的零头，就全国来说也是少数。还有三百万分散在全国各地，怎么办呢？当然还是在各地方设自治州、自治县和民族乡。藏族也是这样。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所管辖的地区，藏族只有一百多万，可是在青海、甘肃、四川、云南的藏族自治州、自治县还有一百多万藏族人口，这些地方和所在省的经济关系更密切，便于合作。在成立壮族自治区的问题上，我们也正是用同样的理由说服了汉族的。到底是成立桂西壮族自治区有利，还是成立广西壮族自治区有利？单一的壮族自治区是不可能有的。因为即使把广西壮族聚居的地方，再加上云南、贵州的壮族地区，划在一起，作为一个壮族自治区，它内部还有一百多万汉族人，而且其中的两个瑶族自治县也有四十多万人，汉族、瑶族合起来有一两百万，所以也不可能是纯粹单一的民族自治区。如果这样划分，壮族自治区就很孤立了，不利于发展经济。在交通上，铁路要和广西汉族地区分割；经济上，把东边的农业和西边的工矿业分开。这是很不利于共同发展的，而合起来就很便利了。所以广西壮族自治区也是一个民族合作的自治区。

从以上几个大的自治区来看，我们就得出一个结论：在中国适宜于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而不宜于建立也无法建立民族共和国。历史发展没有给我们造成这样的条件，我们就不能采取这样的办法。历史发展给我们造成了另一种条件，就是中国各民族杂居的条件，这种条件适宜于民族合作，适宜于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一个民族不仅可以在一个地区实行自治，成立自治区，而且可以分别在很多地方实行自治，成立自治州、自治县和民族乡。回族是最典型的例子。这没有什么不

好，而是很好。我们根据我国实际情况，实事求是地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这种民族区域自治，是民族自治与区域自治的正确结合，是经济因素与政治因素的正确结合，不仅使聚居的民族能够享受到自治权利，而且使杂居的民族也能够享受到自治权利。从人口多的民族到人口少的民族，从大聚居的民族到小聚居的民族，几乎都成了相当的自治单位，充分享受了民族自治权利。这样的制度是史无前例的创举。

十月革命时，俄国无产阶级是首先在城市中起义取得了政权，然后才普及到农村和少数民族地区。俄国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这时候打这个擂台是不容易的。同时，它又是在一个帝国主义的国家里进行革命的，所以必须摧毁旧有的殖民地关系。为了把各民族反对沙皇帝国主义压迫的斗争同无产阶级、农民反对资产阶级、地主的斗争联合起来，列宁当时强调民族自决权这个口号，并且承认各民族有分立的权利，你愿意成为独立的共和国也可以，你愿意参加到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来也可以。当时要使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政治上站住脚，就必须强调民族自决权这个口号，允许民族分立。这样才能把过去那种帝国主义政治关系摆脱，而使无产阶级专政的新社会主义国家站住脚。当时的具体情况要求俄国无产阶级这样做。

中国是处在另一种历史情况之下。旧中国虽然有北洋军阀^{〔6〕}和后来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压迫劳动人民，压迫兄弟民族，但是整个中国则是被帝国主义侵略的国家，成为半殖民地，部分地区则成为殖民地。我们是从这种情况下解放出来的。革命的发展情况也和苏联不同。我们不是首先在大城市

起义或者在工业发达的地方起义取得政权，而是主要在农村中建立革命根据地，进行长期奋斗，经过二十二年的革命战争才得到了解放。因此，我国各民族的密切联系，在革命战争中就建立了起来。例如，在内蒙古也有革命根据地，在新疆也有过反对国民党的革命运动，在我党领导的西南游击区也有各兄弟民族参加，内地许多兄弟民族都参加了解放军，红军长征经过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时，留下了革命的影响，并且在少数民族中吸收了干部。总之，我们整个中华民族对外曾是长期受帝国主义压迫的民族，内部是各民族在革命战争中同甘苦结成了战斗友谊，使我们这个民族大家庭得到了解放。我们这种内部、外部的关系，使我们不需要采取十月革命时俄国所强调的实行民族自决、允许民族分立的政策。

历史发展给了我们民族合作的条件，革命运动的发展也给了我们合作的基础。因此，解放后我们采取的是适合我国情况的有利于民族合作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我们不去强调民族分立。现在若要强调民族可以分立，帝国主义就正好来利用。即使它不会成功，也会增加各民族合作中的麻烦。例如新疆，在解放前，有些反动分子进行东土耳其斯坦^{〔131〕}之类的分裂活动，就是被帝国主义利用了。有鉴于此，在成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时，我们没有赞成采用维吾尔斯坦这个名称。新疆不仅有维吾尔一个民族，还有其他十二个民族，也不能把十三个民族搞成十三个斯坦。党和政府最后确定成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新疆的同志也同意。称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帽子”还是戴的维吾尔民族，因为维吾尔族在新疆是主体民族，占百分之七十以上，其他民族也共同戴这个帽子。至于

“新疆”二字,意思是新的土地,没有侵略的意思,跟“绥远”〔2〕二字的意思不同。西藏、内蒙的名称是双关的,又是地名,又是族名。名称问题好象是次要的,但在中国民族区域自治问题上却是很重要的,这里有一个民族合作的意思在里面。要讲清楚这个问题。

以上这些都说明,我们是根据中国民族历史的发展、经济的发展和革命的发展,采取了最适当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而不采取民族共和国的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单一体的多民族的国家,而不是联邦国家,也无法采取联邦制度。我们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从我国的实际出发,分别情况,成立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或者民族乡,使所有少数民族不论聚居或者杂居都能实行真正的自治。这就有利于少数民族普遍行使自治权利,也有利于民族之间的合作互助。我国各民族的发展是不平衡的,这也是从历史上来的,经济基础是这样,上层建筑也是这样。要想趋向平衡,就要各民族合作互助,不能孤立地讲发展。以新疆来说,那里有石油资源,有各种有色金属资源,有可以开垦的农田,适宜种植棉花,但这只是好的条件,不要忘记那里还有困难。新疆水利不够,要大大地改善水利系统,才能够开发。交通也很困难,不仅要修通从兰州到新疆的铁路,而且要修通北疆到南疆的铁路,才能开发。要开矿、垦田,可以用机械,但最根本的有两个问题:一是要有资金,一是要有人力。即使有了机械,也还要有人力、财力才能得到发展。仅仅依靠新疆一个自治区的五百万人口,不可能积累多少资金,而且人力也不够。必须要靠全国的力量,国家的力量,中央的力量,把我们计划经济中能够积累的资金拿出一部分

投资到新疆增加财力，从内地动员一部分人力到新疆增加劳动力，这样才能使新疆大发展。这就必须民族合作。不能设想，新疆孤立地只靠现有的人力、物力，就可以解决问题。

在中国这个民族大家庭中，我们采取民族区域自治政策，是为了经过民族合作、民族互助，求得共同的发展、共同的繁荣。中国的民族宜合不宜分。我们应当强调民族合作，民族互助；反对民族分裂，民族“单干”。我们民族大家庭采取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有利于我们普遍地实行民族的自治，有利于我们发展民族合作、民族互助。我们不要想民族分立，更不应该想民族“单干”。这样，我们才能够真正在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的基础上，建立起我们宪法上所要求的各民族真正平等友爱的大家庭。

三 关于民族繁荣和社会改革的问题

我们这个多民族的大家庭要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在民族繁荣的基础上前进。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能够有民族繁荣，所以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优越，比封建主义更优越。历史证明，过去许多兄弟民族不是走向繁荣，而是走向衰亡。为什么？就是因为过去的反动统治者采取歧视兄弟民族，以至削弱和消灭兄弟民族的政策。两千年来历史上有记载的兄弟民族，有些现在不见了，其中有的可能向远方迁移了，有的可能和汉族或者和其他民族融合起来了。这些变化的情况，还有待历史家的研究。

上面讲过，满族从几十万人变成了几百万人，吸收了汉族

的文化。满族建立的清朝政权，统治了中国近三百年。清朝以前，不管是明、宋、唐、汉各朝，都没有清朝那样统一。清朝起了统一的作用。另一件事就是繁荣了人口。中国人口的增长，在清朝是相当大的。这是它有功的一面。但是，它不是繁荣所有民族的人口。例如在清朝统治下，汉族人口增长了。可是对某些兄弟民族，它的政策则是削弱。如蒙古和藏这两个民族，在清朝的时候人口是减少了的。蒙古民族在最盛的时候据说有四五百万人口，但是到了清朝就减少了。藏民族在唐朝时是很强大的，有很大的发展，曾到过陕西的关中北部、长安附近，到过甘肃的南部，还到过四川、云南，人口据说有四五百万。现在藏族人口合起来不到三百万。这两个民族，显然是在清代削弱了。这说明，封建主义的民族政策是要削弱别的民族的。

帝国主义更是如此。帝国主义统治殖民地，总是把当地的民族搞得很穷困，穷困以后就要衰弱了。大家知道，帝国主义是从西方来的，起初主要是英国和法国，以后是美国。这些帝国主义国家，对任何殖民地的原有民族，都是采取削弱的政策。例如西班牙、葡萄牙、英国到美洲殖民，把原来占当地人口多数的印地安人削弱成了少数。又如英国人、法国人、比利时人到非洲殖民，也是这样做的，他们力图削弱非洲的黑人民族。只有不甘心于做殖民地奴隶、奋起反抗取得胜利的民族才慢慢好了，如埃及、摩洛哥、突尼斯、阿尔及利亚等等。所以，从世界史上可以看出来，不管是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帝国主义，都是削弱被压迫民族的。反动统治者不仅压迫本民族的劳动阶级，也削弱它统治的其他民族。东方各民族的经济

文化比西方落后，曾长期处于被压迫被削弱的地位。只有争得民族独立，他们才能免于被削弱。在民族政策上，我们社会主义国家跟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根本不同。我们要帮助各兄弟民族的繁荣，必要的时候对社会主义国家以外的民族也给予帮助。我们对各民族既要平等，又要使大家繁荣。各民族繁荣是我们社会主义在民族政策上的根本立场。绝不能说这个民族是优越的，那个民族是劣等的，这种想法是完全错误的种族主义的想法。德国法西斯认为日尔曼民族是最优秀的民族，说德国日尔曼血统是最好的血统，这是极端反动的思想。我们认为，所有的民族都是优秀的、勤劳的、有智慧的，只要给他们发展的机会；所有的民族都是勇敢的、有力量的，只要给他们锻炼的机会。世界上所以有些民族比较落后，这是环境造成的，是因为没有给他们发展和锻炼的机会。我们社会主义的民族政策，就是要使所有的民族得到发展，得到繁荣。所以，我们国家的民族政策，是繁荣各民族的政策。在这个问题上，各民族是完全平等的，不能有任何歧视。我们的根本政策是要达到各民族的繁荣。以往的历史发展使有的民族削弱了，人口减少了，有的很落后，生活水平很低，这是反动统治遗留下来的后果。我在前面讲了清朝对西藏的政策，如果讲到北洋政府和国民党时代，那就更反动了。尽管孙中山先生提倡五族共和^{〔132〕}，到了蒋介石，首先就不承认回族，把他们叫做生活习惯特殊的人。国民党连民族都不承认^{〔133〕}，更谈不到帮助各民族发展了。这种对待各民族的反动统治、反动政策，我们历来是反对的。

历史遗留给我们的，是对民族繁荣的很多不利的条件。我

们必须把这些不利的条件逐步地去掉。要去掉这些不利于民族繁荣的条件，关键在哪里？关键在于社会改革。各个少数民族过去由于处在反动统治下面，被反动统治者所压迫，经济得不到发展，人口得不到增长，生活得不到改善，使这些兄弟民族不能够发展。我们新中国就是要帮助各民族发展，这就必须实行一个根本性的措施，就是进行社会改革。社会改革是我们中国各民族的共同性的问题。汉族也要经过改革才能够发展。我们所说的社会改革，最根本的是经济改革。为什么要改革？因为要建设社会主义，要人民生活富裕起来。要富裕就要有工业，一个民族没有工业不可能富裕起来。因此，我们中国要工业化，没有工业化，就不可能使生产发展。而要工业化，就得首先在农业上实行改革，把农业上的封建制度、奴隶制度废除。农民得到了解放，才能够使农业经济得到发展，才能有工业发展的基础。农业能够大量增产，才可能积累资金，才可能供给工业原料，才可能解放劳动力参加工业生产。只有建立起工业基地来，这个民族才有发展的基础。所以每个民族都不可避免地要经过经济改革。现在，各兄弟民族地区绝大多数实行了土地改革〔10〕，有不少兄弟民族进一步实现了农业上的社会主义改造，组织了农业合作社〔84〕，这就一定会使农民的生产力得到解放，能够在合作社的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基础上大大增产，这样才能够促进工业的发展。可是还有不少兄弟民族，经济改革或者还没有开始，或者还没有完成。经济改革分两步，第一步是民主改革，即土地改革，第二步是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如果不进行经济改革，维持奴隶制度、封建制度，多数的人民还是奴隶、农奴和封建制农民，生

产力就不能够解放。生产的东西大部分被剥削去了，劳动者本身还是穷困的，他们就不可能有增产的积极性。在我们新中国这个社会里，许多地方不但封建制度不存在了，连个体经济制度都不存在了，进到社会主义集体经济了，有些少数民族地区还孤立地处在奴隶制度、封建制度的统治之下，这怎么可能存在下去呢！它是一定要受到外界的影响的。例如，凉山彝族地区的改革，就是受了外界的影响。奴隶娃子起来了，他们要求改革。现在凉山彝族的一些头人也同意改革，愿意放弃剥削。改革以后，他们还可以得到政府很好的待遇，生活得到保障。如果他们不赞成改革，就要被奴隶娃子推翻，什么也得不到。周围环境的影响是很大的。西昌坝子实行了土地改革，就不能不影响凉山。大家都是在同一个民族大家庭里，土地改革也好，社会主义改造也好，浪潮起来了，都会互相影响。不可能设想，某一个地方能够长期地永远地孤立在一个地方“单干”。我们要对现在还处在剥削者地位的兄弟民族上层分子说清楚这个问题：如果他放弃剥削，他所得到的好处，比反对这个改革所得到的要多得多；如果他抗拒改革，被群众起来推翻了，他就得不到好处，或者得到的少了。如果他赞成改革，国家和政府会照顾他，群众可以对他宽大些。这是一点。另一点，如果从长远来看，他继续长期剥削，在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国家，孤独地搞下去，终归要失败，而且剥削越维持得久，他将来失掉的越多。谁要幻想在中国这个社会里长期地保留他的剥削，甚至于过那种极度豪华的生活，那是绝对办不到的。全中国都不那么豪华，少数人要那样豪华是不能允许的。我们主张，各个兄弟民族的人民，包括他们的上层分子，觉悟到需

要改革的时候，再去改革。某些地方推迟改革，是为了将来更好地改革，更和平地改革，更有准备地改革，但总是要改革。一定要把奴隶制度、封建制度和个体经济制度改革成为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所以改革只是一个先后问题，缓急问题，而不是改革不改革的问题。不改革，民族就要贫穷。我们中国这个民族大家庭是要大家幸福，包括兄弟民族上层分子也要得到真正的幸福。改革就是使大家都幸福，不是少数人幸福。当然我们也要承认，改革后的一个时候，上层分子不能象过去那样生活便当，用钱也不那样方便了，因为收入是有一定数额的了。但是，前途是有保障了。将来工业更发展了，他们的生活水平也会更提高。这一点，我们要对所有兄弟民族的上层分子也讲清楚。

前面已经讲过，建设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国家，是任何民族都不能例外的。我们不能设想，只有汉族地区工业高度发展，让西藏长期落后下去，让维吾尔自治区长期落后下去，让内蒙古牧区长期落后下去，这样就不是社会主义国家了。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是要所有的兄弟民族地区、区域自治的地区都现代化。全中国的现代化一定要全面地发展起来。我们有这样一个气概，这是我们这个民族大家庭真正平等友爱的气概。我们不能使落后的地方永远落后下去，如果让落后的地方永远落后下去，这就是不平等，就是错误。

这种改革，不仅是经济制度的改革，也会影响到别的方面。因为经济基础变动了，上层建筑也要受影响，就是说，政治上、思想上也要受影响。政治上的制度要适合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也要改革，要改革成为民主集中制。又有民主，又

有集中；又有自由，又有纪律；又有个性的发展，又有统一意志。思想也要适合这个社会主义制度的要求，大家要学习马克思主义，要爱护社会主义制度。

有的宗教界朋友担心，既然经济基础的改革会影响到思想方面，那么，是否也会影响到宗教呢？经济基础的改革对思想方面有影响是必然的。但是，思想方面的变化，不会象政治制度的改革那样发展。思想变化的过程是最慢的。信仰宗教的人，不仅现在社会主义的国家里有，就是将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是不是就完全没有了？现在还不能说得那么死。现在我们只把宗教信仰肯定为人民的思想信仰问题，而不涉及政治问题。不管是无神论者，还是有神论者，不管是唯物论者，还是唯心论者，大家一样地能够拥护社会主义制度。我们共产党内有很多农民党员，他们拥护社会主义制度，参加合作社，干得很积极。他们的经济是社会主义的集体经济，在组织上是按合作社的章程办事，并且许多人是乡政权的干部。他们在政治上、思想上都适合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要求，但是，一到了晚上，有的就怕鬼。你说所有的共产党员都不怕鬼，我就不相信。人的思想有各种各样，只要他不妨碍政治生活，不妨碍经济生产，我们就不要干涉。宗教是会长期存在的，至于将来发展如何，要看将来的情况。但是，只要人们还有一些不能从思想上解释和解决的问题，就难以避免会有宗教信仰现象。有的信仰具有宗教形式。有的信仰没有宗教形式。宗教界的朋友们不必担心宗教能不能存在。按照唯物论的观点，当社会还没有发展到使宗教赖以存在的条件完全消失的时候，宗教是会存在的。现在应该担心的不是宗教能不能存在，

而是民族能不能繁荣。

民族繁荣是我们各民族的事业，对此不能有任何轻视。只有改革才能使民族繁荣。经济改革是各民族必须走的路。走这条路才能工业化、现代化。工业化、现代化了，经济生活才能富裕，民族才能繁荣，各族人民才能幸福。这里要顺便说一下，就是有些兄弟民族还需要增加人口，但汉族人口增加得太快了，所以汉族地方要提倡节制生育。

四 关于民族自治权利 和民族化的问题

肯定地说，民族自治权利必须受到尊重。凡是宪法上规定的民族自治权利，以及根据宪法制定的有关民族自治权利的各种法规、法令，统统应该受到尊重。在这方面，从中央政府一直到地方政府，有的时候是注意不够的。我们应该多检查，多批评。同时，在这方面，因为汉族人数多，容易忽视少数民族的自治权利，大汉族主义的缺点也是比较容易发生的。忽视民族自治权利的倾向，多半是从大汉族主义来的，应该批判。

另一个问题，就是民族化问题。既然承认各民族的存在，而我们又是多民族的国家，民族化问题就必须重视。因为经过民族化，民族自治权利才会被尊重。例如，民族的语言文字，就要尊重它。没有文字的，要按照本民族的意愿帮助他们创造文字。在民族自治地方，主要民族的文字应该成为第一

种文字。既然是民族自治，就要培养民族干部。既然承认民族，各民族的风俗习惯就要受到尊重。这些就是民族化。如果不重视这些民族化的问题，就不符合我们建立社会主义民族大家庭使各民族共同繁荣的政策。

对以上两个问题，国家、行政机关、汉族应当负更多的责任，因为最容易忽视。关于干部方面的民族化，就是民族干部应当有一定的比例。在汉族人多的地方，容易忽略少数民族干部的一定比例。即使少数民族人口少，也必须照顾这一点。所以民族自治权利问题、民族化问题，政府机关要多注意。

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的行政机构，是不是一定要跟省、专区、县一样？这个问题还值得研究。过去太求同了，不那么妥当。各省之间都不应当完全一样，自治区与省，自治州与专区，自治县与县，就更不应当一样，应当因地制宜。

在每个民族自治地方，民族干部应该做负责工作。当然不是所有的负责人都不能由汉族干部担任，但是民族干部总要负更多的责任。因此，就应当有步骤地有计划地培养民族干部，要派好的干部到中央、省来学习，也要多把好的干部派回去，这才有利。这一方面，以后中央和省应当多注意些。另一方面，也应当派汉族干部去帮助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的工作。有些地方汉族多，更不能不要汉族干部。象内蒙，汉族那样多，在人民代表大会、政府机关、企业机构，当然要有汉族干部。广西也是这样。将来宁夏回族自治区也是这样。就是少数民族占多数的地方，象新疆、西藏，也不可能没有汉族干部。在那些兄弟民族占多数的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派汉族干部应当少而精，就是要派好的、得力的干部，不能多而滥。

领导干部很关重要，不论是党的还是政府的，都要照顾两方面，要力求合作。如果干部问题解决不好，一切政策就都没有人实施。如果干部闹对立、包办、单干、歧视、分裂，则一切都搞不好。

我们的宗教信仰是自由的。在中国存在有宗教信仰的人和没有宗教信仰的人，就是有神论者和无神论者。这两类人应该彼此相处得很好。我们从来不象有些国家那样在宗教问题上争执得那么厉害，甚至被帝国主义者挑拨引起战争。信仰各种宗教的人，本来是可以合作的。我国信佛教的最多，第二是信伊斯兰教的，第三是信天主教的，第四是信基督教的。我国信仰各种宗教的人，向来就是合作的。不信仰宗教的人应当尊重信仰宗教的人，信仰宗教的人也应当尊重不信仰宗教的人。不信仰宗教的人和信仰宗教的人都可以合作。信仰不同宗教的人也可以合作。这对我们民族大家庭的团结互助合作是有利的。

民族的风俗习惯比宗教信仰还要广泛，因为一个民族不一定都信仰一种宗教。有很多民族是信仰多种宗教的，也有几个民族是信仰同一种宗教的，如回族和新疆几个民族是信仰同一种宗教的，蒙古族和藏族也是信仰同一种宗教的，但风俗习惯常常是一个民族一种，因此，风俗习惯也同样应该受到尊重。如果不尊重，就很容易刺激感情。比如我们对回族和新疆的各个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不吃猪肉的风俗习惯就要尊重。另一方面，对于反映在文化方面的风俗习惯，不要随便加以修改。现在有些文工团到兄弟民族地区学习音乐舞蹈，特别是舞蹈，常常拿汉族的想法来修改，兄弟民族对此很不高

兴。这是强加于人，不尊重人家的风俗习惯。有些汉族人总觉得他自己的都是好的，人家的是落后的，这是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思想。人家的风俗习惯是建立在自己的生活条件的基础上的。风俗习惯的改革，要依靠民族经济基础本身的发展，不要乱改。

以上我一共讲了四个问题。这些问题还要继续研究，今天我只是把原则性的问题讲一讲，供大家参考。

给程砚秋^{〔134〕}的信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三日）

砚秋同志：

我在你的入党志愿书上，写了这样一段意见：

程砚秋同志在旧社会经过个人的奋斗，在艺术上获得相当高的成就，在政治上坚持民族气节，这都是难能可贵的。解放后，他接受党的领导，努力为人民服务，政治上积极要求进步，这就具备了入党的基本条件。他的入党申请，如得到党组织批准，今后对他的要求，就应该更加严格。我曾经对他说，在他被批准为预备党员期间，他应该努力学习，积极参加集体生活，力图与劳动群众相结合，好继续克服个人主义思想作风，并且热心传授和推广自己艺术上的成就，以便提高自己的阶级觉悟，发扬为劳动人民服务的精神。

现在把它抄送给你，作为我这个介绍人对你的认识和希望的表现。

周 恩 来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三日

进一步提高军队的政治素养^{*}

（一九五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从建立以来，经过了多年革命战争的锻炼，在各方面都有了很大的提高。从一九五三年朝鲜停战〔26〕到现在的四年半中，情况起了变化，我们已不是在战争中进行锻炼，而是在保卫和平、保卫建设、保卫祖国边防的和平环境中进行锻炼。这对于二十多年来天天拿着武器和敌人作战的解放军来说，是个新的情况。当然我们已经在政治工作、党的组织等方面做了不少的精神准备。但是，对一种新情况的认识和适应，总要经过本身的体验，要有个摸索的过程。四年多来，我们做了一些新的部队建设工作，如实行了兵役制度、军衔制度，颁布了各种条令等，这些都促使我们的军队在正规化方面前进了一步。同时，经过朝鲜战争的锻炼，我们的军事装备逐渐走向现代化，部队的军事素养也得到新的提高。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在另一个最重要的最基本的方面，也就是说要在军队的政治素养方面，在现有的基础上更加提高，在政治思想工作方面更为加强。这四年多，我过问军事工作比较少了，但也看了一些报告，知道在这方面有进步的地方也有减弱的

^{*} 这是在中国人民解放军驻上海陆海空军军官大会上的讲话。

地方，因此我今天想讲一讲进一步提高军队政治素养的问题。

第一，加强敌情观念。因为我们是军队，战时要打仗，平时就应该进行战斗准备，眼睛对着敌人，思想上警惕着敌人，准备战争。我们的人民解放军在党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少到多，经过整整三十年，锻炼成为这样一支坚强的人民的军队，社会主义的军队。我们可以说，三十年中，有二十五年多都在打仗。现在情况有了变化，但我们还必须经常加强敌情观念。如果丧失了对敌人的警惕，就不能成为一个军人，尤其不能成为一个革命的军人。我们今天还处在两个制度对立、社会主义与帝国主义斗争的时代。毛泽东同志说“东风压倒西风”〔135〕，但并不是说我们可以坐等全世界共产主义的胜利。胜利是要用斗争夺取的。帝国主义不会等待死亡，甘心死亡，它还要挣扎。帝国主义存在一天，战争的土壤也就存在一天，总会有一部分战争狂人要冒险。所以我们革命军人就要时刻警惕着敌人，军人如果丧失了敌情观念，那就要犯很严重的错误。

我们是主张和平的，但和平必须通过斗争去争取。比如说，我们的外交工作是和平斗争，军事工作是武装斗争，这两种斗争是互相配合的。外交斗争需要有后盾，这主要是军事力量。没有这样一个后盾，日内瓦会议〔97〕也好，万隆会议〔96〕也好，我们就起不了那样的作用。当然，力量的源泉是人民，归根到底，一切胜利的取得是依靠人民的力量。由人民中的一部分优秀分子在共产党领导下组织成一支武装，这就是我们的人民解放军，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力量。这个力量丝毫不能懈怠，只有这样，敌人才不敢为所欲为。第二次世界大战

以后，社会主义取得的一系列胜利，都是由于社会主义力量的强大、团结和巩固。朝鲜停战，印度支那停战^{〔99〕}，不是敌人不想打下去，而是敌人不敢或不能打下去。所以说，力量是重要因素，只有我们的力量强大，不怕威胁，敌人才会知难而退，和平运动才能不断高涨。因此我们军人必须要有牢固的敌情观念。有国家，就需要有军队保护；帝国主义存在一天，军队的任务就一天也不会轻松。特别是你们处在祖国的东南前线，更应该加强敌情观念，时刻保持高度的警惕。

最近我了解了一下情况，我们的军队在这方面有一些弱点。有些同志的敌情观念不那么强了，工作也有些松懈。这是不应该的。当然我们不制造人为的紧张，也不被敌人制造的紧张所吓倒，但是应该紧张工作的时候还是要紧张地工作。大家知道，最近敌机乘隙窜入我们的上空，盘旋很长时间，一直到接近我们的首都。我还听总参的同志说，有些单位的军纪比较松懈，这很不应该。我们是拿武器来保卫和平建设的，必须有严格的纪律。

近年来，我们军队基层的情况改变了。实行了义务兵役制，战士都是新兵，基层骨干也很新。他们年轻力壮精神饱满，但没有经过战争锻炼，象暖室里培养的花朵，没有经过风霜。他们不仅没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经验，就连抗美援朝战争的经验也没有。如果我们的指挥员和政治工作人员不去教育他们，他们就会松懈。松懈是不允许的，因为帝国主义还存在，我们要准备应付突然事变。如果帝国主义不存在了，那就是另外一种情况了，但在我们这一辈子不可能如此，所以我们就必须随时准备着。尽管现在整个形

势是“东风压倒西风”，和平的可能性更大了，战争推迟的可能性更大了，可是我们不能不警惕突然事变。这是你们的主要任务，是根本任务。爆发突然事变的可能性不论有多大，百分之十也好，百分之二十、三十也好，你们都要保持警惕，要准备坏的那一面。在和平时期要警惕坏的情况的到来。不论什么时候都要记住，这是最重要的一点。这是我们政治工作的责任，是首要的一课。

我们军队中基层干部的战斗经验也不是那么丰富了。营长以下的干部恐怕很多都是解放战争胜利后提拔起来的，有的参加过朝鲜战争，有的就没有参加过。时光过得很快，和平的时间已经不短了，从一九四九年算起已经八年，如果从朝鲜停战算起，也有四年半了，再争取五年、十年的和平时间，那就更长了。和平的时间越长，战争的警惕性就越容易松懈。我们现在处于建设的时期，和平生活惯了，是会有惰性的。在过去战争年代，几个月不打仗手就发痒，那时我们多少干部和战士到了后方医院，住不久总是急于回到前方。现在不同了，整个环境象后方似的，空气也变了。不仅有军队内部的影响，而且还有军队外部的影响，所以就更要加强战斗准备。我们的政治工作者、政治委员、政治部主任，应该经常讲这个问题，讲敌情观念问题，要教育部队时刻警惕着敌人的挑衅，经常加强战斗准备。这是我们保卫和平的首要问题。

第二，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我们的军队是党领导的。三十年来，在党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我们建立了这样一支战斗的部队，胜利的部队。在取得革命胜利以后，这支部队又执行着保卫祖国、保卫和平的历史任务。这几年来，我们党更

多地注意了建设工作，注意了阶级斗争，对军队工作管得少了些，这是个缺点。对这一点，你们可以给我们提意见。党一定要管军队。当然是管大事，不是管小事。毛泽东同志说，大权独揽，小权分散。如果什么事情都要中央政治局去管，那就要变成包办代替，就会形成小权多揽，大权不揽，把大的事情丢掉了。地方党委要管所在地区军队的事情，也应该是大权独揽，小权分散。上海市委应该讨论上海部队的重大问题，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军队的同志也要参加上海市委，出席重要会议。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要了解党的大政方针和重要政策。如果你不了解党的方针政策，怎么会知道整个国家的发展呢！因此，对两方面都要有要求，党要管军队的重大问题，军队的负责人也要参加党的重大事情的决定。不仅上海一地如此，各地都应该这样。在这一方面，我们还要规定一些更具体的办法。但是你们不要等待，现在不是要整改吗，能改的就要先改起来。

我们军队如果没有党的领导，要使它成为一支既有高度军事素养又有高度政治觉悟的革命军队是不可能的，因此一定要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

第三，加强军政联系。我们军队是人民的军队，是保卫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因此对国家建设和人民政府的各项措施都应该关心，有的要争取直接参加。关于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情况，我在上海市党代表大会上讲过了，大概你们的负责同志已经向你们作了传达，这里不详细讲了。我们国家的工业建设已经有相当的规模了，很值得看一看，应该组织起来去参观一下。

军队和地方的界限不要分得太清了。界限分明，互不相干，这对我们国家的建设非常不利。

军队应该关心国家建设，过去这方面做得不够。就拿国防建设来说，我看校级以上的军官也不一定都完全清楚，可能军事工程学院的同志知道一些，旁的人就不大了解了。你们有多少同志知道飞机是怎样制造的？坦克是怎样制造的？我看你们就不大了解。我们不是讲现代化吗，对现代化装备不仅要懂得运用，还要懂得它的性能、原理。尤其是在座的中级指挥员，年轻得很嘛，你们应该懂得这些，学会它，一旦有事，你们就能指挥。至于高级指挥员，如大将、上将、中将等，就更应该懂得这些。可以组织起来到各地去参观，政府方面给你们一些方便。当然，加强军政关系不只是关心社会主义建设一项，我只举此一端加以说明。其他的如征集兵员、复员转业、工程建设、义务劳动等等，许多事情都要双方协作。军队过去帮助地方发展生产，做了许多工作，这种精神应该发扬，今后更要多做些。

第四，改进军内关系。主要是改进上下关系、左右关系、官兵关系。相互之间，不要因为实行了军衔制度、规定了礼节等而拘束起来。我们的军队是革命的军队，应该保持与发扬上下一致、官兵一致的优良传统。工作、打仗要强调按级服从，平时互相交往应该有同志式的友爱，象兄弟一样，不必过分拘泥于形式。我们军队的纪律是自觉的纪律，从井冈山时期以来，毛泽东同志就一再强调这一点。军队内部生活近年来有些呆板，讲求形式的东西多了，应该讨论改进。军队的民主是我们的优点，应该发扬这个光荣传统，进一步增强军内

团结。

第五，密切军民关系。近几年，军队与人民的关系有些疏远了。我们回想一下，在革命战争年代，人民完全把我们当作自己的子弟兵。解放战争胜利时，全国人民对我们解放军那真是衷心拥护，军民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但是近几年来，我们有了营房，有了严格的军事勤务以后，军队和人民群众的关系就比较疏远了，这是要注意改进的。我们是从人民中来的，我们过去的胜利都是在人民的支援下取得的，不能忘本。今后一定要进一步加强军民之间的联系，要结合整风整顿军民关系。

军队也要进行劳动锻炼。军队工作本身当然也是一种艰苦劳动，体力劳动很多，但总不同于工厂和农村的生产劳动。同时，部队的指战员虽然大多数是劳动人民出身，但也有不少知识分子。即使是劳动人民出身的，几年不参加生产劳动，也就生疏了，也需要通过劳动锻炼，进一步加强劳动观念和群众观念。因此要多组织义务劳动，帮助人民群众生产，使人民看到今天的解放军还是当年的子弟兵，还是抗美援朝战争时期的最可爱的人。我们军队要永远保持人民子弟兵的光荣称号，永远保持最可爱的人的光荣称号，永远保持同人民的血肉联系。

上面讲的这五个问题，我们应该根据形势和军队的任务，在整风中认真加以解决。

最后说一下，现在提倡勤俭持家，许多军官动员家属回到乡下去，回到生产中去，这是好事情，值得称赞。我在北京看到北京部队军官家属回乡的数目很大，我相信其他地方也会做得很好。

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

(一九五八年一月十日)

—

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是：简化汉字，推广普通话，制定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

第一是简化汉字。《汉字简化方案》是一九五六年一月由国务院公布的。这个方案包含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即汉字简化第一表，包含二百三十个简字，从方案公布的时候起即已通用。第二部分即汉字简化第二表，包含二百八十五个简字，其中的九十五个简字已从一九五六年六月起开始试用。第三部分即汉字偏旁简化表，包含五十四个简化偏旁，已有三十个根据这个表类推出来的简字从方案公布的时候起开始试用。以上三项合计，现在报刊上使用的简字一共有三百五十五个〔136〕。方案公布后，两年来，简字已经在报纸、刊物、课本和一般书籍上普遍采用，受到广大群众的欢迎，大家称便，特别是对初学文字的儿童和成人确做了一件很大的好事。河南一位老师向小学生介绍简字，说“丰收”的“豐”字今后可以简

^{*} 这是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举行的报告会上的报告，最先发表于一九五八年一月十三日《人民日报》。

写成三横一竖的“丰”字，孩子们高兴得鼓掌欢呼。天津一个工人说，“盡、邊、辦”这三字学了半年了，总记不住，这回简化成“尽、边、办”，一下就记住了。李凤莲〔137〕同志有个弟弟，在家乡种地，写信给李凤莲同志诉苦，说农民普遍感到汉字难学。农民常用的一些字，象“农民”的“農”，“穀子”的“穀”，“麵粉”的“麵”，“麥子”的“麥”，还有“雜糧”这两个字，这一类字都不好写。李凤莲同志给他弟弟寄了一本简化汉字的书去，他弟弟高兴极了，回信说“这些新字好学得多”，还埋怨他姐姐为什么不早些给他寄去。简体字是要比繁体字好学好写，因此包括工人、农民、小学生和教师在内的广大群众热烈欢迎简字，这是很自然的事。

至于象我们这样的知识分子，跟汉字已经打了几十年的交道，当初写了别字给老师责备甚至打手心的事在记忆中已经渐渐淡薄，因此觉得繁体简体都无所谓，对于简字不热心，甚至还觉得不顺眼，思想上有抵触。在这一点上，我很赞成李烛尘〔138〕先生的看法。李先生给《文字改革》月刊写了一篇文章。他说：“一提到汉字改革，总有些人提出这样那样的理由，不同意甚至坚决反对。如有人说，‘汉字并不难’。我看这样的人和‘好了疮疤忘了痛’的人一样，忘记了当年初学《三字经》、《千字文》时的痛苦了。我想这些人如果能回想一下当年自己学习汉字的痛苦，再设身处地为儿童和文盲的利益着想，也许不至于不同意或者坚决反对。”李烛老又在他的文章中批评了那些反对汉字简化的人。他说：《汉字简化方案》公布后，有人说什么“快变成文盲了”。他认为这种感叹和顾虑是多余的。简字中有很多字是人们早就熟悉的。这怎么会“变成文

盲”？当然，有些字比较生疏，但是只要稍微动动脑筋，问题也就解决了，决不至于“变成文盲”。为了广大的劳动人民和千千万万的儿童，知识分子应该动动脑筋。因此，李烛老不仅赞成把“燭”字简化成“烛”，而且赞成把“塵”字简化为“尘”。我看问题确实是这样。汉字简化既然符合广大人民的利益，我们知识分子就应该积极支持这个工作，而不是消极对待。我们应该从六亿人口出发来考虑文字改革的问题，而不是从个人的习惯和一时的方便来看这个问题。我们站在广大人民的立场上，首先应该把汉字简化这项工作肯定下来。汉字简化是符合群众利益并且受到群众热烈欢迎的好事，两年来的试用也证明是有成效的，应该给以坚决支持。

那么是不是说汉字简化工作就没有缺点呢？是不是说《汉字简化方案》中的简字就没有不合适的呢？不是的。应该指出：汉字简化工作所采取的方针“约定俗成，稳步前进”是正确的，已为两年来的经验所证明，但是在具体工作中还有考虑得不周到的地方。实践证明，少数简字在应用上还不够妥善，或者可能发生误解。这些少数简化得不恰当、在使用中证明有缺点的简字，应该另行规定它们的简体，或者保留原来的繁体。一九五六年一月国务院公布的《汉字简化方案》中，除了汉字简化第一表中的二百三十个简字公布推行以外，第二表中的二百八十五个简字和第三表中的五十四个简化偏旁尚在征求意见，本来还没有定案。就是第一表中的二百三十个简字，如果的确有不适当的，也可以作必要的修改。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现在正在征求各方意见，进行简字的整理和修订工作，大家对简字有什么意见，可以向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提

出，请他们考虑，然后再进一步定案。

目前社会上使用简字，还存在一些分歧现象。有些人任意自造简字，除了他自己认识以外，几乎没有别人认识，这种现象自然不好，应该加以适当的控制。一个人记笔记，或者写私信，他写的是什么样的字，谁也无法管。但是写布告或者通知，是叫大家看的，就应该遵守统一的规范。特别是在印刷物和打字的文件上，必须防止滥用简字。希望新闻出版方面和文书工作方面加以注意。使用简字方面存在一些分歧，人们往往以此指责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不错，我们可以批评文字改革委员会，说它对简化汉字的宣传工作做得不够，对简字的分歧现象控制得不好。但是在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应该承认，这种新造简字的现象，是历来就存在的，现在大家公认了的简字，最初也是少数人新造的，今后这个过程也无法停止，而且还会发展。

我们从汉字的历史上来看，一字多体是从甲骨文起就一直存在的。要说是混乱，那么这种混乱是“古已有之”，顶多不过“于今为烈”罢了。这个“于今为烈”的主要原因，在于今天广大群众正在开始掌握文字并且迫切要求改革文字，这是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所没有的。汉字字形演变的总的趋势是简化。由于汉字难写，人民群众不断创造了许多简字。尽管历代的统治者不承认，说它们是“别字”“俗字”，简字还是在民间流行，并且受到群众的欢迎。因此，我们应该说，远在文字改革委员会成立之前，人民群众早已在改革文字，而文字改革委员会的工作，无非是搜集、整理群众的创造，并且经过各方的讨论加以推广罢了。同时，我们也采用了某些日本简化了的

汉字。可见使用简字方面存在的一些分歧并不是汉字简化工作引起的，而《汉字简化方案》的制定，目的正在于把这种分歧引导到一个统一的规范。只有在汉字简化工作方面采取积极的措施，才能逐渐转变这种分歧现象。

此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汉字简化会不会妨碍我国书法的流传和爱好呢？我想是不会的。书法是一种艺术，当然可以不受汉字简化的限制。简字本来主要是用在印刷上的，我们不可能强制大家必须按照《汉字简化方案》写字。因此汉字简化不会对我国的书法艺术有什么不利的影响。同时我们也应当欢迎书法家按照简化汉字书写，以提高简字的艺术水平。

二

第二是推广普通话。我国汉民族的语言还存在着很严重的方言分歧。其中大量的是语音方面的问题。不同地区的人，如果各说各的方言，往往不容易互相了解。甚至在同一个省里，例如闽南人跟闽北人，苏南人跟苏北人，交谈就发生困难。这种方言的分歧，对于我国人民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都带来了不利的影响。北方的干部有时要调到南方去，南方的大学生有时要分配到北方来，沿海城市的工人要去支援内地的工业建设——如果没有一种共同的语言，我们的建设工作就会遭到一定的困难。常常有这样的事情：一个重要的报告，一门重要的课程，由于方言的作梗，大大妨碍了听讲的人的理解。广播和电影是我们的重要的宣传工具，但是由于普通话还没有普及，它们的功效在方言地区不能不受到一定的

限制。解放以来，我国实现了历史上空前的统一，全国人民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为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共同目标而奋斗，人们就越来越感觉到使用一种共同语言的迫切需要。因此，在我国汉族人民中努力推广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的普通话就是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

自从一九五五年十月全国文字改革会议以来，推广普通话的工作已经收到了一些成效。到一九五七年年底为止，全国中小学和师范学校语文教师中已经有七十二万一千人受过普通话的语音训练。全国中小学校中，有很大一部分已经开始用普通话进行教学。全国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举办的普通话语音教学广播讲座的在二百万人以上。据教育部张奚若部长说，他去西安视察，发现西安的一些小学生能说一口很好的普通话。这就说明了只要大家重视这个工作，认真地加以推广，就能够收到成效。我们希望各地教育部门，能在较短期间把中小学语文教师全部训练完毕，好使全国所有的中小学校普遍开始教学普通话。

推广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的普通话，并非要求全体汉族人民都能说得象北京人一样，这样既不可能，也是不必要的。北京语音是个标准，有个标准就有了个方向，大家好向它看齐。但是在具体推广和教学工作中，对不同对象应有不同的要求。比方对广播员、电影和话剧演员、师范学校的语文教师就应该要求严些，对一般人就可以要求宽些，对中年以上的人就可以不必有此一般要求。这样，才能减少推广普通话的阻力，提高大家对学习普通话的信心和兴趣。在什么地方推广普通话？我看首先应该在学校里，在儿童和青年中努力推广。

我们推广普通话，是为的消除方言之间的隔阂，而不是禁止和消灭方言。推广普通话是不是要禁止或者消灭方言？自然不是的。方言是会长期存在的。方言不能用行政命令来禁止，也不能用人为的办法来消灭。推广普通话，要区别老年和青年，要区别全国性活动和地方性活动，要区别今天和明天，不能一概而论。相反地，只会说普通话的人，也要学点各地方言，才能深入各个方言区的劳动群众。

要把六亿汉族人民的方言逐渐统一起来，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必须作长期不懈的努力，才能实现。究竟要多长？就要看交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和我们的工作，但是只要我们不断地认真地工作，这个任务是一定可以实现的。我们应该有这样的信心。我希望大家多做一些宣传工作，造成有利于推广普通话的社会风气。我们还应该随时举办一些普通话演说竞赛，对于普通话说得好的学生、教得好的教师给以奖励。总之，要多用一些办法来宣传鼓励，来改变社会风气，使它有利于普通话的推广工作。

三

第三是制定和推广汉语拼音方案。首先，应该说清楚，汉语拼音方案是用来为汉字注音和推广普通话的，它并不是用来代替汉字的拼音文字。汉语拼音方案的第一个用处，就是给汉字注音。汉字难不难学呢？究竟要不要用拼音字母来帮助学习呢？关于这个问题还有些不同的意见。有人说，“拼音文字并不容易，外国文也有难学的”。这个问题，本民族只能

跟本民族比。我们有了拼音字母给汉字注音，自然比没有拼音字母注音容易。至于外国文，我们学了几十年汉字，再学外国文，自然觉得外国文比汉字难。学别一个民族的文字，总比学本民族的文字要难。俄文比较难学，但是俄国人觉得俄文比英文、德文还容易。拼音文字难易问题，跟本国人学外国文的难易问题是两个不同的问题，不能混为一谈。我看应该承认，汉字是难读难写的，因而也就难记。不要说初学汉字的儿童，就是学了多年的成人，对于不少的汉字也还是不认识，或者要读错。现在我们一方面简化汉字的笔画，另一方面给它注上拼音，目的在于减少汉字的读和写的困难，让它容易为广大群众掌握。利用拼音可以提高汉字的教学效率，这一点已经为过去的速成识字法以及现在小学的先教注音字母^[139]的经验所证明。希望拼音方案经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之后，小学语文课本和北方话区的扫盲课本上就能用来给汉字注音，小学识字教育和文盲扫除工作将得到极大的便利，这是可以断言的。

其次，汉语拼音方案还可以用来拼写普通话，作为教学普通话的有效工具。学习普通话光靠耳朵和嘴巴是不够的，学了容易忘记，必须有一套标音符号，用来编印拼音的读物和注音的字典，供学的人随时查考，不断校正自己的发音，收效才大。过去我们没有一种普遍流行的较为满意的拼音工具，这对于推广普通话的工作是个很大的阻碍。现在因为拼音方案尚未定案，还在使用注音字母。可是注音字母虽然已有四十来年的历史，过去的政府也曾经在小学推行过，但是大多数人学过之后就丢了，至今懂得的人很少。今后我们采用拉丁字

母的汉语拼音字母，这套字母是科学、技术等方面广泛使用的，大家使用和接触的机会很多，学过之后就不容易忘记。因此，采用这套字母，对于推广普通话的工作会有很大的好处。

第三，汉语拼音方案可以作为各少数民族创造和改革文字的共同基础。我国共有五十多个民族，其中有许多民族还没有自己的文字，另外一些民族虽然有文字，但是也需要改进。已有文字的民族中，除汉族用汉字以外，有用藏文字母的，有用蒙文字母的，有用阿拉伯字母的，有用朝鲜字母的，还有用其他各种字母的。这些兄弟民族创造和改革文字的时候，应该采用什么字母作为基础呢？能不能就用汉字作为各民族文字的共同基础呢？过去曾经有人这样试过，没有成功，证明这条路是走不通的。如果几十个民族大家各搞一套字母，这不仅对于各族人民之间的互相学习和交流经验是个障碍，而且印刷、打字、电报的设备势必各搞一套，对于各民族今后在文化教育方面的发展极其不利。许多兄弟民族都表示这样的愿望，就是要同汉族在字母上取得一致，以便于交流文化、学习汉语和吸收汉语的名词术语。前几年，汉语采用什么字母还有些举棋不定，使一些兄弟民族创造和改革文字的工作也受了影响。现在西南地区已经有十几个民族创造了拉丁字母的民族文字，但是他们还是不大放心，因为我们的方案还没有最后定案。因此，汉语拼音方案再不能拖延下去了，否则还要耽误人家的事情。汉语现在既然决定采用拉丁字母作为拼音字母，那就应该确定这样一条原则：今后各民族创造或者改革文字的时候，原则上应该以拉丁字母为基础，并且应该在字母的读音和用法上尽量跟汉语拼音方案取得一致。可以预

料，汉语拼音方案的制定，对于各兄弟民族的创造和改革文字，以及今后各族人民之间的互相学习和沟通，将有极大的利益。

第四，汉语拼音方案可以帮助外国人学习汉语，以促进国际文化交流。由于我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日益提高，在许多国家中，首先是在社会主义兄弟国家和亚非友好国家中，愿意学习汉语的人是越来越多了。他们遭到的最大困难就是汉字，因此常有望洋兴叹之感。现在我们有了汉语拼音方案，就可以用这套字母来编印供各国人民学习汉语的课本、词典和读物，来帮助他们解除这个困难。北京大学的外国留学生专修班采用了汉语拼音方案的第一个草案进行教学，很有成效，说明汉语拼音方案在这方面有很大的优越性，汉字和注音字母是远不能跟它相比的。外国朋友学会了汉语之后，可以仍然依靠这套拼音字母作为注音工具，再进而学习汉字汉文，也一定可以比没有拼音字母容易得多。这是汉语拼音方案在促进国际文化交流方面的功用。

此外，汉语拼音方案还有其他方面的各种用处，例如可以用来音译外国的人名地名和科学技术术语，可以在对外的文件、书报中音译中国的人名地名，可以用来编索引，等等。

从汉语拼音方案的上述各项功用看来，我们说汉语拼音方案的制订是中国人民文化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是不算夸大的。

中国文字从甲骨文算起，到现在已经有三千四五百年的历史。三千多年来，汉字曾经经历过许多变迁：字形简化了，新字增加了，一部分旧字被淘汰了。初期的汉字是象形字，之

后产生了许多形声字，或称谐声字——我们现在使用的字，大多是形声字。但是由于古今语音的演变，许多形声字的声符已经失去了标音的作用，例如“江”、“河”，已经不念“工”、“可”。因此，正如鲁迅所说，汉字变成了“不象形的象形字，不十分谐声的谐声字”〔140〕。既然字面上不容易看出它的音，就不得不另行设法补救。一种办法是“直音”，就是用甲字来注乙字的音，也就是用同音字互相注音。这个办法常常会碰到困难：有时候一个字就没有跟它同音的字，或者虽然有同音的字，这个字恰巧是个冷僻字，注了等于不注。另外一个办法是“反切”，就是用两个字来拼切一个音，上字取声，下字取韵。反切的发明可以说是拼音的萌芽。但是由于我国各地语音出入甚大，常常两个字在甲地读音相同，在乙地就有不同的读音，这种情况就更增加了直音和反切发生分歧差错的机会。尤其是无论直音或者反切，都须先认识不少字，因此对于初学文字的儿童和成人都是很难掌握的。辛亥革命〔73〕之后，产生了注音字母，这是中国第一套由国家正式公布并且在中小学校普遍推行过的拼音字母。注音字母对于识字教育和读音统一有过一定的贡献。尽管今天看来，注音字母还有不少缺点（例如，作为各少数民族文字的共同基础和促进国际文化交流的工具，注音字母显然远不如拉丁字母），但是注音字母在历史上的功绩，我们应该加以肯定。对于近四十年来的拼音字母运动，注音字母也起了开创的作用。现在这个汉语拼音方案，它的主要功用之一是为汉字注音，在这个意义上，汉语拼音方案正是继承了直音、反切和注音字母的传统，在它们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汉语拼音方案历史发展的另外一个方面，即：采用拉丁字母为汉字注音，已经经历了三百五十多年的历史。一六〇五年，来中国的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最初用拉丁字母来给汉字注音。一六二五年，另外一个法国传教士金尼阁又用拉丁字母给汉字注音的办法著了一部《西儒耳目资》。他们的目的是为适应外国人学习汉语汉文的需要。鸦片战争〔141〕以后，帝国主义国家派来中国的商人和传教士愈来愈多。他们为了学习汉语和传播宗教的需要，拟订了许多不同的汉语拼音方案，其中影响最大的有所谓邮政式〔142〕和威妥玛式〔143〕。他们还用拉丁字母拟订了我国各地方言的拼音方案，其中如闽南的白话字（即厦门话的拉丁字母拼音方案）影响最大，曾经出版过许多书籍。据说至今厦门一带还有很多人懂得这个方案，许多侨眷还用这套拉丁字母跟海外的亲属通信。从一八九二年卢戇章的切音新字〔144〕开始，当时我国的许多爱国人士也都积极提倡文字改革，并且创制各种拼音方案。一九二六年产生了由钱玄同、黎锦熙、赵元任等制订的国语罗马字〔145〕，至一九二八年由当时南京的大学院正式公布。接着，一九三一年产生了由瞿秋白、吴玉章等制订的拉丁化新文字〔146〕。拉丁化新文字和国语罗马字是中国人自己创造的拉丁字母式的汉语拼音方案中比较完善的两个方案。在谈到现在的拼音方案的时候，不能不承认他们的功劳。

现在公布的汉语拼音方案草案，是在过去的直音、反切以及各种拼音方案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从采用拉丁字母来说，它的历史渊源远则可以一直追溯到三百五十多年以前，近则可以说是总结了六十年来我国人民创制汉语拼音方案的

经验。这个方案，比起历史上存在过的以及目前还在沿用的各种拉丁字母的拼音方案来，确实更加完善。自从一九五六年二月由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发表了第一个草案以后，曾经经过全国政协和各地政协委员会所组织的各方面人士的广泛讨论，又经国务院成立的汉语拼音方案审订委员会反复审议和多次修订，去年十月间复经全国政协常委会扩大会议讨论，才于十一月一日由国务院全体会议第六十次会议通过，并决定登报公布，准备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下次会议讨论和批准。人们从这里不难看出，政府对于这个问题是采取了负责的和慎重的态度的，决不是少数人关起门来搞的。

汉语拼音方案采用了拉丁字母，这是不是会跟我国人民的爱国感情相抵触呢？为什么我们不能自创一套字母或者就沿用注音字母呢？从一九五二年起，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曾经用了近三年的功夫从事于自创字母（包括修订注音字母）的工作，没有能够得到满意的结果，最后才决定放弃，采用拉丁字母。现在世界上有六十多个国家采用拉丁字母来作为书写语言的符号。例如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荷兰、丹麦、瑞典、挪威、阿尔巴尼亚、匈牙利、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越南、印度尼西亚以及苏联的三个加盟共和国——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都是用的拉丁字母。他们接受了拉丁字母之后，都对它作了必要的调整或者加工，使它适应本民族语言的需要，因此都已经成为各个民族自己的字母了。另一方面，拉丁字母也因此确实可以说不是哪一个国家专有的字母，而是国际公用的符号。我们不能说法国人用的是英文字母，正象不能说英国人用的是法文字母一样。我们只能

说：法国人用的是法文字母，英国人用的是英文字母。同样，我们采用了拉丁字母，经过我们的调整使它适应了汉语的需要之后，它已经成为我们自己的汉语拼音字母，已不再是古拉丁文的字母，更不是任何一个外国的字母了。字母是拼写语音的工具，我们用它来为我们服务，正象我们采用火车、轮船、汽车、飞机（从来源来说，这些东西也都是外来的）来为我们服务一样，正如我们采用阿拉伯数字来计算，采用公历来纪年，采用公里来表示距离，采用公斤来表示重量一样。因此，这是不会使我们的爱国感情受到任何损害的。

除此以外，还有一个问题是大家都关心的，就是汉字的前途究属如何的问题。汉字在历史上有过不可磨灭的功绩，在这一点上我们大家的意见都是一致的。至于汉字的前途，它是不是千秋万岁永远不变呢？还是要变呢？它是向着汉字自己的形体变化呢？还是被拼音文字代替呢？它是为拉丁字母式的拼音文字所代替，还是为另一种形式的拼音文字所代替呢？这个问题我们现在还不忙作出结论。但是文字总是要变化的，拿汉字过去的变化就可以证明。将来总要变化的。而且可以说，世界各个民族的文字形式将来总有一天会逐渐统一，甚至语言最后也会逐渐统一。人类的语言文字发展的最后趋势是逐渐接近，到最后也许就没有多大区别了。这种理想不是坏的，而是好的。至于用什么方案，现在不忙把它肯定。关于汉字的前途问题，大家有不同的意见，可以争鸣，我在这里不打算多谈 因为这不属于当前文字改革任务的范围。

*

*

*

以上所说是政府所推行的当前文字改革工作的三项任

务。我们希望，当前文字改革的工作能够得到大家的支持。文字改革是关系到全国人民的一件大事，政府对它采取的步骤是很慎重的。我们愿意尽量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好集思广益，大家一起来努力做好这项工作。工作中如果有缺点，我们就改正，这是我们党和政府进行各项工作的方针，对于文字改革工作也是这样。关于文字改革，过去的宣传工作做得很差，因此有许多人还不了解，甚至有不少误解。希望大家来做宣传，消除这种误解。希望大家积极支持文字改革工作，促进这一工作而不要“促退”这一工作，好使中国文字能够稳步地而又积极地得到改革，以适应六亿人民摆脱文化落后状态的需要，以适应多、快、好、省地发展社会主义事业的需要。

把知识和经验留给后代^{*}

（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九日）

这是个别开生面的会，只请了年满六十岁的政协委员参加。陈毅和彭真两位副主席例外，他们是“候补老人”。我也只有到今年才敢召开这个会，因为今年刚过六十岁。陈毅同志喜欢用《秋江》里的一句台词，说过了六十岁又是一个新花甲。老道理新解，很好。

这几天我参加了政协分组会，见大家精神很饱满，在新中国大家都获得了新生。现在六十岁以上的委员有三百八十三人，占全体委员的三分之一还多。老年人占的比例很大也证明我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扩大了。老年人得到了新生是可喜的事，但也要辩证地看问题。按照自然规律，人满了六十岁，今后的日子总是比中青年人少一点了。有些人不服老，我就是其中的一个，但有时熬夜多了就会出点小毛病。陈叔老^{〔147〕}也不服老，最近得了流行性感冒以后，才说服老了。老年人不能和充满生命力的年轻人比，但要做到人老精神不老。据说过去中国人的平均寿命不超过四十岁。现在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条件改善了，医疗卫生条件也比旧社会好得多，大家精神愉

^{*} 这是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举行的茶话会上的讲话。

快，长寿的人也越来越多。希望大家在新社会多活几年，多做些事，即使多看几年也是好的。

在分组会上听了几位老先生的发言，很有感触，觉得有必要和大家谈谈工作安排的问题，希望过了六十岁的委员都能把自己的知识和经验留下来，作为对社会的贡献。这是从已故的程砚秋〔134〕同志那里得到的启示。程砚秋同志的艺术修养很高，解放后在政治上和作风上也有很大进步，但总还是有点孤僻。在旧社会，他是孤身奋斗出来的，养成了洁身自好的习气，不大收徒弟，因此他的唱腔也就流传不广。解放以后，我曾劝他收徒弟。今年纪念他逝世一周年时，算了一下，他的徒弟不过十几个。程派唱腔又难学，徒弟们还没有学得好，他就去世了，录下来的唱片也不多。从这个问题联想到，凡有一技之长的老年人，总是多给社会留下一些东西好。

在座的委员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有具体工作岗位的，担任着科学、医药、工程、教育等方面的工作。这部分同志很忙，有的连写东西的时间也没有。老舍〔116〕同志有一次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将”了我一“军”，要求给他安排些时间搞业务。对这部分同志要加以照顾，不要弄得太紧张。高龄的委员精力集中使用，工作的年头可以更长一些。到各地视察既是政协委员的权利，也是他们的义务，但是要量力而行，有的可以不去，也可以就近视察。这次张文白〔148〕先生提出在北京附近视察，我们就赞成。以后，可以把老年人组织在一起视察，少看多休息，不能和年轻人一样对待。另一种是年老体弱没有具体工作岗位的，但他们都有一定的知识和经验。过去这方面的工作组织得不好，没有能使他们的力量发挥出来。许

多人在历史、科技、文化、艺术或其他方面是有研究的，如果自己不能动笔，可以带徒弟写点东西。

我们都是过六十岁的人了，至少是戊戌年出生的。戊戌以来是中国社会变动极大的时期，有关这个时期的历史资料要从各方面记载下来。在座的都经历过四个朝代：清朝、北洋军阀政府〔6〕、国民党政府和新中国。新中国成立以前的史料很值得收集。时间过得很快，开国至今已经十年了，如果不抓紧，有些史料就收集不到了。五四运动〔39〕距今才四十年，那时候的事情现在的青年们已经不大了解了，对甲午战争〔34〕、戊戌变法〔149〕的情况他们就更不熟悉了。现在当然首先要研究现实问题，反映新的情况，但对过去的东西也需要研究，新的东西总是从旧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过去编的府志、县志，保留了许多有用的史料。收集旧社会的典型事迹也很有价值，如近百年来有代表性的人物、家庭和家族的情况就值得研究，看看他们是如何产生、发展和衰亡的。那些典型人物，他们所代表的那个社会虽然灭亡了，有的本人也死亡了，但事迹可以作为史料记载下来。我国大小凉山有过半奴隶制，现在已经进行了民主改革。西藏是农奴制，再过几年也要改革的。有些东西不赶快记载下来就会消失。从最落后的到最先进的都要记载下来。要勇于暴露旧的东西，五四时代就提倡叛逆精神。一个人的转变不是偶然的。我如果有时间，也愿意写点东西暴露自己的封建家庭。对袁世凯〔43〕我不熟悉，谁要写蒋介石的历史，我还可以供给一些资料，两次国共合作我和他来往不少。暴露旧的东西，使后人知道老根子，这样就不会割断历史。人们都赞扬我国的古代文化，其中就包括很丰富的历史记载，不

仅有正史，还有野史、笔记等。汉文在这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我们要把自己所掌握的历史遗产贡献出来。

顾颉刚〔150〕先生说他想做些考据，但是政治运动很多，虽然有所得，却把时间都占了，在考据方面的贡献就少了。做考据工作只靠个人不行，要组织起来，也可以带点徒弟。

写东西不一定只限于文化史。在座的有搞军事的，可以写军事史，如从八旗〔151〕、绿营〔152〕、湘军〔153〕、淮军〔154〕、新军〔155〕一直到国民党军队的发展史，都可以写。在座的还有不少工商业者，可以写我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史，也可以写其中的一个行业，如银行、纺织业等。其他如政治史、经济史、外交史也都可以写。

政协是联系各方面的，要注意组织这项工作。全国政协要开常委会，成立工作组，其中有收集历史资料的组。各位委员回去，可以利用地方政协和文史馆两个机构做做这项工作。在具体做法上要从容一点，不要象青年人那样，喜欢放“卫星”〔156〕，也不要规定一个月写多少字，有精力的时候可以多做些。收集史料的工作一定要从容一点。

昨天有两个黄埔军校〔157〕的朋友讲起三二〇事变〔158〕和皖南事变〔159〕，听起来很有味，但我因有事只听了一个半小时就告辞了。有些朋友的观点不一定正确，那可以共同研究，但先要把史料记载下来。例如昨天两个朋友讲的三二〇事变的情况就可以补充已有史料的不足。他们说，在事变发生前一星期蒋介石想走。乍一听不容易理解，这次事变是蒋介石向共产党的进攻，怎么他又想跑走呢？青年人听了根本不会相信，但根据蒋介石一贯的作风来看，这是可能的。蒋介石在陈

炯明^{〔160〕}、孙中山手下时都曾拂袖而去。在黄埔军校时他同苏联顾问闹翻了，也是走了又请回来的。他当权后，这种事又有过三次：一九二七年下野去日本，一九三二年一二八淞沪抗战前躲回奉化，一九四九年和平谈判时退居幕后要李宗仁代总统。他常以退为进。三二〇事变前他可能想走，等到摸清我们毫无戒备的时候，就大举进攻。历史是曲折的。我早说过蒋介石是最好的反面教员。蒋介石这一集团是有些东西可写的，在座的不少人熟悉这方面的情况。

今天梁思成^{〔161〕}先生没有来，康同壁^{〔162〕}先生来了，他们二位如果对维新派^{〔163〕}有兴趣也可以写。去年学术界对戊戌变法作了评价^{〔164〕}，也还可以重新估量。国外有专门研究戊戌变法的，但我国研究这个问题的人很少。

现在先提一提这件事，大家好作安排，具体的组织工作由政协常委会秘书处与各方面联系。

上面这些话可能对六十岁以上的人有些用，所以耽误大家不少时间。

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

（一九六〇年七月十四日、十五日）

中央常委要我讲一下国际关系，主要是共产国际〔165〕和我们党的关系。

我先概括地讲六点看法：

一、共产国际的成立和解散，都是必要的。共产国际从成立到解散共存在二十四年（一九一九——一九四三），三个八年。毛泽东同志说它是两头好，中间差。两头好，也有一些问题；中间差，也不是一无是处。共产国际的成立，当然是必要的。它对各国党的建立和成长起了很大的作用。后来各国党成长了，成熟了，共产国际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共产国际在建立的初期，阐明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理原则，推动了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那时，尽管列宁有那么高的威望，但共产国际是民主集中地决定问题的，各国党的代表可以纷纷议论，各抒所见，非常活跃。共产国际划清了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的界限，也批判了“左”派幼稚病，发扬了国际主义精神，动员了各国革命人民拥护苏联，支持了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和民族革命运动。

^{*} 这是在中共中央于北戴河召开的省、市、自治区委书记会议上所做报告的节录。

共产国际的解散也很适时。一九三五年，共产国际作了一个决议，说对各国党的内部事务不要去干涉，以后也的确放手了一些。但是这时，共产国际的存在还需要，它在反法西斯和建立统一战线的斗争中起了积极的作用。苏德战争爆发之后，到了一九四三年六月，共产国际就解散了。

共产国际的缺点和错误，特别在中期的缺点和错误，概括地说是：一般号召不与各国实践相结合，具体布置代替了原则的指导，变成了干涉各国党的内部事务，使各国党不能独立自主，发挥自己的积极性、创造性。

这是对共产国际的一个粗浅的总评。

二、各国的革命和建设，要靠各国人民自己的实践。只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本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才能使马克思列宁主义得到补充和发展。要在实践中总结自己的正面和反面的经验。中国党的经验很丰富。中国党虽然犯过几次“左”的和右的路线错误，但也有很重要的正面的经验。

三、各国的革命和建设，要靠各国党自己独立思考。只有独立思考，才有可能避免国际的坏的经验在本国重犯，使国际的好的经验在本国得以发展。据我所了解，不独立思考、盲从迷信的人是很多的，破除迷信、独立思考是很不容易的。当然独立思考并不等于狂妄自大，唯心武断，拒绝国际提出的好的意见。陈独秀^{〔40〕}是狂妄自大、唯心武断的。李立三^{〔166〕}同志也是这样，他提出夺取武汉，争取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一省数省的胜利就是全国胜利的开始；打下武汉再和共产国际算帐；中国革命起来了，要苏联出兵；中国革命胜利，英、美、

法等国的资产阶级都要濒于末日，世界革命就会起来。现在立三同志看一看这些话，他自己也会发笑的。

四、各国的革命和建设，要靠各国自己独立自主和自力更生。毛泽东同志说，两个大国的革命胜利，即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和中国革命的胜利，都是在没有共产国际的时候取得的。在现在的情况下，成立国际组织，相互间总是不容易做到平等。不仅在政治上，就是在经济上也是如此。

五、研究国际的经验，要全面地看问题。斯大林管事的时间长，缺点错误多一些，但是在斯大林那个时期也并不都是不好的。就是在共产国际中期和斯大林的晚年，他也是支持革命的多，不许革命的少。我们顶一顶，他还是可以接受一点意见，也可以含蓄地承认一点错误。他的怀疑一经实践证明不对，看法也可以改变。例如他怀疑我们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怀疑我们对于帝国主义不斗争，一到抗美援朝〔26〕，他的看法就改变了。斯大林还是讲理的。当然，斯大林在中国革命问题上有错误，但中国革命中的错误主要应该由中国同志负责，犯不犯错误主要还是决定于我们自己。我们过去犯的错误已经认识了，纠正了，革命已经胜利了。

六、团结高于一切，国际主义万岁。这是原则，过去如此，现在也应该如此。所谓团结，是在原则基础上的团结。有分歧，我们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适当的批评或斗争，在新的基础上达到团结。同时批评要注意场合，要心平气和，摆事实，讲道理。如果批评或斗争都不生效，也需要等待，需要时间。中国党在这方面有很丰富的经验。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八年中犯了三次“左”倾错误〔167〕，从遵义会议〔92〕开始

到七大〔15〕，经过十年之久才解决了问题。一个党如此，何况国际？我们要举团结的旗帜。这主要是对于苏联千百万党员、两亿人民，各兄弟党的党员，世界上百分之九十以上要革命的人民。

下面分几个时期讲一讲共产国际和我们党的关系。

（一）共产国际的初期（一九一九年三月——一九二七年七月）。

这个时期，共产国际的工作对于中国革命，还是有益的多。当然，也有个别的原则问题的错误。

一九一九年三月共产国际成立后，就派人到各国访贤，做工作。在中国，他们不仅找了陈独秀、李大钊〔48〕，还找过江亢虎〔168〕、黄介民〔169〕和戴季陶〔170〕；在北方找过吴佩孚〔171〕，在南方找了孙中山。中国有五四运动〔39〕的基础，在共产国际的帮助和推动下，很快成立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党很快地走到了群众斗争中去。这时共产国际讨论中国问题的次数也逐渐多起来了。一九二〇年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一九二一年的第三次代表大会，都讨论了东方革命问题。一九二二年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认真讨论了中国革命问题，以后就大量吸收中国的知识分子到莫斯科去学习。一九二三年共产国际作了关于国共合作的决议，决定中国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同时共产党保持自己的独立性；还讨论了中国搞土地革命的问题，并发来了指示。一九二三年六月，中共召开三大〔172〕。当时党内有“左”的和右的两种思想：一种以陈独秀为代表，认为中国现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种革命应该由资产阶级领导，无产阶级只是帮忙，民主革命中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问题

根本没有提；一种以张国焘〔173〕为代表，认为中国共产党员只能少数人加入国民党，工人不能参加。实际上，这两种思想都是不要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党的四大的决议对这两种思想都批评了，但是并没有解决问题。现在看来，批评也没有重点。当时群众斗争已经轰轰烈烈地开展了，但是在陈独秀机会主义的领导下，在关键问题上掌不好舵。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时，国民党内的右派已经比过去嚣张得多，如西山会议派〔174〕。但在此以前广东打商团〔175〕，东征陈炯明〔160〕等等，左派力量大大发展。当时的政策应该是支持左派，排斥右派，这是有可能实现的。但陈独秀却要让右派回去，并且要保证他们在国民党二大上当选，结果右派的气焰高涨。在军事上，我们也让步。蒋介石进攻，我们党没有警惕，他制造了三月二十日的中山舰事件〔158〕，把我们党在军队中的力量搞掉了一部分。当时我们并不是没有力量，应该反击，但是没有反击。结果使我们党在军队中的力量仅仅留下了一个独立团〔176〕，这个团到了武汉发展成两个师。北伐的时候，我们应该争取群众，争取军队。可是，这边北伐，那边上海的《向导》反映陈独秀的主张，反对北伐，说现在是军阀战争，广东不应该北伐，应该防御，应该搞群众斗争。我们党放弃了对北伐战争的领导。土地革命轰轰烈烈起来了，毛泽东同志的文章〔177〕出来了，但是党中央不支持。当时，陈独秀的确是有点怕革命，怕群众。当时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也对中国问题作了一些不正确的分析，六、七、八三次会议对我国阶级力量的分析都有错误。特别是一九二七年五月第八次会议，认为资产阶级都叛变了。到了武汉政府叛变〔178〕之后，共产国际又认为，小资产

阶级也离开革命了。在领导权问题上，一九二四年国共合作的时候，无产阶级的领导已经有了雏形，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召开，共产党已经起了领导作用。本来我们应该在广东革命政权的时候就抓军队，而且这是完全可能的，但是党中央在那个时候放弃了领导权。这时列宁去世了，斯大林跟他们党内的反对派斗争很激烈，对中国革命的情况不大了解，方针也不大明确。当时我国革命的中心在广东，党的中心也应该在广东才好领导。但是党的中心在上海。请陈独秀到广东去，他也不去。两个中心常常发生矛盾。直到打下武汉很久，党的中心才移到武汉。所以，第一个时期还是中国党的领导人应负更多的责任。那时，毛泽东同志的威信还没有建立，也不可能建立。当时党的领导人员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水平也不高，还有各种派别性，陈独秀的家长制作作风更助长了派别性，这就影响了党在政治、思想上的发展。

（二）共产国际的中期（一九二七年七月——一九三五年七月）

这个时期，共产国际基本上是错误的，对我们中国党影响最大。一九二七年七月，武汉政府叛变革命，陈独秀投降主义路线破产。在这样一个紧要关头，七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给中央来信。这封信强调了革命的前途，而对革命的动力和阶级关系分析得不正确，说中国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都叛变了。对革命的任务，提出了七条：第一，退出武汉政府；第二，发表宣言；第三，不要退出国民党，在国民党内搞左派；第四，工人斗争；第五，武装工农；第六，党可能转入地下；第七，反机会主义。这七条，对搞军队、搞地方政权和深入土地

革命没有重视，而当时恰恰应该是搞军队、搞地方政权和深入土地革命。

反对陈独秀的机会主义，联系到组织问题。共产国际派来的鲍罗廷〔179〕直接干涉中国党的内部事务，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组织了一个临时中央常委。这是仓促通过的。七月十三日中央有个声明，只提了退出武汉政府。当时我们党还有一点武装力量，如叶挺的部队〔180〕，所以决定举行南昌起义〔181〕。南昌起义的目的是南进汕头，占领海口，然后到广州。南昌起义本身是正确的，但在领导思想上有错误：单纯军事行动，中心是城市观点，没有跟当地农民结合起来建立根据地的思想。当时，共产国际派了几个人来，在罗米那兹〔182〕的指导下，在汉口召开了八七会议〔183〕。八七会议在反对机会主义这一点上是痛快淋漓的，但在怎样跟土地革命结合起来，深入群众斗争，建立军队、政权、根据地这些重要问题上没有作出正确的总结和指示，没有提出明确的任务。张太雷〔184〕到汕头给我们传达八七会议，只批评了机会主义，没有提出如何做的问题。我自己当时是城市观点，没有从上海起义和南昌起义中取得经验，上山搞农村斗争。

中国革命失败，反对派攻击斯大林更凶。斯大林在一九二七年，连写了几篇文章〔185〕驳反对派，其中对中国革命的理论的分析，形势的估计，许多是不合实际的。他认为中国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先后都离开革命阵营了，但是中国的革命高潮很快就要到来，并且有很快转入社会主义革命的趋势。在共产国际、斯大林的理论分析和形势估计的影响下，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党中央扩大会议就搞了盲动主义，号召到处暴动，

认为革命形势还是高潮。在组织上，处分了不少人，最主要的是开除谭平山〔186〕，对毛泽东同志和我们这些人都有处分。十一月中央会议决定组织广州暴动〔187〕，也没有明确的方向。参与指导广州暴动的有一个德国人，还有一个苏联人。广州暴动失败，太雷同志牺牲后，中央把立三同志派到香港去领导广东的工作，这时是盲动主义的最高峰。盲动主义在广东搞得最厉害，广东干部牺牲得最多。当时的路线，根本没有接受上海、南昌、广州暴动的教训，仍然要到处搞暴动，结果使革命力量特别是白区革命力量受到了很大损失。当时在组织上还搞了一条，叫作领导干部工人化，使领导机关更加混乱，宗派性增加了。这个根也是从共产国际的指示来的。

现在讲一下中共六大〔188〕。六大是根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九次全会的决议召开的。中共有一个代表团，其中有向忠发〔189〕等人，出席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九次全会。六大的召开，首先去的代表就有问题。当时强调工人化，在七十五个代表中，有四十一一个工人，后来叛变的十六个代表中，有十四个工人。当时共产国际指导六大工作的人，一个是布哈林〔190〕，还有一个法国同志，还有陶里亚蒂〔191〕，但做实际工作的是米夫〔192〕。在选举中央委员的时候，只强调工人成份，中央委员二十几个人中，很多是工人，而当时党内真正有威信的同志有些没有被选入。会后，瞿秋白〔193〕、张国焘留莫斯科做共产国际执行委员。六大的决议，对中国革命的性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任务（反帝反封建）等的分析是正确的，但是对于阶级关系等问题则作了不正确的分析，认为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都叛变革命了。在土地问题上，只提了没收

地主阶级的土地交农民代表会议处理；对军事问题没有强调指出。六大后，中山大学里以王明^{〔194〕}为首的宗派，集中力量反对驻共产国际的中共代表团。中山大学是一九二五年在莫斯科创办的，米夫做副校长，吸收了大革命时期党的一些干部和青年去学习，其中有王明这么一些人，还吸收了国民党的一些左派。在中山大学内，宗派斗争很厉害。六大后，中山大学的宗派斗争继续发展。王明宗派反对中国代表团，实质是反对党中央，认为中国党的中央不行了，要换人。到了一九二九、一九三〇年，再加上联共（布）清党的影响，就搞得更混乱了，对有一点可疑的就开除，还流放了一部分。

六大以后，共产国际派了一个波兰同志和一个德国同志来中国。到了一九二九年，共产国际陆续来了四封信。第一封信的内容是反右倾，第二封信的内容是反对联合富农，第三封信的内容是赤色工会公开，第四封信的内容是反改组派（汪精卫、陈公博）^{〔195〕}和第三种力量。这四封信，对立三路线都有影响。第四封信就号召中国搞政治罢工，准备革命，说直接革命形势快到了。

我一九三〇年三月动身去共产国际。七月，我见了斯大林，斯大林对在中国进行的军事斗争很重视。当时产生了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秘书处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共产国际的决议还附了东方部的六个决议^{〔196〕}。斯大林说，这么多决议拿到中国太多了，作为草案拿去吧。国内，六月十一日产生了立三路线。立三路线提出，要争取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一省数省的胜利就是全国革命的开始。同时在全国布置暴动，并提出夺取武汉、南昌、长沙等大城市的计划。后来打下了长

沙，于是在八月一日、三日，在上海连着开了两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立三说，打下武汉再和共产国际算帐。立三路线持续时间只有三四个月，但使很多地方的党组织受到很大损失，所以，九月就开了三中全会。三中全会还有“左”的东西，因为三中全会是传达共产国际上述决议案的。会上，向忠发和我做了报告，秋白做了结论，立三发了言。会上对立三的批评很尖锐，不过后来在会议决议上写的并不那么尖锐。三中全会在组织上也有些错误，例如批评了何孟雄〔197〕，也批评了陈绍禹（王明），这些批评，也有对的，也有错的。三中全会补了一批中央委员，就是没有补何孟雄，其实那个时候他的意见还是对的居多。向各地派“钦差大臣”，从三中全会就开始了。当时，共产国际说中共中央不重视苏区，所以中央就往苏区派了不少人，使苏区受到了影响。

一九三〇年十月共产国际来信，说中央不对，是调和路线。王明他们就闹起来了。米夫一来，更造成了党内的危机。王明写了小册子〔198〕，要求中央召开紧急会议，撤换中央的领导。所以，召开了四中全会。四中全会，我们起草了决议，不被采用，米夫自己起草了决议。三中全会是贯彻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秘书处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的。四中全会也是根据这个决议案的，再加上国际的信，用极左反对立三路线的“左”，作了决议。四中全会后，王明的小册子更加发挥了作用。他站在更“左”的立场来反对立三的“右倾”和三中全会的“调和路线”，形成了更“左”的路线，再加上中央几个负责人叛变，使我们党受到了很大的破坏。

一九三一年八月，米夫回去了。共产国际的八月决议批

评了三中全会，说四中全会后，中国党更加健全了。实际上，四中全会后，中国党更加混乱了。四中全会把我保留在政治局，把秋白去掉了。以后，王明到了共产国际，张国焘、陈昌浩〔199〕到了鄂豫皖苏区，我到了中央苏区。当时，中央只留少数人，多数派到各地去，抓各地的权。在上海组织了一个临时中央。这个临时中央，共产国际是批准了的。临时中央有一个关于九一八事变的决议，一九三二年一月又有一个争取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当时要求争取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要求攻打中心城市，对于正确的同志，如毛泽东同志，刘少奇同志，指责他们“右倾”。宁都会议〔200〕以后，毛泽东同志对军队的领导被取消了。一九三三年又反对罗明路线〔201〕，反对邓、毛、谢、古〔202〕，正确的同志都受到打击。搞得最凶的是江西，因为临时中央一九三三年初到了江西，执行国际路线。结果使党在白区的力量几乎损失百分之百，苏区的力量损失百分之九十。当时在军事上有个李德〔203〕，他虽然是个顾问，却成了太上皇，他说了算。他和博古〔204〕的军事路线相合，一直搞到遵义会议。当时的军事路线执行的结果是退出江西，被迫长征。现在看来，当时不退出江西是不可能的。到了遵义会议，毛泽东同志才在军事上纠正了错误路线，挽救了中国革命。没有遵义会议，中国革命不知道要推迟多久。有了遵义会议，虽然长征中受了损失，又遇到了张国焘分裂党另立“中央”，但是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战胜了狂风巨浪，克服了党内的危机。

共产国际对中国党的指导在中期是有很大错误的。中国党在这个时期犯了那么多错误，使中国革命受到了那么大的

损失，我们中国人当然要负责，但与共产国际有很大的关系。

（三）共产国际的后期（一九三五年——一九四三年）。

这个时期，中国党与共产国际联系少了。一九三五年七八月，共产国际召开了第七次代表大会。斯大林更多地注意国内问题，共产国际由季米特洛夫〔205〕领导。当时通过了一个决议，说国际执委会要把工作重心转到规定国际工人运动基本政治路线及策略路线方面去，一般不干涉各国党的内部事务。当时，共产国际搞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和中国搞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相合。西安事变〔206〕张学良、杨虎城把蒋介石抓起来，共产国际公开说张是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抓蒋介石是适应日本的要求。这个判断是完全错误的。西安事变，我们处理得还是比较好的。

这个时期，中国党由毛泽东同志当家了，但是共产国际对我们中国党还有影响。主要的问题是第二次王明路线〔207〕。一九三七年年底王明从共产国际回来，说他跟斯大林谈过话。他打着共产国际的招牌，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说国民党和共产党都是中国优秀青年的总汇。王明回来后，主持了长江局，蒙蔽了一批人，搞了第二次王明路线。第二次王明路线虽然时间不长，但对北方，对新四军，对上海，都有影响。第二次王明路线与共产国际不无关系。斯大林信任王明，季米特洛夫和王明的关系也好。后来我去莫斯科对季米特洛夫谈王明的错误，季米特洛夫听了还表示惊讶。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在我们党内形成了一个新的局面。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批判王明，很多干部逐渐觉悟了，王明就逐步地孤立了。当时蒋介石也不要王明，连个部长都没有给他当。毛泽东同

志说，要是给他一个部长当，也许情形更坏。

一九三九年，希特勒德国发动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打起来了，由于苏德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资本主义各国党处境很不利，思想也很混乱。毛泽东同志九月一日有个《关于国际新形势对新华日报记者的谈话》〔208〕，我把它带到共产国际，发给各兄弟党。共产国际很称赞，说中国党领导正确，给了他们很大支持。

在这个时期，共产国际对我们党的内部事务还是有些干涉，甚至在组织上也还有些干涉。但这个时期比共产国际初期对我们党的干涉少，比中期就更少。后来战争打起来，对我们党的干涉就很少了。我们中国党这时已经成熟，和共产国际的来往不多了。到了一九四三年，共产国际就解散了。

加强调查研究

(一九六一年三月、五月)

调查研究,实事求是^{*}

(一九六一年三月十九日)

毛泽东同志这篇关于调查工作的文章〔209〕,讲的是世界观,也是方法论。我们要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读它。这篇文章现在读起来,还是对症下药的。毛泽东同志一向提倡调查研究和实事求是。从延安整风〔14〕到七大〔15〕,到全国解放,我们发扬了这种精神,取得了全国胜利。进城以后,特别是这几年来,我们调查研究较少,实事求是也差,因而“五风”〔210〕刮起来就不容易一下子得到纠正。

毛泽东同志最近几次讲到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讲究实事求是;又说,右要反,“左”也要反,有“左”就反“左”,有右就反右。是好是坏,要从客观存在出发,不能从主观想象出发。进行调查研究,必须实事求是。我们下去调查,必须对事物进行分析、综合和比较。事物总存在内在的矛盾,要分别主次;总有几个侧面,要进行解剖。各人所处的环境总有局限性,要从

^{*} 这是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中南、华北小组会上的讲话节录。

多方面观察问题；一个人的认识总是有限的，要多听不同的意见，这样才利于综合。事物总是发展的，有进步和落后，有一般和特殊，有真和假，要进行比较，才能看透。下去调查，要敢于正视困难，解决困难。一个困难问题解决了，新的困难问题又来了。共产党人就是为不断克服困难，继续前进而存在的。畏难苟安，不是共产党人的品质。

我们下去调查要坚守毛泽东同志的三条原则：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集中起来，坚持下去；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这就是民主集中，它不但是组织原则，也是工作原则。智慧是从群众中来的，但对群众的意见领导方面还要加工，然后回到群众中去考验，在这基础上再加工。脱离我们的基本阶级群众，就会丧失党的基础。尾巴主义，随着群众跑，就会放弃党的领导。目前的毛病，还是我们发号施令太多，走群众路线太少。

关于食堂和评工记分等问题的调查*

（一九六一年五月七日）

主席给李井泉和陈正人同志的信〔211〕六日早上我就看到了。我到邯郸之后，听了三天汇报，就到武安县伯延公社，现在已经有五天了。五天中，我找了公社、大队、生产队的干部和社员群众谈了话，开了座谈会。现在有下面四个问题简要地向主席汇报一下。

* 这是在河北省邯郸地区农村调查期间给毛泽东的电话汇报记录。

(一) 食堂问题。绝大多数甚至于全体社员，包括妇女和单身汉在内，都愿意回家做饭。我正在一个食堂搞试点，解决如何把食堂散好和如何安排好社员回家吃饭的问题。

(二) 社员不赞成供给制，只赞成把五保户^{〔212〕}包下来和照顾困难户的办法。现在社员正在展开讨论。

(三) 社员群众迫切要求恢复到高级社^{〔84〕}时评工记分的办法，但是已有发展。办法是：包产到生产队，以产定分，包活到组。这样才能真正实现多劳多得的原则。因此，这个办法势在必行。只有这样，才能提高群众的生产积极性。

(四) 邯郸专区旱灾严重，看来麦子产量很低，甚至有的颗粒不收，棉花和秋季作物还有希望。目前最主要的问题是恢复社员的体力和恢复畜力问题。

我明天还要看一个食堂，八日返回北京，帮助陈总^{〔213〕}解决出席日内瓦会议^{〔214〕}的一些问题。以后再给主席写报告。问题解决了之后，我还要返回邯郸。

我到邯郸之前，已经派许明^{〔215〕}同志带领一个工作组在这里工作了二十天。

接见嵯峨浩〔216〕、溥杰〔217〕、 溥仪〔218〕等人的谈话

（一九六一年六月十日）

听说嵯峨尚子〔219〕夫人同宫下明治〔220〕先生后天就要走了，本来想晚一点见你们，这样就不能不提前。

欢迎你们到中国来！你们在日本可能听说中国的生活很困难，其实也没有什么。两年来的灾荒，是带来些困难，粮食少了一些，以农产品为原料的商品比以前少一些，但是经过两年来的努力，恢复了不少。

听说媿生〔221〕来后讲中国人面孔黑。溥仪先生、溥杰先生的面孔的确比过去黑了一些，身体也结实了一些。黑是健康的表现，不管怎么样，我们都是黄种人，被称为有色人种，不会变成白种人。世界上有黑种人、黄种人、白种人和棕种人。不管是哪种人，相互间都应该是平等的。但现在还有差别，还存在着种族歧视。从另一个意义上说，最黑的人最受压迫，最有前途，最有希望。非洲有两亿多人口，是未开发的处女地，资源很丰富，现在经济发展不如欧洲，但后来居上，将来会赶上的。世界上开发较早的地方是欧洲，但很多资源快开发完了。开发最少的地方是非洲，非洲有煤、铁砂、石油和稀有金属等，很丰富。北美的加拿大也开发了不少，美国的石油开发

早，浪费也大。亚洲和拉丁美洲则是半开发的地区。这些未开发和半开发的地区，民族独立了，外国不能干涉了，自己管理自己了，是统统要开发的，所以说是后来居上。到那一天，我们的态度仍然是平等待人，有无相通。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肤色，四海之内皆兄弟。到那时帝国主义不存在了，世界大同了，不过这大概要到二十一世纪以后才可以看到。我是看不到了，载涛^{〔222〕}先生你大概也看不到了，老舍^{〔116〕}先生与我同年，大概也看不到了，年轻的人有希望看见。我们共产党的目的就是要把世界搞得美好，使大家都能活下去，而且过得好。

今天在座的有过去的皇帝、皇族，现在都生活在一起，这有一个条件，大家平等。以前日本也有贵族，比如西园寺^{〔223〕}就是公爵的后代，但他不愿意要这个爵位了。尚子夫人、浩夫人、干子^{〔224〕}夫人都是侯爵的后代。载涛是贝勒^{〔225〕}，他是光绪的弟弟，宣统的叔叔。溥仪先生是皇帝，“满洲国”^{〔226〕}我们不承认，但宣统我们是承认的。溥杰是皇帝的弟弟，嫣生是日本贵族的外甥女，又是中国皇族的女儿。溥仪、溥杰的弟弟妹妹过去也都是皇族。现在变化了。溥仪先生研究热带植物，还能劳动，自愿参加劳动，对劳动有兴趣。溥杰先生在景山公园研究园艺，半天工作，你还要照顾一下你的家庭。弟弟妹妹的情况，那是你们都知道的了。三妹是东城区的政协委员，我是全国政协的主席，从这一点说，我们还是同事。五妹曾做过服务员，现在做会计，她完全是自我奋斗，过去我们不知道。六妹是画家，字写得很好，现在是艺术家了。七妹是小学校的教导主任，模范工作者。你们在街上走，谁能认出来是过去的皇族呢？妹夫们也都有了变化。过去这些皇族、官僚、贵族，今

天都变化了，当了工人、职员或教员。

现在介绍一下满族的杰出人物老舍先生。他是一位名作家。辛亥革命〔73〕后，若讲自己是满族人就会受欺侮，受歧视，所以他就不愿意讲。他有许多著名作品，如《骆驼祥子》、《龙须沟》等等。老舍夫人是位画家，中年学画，拜齐白石〔227〕为师，现在和陈半丁〔228〕、于非闇〔229〕等画家合作绘巨幅的国画。

再介绍一下，这是程砚秋夫人。程砚秋〔134〕是中国著名的京剧演员，也是满族人。解放后他非常努力，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五七年我和贺龙〔230〕元帅介绍他入了党，可惜第二年他就去世了。浩夫人你有听唱片的爱好吗？（浩：很喜欢。）我可以送几张程砚秋的唱片给你，我很喜欢听他的唱片，睡不好觉时，就听一听。旧社会他们被叫作戏子，受人歧视，我们称他们是艺术家，都是平等的。

我还介绍一位照顾我们夫妻的护士，她也是满族人，自己不说，被我认出来了。在座的汉族同志很多，就不一一介绍了。中国旧社会，等级森严，不平等。清朝时我们这些人要见溥仪非下跪不可，也根本见不到。辛亥革命后就变了，但只变了一点，推翻了清政府的压迫，代之以少数汉人的统治，而且更凶。北洋军阀〔6〕是年年打仗，国民党统治也是战争不断，搞得民不聊生。只有中国革命胜利了，社会才变了，全中国人民都平等了。中国现在的社会制度是中国人民自己选择的，自己奋斗出来的，不是外来力量强加的。我们觉得这样做很心安，很高兴。请大家想想，世界上有哪一个国家在推翻了封建制度、建立了共和国以后，以前的皇帝还能存在，还给予平等地位？例如英国的查理一世〔231〕、法国的路易十六〔232〕、德国

的威廉二世〔233〕、埃及的王室〔234〕等等，他们哪里去了呢？可以比较一下。（溥仪：世界有史以来没有过。）这是我们国家的政策，当然也要本人努力争取，大家合作。浩夫人请放心，我们不会歧视你的，尚子夫人和宫下先生回国以后请告诉日本朋友，浩夫人是不会受到歧视的。（尚子：在总理的帮助之下，浩才能到中国来，非常感谢。）这不是我个人的帮助，这是国家的政策。（对嵯峨浩）你的死去的女儿慧生给我写过信，我同意她和她父亲通信。她是一个很勇敢的青年，是否有她的照片，送给我一张作纪念。

现在谈谈满族的问题。满族统治阶级入关统治中国近三百年，奴役各族人民，虽然曾使中国一度强盛，但最终还是衰败了，这应由清朝的皇帝和少数贵族负责，满族人民是不用负责的，他们也同样受到灾难。孙中山先生领导辛亥革命推翻清政府是对的。溥仪先生当时才几岁，他也不能负责。载涛先生当时是大臣，要负一部分责任。至于“满洲国”时代，溥仪、溥杰都应该负责，当然更大的责任应由日本军国主义来负。溥仪、溥杰合作的书〔235〕揭露了这一点。你们的书应该修改一下再出版，书里自我批评太多了。那些事情都过去了。新中国成立十一年啦，中国人民对清朝的残酷统治和压迫，印象已经淡了，记得的人也不多了，但历史还是要按照事实来写。清朝亡了，说明它不好，这一点历史已经做了结论。

现在的问题，是要恢复满族应有的地位。辛亥革命以后，北洋军阀和国民党反动政府歧视满族，满人不敢承认自己是满族，几乎完全和汉人同化了，分不清了。民族将来是要互相同化的，这是自然发展的结果，但不能歧视，不能强制。因此

现在还要把满族恢复起来，事实上一九四九年以后已开始这样做了。

清朝是中国最后一个王朝，它做了许多坏事，所以灭亡了。但也做了几件好事：第一件，把中国许多兄弟民族联在一起，把中国的版图确定下来了，九百多万平方公里。第二件，清朝为了要长期统治，减低了田赋，使农民能够休养生息，增加了人口，发展到四万万人，给现在的六亿五千万人口打下了基础。第三件，清朝同时采用满文和汉文，使两种文化逐渐融合接近，促进了中国文化的发展。清朝在确定版图、增加人口、发展文化这三方面做了好事。康熙懂得天文、地理、数学，很有学问。俄国彼得大帝和康熙是同时代的人，因为俄国地处欧洲，手工业比较发达，他汲取了西欧的经验，发展了工商业。中国当时封建经济的统治比较稳固，工商业不发达，康熙只致力于发展封建文化。清朝所做的坏事，历史已经做了结论，用不着多提，做的好事是应该讲一下的。汉族是个大民族，也做了很多好事，这就不用提了。这个思想不是我的，是毛主席多次讲过的。我说这些话的意思，是要说明就是和满族人结婚了也用不着自卑；我称赞了清朝做的好事，也不要骄傲。

浩夫人是日本人，同中国人结了婚，现在已经是中国人了，我欢迎你做中国人，参加中国的社会活动。

我讲的这样多，浩夫人还要再看一看，看一年、三年、五年、十年，看看是不是这么回事。哪一年觉得不适宜了，什么时候都可以回去。如果回到日本，比较一下，觉得中国好，还可以再来。来去自由，我可以保证，我可以签字，我相信你不会要我签字的。孀生愿意回去，可以让她回去，不要勉强她留

下。青年人变化多，以后想来，随时都可以申请护照。如果不来中国，同日本人结婚，又有什么不好？唐太宗把公主嫁给西藏王，汉藏通婚。嵯峨家把女儿嫁给爱新觉罗家。爱新觉罗家的女儿又嫁给日本人，有什么不好呢？

现在再来谈谈日本问题吧。浩夫人想致力于中日友好事业，其实，你和中国人结婚，今天又到中国来，这就是中日友好的象征。日本军国主义从一八九四年至一九四五年，损害了中国人民。日本经过明治维新〔57〕前进了一步，从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搞明治维新的人物是有功劳的。日本比中国前进了一步，但是日本的资产阶级还有封建尾巴，后来逐步发展到军国主义，侵略朝鲜、中国，向外扩张，这是坏事。一八九四年〔236〕、九一八〔237〕、七七〔35〕再加上“满洲国”使中国人民受到很大损害。最近以大谷莹润〔238〕为首的代表团把中国在日本殉难的烈士名单送来，我们很感谢。解放十年来，有上万的日本朋友见到毛主席、刘主席和我，表示谢罪。我们说这已经过去了，中日两国有近两千年的来往，发展了经济文化交流，同近两千年比起来，五十年的时间是很短暂的，而且已经成为过去。我们应该往前看，应该努力促进中日两国的友好关系，恢复邦交，发展经济文化交流。我们并不总盯着过去的事情。毛主席说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是一件坏事，但它唤起了中国人民的觉悟。日本军国主义者认为中国人民是蠢才，是可欺侮的。事实并不如此。中国人民觉醒了，掀起了抗日运动，进行了抗日战争，一盘散沙团结起来了，睡狮觉醒了。这就是说，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使中国人民团结组织起来了。土肥原〔239〕、冈村宁次〔240〕、东条英机〔241〕、板垣征四郎〔242〕等都

不能破坏中国人民的团结，中国人民从来没有这样团结过。我们对日本人民毫无怨恨，日本人民也同样是军国主义的受害者。皇族、华族〔243〕也好，资产阶级也好，劳动人民也好，只要愿意同中国友好，我们都和他友好。参加过日本侵略政府的成员，只要他们赞成中日友好，我们仍然欢迎他们，如远藤三郎〔244〕先生、辻政信〔245〕先生、高碕达之助〔246〕先生和久原房之助〔247〕先生，我们都欢迎过他们。日本朋友来中国的，左、中、右都有，我们对日本朋友是门户开放的。我们不但欢迎共产党、社会党，就是为日本政府做情报工作的人，我们也让他来。

浩夫人回来了，愿意做个中国人，愿意为促进中日两国友好、恢复邦交而努力，我很欢迎。关于你回来的问题，你的丈夫和溥仪是踌躇的，他们担心中国目前有困难，比日本的生活水平低，但是少数人的生活是可以照顾的。你刚从生活水平高的日本来，还不习惯，需要照顾，将来习惯了，就不用照顾了。西园寺先生是贵族，但他不愿意过贵族生活，愿意到生活水平低的中国来，这还不是为了和平吗？

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 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六一年六月十九日)

引 言

现在有一种不好的风气，就是民主作风不够。我们本来要求解放思想，破除迷信，敢想敢说敢做。现在却有好多的人不敢想、不敢说、不敢做。想，总还是想的，主要是不敢说不敢做，少了两个“敢”字。为什么会这样呢？毛主席一九五八年在南宁会议上就提出敢想敢说敢做，八大二次会议更正式提出，敢想敢说敢做要同求实精神结合，建立在科学预见之上。但是，事实上不是人人都能做到的。想得、说得、做得偏了一些是难免的，这并不要紧，只要允许批评自由，就可以得到纠正。只许一人言，不许众人言，岂不成了“一言堂”么？“一言堂”从何而来？是和领导有关的，所以，我们要造成一种民主风气。我首先声明，今天我的讲话允许大家思考、讨论、批判、否定、肯定。“一言堂”，说出一句话来就是百分之百正确，天下没有这种事情。人们不仅在犯错误的时候要讲出不正确的话，即使在正确的时候也会有些话讲得不恰当，过火一些，这

就要允许批评。一个人不要给自己打保票。奉劝作家同志，你们也不要企图一挥而就。伟大的政治家、艺术家对自己作品的修改工作都是非常严肃的。毛主席经常说，马克思、列宁的著作，都是精心修改的。毛主席自己也是这样，他写的东西很多是几易其稿的。所以，我们要造成一种风气，我们所发表的意见，都允许大家讨论、商榷。

我在一九五九年关于文艺工作两条腿走路方针的谈话〔248〕，从今天水平来看，也不一定都是对的，里面也会有过头或不足的地方。使我难过的是，讲了以后得不到反应，打入“冷宫”，这就叫人不免有点情绪了。这次你们要求谈一次，我就谈一谈。心有所感，言之为快。但不可能什么都讲对了，有些问题是可以商榷、批判的，主要是引起同志们的共同讨论。我们要造成民主风气，要改变文艺界的作风，首先要改变干部的作风；改变干部的作风首先要改变领导干部的作风；改变领导干部的作风首先从我们几个人改起。我们常常同文艺界朋友接触，如果我们发表的意见不允许怀疑、商量，那还有什么研究、商讨呢？我们的讲话又不是党正式批准的。即使是党已经研究通过的东西，也允许提意见。中央工作会议正式通过的东西都允许讨论，允许提意见，加以修改，为什么我个人的意见就不能讨论修改呢？我们要造成风气，大家都是站在社会主义立场上探讨问题，为了把文艺工作搞好，把文艺政策执行好。在这些方面各有所见，为什么不能讨论呢？我今天的讲话，你们做了记录带回去，希望你们谈谈，把意见寄来。但是如果你们寄来的意见都是“完全同意”、“完全拥护”、“指示正确”之类，我就不看。这并不是说你们讲假话，而是因为看了没意思。

如果你们有不同的见解，有提出商量的问题，就写信寄来。

民主作风必须从我们这些人做起，要允许批评，允许发表不同的意见。象我今天的讲话，只有两天时间考虑，是不成熟的。当然，讲话里有些是关于党的方针政策、关于阶级斗争的问题，但不少是根据你们所反映的问题做准备的。如果把这次讲话比作人形，那就只是一个胎儿，甚至是不足月的胎儿，能不能长大成人，现在还不知道。你们提出意见来，就可以使我在下一个场合讲得好一些。我们要学习毛主席。毛主席对每一个问题总要反复讲多次，我们常常听他反复讲一个问题，而每次都有新的发展。他希望我们提出意见，吸收我们的意见进行修改。毛主席这种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作风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我们学习毛主席，就要学习他的这种作风。在我们的工作中要允许别人提出不同意见，才能树立好风气。总之，要根据不同的情况，允许有不同的意见，这才是社会主义的自由，才有心情舒畅，实现毛主席所说的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我希望经过这次会议能够造成这样一种空气，收到这样一种效果。

三年来，我们本来要求解放思想，敢想敢说敢做，结果反而束缚思想。其实人家也还在想，只是不敢说不敢做。人又不是石头，哪有不思想的道理。现在我们要使人们把所想的都说出来做出来。几年来有一种做法：别人的话说出来，就给套框子、抓辫子、挖根子、戴帽子、打棍子。首先是有个框子，非要人家这样说这样做不可，不合的就不行。有了一个主观的框子就据以去抓辫子，一切从他的主观主义、片面性、形而

上学出发,也不经过调查,他主观上以为“右倾”,就断定是“右倾”。对《达吉和她的父亲》,认为是“温情主义”,先立下这个框子,问题就来了,就要反对作者的小资产阶级温情主义。感谢上海的同志,你们建议我看《达吉和她的父亲》,我看了,小说和电影都看了,这是一个好作品。可是有一个框子定在那里,小说上写到汉族老人找到女儿要回女儿,有人便说这是“人性论”。赵丹同志和黄宗英同志看电影时流了泪,我昨天看电影也几乎流泪,但没有流下来。为什么没有流下来呢?因为导演的手法使你想哭而哭不出来,把你的感情限制住了。例如女儿要离开彝族老汉时,我们激动得要哭,而银幕上的人却别转身子,用手蒙住脸,不让观众看到她在流泪。思想上的束缚到了这种程度,我们要哭了,他却不让我们哭出来,无产阶级感情也不是这样的嘛!听说导演提心吊胆,直到有的同志说了好,他才放下心来。导演在那个地方不敢放开手。这不是批评王家乙同志,而是说这里有框子,“父女相会哭出来就是人性论”,于是导演的处理就不敢让他们哭。一切都套上“人性论”,不好。其实关于人性论的问题早在二十年前就解决了。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里就说,没有抽象的人性,在阶级社会里只有带着阶级性的人性。可是现在还有人在那里定框子,一个框子把什么都框住了,人家所说所做不合他的框子,就给戴帽子,“人性论”、“人类之爱”、“温情主义”等等都戴上去了。先是抓辫子,抓住辫子就从思想上政治上给戴帽子,从组织上打棍子,而这些都是从主观的框子出发的,是从定义出发的,那种定义又是错误的,并不合于马克思列宁主义。还有挖根子。一是联系历史。不论讲了几句什

么话，都要联系历史检查，这叫人怎么办呢？二是联系家庭，挖出身的根子。我们认为动机与效果是统一的，不能不问效果而只从动机上去推测。追根子，联系历史是可以的，但主要应该看今天的表现；联系家庭出身、社会关系也是可以的，但主要应该看本人。历史和出身可以作连带的研究，因为我们从旧社会来，旧社会使我们身上带有旧的东西，有毛病，这必须承认，但不能随便联系，主要应根据今天的表现、本人的表现去判断。先定一个框子，拿框子去套，接着是抓辫子、挖根子、戴帽子、打棍子，那就不好了。

马克思主义是有框子的。我们并不一般地反对框子，我们有的是大框子。我们要改造整个社会，建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这个框子该有多大！我们还要改造自然，这又是多么大的框子！无产阶级世界观是最科学、最伟大的世界观，拿过去的种种世界观同它比较，都渺小得很。只有我们才能改造整个社会、整个世界，揭示未来。我们有的是最伟大的框子。把这个伟大的框子改变成为形而上学、主观主义的小框子，是错误的。我们也不一般地反对抓辫子，我们要抓大辫子，抓那种政治上反动的大辫子，那种“白发三千丈”的辫子。例如一九五七年对于资产阶级右派，他们猖狂进攻，反党反社会主义，“黑云压城城欲摧”，于是抓住辫子予以反击〔249〕。对于根子也不是不要研究，上面已经分析过，应当对历史和出身作连带的研究，但主要还是看本人、看今天。戴帽子，如果确是右派，就要戴帽子，只是不可乱戴。现在的问题正是乱戴帽子，把一句话的错误、一种想法的错误，甚至把那种本来是允许的、可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各种说法想法，也都看成毒草、邪道，

那就不对了。打棍子就更加要慎重。即使他错了，只要他愿意改也还要允许他改，一时改不过来的还要等待，不能随便开除党籍，那是不慎重的做法。我们还是要“一看二帮”嘛！所以，我不是主张无产阶级可以不要框子，不抓辫子，不联系出身、历史，应该戴的帽子也不戴，应该执行处分的也不处分。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那种错误的、不适当的东西在现在成为一种风气，一来就“五子登科”〔250〕，这种风气不好。现在要把这种风气反过来，但反过来并不能推翻那些大框子、大辫子之类的问题。比如出身、历史，就应当交代，使大家知道。大家帮助自己改正错误，错误的东西光靠个人在那里想，是不容易改掉的，要靠众人帮助。所以，那些大的原则还是应该坚持的。只有把那种坏的、不好的偏向去掉，正风才能建立起来，才能造成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我希望这次会议能够收到这样的效果，首先从我们领导者改起，提倡这种正确的风气。

以上是开场白，是引言，下面讲六个问题，如果时间来得及，最后还讲一讲关于话剧的一些意见。

一 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问题

物质生产的某些规律，同样适用于精神生产。搞得过了头，精神生产也会受到损害，甚至损害更大。一九五九年我曾讲过，不能老去催作家，叫他赶写稿子。当然，有些稿子也要赶，例如报纸的社论，为了适应瞬息万变的国际斗争形势，必

须赶写，以便配合斗争。但是我们也有一个传统，如果写得不好，宁肯晚一天见报，也要把它改好。所以外国人常说我们发表意见晚。连国际斗争方面都可以这样做，国内的精神生产为什么不能这样做呢？搞指标、订计划、保证完成、一催再催，这对于精神生产者是不幸的事。我说过，在文艺工作方面我有过一个错误，就是提倡大拍艺术性纪录片。艺术性纪录片是可以拍的，但提倡太过也不行。我们提出一九五八年拍八十部，结果下面就搞出了一百零三部，其中就有粗制滥造、浪费劳动力、占用材料的，当然也有拍得好的。总之，要求得过多，就违背了多快好省的辩证结合。多快好省，要算总帐，算大帐，不能从每个人来提要求。比如张水华同志，你拍影片习惯于慢一点搞，应当允许慢一点，不必要求很快拍出来。又如做诗，我们的领导人中，陈毅^{〔213〕}同志喜欢写诗，写得很快，是多产作家，是捷才。毛主席则不同，他要孕育得很成熟才写出来，写得较少，而气魄雄伟、诗意盎然。当然，陈毅同志的诗也很有诗意。我们不能要求毛主席一天写一首诗，也不必干涉陈毅同志，叫他少写。精神生产是不能划一化地要求的。但是把全国的精神生产加在一起，我们的社会主义文化仍是丰富多采的。国画，象展出的江苏国画家《山河新貌》画展，就是很丰富的。我不赞成说只有江苏的国画好，虽然我是江苏人。应该说全国各地都有很好的国画。精神生产是不能限时间限数量的。要从全国作综合的计算，而且要集中力量，以求搞出更好的东西来。这方面的问题应该讲清楚。过高的指标，过严的要求，有时反而束缚了精神产品的生产。

有的同志提出，在精神上、物质上都有退赔问题，我支持

这个意见。当然，怎么退赔还有待各部门的研究。例如，人家的意见是对的，你说他错了，批判了他，使人家的心情很不舒畅，难道不应该检讨一下吗？又如献稿费问题，人家本来是按照规定的标准领的稿费，但你却规定要献出百分之几十，这个规定又没有经过批准，而且，即使批准了，也不一定就合适。比如农村，农民手里的粮食，可以提出若干作为公社、大队的储备粮，也可以出售一部分，但出售的收入应该按工分分给农民，这是他的劳动所得。当然，也要有不同对待，如果是占用工作时间，影响本身工作的质量而写出的，就要有所不同。业余时间写作所得，就不能无偿占有。据说有人说，究竟谁的稿费归了公已经查不清了，不好退赔。这种话是领导者的话，是找出借口来不想退赔。实际上人家心里是有数的。所以还是应当退赔，退赔多少则可以公议。又如平调了作家的房子，为什么不应该退还给本人住呢？

文艺部门也有个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问题。过去搞得多了，不合乎巩固、提高的精神。文教队伍搞大了，事业搞多了，包括教育、文化等方面的问题，就应该同样执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我们要求中央文教部门搞一个规划，提请地方同志们讨论，加以约束。据说，有些地方、有些方面不愿意退下来。我看还是要从实际情形出发，要区别情况，有的是群众的爱好和自愿，有的是领导的要求。群众自己爱好，愿意保留一个流动剧团，大家出股子养活一个剧团，在社队之间巡回演出，这样的剧团就可以保留下来。我们允许集体所有制，为什么剧团都要全民所有呢？当然，集体所有制的剧团，应该防止旧势力复活，不能让班主、把头拿高薪。剧团

工作是精神劳动，应该是主要演员、艺术水平真正高的人多劳多得。要允许他们搞合作社性质的剧团，而由地方党委和文化行政部门加以指导。这是一种，是根据群众的需要、为群众服务的。另外有一种，中央各部、地县领导机关，一定要搞一个戏班子，为少数人服务，这就要干涉，不允许保留。保留这种剧团是搞干部特殊化。剧团主要是为群众服务的，虽然也可以作些内部演出，但是应当有个界限。文化部门应在党委宣传部门指导之下订一个规划，脱离物质生产专搞精神生产的人不能太多。至于业余的，群众自己办，又不影响生产和工作，应该允许办。我们普及文化，主要还是靠业余活动来实现。

总之，三年来的工作中出了一些毛病，需要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精神生产方面也不例外，同样需要规划一下。

二 阶级斗争与统一战线问题

说明一下阶级斗争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阶段的曲折。党在七届二中全会〔3〕时就指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存在着两条道路的斗争。解放以后，经过“三反”〔77〕“五反”〔74〕，证明了这一点。合作化后一个时期，敲锣打鼓进入社会主义，来势很猛、很广，可能认为我们改造旧社会所收到的成效很大，对阶级斗争在程度上有所忽视。毛主席预见到这个问题，一九五六年发表了《论十大关系》的讲话，其中就讲到革命与反革命、统一战线等问题；一九五七年又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阐述更清

楚了。果然，不出毛主席所料，右派猖狂进攻，证明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阶段，阶级斗争的面也许缩小了，但有时斗争还会很尖锐。阶级敌人在我们有困难、有缺点、有弱点时，就会猖狂进攻。但我们不能因为有阶级斗争就忽略统一战线，对资产阶级没有分析，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上有所动摇，或有所偏颇。

阶级斗争有政治上的和思想上的，还有旧社会的习惯势力方面的。

属于政治性质的，敌视社会主义、要乘机复辟的，就要坚决反对，如右派猖狂进攻。去年农村中个别地区反革命分子篡夺领导权，企图复辟；或者待机而动，有时暗藏，有时公开，有时隐蔽活动，到一定阶段猖狂地复辟。当然这只是一小部分地区。由于全国人民政权的巩固，他们是挑不起大事来的。这一类阶级斗争是敌我矛盾性质的，要警惕，麻痹了就会上当。这种问题在全国任何方面都存在，但为数极少。我们要站在人民立场上随时警惕，特别是当我们有困难、有缺点错误时，更要注意。

思想斗争是长期任务。对于思想上作风上的问题，搞精神生产的文艺工作者要尤其注意。肃清旧的思想、作风是长期的。我们从旧社会来，受过旧学校的教育，今天的青年也会受家庭、社会旧思想残余的影响，所以旧思想旧作风在人们的脑子里或多或少地存在。思想是先驱，但真正肃清旧思想残余，要新的基础全部完成之后才有可能。思想问题，世界观问题要慢慢改造，不能急，对于搞自然科学工作的人更是如此。拿医生来说，我曾遇到过这样的医生，技术是第一流的，

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但脑子里有上帝，这并不妨碍他为社会主义社会服务。我们家中有的老人也信鬼神，也还可以是一个社会主义社会的公民嘛！这是可以允许存在的，是无法勉强的。有些老人终其生而无法改变，带着迷信思想进棺材，但他活着的时候仍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思想影响他的作风，由于信上帝就要去教堂，或到吃饭时要默祷一下，有些同志对此也看不惯，斗他一下，造成了社会上不必要的紧张和不安。当然，作为教师、作家，以此去教育青年，或搬上舞台影响青年，那就不好了。但要他们彻底改造，是不容易的。就以我们来说，是否对辩证唯物主义就认识得那么清楚了？思想上是否一点旧的东西都没有了？很难说，也要不断改造。前面所讲到的缺点与错误，还不都是唯心主义、形而上学所引起的？但你能说我们的党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党，我们的干部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吗？人总是有缺点的。我们的党是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党，但从我们个人来说，还是不成熟、不完全的马克思主义者。共产党人还会如此，如何能责备一般的非党朋友呢？自己虚心一些，帮助别人就好办一些。思想改造是长期的，从旧社会脱胎出来的新社会，哪能一下子就改造好？

习惯势力，是指从旧社会带来的封建阶级、资产阶级的习惯势力，从小做惯了，不以为是不对的。例如我们领导同志走到哪里，就把众人拦住，为我们让路，你要平等待人，就不行，有些人一定要把你搞得很特殊。我也不反对必要的警惕性，但本来是坐在一起的，为什么要隔开来？我看这就是一种习惯势力，是封建的，有时不自觉地就出来了。习惯势力在中国很多，如农村中急起来打人，就是一种习惯势力。这是从旧社

会带来的，现在还有人用这种方法来对待群众。戏里还有打板子的。《十五贯》^{〔111〕}很好，把打板子放到幕后去了。对于反革命分子，毛主席一贯强调反对用刑。对反革命尚且要教育，何况人民内部呢！但习惯势力常常是不自觉的，还要打人。最近知道有许多戏被禁演，也是按习惯势力去看问题，例如《秦香莲》，有人认为也不能演，真是岂有此理！批判陈士美杀妻灭子，他的行为是很恶毒的，为何不能演？这与离婚再娶有什么关系？这就是封建思想的影响。许多戏对男女关系问题总是骂女的，对男人总是原谅的。我认为不对。我们现在还没有把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习惯改掉嘛！不要以为干部就没有封建思想，这不是封建思想是什么？讲起道理，大家都同意，但一遇到具体事情，习惯势力就来了。不要以为我们这一代可以肃清，到二十一世纪也许能创造出新的习惯来，但在这一世纪，不要指望全部肃清旧的习惯势力。这里涉及阶级斗争问题。我们有时话说得不恰当，或开玩笑把话说错了，这是常有的。如果把这种情况都当作严重的政治问题斗争，人家就不能活了。所以，要区别何为政治问题，何为思想问题，何为习惯势力，不能不分清问题性质事事斗争。有的已形成习惯，要长期才能改变。新风气不树立起来，旧习惯势力去不了。总之，对阶级斗争要具体分析，不要把对反革命的警惕性和人民内部的思想改造混同起来。否则，毛主席所说的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就不能形成。

思想改造是长期的任务。这里所说的改造，是从团结出发，并且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的。不要怕听改造这两

个字。改造，包括对非马克思主义思想和习惯势力的改造。一个共产党员如果以为自己改造完成了，不需要再改造了，他就不是好的共产党员。我常说，改造没个完，一直到死，那时也不能说改造够了，只是比现在好一点。改造是好事，不是坏事，是为了更便于团结，和反革命分子作斗争。除阶级敌人外，全国人民大团结。至于思想上是否有唯心主义、旧习惯势力，那是人民内部的问题，这些人都在我们团结之内。社会主义社会是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时期，是个相当长的时期，有人却估计只要四年零八十天。从一九四九年算起就是十三年。我看几个十三年也不止，也许更长，现在不好“算命”。思想改造的目的，是为了使我们的事业发展得更好，把文艺工作做得更好，为了文艺工作者的团结，而不是“五子登科”，使大家很紧张。进行这项工作要和风细雨。毛主席讲：凡是思想改造学习，都要和风细雨，采取神仙会的形式漫谈。这次会议讨论的问题很多，从领导到文艺队伍，到“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这些问题不是一次会议能够完全解决的，大家回去还要去漫谈，不能性急，不能又出一个新框子，要长期做下去，要有耐心，才能心情愉快。

一方面要进行阶级斗争，一方面要巩固统一战线。党与民主党派、民主人士的团结合作，就是统一战线。不仅民主革命时期如此，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也如此。李维汉〔251〕同志在这方面已经发表了文章，在此不再多说。有一个时期好象觉得一九五六年关于知识分子的那些问题可以不讲了，不是的，那些原则仍然存在，只是三年来由于忙，这方面有所疏忽，讲得少了些。现在经过反右派，有了三年大跃进〔252〕

的经验，彼此更了解了。三年大跃进有顺利的经验，也有困难的经验，要更团结，更有信心，统一战线应更扩大、更深入，而不是更缩小、更淡漠。这一点要肯定下来。要使得我们的经济、文化得到更好的发展，就要一方面在政治上提高对国内外阶级敌人的警惕性，一方面更加扩大和加强内部的团结。

三 为谁服务的问题

为谁服务是个政治标准，任何文艺都有个为谁服务的问题。毛主席指出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就是我们的政治标准。为工农兵服务，为劳动人民服务，为无产阶级专政制度下的人民大众服务，这只是文艺的政治标准。政治标准不等于一切，还有艺术标准，还有个如何服务的问题。服务是用文艺去服务，要通过文艺的形式。文艺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不能框起来。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是肯定的，至于表现形式，是多样的。文艺形式至少象周扬〔253〕同志报告中说的，有文学、戏剧、音乐、美术、舞蹈、电影、曲艺、摄影等方面，细分还不止，如戏曲中就有很多剧种。文艺为政治服务，要通过形象，通过形象思维才能把思想表现出来。无论是音乐语言，还是绘画语言，都要通过形象、典型来表现，没有了形象，文艺本身就不存在，本身都没有了，还谈什么为政治服务呢？标语口号不是文艺。象我今天的讲话，只能叫漫谈，就不能叫艺术。既然如此，文艺要好好为人民服务，就要通过实践，到群众中去考验。你这个形象是否站得住，是否为人民所喜闻乐见，不是领导批准可以算数的。艺术作品的好坏，要由

群众回答，而不是由领导回答；可是目前领导决定多于群众批准。当然，如果有政治错误，反社会主义，我们要发言，不能任其自由泛滥，但这终究是少数。我看到四川一个材料。文化部一位副部长到四川说：川剧落后。得罪了四川人。当时一位同志回答：落后不落后要由四川七千万人去回答、去决定。我看这位同志很勇敢，回答得好！人民喜闻乐见，你不喜欢，你算老几？上海人喜爱评弹、淮剧、越剧，要你北京人去批准干什么？领导人可以有喜好，有人爱看戏，有人爱看画，有人爱古董，这有什么关系？我们看了戏说好，不一定就好，我们的话靠不住，各人有各人的爱好，怎能作为标准？艺术是要人民批准的。只要人民爱好，就有价值；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就许可存在，没有权力去禁演。艺术家要面对人民，而不是只面对领导。这是不是主张反对领导呢？不是的。领导在政治上有权提意见，要政治挂帅，但政治挂帅主要是看它是香花还是毒草，是否反党反社会主义，政治上的敏锐要放在这个方面。至于艺术方面，我们懂得很少。

我们懂得少，发言权很少，不要过多干涉。在座的同志都是做领导的人，希望你们干涉少些，当然不是要你们不负责任。第一，要负责任；第二，要干涉少些。负责任主要指政治上，不要放任毒草，放任修正主义。但是一定要区分清楚，不要把什么都说成是修正主义。有人问我：文艺的教育作用和娱乐作用是不是统一的？是辩证的统一。群众看戏、看电影是要从中得到娱乐和休息，你通过典型化的形象表演，教育寓于其中，寓于娱乐之中。当然要多样化，不能老是打仗。朱德同志说，我打了一辈子仗，想看点不打仗的片子。如果天天让

人家看打仗的片子，人家就不爱看，就要去看香港片，这只能说明电影局的工作没做好；反之，一个打仗的片子也没有，让青年丧失战斗性，也不好。现代片多少，历史片多少，要大体上有个比例。至于题材，完全可以允许作者自由选择。古代没有社会主义，但有中国人民优良的传统，人民创造了许多他们理想的人物，如武松、穆桂英等，还有不少神话，都可以写。我们要有个比例，这种比例在不同地区、不同剧种中也要有所不同。有的剧种只宜于演抒情戏，打仗戏只能偶尔演之，如越剧团都是女同志演《红楼梦》很舒服，演《追鱼》也还可以，演武打戏如《泗州城》就有困难。越剧是嵊县“的笃班”〔254〕发展而来的，后来又吸收了绍兴大班〔255〕的一些东西。原来有男演员或全是男演员，后来都变成女演员演，现在既允许有男女同台的，也允许全是女演员的。由于剧种不同，要因地因时制宜，在安排剧目时必须考虑群众的需要。又如电影，农村、工厂宜于看什么片子，要不同对待，但总要对生活有所调剂，一方面要歌颂劳动光荣，一方面也必须有些抒情的、轻松的东西。对于青年，要告诉他们革命之甘苦，社会主义来之不易，表现革命斗争艰难困苦的戏要多演，使他们不要忘本。创作题材要有个大概的比例，文化部在这方面要多做些工作，但决不能强迫命令和干涉过多。听上海的同志讲，有几个作者对党委领导工作根本不熟悉，硬要他去写党委领导，结果天天对他讲党委挂帅如何重要，还是写不出来，不如让他写写别的，发挥所长。本来是各显所长，百花齐放，结果成了一花独放，拿一个政治框子，把大家束缚住了。陈云同志关于曲艺的意见〔256〕是有道理的。他身体很弱，很疲劳，需要另一种生活环

境来休息，听听评弹，以便为党做更多的工作。评弹也有教育作用，艺术上很有特点，一个人表演很多角色，做多方面的表演。我过去对评弹不懂，现在觉得比北方大鼓还好，当然各有千秋。但我仍愿意听北方曲艺，因为听评弹的苏州口音比较费力，所以不如陈云同志热心。不能一定要我和陈云同志一样，也不能因而说我不赞成评弹，各取所需嘛！观众看戏看电影就是各取所需的。又如，我愿看散文、短篇，看长篇小说就没有时间。有时想看看不费脑筋的戏剧和电影，借以休息，但是不行，还是要想，要提意见，其实这是多余的，今后要解放一下，反正专家很多嘛！我们看了戏之后，受不受感染呢？也是受感染的。《达吉和她的父亲》，小说和电影我都看了，各有所长。小说比较粗犷，表现了彝族人民的性格，但粗糙些。电影加工较小说好，但到后来该哭时不敢哭，受了束缚，大概是怕“温情主义”。我们无产阶级有无产阶级的人性，为什么有顾虑？是有一种压力。把“人性论”、“人类之爱”、“人道主义”、“功利主义”都弄乱了。这些问题，毛主席早在延安文艺座谈会时就回答了。我们不一般地反对功利主义，我们讲无产阶级的功利主义、人性、友爱和人道主义。现在的搞法，不是从无产阶级的立场和阶级观点来看问题，而是用唯心主义观点来看问题。以政治代替文艺，就没有文艺了，还有什么看头呢！

还有，搞文化工作要研究经济基础。如周扬同志所说，思想是先行，但文化建设高潮要在经济高潮之后。文化事业的发展不能漫无边际。文化事业、大专学校太多，超过经济发展的水平，就会使基础、使生产受到影响。说是为生产服务，结果适得其反，成为生产为文化服务，为文化而文化，最后消灭

了文化。普及与提高，普及就要开展群众业余活动，在此基础上提高。现在我们做过头了，文化事业搞多了，队伍搞大了，占用了劳力，影响了生产，所以要缩短战线，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才能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为工农兵服务，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

四 文艺规律问题

文艺同工农业生产一样，有它客观的发展规律。当然，文艺是精神生产，它是头脑的产物，更带复杂性，更难掌握。周扬同志讲，文艺的特点是通过形象思维反映生活。毛主席说，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革命的文艺，应当根据实际生活创造出各种各样的人物来，帮助群众推动历史的前进，实现为政治服务的目的。我觉得现在在这方面存在如下一些问题需要解决：

1. 数量和质量的问题。几年来，文艺作品在数量方面搞得很多，质量不高。文艺的队伍搞得很大，水平不高。同一个剧目，到处学着上演，路子很窄。同一个题材，各地都写，大同小异。用同样的语言歌颂同一事物，把质量降低了。虽然目前文艺的数量离普及还有距离，但是当前主要的不是继续发展数量，而是要提高质量。提高质量是一件细致的工作，不能要求太急。成功的作品不是人人都能创造出来的，也不是天天都有的。优秀的作家、优秀的作品在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是并不很多的。当然我们要超过他们；但是也不能“人人做

诗，人人画画”，每县出一个郭沫若。这种口号是不对的。数量和质量是辩证地发展的，数量总是超过质量，好作品总是少数。但是现在质量高的东西太少了。文艺要求思想性和艺术性辩证的结合，创作好作品需要更多的准备。《社会主义好》是一首好歌，但是歌词太简单了。在大革命时有一首歌，名叫《打倒列强》，群众很爱唱。一共只有八句词：“打倒列强，打倒列强，除军阀，除军阀，国民革命成功，国民革命成功，齐欢唱，齐欢唱。”更简单，等于标语口号。但是那是一九二四年写的。现在过了三十七年，还是那么简单，就不好了。《社会主义好》的作词者不要紧张，我在这里不是怪作家；这是由于领导要求太急，所以只能是急就章。现在《洪湖水，浪打浪》更受群众欢迎，因为它既有革命的内容，又抒情，质量较高。这就是群众的批评，群众的选择。现在应当允许作家的写作时间多一点，不要催得太急。剧团也不要演那么多场，使演员能够劳逸结合。

2. 原料和加工的问题。普通的实际生活总是要经过加工才能成为艺术作品。作家掌握了原料以后，必须经过加工，才能写成作品。现在应当更加着重加工这一方面，因此要多给点时间。《杨门女将》这出戏如果能由梅兰芳^{〔257〕}同志加工，可能更好些。

3. 思想和业务的问题。思想很重要，是指导，必须加强思想学习。你们是“灵魂工程师”，思想总要高些。思想水平不提高，作品不可能写好。但是除了提高思想水平以外，还要精通业务，否则思想如何表现出来呢？只懂政治，不精通业务，写出来的东西势必是标语口号，不能感人。只懂政治不精通

业务，可以去做别的工作，例如做宣传工作，不能成为艺术家。当然，宣传工作也要求有鲜明性，生动性。要精通业务，没有基本训练是不行的。作为一个艺术家，要有经验和才能，必须有很好的修养，其中包括训练，否则就不能成为一个艺术家，也不能成为评论家。我今天的讲话就只能是漫谈，而不能算作评论。因此，一定要积累经验和才能，要不断实践，在实践中接受群众的考验。我们的艺术团体到国外去，人家对我们的艺术家受到国家的重视和培养非常羡慕。我国的艺术家有广阔的发展天地，这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我们受人赞美，就更要提高，更往上发展，所以要重视经验和才能，要重视技巧。现在不敢谈经验和才能，不敢谈技巧，有人一谈技巧，就被说成是资产阶级思想，这显然是错误的。

与此相联，红与专，论与史，文与道，都不能偏废。这些问题周扬同志在高等学校文科教材编选计划会议上都讲过了。现在“白专道路”这个口号很流行。这个口号不是我们提的。

聂荣臻〔258〕同志一定要我再讲讲这个问题。什么叫做“白”呢？一个人只要在社会主义土壤上专心致志为社会主义服务，虽然政治上学习得少，不能算“白”。只有打起白旗，反对社会主义，才是“白”。例如有个外科医生，开刀开得很好，治好了很多病人，只是政治上不大开展，因此就说他是“白专道路”，岂不是荒谬？再如有一个人专心致志为社会主义服务，政治上懂得少一些，但是两年把导弹搞出来了，对国家很有贡献；另外一个人，天天谈政治，搞了五年也没有把导弹搞出来。你投票赞成哪一个人？我投票赞成第一个人。第二个人只好请他去当政治教员，他不能在导弹部门工作，他只能在导弹部

门“捣蛋”。毛主席说过：我们并不一般地反对功利主义，我们要讲无产阶级的功利主义。这两个人中的第一个人对我们是有利的，对社会主义事业在全世界的胜利是有利的。不讲革命的功利主义，空谈政治，不好。当然，学习政治我赞成，但是要精通业务，不能占用钻研业务的时间。

4. 批评和讨论的问题。文艺作品要容许别人批评，既有发表作品的自由，也要有批评的自由；同样，既有批评的自由，就要有讨论的自由。不论哪一方面都不能独霸文坛。我们提倡批评，也提倡百家争鸣、自由讨论。只要是在社会主义大框框中争论，你说好，我说坏，都可以。光允许批评，不允许讨论，人家就会说，还是批评家好当。

五 遗产与创造问题

毛主席说，我们应当厚今薄古。我们相信一代胜过一代。历史的发展总是今胜于古，但是古代总有一些好的东西值得继承。所以毛主席要我们继承优秀的文化遗产，批判地吸收其中的一切有益的东西，“弃其糟粕，取其精华”，使它发扬光大，一代胜过一代，到了共产主义社会就更加发扬光大。

在中外关系上，我们是中国人，总要以自己的东西为主，但是也不能排外，闭关自守，如果那样就是复古主义了。外国好的东西也要加以吸收，使它溶化在我们民族的文化里。我们的民族从来是善于吸收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的。我们吸收了印度文化和朝鲜、越南、蒙古、日本的文化，也吸收了西欧的文化。但要“以我为主”，首先要把我们民族的东西搞通。学习

外国的东西要加以溶化，不要硬加。《小刀会》是一个很好的舞剧，在上海演出时，其中的《弓舞》没有女的站在男的身上那些芭蕾动作，在北京演出时加上了。事实上在太平天国时代〔259〕怎么能有这种动作呢？它同太平天国的历史背景不符合。

《宝莲灯》也是如此。中国古代神话怎么能够那样演呢？也许他们考据出什么东西作为根据。一些器乐也是如此，总要点西方情调，听来不和谐。在这方面，也许我有些保守。我是主张先把本民族的东西搞通，吸收外国的东西要加以溶化，要使它们不知不觉地和我们民族的文化溶合在一起。这种溶合是化学的化合，不是物理的混合，不是把中国的东西和外国的东西焊接在一起。

不论学习古代的东西还是学习外国的东西，都是为了今天的创造，都要把它们溶化在我们的创作中。文艺总要有独创精神。也许《小刀会》中的《弓舞》，让女的蹬在男的腿上是一种创造，这可以争鸣。我认为把古代的、外国的东西吸收溶化在创作里，应该注意时代背景。写古代题材，女人不可能站在男人身上，写现代生活就不同些。据说安徽的《花鼓灯》是女人站在男人的肩膀上。但是我记得年轻时看群众跳这种舞是男扮女装的，从前根本不允许女的站在男的肩上。当然你们也可以驳我。我讲这一部分就是准备引起讨论的。

六 领导问题

三年来，我们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这是主要的。缺点和错误是部分的。如何改正这些缺点和错误？中心问题在于领

导，在于教育，在于深入群众，总起来一句话，要实行调查研究。毛主席的工作方法论就是调查研究。做调查研究的是领导者，领导者要有自我批评精神，不是层层对下批评。

最近听周扬同志说的一句话很顺耳。他说，统一战线工作不仅统战部要做，宣传部也应当做。这话很对。本来宣传部应当广为招徕，门户洞开，但是现在党外人士不到中宣部来，可见门户不是那么洞开。统战工作不只是统战部的工作，而是全党的工作，不仅文化部、宣传部要做，组织部也要做，许多部门都要做。毛主席每年都要找章行老^{〔260〕}谈谈教育工作。我也还要对溥仪^{〔218〕}做工作。既然把他放出来了，总要让他做点工作，发挥他的作用。改造末代皇帝，这也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嘛！否则为什么放他出来呢？

缺点和错误的改正要从领导做起，首先领导上要自我批评，要多负一些责任，问题总是同上面有关系的。希望你们回去也这样做。文艺团体的领导也要自我批评。这样就可以解除包袱，框框就只有大的，没有小的了，辫子就不会乱抓了，根子就不会乱挖了，帽子就不会乱戴了，棍子就不会乱打了。就可以使广大的文艺工作者心情舒畅，意气风发，使社会主义文艺更加繁荣。

光有自我批评还不行，还要深入群众。只有深入群众，才能知道自己的意见对不对。怎么办？要实行调查研究。我还要说一句，我们要进行自我批评，但是你们也不能封锁消息。不能认为这是我的工作，你不能管——“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261〕}，这样就无法合作了！任何问题公之于众总是有好处的。这样，可以得到大家的帮助，有什么不好呢？当然，调查

研究不能成灾，事前应当有准备，应当写好提纲；还要自带粮票，注意节约。调查研究要实事求是，不能乱搞。别人的成绩，应当加以肯定。对问题要做出恰当的估计。各个地区、各个部门的情况会有所不同，有的地方是整个领导错误，有的地方是个别错误，有的地方则很好，要实事求是，分别对待。

这一切是为了什么呢？是为了教育干部。毛主席说，十一年来忙于建设，对干部的教育注意不够。我今天讲这么多话，也为的是把这个问题讲清楚。要造成一种风气，使大家敢于讲话。只要是对社会主义有利，即使思想不一致，也要说出来。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样，我们的干部就可以得到教育，健康的风气才能造成，社会主义的文艺才能得到更好的发展，活动的天地就可以非常广阔。

七 话剧问题

最后，我还想讲一讲话剧问题。

话剧几年来有进步，但是比起其他方面来要弱一点。什么道理呢？是由于不承认基本规律，不搞基本训练，似乎演话剧很容易，只要会说话就行。话剧是一种综合艺术，它包括剧本、表演、布景、灯光、道具等等。但是其中最重要的是语言的艺术化，话剧要通过语言打动人。话剧界的同志要我向毛主席做工作，请毛主席看话剧。我说，你们什么时候把话剧演得不象普通人说话，毛主席就会来看了。

话剧演员不仅要会说话，而且要会唱、会做，因此基本训

练的内容是很多的。但是现在不大讲基本训练，忽视话剧艺术的基本规律。话剧团体的演出任务很重，一年将近三百六十五场，弄得大家很累，没有时间钻研艺术，使话剧不能被人接受。演话剧也要有别的修养，琴棋书画都要会一点，要成为通才。演《雷雨》，不熟悉封建社会的生活，演成资本主义社会的家庭，就不象了。

任何艺术不掌握规律，不进行基本训练，不掌握技术，是不行的。我看艺术应当苦练，这虽是从话剧讲起，但应适用于各个艺术部门。要进行基本训练，就要有时间。文化部在这方面应当有一个规划，定出一个恰当的比例。

解放以来，我们培养出很多人才，但是从发展观点来看，还是不够的。杨秋玲在香港被称为“小梅兰芳”，但是实际上她离梅兰芳还远得很。如果不给她时间加强训练，过几年也会垮的。我们培养人才不能起一个垮一个。国家培养人才也要讲“成本”，当然，不是说要搞经济核算，但是要注意这个问题。

要掌握基本规律，加强基本训练。这是第一点。

第二，演话剧要目中无人，心中有人。又无人，又有人。演员在舞台上看到台下千百双眼睛，就有些战战兢兢，当然演不好戏。因此要“目中无人”。现在剧场观众席是黑的，是为了让演员看不见观众。但是往往又产生另一种偏向：演员的心里也没有观众了。演员在台上背着观众说话，我们竖着耳朵都听不见。他们根本忘了话是要说给观众听的，戏是要给观众看的。所以演员要心中有人。

第三，对舞台，既要藐视，又要重视。所谓藐视，就是要敢

于什么角色都演，好人、坏人都演。年纪大的人演小孩也可以。《以革命的名义》中演瓦夏和别佳这两个孩子的女同志年纪都很大了，演得很好。但是光藐视不行，还要重视。舞台虽小，下面却有成千成百的人看着你，稍有疏忽，观众都会看出来的。所以要象毛主席所说的那样，把战略上藐视和战术上重视统一起来。

第四，演员自己要做到客观逼真，主观认真。象斯坦尼斯拉夫斯基〔262〕所说的那样完全变成角色，是不可能的。只能做到逼真。但是主观上要认真地演，演武松要象武松，演曹操要象曹操。应当是又象又不象，二者辩证地统一起来。

总之，各种事物都有它的客观规律，艺术也一样。要认真地加以研究，加以摸索，许多经验要认真加以总结。希望在这次会后，大家都来研究规律，但也不要又搞出许多框框来。

我今天所说的这些话不一定对，我是树个“的”，让大家来射，树个活靶子，让大家来攻攻。

说真话 鼓真劲， 办实事 收实效^{*}

（一九六二年二月三日）

我们检讨的目的，是为了增强团结。这里，最重要的是毛泽东同志讲的实事求是，也就是说真话，鼓真劲，办实事，收实效。

这几年来，党风不纯，产生了浮夸和说假话的现象。我们要提倡说真话。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要大家讲真话，首先要领导上喜欢听真话，反对说假话。如果你乱压任务，结果象同志们所说的，他就会准备两本帐，揣摩一下才讲，看你喜欢听什么再讲什么。这的确是一个党风问题。大家都说假话，看领导的颜色说话，那不就同旧社会的官场习气一样了吗？你们反映的情况我听起来觉得很痛心。你们说假话当然不对，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压你们。从现在起，不要乱压任务、乱戴帽子了。要提倡讲真话，即使是讲过了火的也要听。唐代皇帝李世民能听魏征^{〔263〕}的反对意见“兼听则明”，把唐朝搞得兴盛起来。他们是君臣关系，还能做到这样，我们是同志关系，就更应该能听真话了。

^{*} 这是在中共中央扩大的工作会议福建组会上讲话的第四个问题：检讨的目的。

鼓真劲。有的劲就不是真劲。象你们所说的两个工厂，一个厂踏踏实实地干，说他“没劲”；“冷冷清清”，一个厂在那里造假，却说他是“轰轰烈烈”。这是庸俗地理解了毛泽东同志讲话的精神。毛泽东同志说，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因为有上游，你才争上游。主观能动性要和客观可能性结合起来。我们提倡鼓干劲，不是鼓假劲，而是鼓真劲。鼓干劲也要实事求是，有的就是鼓假劲。比如有的提倡苦干几天几夜，过年也不休息。你在那里鼓劲，他就苦战，你走了，劲也没有了，他照样休息，照样过年。

做实事。做了实事，就有实效，否则强迫命令，就会搞一些不实在的东西。这几年《人民日报》宣传了许多不恰当的口号，如拔白旗〔264〕等，他们已经做了检讨。我在这几年也开过几次大会，发了不少奖状，如果表扬的事迹是假的，你就把“奖状”摔掉。我们要做实实在在的事，做实事，收实效，才会对人民有利。

说真话，鼓真劲，做实事，收实效。这四句话归纳起来就是：实事求是。实事求是是一句成语，毛泽东同志做了新的解释，它代表了毛泽东同志的一个根本思想。这四个字，话虽简单，却包含着丰富的内容。如何做到实事求是？首先要通过认真的调查研究。要调查研究得好确实是不容易的，因为现在已经有四年的浮夸风气，不易一下子改变过来。少奇同志去年回湖南家乡，开始群众不敢讲真话，有人封锁了真相。我也曾到一个地方搞调查，去之前，先派了办公室的同志去，后来发现反映的材料与实际情况还是有出入。你要了解真实情况，就要与老百姓平等相待。在战争年代，我们与老百姓住在

一起，天天见面，不分彼此，和群众的关系很密切。现在就不一样了。比如我参加你们这个会议，一进会场，你们就站起来鼓掌，我就不舒服，但是又不好阻止你们。昨天下午你们没有鼓掌，我心里就很舒畅。因为有了那么一些形式，就显得不那么亲切，不是平起平坐，而是隔了一层。当然这一层不是一道墙，是一张纸。你们也都是老革命了，参加革命都有十几年、二十几年了，为什么还会产生这个隔阂呢？我想就是因为国家大了，“官”大了，和根据地的情况不一样了。所以你们鼓掌，我心里就不安。现在造成的这种形势，一定要改变，下决心改变。要搞好调查研究，就要真正联系群众。

我们要发扬民主，恢复和加强党内正常的民主生活。在战争年代，军队讲民主，就能打胜仗。规模最大的是解放战争，那时军队也最讲民主，仗怎么打法，作战方案怎么定，允许连队讨论，提出意见。这是毛泽东同志的创造，也是全军的创造。军队能够讲民主，为什么党内不能讲民主呢？我以为要按党章办事。少奇同志在七大做的修改党章报告，小平同志在八大做的修改党章报告，都讲到党内民主生活问题，但这几年有的同志把它搁到一边去了。当然有些事情是中央带的头。比如开电话会议，是中央先开的，以后一层一层开下去，电话会议又无法讨论，只能层层下压，这是不对的。少奇同志和小平同志的修改党章报告，对党内民主生活都有过说明。乱斗争行吗？不行。随便撤职，随便开除党籍，随便捕人、打人，都是不行的。当然有些是属于违法乱纪性质的，这不只是党内问题了。违犯了国家法律的，要按国法处理。

我们党内正常的民主生活要尽快恢复起来，毛泽东同志

的建党思想要恢复起来，现在被搁在一边的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通通都要恢复起来。党内要有正常的民主生活，要实事求是，要按照党章办事。

论知识分子问题^{*}

（一九六二年三月二日）

这几年，特别是近两年，从事科学工作和戏剧创作的同志很勤劳，很辛苦。虽然生活供应差，工作条件受到限制，甚至精神上也有些不愉快，但在科学工作、戏剧创作方面仍然取得了显著成绩，值得庆贺。我特别要向你们致敬。

今天能有机会和全国高级的优秀的有成就的科学工作者、戏剧写作者聚在一起谈一谈，对我个人来说是很高兴的事。因为时间关系，我只谈一个问题：知识分子问题。这个问题也包括我在内，我也是知识分子出身，谈起来会更亲切些。

一 知识分子的定义和地位

这个问题在党内部分干部中常常有不同的解释，在知识分子中也有些疑惑。现在尽我的能力作个初步解释，不能担

^{*} 这是对在广州召开的全国科学工作、戏剧创作等会议代表的讲话。同月二十七日、二十八日，周恩来同志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做的《政府工作报告》，进一步阐明了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时期的地位和作用，明确肯定了我国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是“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

保今天讲的都是成熟的，如讲得不恰当就改正。

知识分子不是独立的阶级，而是脑力劳动者构成的社会阶层。一般地说，这个阶层的绝大部分人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是附属于当时的统治阶级并为其服务的。在奴隶社会为奴隶主服务，在封建社会为地主阶级服务，在资本主义社会为资产阶级服务。在剥削阶级占统治地位时，知识分子多数是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出身于劳动人民的很少；只有剥削阶级才有条件求得知识，求得更高的知识。当时的大多数知识分子，常常容易接受并传播剥削阶级的旧观点和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体系。在奴隶社会、封建社会或资本主义社会，尽管也有朴素的唯物主义，但总是唯心主义占上风。在旧社会，也会有一小部分知识分子能预见到真理，敢于反抗当时反动阶级的黑暗统治和压迫，为新兴的进步的阶级说话，成为革命的知识分子。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生长在资本主义社会，他们都是知识分子，敢于反抗当时的统治阶级，投入到新的阶级队伍中来，为新的阶级说话。他们背叛了原来的阶级，投降了进步的阶级。欧洲文艺复兴〔70〕时期，中国从鸦片战争〔141〕到辛亥革命〔73〕，都有一部分进步知识分子传播新的思想、新的学说。这些知识分子同样也遭到反动统治阶级的迫害，遭受反动知识分子的歧视和压迫。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人民已经处在统治地位，知识分子才转变到为人民服务。一方面旧的知识分子得到了改造，一方面又培养出了新的知识分子，两者结成社会主义的知识界。现在还存在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差别。将来到共产主义社会，阶级和党派消灭了，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的差别消灭了，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差

别也就不存在了。

以上讲的是一般情况，是从整个社会历史发展阶段说的。

资本主义后期产生了殖民主义体系和帝国主义的统治。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许多国家成为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半殖民地。这个广大地区的知识分子，同帝国主义国家的知识分子相比，有很大的特殊性。他们大多数站在民族立场上，反对外国殖民者和本国的卖国贼、民族叛徒以及帝国主义直接或间接豢养的走狗，成为革命的、爱国的知识分子。就连受外国欺压的民族资产阶级中的绝大多数人，也或先或后地站到了反帝爱国的立场上。所以毛主席再三地说，我们要团结世界上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来反对帝国主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具体地说，是指工人、农民、进步的知识分子、进步的民族资产阶级分子和进步的民主人士（有一些还是封建阶级出身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就属于这种特定范围的社会阶层。

二 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发展过程

中国什么时候有知识分子？讲起来很远，远在奴隶社会就有。这是属于郭老〔265〕、范文澜〔266〕等历史学家们研究的问题。我只讲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发展过程。

（一）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无疑地都受到帝国主义、反动统治阶级的种种影响。我也是其中的一个，是封建家庭出身，头上留过辫子。存在决定意识，怎么能没有影响？

（二）我们曾为旧社会服务，纵然不是为北洋军阀〔6〕或国民党直接服务，也是为旧社会服务，不能说没有受旧社会的

影响。

（三）我们都受过资产阶级教育，甚至一部分人还受过封建教育，如上塾馆，拜过“天地君亲师”〔267〕，磕过头，手心挨过打，罚过跪，封建教育嘛！不过现在也还有些用处，知道些诗云子曰。解放后我去天津，回到曾读过书的南开中学，第一句话就说：“我在这里受过资产阶级的教育，但是也要感谢，当时对我有启蒙作用。”受到资产阶级教育，不能光说不好，它对我也有启发。这样说才全面一点。

这三条是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的“根”，这种“根”，不能否认。

还是以我为例。有人问我是哪里人，我说原籍绍兴，生在淮安，江浙人。为什么这样罗嗦呢？因为我的亲兄弟、堂兄弟都是绍兴人，我不能不说原籍是绍兴，否则就有企图摆脱这种关系的嫌疑。我生在淮安，祖父当过淮安县知事，外祖父是淮阴县知事，现在还有家属在淮安，如果我不说生在淮安，和他们的历史关系也无法交代清楚。一个人的历史关系要交代清楚，这样没有坏处。不管现在情况如何，不能抹掉过去的历史。我经过革命锻炼，现在当然不再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应该说是革命知识分子了，但写历史不能把过去那一段抹掉。毛主席很不满意有人写他的传记时，说他从小就懂得很多，什么都知道。毛主席说他小时候还烧过香。我小时候也迷信过菩萨，后来还相信过无政府主义〔268〕。五四运动〔39〕时，我们组织了觉悟社〔269〕。后来有人问邓颖超〔270〕：那时你们是不是共产主义小组？她回答说：还不能称为共产主义小组，是研究新思潮的一个组织。我们的社员有研究无政府主义的，有

研究基尔特社会主义〔271〕的，也有研究共产主义的。以后有不少人加入了共青团和共产党。青年人不了解，以为这样说太谦虚了，其实历史是发展的，个人也是发展的。一九二〇年我到法国，还对费边社会主义〔272〕有过兴趣，但很快就抛弃了。我感谢刘清扬〔273〕和张申府〔274〕是他们两人介绍我入党的。张申府的思想很杂，研究罗素〔275〕哲学着了迷，他想把孔子、罗素、马克思、弗洛伊德〔276〕、爱因斯坦〔277〕的思想熔于一炉。

总之，有一点要肯定，大家是从旧社会来的，不管现在如何，过去都属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类型。

但是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一方面，应该看到中国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和压迫，因而有一部分人参加了革命，一部分人同情革命，多数人开始时对革命观望、中立，以后逐渐靠近革命。反革命的知识分子是极少数。直接为清朝、北洋军阀、国民党反动派服务，真正成为他们的工具压迫人民的只是少数。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是如此，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也是如此。从鸦片战争到现在一百二十多年的历史事实证明，为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产阶级服务的知识分子，都是没有前途的。溥杰〔217〕过去到日本留学过，有什么作为？还是新中国改造了他，才有了用。他的叔父载涛〔222〕过去做过军谘大臣，不如现在当人大代表，可以为人民服务。在我们这里有不同等第的人，沈衡老〔278〕是进士公，黄任老〔79〕是举人公，董老〔279〕是秀才公，还有翰林公〔147〕。秀才、举人、进士、翰林都有。过去想做点事业，可是做不成，有什么办法？

北洋军阀时代的李根源〔280〕是我的“同行”，当过国务总理，能为国家民族做什么有益的事？国民党时代的行政院长翁文灏〔60〕回来了，也是高级知识分子，当时跟他们走有什么出路？死心塌地为美帝国主义服务的胡适〔281〕，直到了结生命，还是没有出路。反过来，历史的发展证明，知识分子只有同无产阶级，同劳动人民，同共产党一道前进才有出路。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都证明了这一点。

不论是在解放前还是在解放后，我们历来都把知识分子放在革命联盟内，算在人民的队伍当中。解放前，毛主席在《论联合政府》中讲过。解放后，刘少奇同志在一九五六年党的八大一次会议上也讲过，他说：“无产阶级只有同广大的可以接受社会主义的群众结成联盟，才能形成最大多数人对于反动阶级的专政。”我们是团结全国的最大多数人，在民主的基础上实行集中，是最大多数人对少数人实行专政。人民民主专政不同于资本主义社会、封建社会、奴隶社会的少数人对多数人的专政，剥削阶级对劳动阶级的专政。他还引用列宁的话：“无产阶级专政是劳动者的先锋队——无产阶级同人数众多的非无产阶级的劳动阶层（小资产阶级、小业主、农民、知识分子等等）或同他们的大多数结成的特种形式的阶级联盟，……是为最终建成并巩固社会主义而成立的联盟。”〔282〕列宁在对“非无产阶级的劳动阶层”的说明中包括了知识分子。这是讲的无产阶级同其他劳动者的联盟。中国又扩大了联盟，一直扩大到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中国是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有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任务，要同民族资产阶级保持政治上的联盟。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

盟是无产阶级同非劳动者的联盟。坚持这两种联盟是我们的战略方针和长期的历史任务，在我国统一战线中将长期起作用。对知识分子的估计要以这个为纲。这一点，党内不少干部常常不注意，解释不清楚。无产阶级根据这个既要同其他劳动者结成联盟又要同非劳动者结成联盟的方针，就提出了一个改造的任务。

（一）无产阶级首先要进行自我改造。天下没有完人，觉悟程度是逐步提高的，认识也是不断发展的，因此要经常进行自我改造。无产阶级有自己的阶级本性，反抗剥削压迫，思想先进，但要发展成为有高度觉悟性、战斗性、组织性的阶级，也要进行自我改造。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生活在一个社会里，不能不受资产阶级思想意识和习惯势力的影响，而且还有封建的影响。所以，无产阶级、共产党要不断消除自己队伍中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影响，把旧的东西剔除掉。只有能自我改造的人，才能改造别人。在延安整风^{〔14〕}时，毛主席就首先要求党内进行学习和改造。

（二）无产阶级对其他劳动者实行团结、教育、改造的方针，这主要是对农民和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说的。改造什么呢？改造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和习惯势力，使他们接受无产阶级的思想和观点。要求农民同农村中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影响作斗争，要求知识分子改造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和习惯势力。这样，才能使他们和无产阶级一道建设社会主义，将来还要建设共产主义。

（三）无产阶级对民族资产阶级又团结又斗争。在经济上采取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方针，利用其有利于国计民生的方

面，限制其不利于国计民生的方面，从加工定货到定股〔283〕定息〔124〕，进而取消定息，消灭其阶级的经济基础。在政治上思想上则要改变其阶级立场和观点。这要经过长期的工作。这种工作的目的是要使他们成为社会主义的新人。当然，民族资产阶级也是我们的同盟者，但是属于另外一个方面的同盟者。

总起来说，无产阶级对其他劳动者或非劳动者的改造，是为了最后消灭阶级和阶层。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共产主义。到那时，工农差别、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差别都不存在了。这需要一个很长的时期，中间要经过许多阶段。

两种联盟的矛盾性质不一样。无产阶级同其他劳动者之间不存在对抗性的矛盾，同非劳动者之间还存在着对抗性矛盾的一面。无产阶级要消灭资产阶级，不是对抗性的吗？但我们改变资本主义所有制采取的是赎买的政策，而不是没收的办法。对农民则是逐步引导他们从个体所有制进入集体所有制，这是非对抗性的矛盾。解决非对抗性的矛盾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要采取说服、教育、示范、提高的办法。同样，体力劳动者与脑力劳动者之间的差别，也要经过长期的过程，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通过互相学习，逐步接近，才能逐步消除的。这样看，我们同知识分子的联盟与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是有根本区别的。

由于中国知识分子有上述的发展过程，使得他们也有两重性：一方面是脑力劳动者，可以为人民服务；另一方面又与旧社会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党和国家有必要与可能对他们采取团结、教育和改造的方针，知识分子也有必要与可能摆脱旧社会的影响，成为适应新社会需要的知识分子。所以

说，党和国家对知识分子的根本政策，也是知识分子本身的基本任务。

根据这样的方针和自我改造的任务，十二年来，我国大多数知识分子已有了根本的转变和极大的进步。一九五六年我曾作过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对知识分子的状况作了初步估计。刘少奇同志在一九五六年党的八大一次会议上也说，“知识界已经改变了原来的面貌，组成了一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队伍”。毛主席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是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的，到一九五七年六月才发表，那时已有右派进攻〔249〕，但并不因此而改变原来的分析。他说：“我国知识分子的大多数，在过去七年中已经有了显著的进步。他们表示赞成社会主义制度。他们中间有许多人正在用功学习马克思主义，有一部分人已经成为共产主义者。这部分人目前虽然还是少数，但是正在逐渐增多。当然，知识分子中间有一些人现在仍然怀疑或者不同意社会主义，这部分人只占少数。”毛主席对知识分子的估计，是很清楚的。

从一九五七年到现在，知识分子受到了锻炼和考验，特别是最近两年，全国人民除少数反动分子外都经住了这种考验。我们一方面在建设中取得了伟大的成绩，另一方面在工作中也出现了偏差和错误，加上三年来农村灾荒，粮食和经济作物减产，城市工业生产也有些下降，市场物资供应减少，物价部分上涨，实际工资有所下降。这种情况还要持续一个时期。中国知识分子的大多数同工人、农民一样经得起考验。我们不能说没有人对这种情况有意见，意见是应该有的，大多数人

是出于关心提出改进意见，希望情况有所改善。只有极少数人幸灾乐祸。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大多数是热爱祖国的。科学工作会议的《简报》我都看了。《简报》上反映了这样的情况，大家工作努力，生活上克服困难，甚至遇到心情不怎么舒畅的事情还能克制自己。你们热爱祖国，使我们很受感动。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骄傲！中国人民是从民族苦难的日子里熬出来的。在座的有的是经过几个朝代的人，看到了民族解放，人民胜利了，参加了社会主义建设，经受了困难，对前途充满了信心。

从《简报》中还看到大家提出了一些善意的批评，不能不使我高兴。经过十多年的努力，知识分子队伍壮大了，从老一辈知识分子手里培养出了新一代知识分子，文化、教育、卫生等方面都培养出了新的力量。饮水思源，是党的政治思想工作起了作用，也是知识界共同努力的结果。青年人的成长是老一辈亲手培养的，这一点要很好地向青年人讲清楚。从老知识分子身上找毛病是很容易的，但要看主导方面，要看到各有所长。比如我讲话可能不如青年人讲得流利，但是谈问题、论经验则比他们深些。如果说要互相尊重，首先要教育青年知识分子尊重老年知识分子。老年知识分子中许多人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有些人加入了党，这是可喜的现象。

但是，十二年当中，甚至很长时期内，总有一小部分人怀疑或者不同意社会主义，保持原来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立场，拒绝改造甚至进行反对社会主义的活动。这些人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甚至是右派。毛主席对民主党派领导人曾经讲过，

现在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消灭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要做“梁上君子”〔284〕，这部分知识分子应该投到无产阶级方面来，承认共产党的领导，这才有出路。这话是有所指的，是在一九五七年五一前后说的，但是到六月，右派还是进攻。当时反击是必要的，但这决不会动摇我们党在整个历史时期对知识分子的根本政策和战略方针，决不会改变无产阶级同其他劳动人民的联盟。我们党内有一部分同志对这些认识不清楚。

在知识分子内，也和党内一样有左、中、右。任何党派、社会团体内都有左、中、右，这是规律，是客观存在。左、中、右或者说进步、中间、保守，他们之间也会相互转化，保守可以转向进步、中间，中间、进步也会变成保守。但是有些部门和机关用左、中、右去排队就不好了。人的思想状态是会变化的，政治思想、主张经常有变化，特别是对科学上生产上许多问题的看法不同，不属于政治思想上的分野，更不能用左、中、右去划分。如在建设工作中，有个时期说高指标是正确的，低指标是保守的，这是不对的。现在钢的产量定在一千万吨以下，这不是保守，不是右倾，这样可以搞得扎实些，对建设更为有利。指标能高就高，该低就低，不能拿这些来作政治分野。

就是对一小部分坚持资产阶级立场的知识分子，只要他们不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我们在政治上还是把他们算在联盟之内，对他们进行教育。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的则作别论，那就是反革命，就是犯法了。对右派，还要给他们工作，还要容纳在统一战线之内，有的还在政协嘛。我们要团结最大多数的人，能改造的改造过来，不能改造的孤立

起来。

这是对中国知识分子发展过程应有的认识。党没有低估知识分子的作用，党的政策是明确的。知识分子也应心安理得地知道自己的作用。

三 如何团结知识分子

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说：“我国的艰巨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需要尽可能多的知识分子为它服务。凡是真正愿意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知识分子，我们都应当给予信任，从根本上改善同他们的关系，帮助他们解决各种必须解决的问题，使他们得以积极地发挥他们的才能。我们有许多同志不善于团结知识分子，用生硬的态度对待他们，不尊重他们的劳动，在科学文化工作中不适当地干预那些不应当干预的事务。所有这些缺点必须加以克服。”现在看来，毛主席这段话仍然是击中要害的，完全适合当前的情况。如何团结知识分子，应该根据毛主席的这段话去做。

首先谈一谈我们党能否领导一切。一九五七年以后，党对科学文化工作的领导进一步确立了。知识分子承认和接受党的领导，是党和人民的胜利，也是知识分子的光荣。必须肯定，党应该领导一切，党能够领导一切。现在的问题是如何领导一切？什么是一切？这个问题正在逐步解决。我们已经制定科学工作十四条〔285〕、高等教育六十条〔286〕、工矿企业七十条〔287〕，文艺方面也提出了几个初稿〔288〕。关于党如何进行领导，存在着各种想法。解决这个问题，必须在中央领导下提

出一套办法来，征求党外朋友的意见。

下面我谈谈关于党的领导方面的几个问题。

第一，党的领导范围。我们说党领导一切，是说党要管大政方针、政策、计划，是说党对各部门都可以领导，不是说一切事情都要党去管。至于具体业务，党不要干涉。人家熟悉，要信任他们。如果他们做不好，可以检查，有意见可以讲，但党委的意见不一定都是对的。如果什么都管，连发戏票、导演戏都去管，结果忙得很，反而把大事丢掉了。小权过多，大权旁落，党委势必成为官僚主义、事务主义的机构。

第二，党的领导不是党员个人领导。党是一个集体，是有组织的。党的领导是组织领导，不是个人领导。党员个人怎么能领导？一个单位的个别党员，怎么能说他就是党的领导？党章没有规定党员有这样的权利，实际上也不可能有这样的本事。尤其是一些年轻党员，应该向有经验的知识分子学习。我们过去在广州搞革命时，少年气盛，有点“乱指挥”，这种不好的传统不要学。要学毛主席好的传统——调查研究，从实际出发。个人没有权力领导一切，不管是谁。如果把我下放到剧团，虽然我也曾演过戏，现在必定是个蹩脚的演员，只有向人家虚心学习，哪能领导？我们到下层单位最怕听“请指示”。就有这样的党员，人家请他指示，他就俨然以领导者自居，摆出领导者姿态，发号施令。这是最坏的官僚主义者。要平等待人才是好勤务员，才不是官僚主义者。

第三，上下级要有区别。例如一个学校，党的领导是指学校党委领导，有些事情学校党委也不能解决，要请示上级党委决定。至于支部，如系支部、剧团支部、车间支部，只是起保证

监督作用,不是指挥,下命令还得要行政首长才行。

第四,党委领导是集体领导,不是书记个人领导。没有经过党委讨论的大事,书记不能随便决定。行政上的事由行政决定,书记也无必要去干涉。

第五,外行领导内行要有个范围。以前我们讲过外行能领导内行,这是讲的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的领导。党委书记、委员有些不懂专业,但可以超脱专业,看到全局,通过党委集体研究作出贯彻党的方针政策的决定或贯彻上级指示的决议。我们说外行能够领导内行,不是要外行去干涉业务,对业务确实不懂嘛。外行变成内行,要经过学习,就是学会了,也要尊重专家,尊重群众意见。有些同志说,科学研究要走群众路线,不要搞群众运动,这个说法比较恰当。科学研究不是靠突击和群众运动能解决问题的。

关于如何正确对待知识分子,我以为有六个问题要解决好:

第一,信任他们。他们承认和接受党的领导,愿为社会主义服务,愿意自我改造,党就要信任他们。你信任他,他也就信任你,彼此有了信任,就可以团结在一起工作。

第二,帮助他们。知识分子所处的环境需要党的帮助,以诚心诚意的态度去帮助他们,对工作才有好处。

第三,改善关系。过去关系不好的,应该改善,先从党委、党员方面做起,先检查自己,不能只责备人家。检查了自己就能引起共鸣。党的具体政策你在执行中有偏差和错误的,要作检查。党团结知识分子的政策,要通过党员和党组织实现。

党内有些术语不合适,每次看到心里就不安,如在一些登

记表上分“党员”、“群众”。这两个词不是同一组概念，党员、非党员才是同一组的概念。党员也是群众中的一员，包括领导人在内，不能自居于群众之上。“党员”、“群众”的分类，使党员居于群众之外、群众之上。我们犯官僚主义，一方面由于自己脱离群众忙于事务，另一方面是别人把我们封锁起来。我们也很苦。希望领导同志要自觉，不要把自己置于群众之外，不要被封锁。

第四，要解决问题。不解决问题使人感到诚意不够。问题能够解决的，一定要解决。现在问题成堆，不能一下都解决。科学工作会议的《简报》，快出到五十期了，其中提到的有些问题不可能马上都解决。但要负起责任来，力求逐步解决。

第五，一定要承认过去有错误。对于党与非党的关系、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上级与下级的关系、各部门之间的协作关系，会上有些意见批评得很对。各级领导要以老老实实、实事求是的态度，承认错误，改正错误，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过去对同志们批评错了的、多了的、过了的，应该道歉。党内我已道过歉，现在利用这个机会，再作个总的道歉。

第六，承认了错误还要改。只承认错误，不去改正，还是空话。凡是党和政府方面犯的 error 都要改正。改要有实际行动。

以上六个问题要解决好。

四 知识分子的自我改造

（一）所有的人包括共产党员在内都要自我改造。改造有

性质上和程度上的不同。对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的改造，是带有强迫性的，这与人民内部通过劳动、生产、学习进行的改造有性质上的不同。人民内部的改造，只有程度上的不同，没有性质上的不同。旧东西多的多改，旧东西少的少改，去掉坏的影响。

（二）思想改造是长期的。把资产阶级世界观转变为无产阶级世界观，需要一个过程。首先是爱祖国，进一步愿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更进一步接受党的领导，逐步改变旧的立场和思想体系。就是长期在党内锻炼的同志，无产阶级世界观也不见得那么巩固。

（三）改造靠自觉。自我改造的程度如何主要决定于自觉性。

（四）改造的方法要和风细雨，不能粗暴。这样气才能顺，心情才能舒畅，才能接受帮助。帮助人不能给人“上大课”，知识分子最怕别人给他“上大课”，要促膝谈心。

（五）改造要互相帮助，互相学习。没有人是专门改造别人的。自居于领导，自居于改造别人的人，其实自己首先需要改造。要对这种人大声疾呼：“请你自己先改造！”任何共产党员都不是十全十美的，不可能什么都懂。人生有限，知识无限，到死也学不完，改造不完。帮助人家，首先要学习人家的长处。

（六）人总有缺点的，世界上没有完人，永远不会有完人。事物总是有矛盾的，有矛盾就能促进事物发展，如果停止发展，就会灭亡。

自我改造是为了进步，是光荣的事情。现在大家肚里有

气，是我们工作没有做好，帮助不够，要把这个扣子解开。毛主席说，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过去科学、文艺工作方面成绩是主要的，希望今后要不断改进，取得更大的成就。

国民经济的调整工作 和当前任务*

（一九六二年三月二十八日）

中共中央在一九六〇年下半年，对国民经济工作提出了以调整为中心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这个方针，是在当前的条件下，具体贯彻执行党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289〕的方针，是一个既从当前实际情况出发、又为长远打算的积极的方针。它包含着多方面的内容，主要的是，要适当地调整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的相互关系，生产和基本建设的相互关系，经济事业和文教事业、国防事业的相互关系，积累和消费的相互关系，以及财政、信贷和物资的相互关系。各个经济部门和文教部门的内部，也要进行适当的调整。

在社会主义建设经过了一个非常大的发展以后，进行全面调整是十分必要的。在我国前几年社会主义建设的大发展中，出现了许多不协调的现象。为了改变这种不协调的现象，为了巩固已有的成绩，为了给以后的国民经济的新的新发展创造条件，就必须用一个较长的时间，即用几年的时间，通过

* 这是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国内形势和我们的任务”部分的第二节。

综合平衡、全面安排，进行较大幅度的调整。

在当前的国民经济调整工作中，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是一个中心环节。我国国民经济中出现的不协调现象，农业生产下降的影响最大。没有农业的恢复和发展，就不可能有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多年来的经验完全证明，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必须以工业为主导，而以农业为基础。我国有广大的农业，农业现在的生产水平又是很低的。在这种情况下，工业的发展不能不受农业的限制，也就是说，工业的发展规模，绝不能超过农业提供商品粮食、工业原料和其他农副产品的可能性，也绝不能挤掉农业所需要的劳动力。只有当农业生产提高以后，我国工业的发展才能得到更有利的条件。我们应该充分发挥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改进农业的生产条件，适当地增加对农业的投资，加强各方面、特别是重工业对农业的支援。这样，农业生产力就能够逐步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能够逐步地提高。所以，我们必须遵照毛泽东主席的指示，把农业放在发展国民经济的首要地位，按照农业、轻工业、重工业的次序来安排经济计划。重工业必须为农业提供越来越多的各种农具、农业机械、化学肥料、木材、燃料等等，来不断地提高农业的劳动生产率，使农业能够为工业和城市提供越来越多的粮食、原料和其他农副产品。轻工业必须尽可能为农村提供越来越多的日用品，以利于发展城乡交流，逐步改善城乡人民的生活，增加国家建设资金的积累。

一九五八年以后几年，重工业有了巨大的发展，这是大家感到高兴的事。但是，重工业内部各行各业的发展是很不平衡的。在进行国民经济调整工作中，为了恢复和发展农业，为

了适当地发展轻工业，为了协调重工业内部各行各业的关系，我们必须放慢重工业的发展速度，有些重工业部门的生产指标，必须大幅度地下降。这样做，是十分必要的。这是因为：第一，如果继续采取过去那样高的速度发展重工业，势必妨害农业的恢复和发展，妨害轻工业的发展，这不但对人民的生活不利，而且重工业本身也不可能继续高速度发展。第二，重工业内部的填平补齐，要花很大的力量，只有把那些过分突出部分的生产指标降下来，才能加强那些薄弱的部分。第三，某些产品产量的下降，是为了提高它的质量和增加它的品种。质量提高了，品种增加了，即使数量较少，也会得用得多。例如钢材，就是这样。第四，维修好国民经济各部门急需维修的设备，是目前的一项重要工作。而要维修好设备，也必须适当减少某些产品的生产，以便腾出一些材料和生产能力，生产必要的部件、配件和零件。所以，我们在一段时间内降低重工业的某些生产指标，正是为了使整个国民经济在长远时期内能够更好地前进，使现有的生产能力真正发挥它的作用。

这几年，我们施工的建设项目很多，有些已经建成和部分建成，有些已经停建，有些还在施工。即使那些已经建成和部分建成的项目，有许多还没有建立必要的协作关系，或者设备还不配套，或者还缺乏原料、材料，都需要有一个较长的时间，进行大量的工作，才能逐步地发挥作用。因此，现在一般地不应该再增加新的项目，而且，对还在施工的项目必须逐个地进行审查，坚决地停建一切应该停建的项目，推迟一切应该推迟的项目，以便集中力量，建成那些十分必要的重要项目，并且使那些已经建成和部分建成的项目配起套来，逐步地发挥作

用。今后几年内，我们都要根据这个方针来安排基本建设，这是调整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

随着农业、工业生产和基本建设的调整，商业方面，财政金融方面，文化教育事业方面，也都必须进行一系列的调整工作。

一九六〇年以来国民经济的调整工作进行的情况，大体如下。

在农业方面，一九六〇年下半年，我们除了在改进农村人民公社的工作方面，进行了巨大的努力以外，还采取了一些支援农业生产第一线的有效措施。一九六一年，我们继续进行这些方面的工作，并且从城市动员了约一千万人下乡，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是最近几年从农村到城市来的，他们回去以后，加强了农业生产战线。由于贯彻执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六十条〔290〕，由于实行以生产队为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大为提高，农村的形势就开始好转。虽然由于自然灾害，一九六一年的夏收很差，但是全年的粮食产量比上一年要多一些。在许多地方，家禽、家畜的数量，目前正在逐渐上升。

工业的调整工作是从一九六一年开始的。我们在这一一年较大幅度地减少了重工业的生产任务，缩小了基本建设规模。我们努力增加日用品的生产，恢复了手工业生产合作社。中共中央制订的国营工业企业和手工业的工作条例草案〔291〕，对于改进工业企业的经营管理工作，对于改进手工业生产，有着重要的作用。目前，工业生产下降的情况已经基本停止，产量开始稳定，有的开始上升，不少产品的质量有所提高，品种

有所增加。

这几年，我国职工人数增加了很多，就业面扩大了，使一部分家庭增加了收入。但是，职工人数和城市人口增加过多，工资总额增长过快，而农业和轻工业又减产很多。这样，商品供求之间就出现了差额，城乡供应都比较紧张，职工的实际工资有所下降，人民生活发生困难。

在商品不足的情况下，国营商业部门和有关部门做了不少的工作，加强了农副产品和工业日用品的收购；在灾区和非灾区之间组织了某些生活必需品的调剂；压缩了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学校、部队的集团购买力，腾出了一部分商品供应市场；基本上保证了城镇居民最必需的粮食、蔬菜、食油、食盐、煤炭、日用品等的定量供应。定量供应城乡居民的商品，价格基本上是稳定的。

由于连续三年灾荒，一九六〇年和一九六一年，我们减少了粮食的征购数量。一九六一年我们从国际市场进口了五百万吨粮食。大家知道，全国解放以后，我国不仅不再进口粮食，而且每年有一定数量的粮食出口。现在进口粮食，虽然一时是必要的，但是，这种状况必须尽快地努力加以改变。

一九六〇年冬天，各地方有计划、有领导地开放了农村集市贸易，这对于促进农副业生产发展，活跃农村经济，起了一定的作用。现在，各地方正在根据这一段时间的经验，加强对农村集市贸易的管理。一九六一年，许多地方又恢复了农村中的供销合作社。

一九六一年，在城市中，国营商业除了平价供应的商品以外，开始出售糖果、糕点等少数几种高价商品。这是在物资不

足、购买力和商品供应量之间差额过大的情况下的一种临时性措施。

随着经济各部门调整工作的逐步展开，我们对教育、科学和其他文化事业也进行了必要的调整，适当地降低了它们的发展指标。在科学研究、高等教育方面，由于试行关于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当前工作的十四条规定草案〔285〕和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286〕，工作开始有了改进。

应该指出，我们对于调整工作的认识是有一个发展过程的。在中共中央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以后，政府虽然做了许多工作，但是，在有些方面贯彻不力，调整不够全面，没有迅速地在应该后退的地方退够，没有迅速地在应该加强的地方足够地加强。现在，经过一段时间调整工作的实践，我们更加清楚地认识了调整工作的必要性和应该采取的措施、步骤。

在一九六二年，我们必须采取更有力的措施，切实按照农业、轻工业、重工业这样的次序，对整个国民经济进行全面调整，合理安排，以便集中主要力量，逐步地解决人民的吃、穿、用方面的最迫切的问题，并且逐步地在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建立新的平衡。当然，这并不是说，全部调整工作今年就可以做好。我们应该在今后几年中，把调整作为经济工作的主要任务。但是，今年的工作做好了，就能够为以后的调整工作打下可靠的基础，就有可能争取较快地完成调整任务。从这个意义上说，一九六二年是调整国民经济的极关紧要的一年。

当一九六〇年实现第二个五年计划所规定的一九六二年主要工业产品的生产指标的时候，国家计划委员会即着手拟

订第二个五年计划后两年的国民经济调整计划。由于在一九六一年继续遇到了严重的自然灾害，而且灾情更重，由于在调整工作的过程中，发生了许多新的问题，还有许多情况没有摸清楚，需要进一步研究，所以，我们编制两年调整计划的工作，还没有全部完成。国务院请求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同意：国务院在第二个五年计划后两年的国民经济调整计划确定以后，把这个计划连同财政预算，提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由人民代表大会授权常委会审议批准。

这里要说一说当前调整工作的任务。这些任务，是在一九六二年要做的事，其中有些也是在一九六二年以后还要继续进行的。

为了做好一九六二年国民经济的调整工作，国务院要求各级政府机关、各行政部门的全体干部，加强调查研究，继续摸清情况，按照中共中央既定的方针、政策，在中央集中统一的领导下，扎扎实实地进行工作，特别要抓紧完成增产节约、精兵简政、稳定市场、改善供应这几个方面的任务。具体说来，有下列十项。

第一，争取农业增产，首先是争取粮食、棉花、油料的增产。

一九六一年，我国农业生产的情况已经开始好转，但是，好转的情况，在全国各地是很不平衡的。有一部分地区生产上升，大部分地区生产已经稳定下来，还有一部分灾情特别严重的地区，生产情况仍然不好。从现在的条件看，全国大多数地区要恢复到原来最高的生产水平，还需要作艰苦的努力。我们应该用一切可能的力量，争取一九六二年有一个比较好

的收成。

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首先必须增产粮食。有了粮食，才能比较迅速地恢复经济作物的生产，才能保护和增殖耕畜，发展家畜和家禽。在努力增产粮食的同时，要适当安排棉花、油料等经济作物的播种面积，保证它们逐年有所增产，以便逐步增加城乡人民的布匹、食油等生活必需品的供应。合理安排种植面积和人力、畜力，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各级政府和农村人民公社，在安排的时候，要很好地同生产队商量。

农村人民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要继续贯彻执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实行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规定，更好地调动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要把一切可以利用的零星小块的土地尽量利用起来，力争多种多收。要抓紧水利、积肥、选种、修补中小农具、田间管理和防治病虫害等工作，尽力提高单位面积产量。要切实保护好耕畜，做好牲畜的配种繁殖和兽疫的防治工作。农村人民公社的各级干部，都要正确地领导生产，在推行各种增产措施的时候，一定要根据当时当地的条件，吸取群众的经验。

国营农场必须加强管理工作，严格实行经济核算，努力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农、牧业产品的商品率，完成和争取超额完成国家计划。

应该注意保护林木，努力植树造林。应该努力发展畜牧业和渔业。

各级政府应该组织各方面的力量，加强对农业的支援。对于农业所急需的生产资料，特别是制造和维修中小型农具、车、船的材料，制造化肥、农药的原料，要尽可能优先保证

供应。

各级政府在安排农产品征购任务的时候，要同时安排好群众的生活。

第二，合理安排轻重工业生产，尽一切可能多增产日用品。

为了适当满足城乡人民生活的需要，扩大城乡之间的商品交换，改善市场供应的状况，我们在安排工业生产的时候，应该首先注意安排日用品的生产。轻工业部门和手工业部门，当然要努力增产日用品；重工业部门，凡是有条件的，也应该尽可能地增产适合市场需要的日用品。

由于农产品原料不足，在日用品的生产中，应该尽可能利用重工业部门生产的原料、材料。有些轻工业和重工业都需要的原料、材料，在分配的时候，应该先照顾轻工业的需要。轻工业部门和手工业部门，应该使那些原料、材料消耗低而产品质量高、品种多的企业，能够优先得到供应。

一切轻工业企业和手工业单位，一切重工业企业，都要厉行节约，争取用较少的原料、材料，生产更多更好的产品。对于一切可以利用的废气、废物，应该注意回收，充分利用。

重工业部门当前的首要任务，是保证农业生产资料的生产，增产更多的化肥和农药，增产更多的中小型农具和适合的、质量更好的农业机械。同时，还应该为轻工业多提供原料、材料。重工业部门应该努力增产目前特别感到不足的原料、材料和燃料，并且要根据国民经济各部门设备维修和配套的需要，有计划地安排急需的备品、配件、零件和必要的辅机、主机的生产。

重工业各部门应该根据上述任务和可能条件，进行调整工作。对于那些不是当前急需、原材料供应不足的产品，应该降低它们的生产指标，并且对生产这些产品的企业进行必要的裁并。对于那些当前各方面急需、而又供应不足的产品，应该努力增产。对于煤炭、木材等，为了保证它们能够在一定水平上持续生产，应该妥善安排它们所必需的材料、设备和投资。重工业各部门在调整工作中，都必须注意生产能力的填平补齐、成龙配套。

工业部门对于国防建设所必需的材料和设备，要注意组织生产。

一九六二年工业方面一项重要的工作，是切实按照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改进企业的经营管理。一切工业企业，都要加强责任制，加强技术管理，加强经济核算，加强劳动保护，在提高产品质量、增加产品品种、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成本这几个方面，做出显著的成绩。

交通运输部门，应该进一步整顿好运输秩序，并且切实安排好短途运输。对于车、船和铁路、公路、航路，要做好维护的工作。

第三，进一步缩短基本建设战线。

目前基本建设战线仍然过长的情况，对国民经济的调整工作是不利的，我们计划再减少一些不是十分必需的基本建设项目。这样做，不仅可以腾出一定数量的材料、设备和人力，用到最急需的方面，特别是农业生产方面，而且可以集中力量，使那些最重要的建设项目，能够建成投入生产，发挥作用。

鉴于过去对基本建设项目和投资的管理不严而造成战线过长的教训，今后，一切基本建设项目和投资，都要列入国家计划。基本建设项目，都要按照国家规定的程序，逐项地分级地审查、批准；没有经过审查、批准的，一律不准动工。列入国家计划的项目，各部门、各地方也要根据设备制造情况、需要的缓急和施工技术力量，进行排队，依序完成，并且保证质量。

过去两年中，我们已经停建了一些基本建设项目，今年又将停建一些项目。建设项目中途停建，是会造成一些损失的。但是，如果应该停建的还不停下来，就势必分散力量，使许多重要的工程不能迅速发挥投资效果，就会造成经济上更大的损失。当然，对于那些中途停建的项目，必须切实做好维护工作，避免损失。一切停建项目的设备和材料，必须由国家统一调剂使用。

第四，压缩城镇人口，精简职工。

压缩城镇人口，精简职工，这是调整工作的一个重要环节。目前的城镇人口仍然过多，农业可能提供的商品粮食和其他农产品，供养现有的城镇人口还有困难。工业生产和基本建设的指标降低以后，现有的职工人数也还显得过多。我们的机关、企业和事业单位，仍然存在着机构庞大、人浮于事的现象。为了改变这种状况，我们计划在一九六二年继续压缩城镇人口和精简职工。

动员城镇的人口和职工，首先是动员从农村来的职工，回到农村参加生产，不仅可以加强农业生产战线，提高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和机关的工作效率，而且可以减轻城市供应的困难，

节省国家的开支。各个部门、各个单位，应该做好动员工作和组织工作，城镇乡村密切配合，妥善安置精简下来的人员。我们希望到农村去的职工，在农业生产和建设的光荣岗位上，为国家做出新的贡献。

现在有些企业、有些部门的负责人，还没有从全局利益出发，下最大的决心精简职工。他们总想把一些以后可能有用的人力都保留下来。这种想法是不对的。当然，企业在精简职工的时候，要注意保留必要的技术骨干，但是，有些技术工人，如果目前没有适当的工作，也应该动员他们回到农村去，农村很需要他们。将来企业单位技术力量不足的时候，还可以把他们调回来参加工业生产。

在城镇和人口密度大的农村，要认真地提倡节制生育。

第五，彻底清理仓库，重新核定资金。

目前物资不足，给生产建设和人民生活带来了不少的困难，但是，许多地方、部门、企业、事业单位中还积压着大量的属于全民所有制的物资，不能统一调度，合理使用。为了改变这种不合理的状况，国务院已经决定，要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一次清理仓库、调剂物资的工作。所有的企业、事业、机关、学校、部队各单位的仓库，都要进行一次彻底清理。清查出来的物资，由有关部门按照国家的统一规定，分别处理。企业的流动资金，将根据新的情况，由国家财政机关重新核定；多余的资金，一律收归国库。这样，就可以使积压的物资和资金活动起来，用在当前调整工作最必需的方面。根据初步统计，仅积压的钢材一项，至少有一百多万吨。这些积压的物资，只要我们统一调剂使用，就会逐步地发挥作用。

第六，改善市场的供应状况。

各级商业部门和商业企业，在稳定市场方面担负着艰巨的任务。在一九六二年，必须切实做好商品的收购工作和供应工作，扩大城乡物资交流，使市场供应的状况有所改善。

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对于农副产品和三类物资〔292〕的收购，要兼顾国家、集体、个人三方面的利益，恰当地规定购留比例，并且努力改进收购办法。国营商业对于日用工业品，要及时地进行收购，按照国家的规定统一调度。国营商业对于一部分日用工业品，合作社商业对于一部分手工业品，可以采取加工、定货的办法，增加货源。

在商品不足的情况下，合理地分配商品是一项很重要的工作。国营商业部门要尽可能多地组织切合农村需要的工业品下乡，凡是农村急需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应该优先供应农村，以适当满足农民的生产和生活的需要，促进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并且多换回一些农副产品，供应城市居民的需要。在城市中，要改善商品的供应办法。为了尽可能挤出更多的商品供应市场，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学校、部队要进一步节约行政开支和事业费用，压缩集团购买力。

为了适应工业生产多方面的需要，改变某些企业之间以物易物和采购人员过多的现象，国务院确定恢复和加强一些专业公司的业务，统一组织有关物资、特别是三类物资的供应。

一切国营商店、供销合作社、消费合作社和合作商店，都要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切切实实地为城乡人民的生活服务，为农业和工业的生产服务。所有的商品，都要按照正常的商

业途径出售，彻底纠正和防止开“后门”的现象。

国营商业应该切实改善经营管理工作，加强对整个市场的领导，使农村中的供销合作社、城市中的消费合作社和合作商店发挥它们应有的作用。国营商业今年要把一部分人员，包括原来的小商小贩，转到合作商店；对于他们要加以妥善安排。

商业部门和税收机关必须加强对农村集市贸易的管理，并且同投机倒把现象作斗争。

第七，保证完成对外贸易任务，偿还外债，努力承担国际义务。

建国以后，苏联给予我们的贷款，对于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起了很好的作用。这一部分贷款，我们已经偿还了大部分，还有一小部分没有偿还。最近几年，我们在同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贸易中，对他们又有一部分欠款。所有这些外债，我们将争取在几年内逐步还完。今后，我们应该继续发展同各兄弟国家的互助合作。同时，在平等互利的原则下同资本主义国家发展贸易。

胜利了的中国人民，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同时，还要根据可能的条件，给兄弟国家和民族主义国家以援助，这是我们不可推卸的国际义务。事实上，并不光是我们援助他们，他们也援助了我们。我们对兄弟国家和民族主义国家的援助，现在还不是很多，但是，这种援助，是他们所需要的。他们的建设工作做好了，他们的反帝国主义的力量增强了，这就是对我们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重要支持。

为了有计划地偿还外债，承担必须承担和可能承担的国

际义务，为了换取我国所需要的进口物资，尽管国内工农业产品不足，我们还是应该挤出一些来出口。各地方、各有关部门，都必须努力按质、按量、按时地完成国家规定的出口商品的生产任务和收购任务。

第八，提高文化、教育、科学研究、卫生等工作的质量。

为了使文化、教育、科学研究、卫生等各项事业的发展同经济建设的发展相适应，这些部门，也应该贯彻执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并且以调整为中心，来安排自己的工作。

一九六二年，各级学校都要努力提高教学的质量。全国的高等学校，凡是具备条件的，都应该试行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

科学研究部门，应该适当调整现有的机构和研究人员，充实重点的科学研究单位，并且加强各个科学研究单位之间的协作。

卫生事业方面，要切实改进医疗工作，加强疾病的预防，增产中西药品，增加城乡药品的供应。

文艺、新闻、出版、广播、体育等事业，也都要进行适当的调整，提高质量，更好地为国家建设和为人民服务。

第九，节约支出，增加收入，加强现金管理，保证财政收支平衡。

保证财政收支和信贷的平衡，是政府当前的一项重要工作。所有的经济部门和企业单位，都要改进经营管理，加强经济核算，加强财务管理，努力降低生产成本，努力降低商品流通费用，尽可能增加收入，减少支出。

现金管理不严的情况，应该彻底改变。一切企业、事业单位和机关团体，都要严格遵守国家的现金管理制度、信贷管理制度和财政管理制度。企业从银行借的款，应该按期归还。企业的流动资金，只能用于生产周转和商品流通的需要，不能用于基本建设、弥补亏损和其他财政性开支。一些企业的亏损现象，应该迅速改变。财政金融部门应该加强对国民经济各部门的财政监督。

各部门、各地方、各企业、事业单位、各机关、团体，都应该继续坚决贯彻执行勤俭建国的方针，反对铺张浪费，努力节约开支。

第十，进一步改进计划工作。

为了适应国民经济调整的需要，国务院责成政府的各级计划机关，把主要的注意力，从工业交通方面转移到农业和市场方面来，切实按照农业、轻工业、重工业的次序和调整的具体任务，安排国民经济计划。

计划机关在拟订国家计划的过程中，应该进行系统的调查研究，根据准确的资料，集中各部门、各地方的初步计划，精打细算，不留缺口，做好综合平衡，力求使国家计划指标符合实际，并且适当留有余地，保持必要的后备。

我们的计划工作必须走群众路线，倾听群众的意见，吸取各方面的专家、科学家们的意见。

各部门、各地方，都应该及时地如实地提供情况和统计数字，提出关键性的问题，拟订有可靠根据的计划草案，帮助国家计划委员会制订切实可行的国家计划。在国家计划确定以后，都要严格执行，保证实现，不得随意改变。对于计划的执

行情况，要严格检查。

调整国民经济的任务是十分艰巨的。目前，我国国民经济还有相当大的困难，人民吃的东西、穿的东西、用的东西，都还不足。这种情况，需要一个时间的艰苦努力，才能够根本改变。在实现调整任务的过程中，我们还可能遇到这样或者那样的新的困难。对于这些，都应该有足够的估计。但是，困难从来没有吓倒过勤劳勇敢的中国人民。我们有着战胜困难的许多有利条件。这些条件主要的是：

第一，我们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巩固的工农联盟和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广泛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全国各族人民同党和政府密切合作，这是战胜困难的最大的保证。

第二，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已经进一步发展和完备起来，这对于促进全国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的思想统一和行动统一，有重大的意义。

第三，在过去几年的伟大实践中，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所取得的丰富的经验，包括许多正面的经验和一些反面的经验，使我们有可能进一步地认识和掌握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规律，把工作做得更好。

第四，农业生产正在逐渐上升，农村形势正在开始好转，这对于克服目前的困难，对于活跃整个国民经济，对于进一步巩固工农联盟，都有重要的作用。

第五，这几年扩大了的工业生产能力，新增加的农田水利建设，正在逐步地越来越大地发挥作用。这是我们克服困难的重要的物质条件。

只要我们能够充分地运用这些有利条件，善于依靠群众，

同群众商量办事，发挥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就一定能够一步一步地战胜我们面前的困难，胜利地完成国民经济的调整任务。

我国人民民主 统一战线的新发展^{*}

（一九六二年四月十八日）

今天，讲一讲我们国内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新任务和新发展。我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不仅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取得了全国的胜利，而且在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继续取得了胜利，现在面临着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任务。因此，在人民民主统一战线这个组织、这个力量面前又提出了新的任务，它又要有新的发展。前天我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会议上也说了，对一切事物的发展都有一个认识的过程，我们的统一战线也是一样。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统一战线由建立、扩大、缩小、再扩大，一直到胜利，在这中间，我们就有反复的经验。革命胜利以后，在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是起了作用的，动员了社会上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来参加社会主义改造的工作，使我们的社会主义改造进行得比较顺利、比较快。进入了社会主义建设阶段，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任务就更重了，就要负起新的任务（当然，同时还有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就要有新的发展。就是说，它在社会主义改造和

^{*} 这是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的讲话。

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伟大成果的基础上，现在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动员更多可以动员的因素，来参加社会主义建设，扩大我们的民主生活。这就是我们的新任务。不要把我们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看成只是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它的作用，不但表现在社会主义改造方面，而且表现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我们要把建设的任务担当起来。

为着更好地实行民主集中制，我们首先要扩大和发扬民主生活，这也是我们人民民主统一战线要担当的任务。在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中间，不能说一切参加的成员和所动员起来的力量对我们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都是同意的，会有一部分人不同意的。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应当具体分析，区别对待。如果有人违背了毛主席所说的“六条标准”〔293〕，站在敌视和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立场，甚至进行破坏活动，那么，他就是自外于人民，变成非人民内部矛盾了，当然不能把他当作人民内部的问题来对待了。“六条标准”更集中地说就是：接受共产党领导，积极为社会主义服务，愿意进行自我改造。如果采取了这样的立场和态度，在具体政策上持有不同的意见，与其说应该允许，毋宁说我们欢迎。在人民内部有一些对立面的意见，这对我们的进步是有好处的。我们不可能设想，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是铁板一块，大家都是一个想法，对任何问题的看法都一样。如果我们的统一战线是这样，它就不能发展，就会停止不前，甚至要后退。不要说一个组织、一个团体、一群人不能有这样的情况，就是一个人的头脑里面，也不能有这样的情况。每天的客观存在，反映到人的头脑里面，在思维的过程中，经常有不同的意见产生。自己肯定了的東西，后来自己

又否定了。这样看对了，那样看又不对了，几个侧面看完全了，才掌握了全面。原来没有认识到的，后来认识到了，以后又有了更加新的认识。这样，一个人的思想才能发展，一个党的政策也才能完备，一个团体的工作也才能在这个过程中间得到改进。我们的统一战线组织也要在这样的发展过程中间前进。所以我们说，毛主席提出的两类矛盾，特别是人民内部矛盾，是会长期存在的。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指导我们统一战线民主生活的原则。因此，我们应该肯定统一战线的任务是加重了，有了新的发展。同时，我们应该在统一战线的内部，提倡在“六条标准”的原则下发表各种不同的意见，彼此讨论、研究、切磋，以求得更好的认识，求得更符合于真理，不断推动我们的事业前进。从这一点上看，我们这一次的会议，可以说是初步反映了这个要求，是一个开端。

这一次我们开了二十多天的会，有二百多位委员发言，提了四百多件提案。我们不能说，大家的意见都说完了，要说的都说出来了。如果这样看，就把问题看死了。不可能的，还会有一些保留的意见没有说出来，先说一点看看，看党和政府机关能不能接受。这样的想法是允许的，也很自然。因为过去一个时期说得少，批评得少。现在我们大开言路，开了以后，是否会发生问题呢？有这种想法的人，我们应当允许他们保留意见，应当等待。的确，我们也得看看。大家提了这么多的意见，其中有的是好的，有的是要斟酌的，有的是不能成立的。党和政府机关是否真正采纳？提案审查委员会提出来的审查意见，交到有关机关去，它是否做？我想，应该观察一个时期。比如昨天胡先骕^{〔294〕}先生的讲话，我当时就把他的讲话稿送

到科学技术委员会去了，请聂荣臻副总理去研究办理。我也要保留一点意见，也要看一个时期，晓得科委是否真正研究照办呀！所以，不仅是发言人本身要看看，就是我们主持事务的人也要看看。当然，不是所有的意见都能够马上做的，有的还要斟酌，有的还要准备条件，但都要认真进行研究。我们这个统一战线，要动员广大的力量来发扬民主生活，参加建设。不单是政协应该做，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民族、各方面都要把它所联系的人们动员起来参加，这才是把统一战线的全部成员动员起来了。所以我们说，这是一个开端。我希望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根据这样一个认识，我想分别说说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第一，有关政协的工作问题。

今后政协的工作，责任更重了。政协过去的工作，应该说做得不错。这一次陈叔通副主席关于政协工作的报告，内容就比过去更丰富，说明我们各方面工作更发展了。但是，我们觉得还不够，还要求更好地发展。首先，政协要多组织一些调查研究工作。要使我们的建设搞得更好，首先就要实地调查，才能知道实际情况，如实反映情况，才有具体材料、具体经验可供讨论和研究。不要面临政协开会了，才到下面去视察访问，平常也可以分期去，比如说一年下去几次，不一定都要同时去。现在是调整阶段，更需要多知道实际情况。政协这个机构，应该参加这个工作，到农村和城市去进行调查研究工作，再回到政协里面来时，就可以交换意见了。不管中央的、全国的、地方的，都可以交换意见，交换经验。这样，我们的座谈会、报告会就有生动的事例来讨论，就能够产生一些提案、

意见和建议，使得各方面的力量都动员起来。其次，政协过去的工作，偏重于政治学习、国际活动和文史资料的收集，今后要多开展学术性的报告和讨论，要有意识地多邀请学术界的朋友参加。这一次会议反映这方面的意见多起来了，发言的同志在这方面也提供了很多宝贵的意见。从建设的要求来看，我们也需要发展这方面的工作。过去一个短时期里，全国政协也曾经组织过学术性的报告会，但是做得不多。今后除去政治学习和文史资料的收集工作还应继续进行外，应该更多地进行学术性的报告和讨论。我们是政协机关，可以同时提出各种不同的意见，争论的结果，不一定得出一致的结论，可将不同的意见提交有关方面，如政府机关、科学研究机关、教育机关或者其他学术团体。这些不同意见的提出，表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在这里的贯彻。多有些不同的意见，就使执行机关能从多方面去考虑，利于选择比较更恰当的方案来执行。

第二，共产党在政协的责任。

大家都承认共产党是领导党，共产党的领导是指党的集体领导，党的中央和党的各级领导机构（省、市、县委员会等）的领导。起着领导作用的，主要是党的方针政策，而不是个人。个人都是平等的，如果从工作上说，大家都是人民的勤务员，彼此平等地交换意见，决不能个人自居于领导地位。个人离开了集体，就无从起领导作用。个人的意见不能代表政策，必须制定成政策，才能算为集体的意见、领导的意见。所以，个人平常讲点意见，包括我今天在这里的讲话，是个人的意见。不能说今天我所讲的每段话，都经党中央集体讨论过，当然有

些是讨论过的，但有些只是个人的意见，只能作为建议供大家参考研究。所以，共产党员必须首先把这个界限划清楚。在政协里边，在我们个人的来往当中，没有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只有领导机关和政策才是代表领导的。不然的话，我们的民主生活、民主风气就不能够发扬，我们之间就有隔阂，中间本来没有墙，就会有一座精神的墙隔着，妨碍民主集中制的贯彻。其次，要实现民主生活，还要求共产党员多交党外的朋友。既然我们扩大了统一战线，共产党又在这里起领导作用，我们党员应该把许多党外的意见集中起来，集中到党的领导机关来。这就要和党外的朋友来往，就要听到一些不同的意见。共产党员在一起也会有不同的意见，但是由于工作环境相同，政治生活相同，这些人的意见总是比较容易接近。因此，所反映的总不会那么全面，一定要听取各方面的意见才能全面。同样，党外朋友如果听不到共产党的意见，也会想得不那么全面。所以，党内外应该相互多交朋友，特别是共产党员应该主动多交党外的朋友。每个共产党员都得有几个党外朋友来往，可以多交新朋友，也可以有些固定的朋友，能够反映一些意见，敢于提出意见的。陈毅副总理昨天谈到，要有畏友。就是说，他敢于提出不同意见，敢于批评对方的短处，习惯了就不是畏友而是诤友了。我们共产党员要多听不同的意见，才能多知道各方面的意见。不同的意见不一定都对，但你要听了才有比较。当然，在不同的意见中，更重要的是广大群众的意见，就是在公社、工厂等基层组织里从事生产活动的广大群众的意见，还有学校里的群众的意见。这些直接从群众中来的意见更加宝贵。我们共产党员既然参加了政协，那就要特

别注意多接触自己不熟悉的事情和不熟悉的人物。你既然不熟悉，就证明你在这方面有缺陷，你去接触了，才能认识，才能了解，才会得到有益的东西，即使是反面的意见，甚至不对的意见，你也可以作比较。习惯于只限在自己的小圈子里，只喜欢听相同的意见，听不到不同的意见，对不熟悉的事也不愿意去熟悉，把自己局限起来，这样工作就会越做越窄了。所以，我们首先要求党员多交朋友，希望参加会议的各省、市、自治区的党员回去后将上述的精神向在地方政协的党员传达。这次会议上，有朋友说，希望共产党员多和党外人士接触。我想这个要求是合理的，你们有权利提出这个要求，因为每次会议相隔一年，这次更长，有一年多不会面，有这么个机会，朋友们当然有权利要求同共产党员多接触，多交换意见，多谈心。

总之，党员要承认我们有很多事情还不知道，知识还有限。我们的确是要做到老学到老，改造无止境。有这样的精神，才能有进步。我们难道都改造好了吗？不可能的，总有些渣滓，总有点需要改造的，有自觉我们才能进步。这方面要求共产党员应该严一些。如果说“严于责己，宽于责人”，对共产党员就应该要求严些。党外的同志们也应该责备我们严一点。我想责备严是好事，是统一战线中的好朋友。当然这是为了把国家搞好，把社会主义事业搞好，而不是对个人的攻击。

第三，各民主党派的责任。

各民主党派在统一战线中的责任，应该说不是轻了，而是更重了。有不少朋友参加了最高国务会议，说了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刘主席说：责任在共产党，在共产党中央，民

主党派没有责任，或者很少责任。毛主席也这么说。而民主党派的许多朋友说：民主党派也有一定的责任。我看这样说法很好，把责任引为己任。那么，好了，过去的已经过去了，我们取得了教训。今后要把事情搞得更好，大家要共同负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民主党派要负起监督的责任。我们把事情报告出来，也作了初步的经验总结，今后根据大家同意的方针和任务去执行。在执行过程中，民主党派要进行监督、提意见。所以我们说：民主党派在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责任是更重了，而不是轻了。各民主党派都是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本身就锻炼各党派和他们的成员。各党派的成员中总是有进步、中间和落后的，正如共产党员一样也有进步、中间和落后的。各党派就要在组织中不断地以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个标准，把自己的成员锻炼成忠实于社会主义事业的人，不断地推动他们进步，使中间状态的转向进步，摆脱落后。除原有的成员外，一个组织总还有新的成分进来，党派总还有发展，吸收进来的也有进步、中间和落后的，所以党派本身就具有不断改造不断推进的作用。对于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由于存在的各个阶级、阶层的状况比较复杂，不能设想得太容易。我们过去有一段时间设想得太容易一点，以为经过社会主义三大改造^{〔129〕}，我们的社会不是属于全民所有制就是属于集体所有制，好象社会主义改造很快就能完成。不仅农村，城市都得进入人民公社，把街道里弄都改造过来，成员都改造过来。而且还有一部分人，认为很快地就能从集体所有制转到全民所有制。现在看来这些想法是不恰当的。我们这样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人口这么多，地区

这么辽阔，民族这么多，尽管民主革命进行得彻底，社会主义改造进行得顺利，但是，整个社会的改造是不可能一下子就完成的。因为它的经济水平比较低，在这样的经济水平的基础上，上层建筑不可能那样快地完整地改造好，总是参差不齐，不平衡现象总是长期存在的。社会主义改造要随着整个社会主义建设的进展才能相应地完成。如果说我们中国实现现代化需要几十年的时间，那么，整个社会主义社会完全建成，就得花更长时间，然后才能向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前进。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比较长期的想法，认识社会主义改造需要一个很长的时期。因为不仅是经济，而且各种旧的政治影响和习惯势力，对我们仍有影响，虽然占统治地位的旧东西被打倒了，但一些旧的政治影响也还是依靠旧的习惯势力而存在着，至于思想作风上的问题就更多了，这种改造就要更长时期。广大的劳动人民尽管从本质上说是有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的，但旧的习惯、思想作风在他们的头脑里还起影响，也要进行改造。何况我们的社会存在着各界、各阶层的分子，更加需要努力改造。因此，各党派要动员所代表的方面，不仅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并且努力改造。各党派代表的方面不一定相同，在比较接近的那一方面多做工作，就更可以促进社会主义的改造，使整个社会主义改造的发展更健康一些。这就是说，不仅从建设的意义上，而且从改造的意义上，也需要各党派的合作，根据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来进行工作。

第四，工会的作用。

工会是统一战线中的人民团体，是工人阶级的阶级组织。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他不仅要把自己的成员教育好，还要影

响其他阶级阶层；不仅自己的组织要健全，还要影响其他方面。现在我们面临着调整的任务，首先在工人队伍本身就要进行一些人员调整。工会要在调整中对它的成员做工作。工业、交通、基本建设系统和各种企业事业、国营农场，都是工会活动的范围，都要搞好增产节约。工人生活现在有一定的困难，如何保证生活供应，如何帮助解决生活上的困难，工会负有很大的责任。因此，在国家任务面前，工会今天的责任更重大更复杂，要做的事比以前更多而不是更少。工会要配合党和政府去进行工作，因为工会是党的主要助手，统一战线的主力军。工会不仅要注意解决工人生活困难问题，而且要把生活问题提到政府面前。中央和地方上的精简工作如果做不好，工会有权把问题提出来，要起监督作用。当然不是与政府对立，是协助政府办事。政府没做好的事，工会可提意见。党派互相监督，工会也可以同其他方面互相监督，这要作为任务，大家一条心，朝着一个方向，把工作做好。

第五，青年团的作用。

青年团任务也加重了。别的不说，就拿青年学生的教育，我前天在人大会议上讲了，我们今年高等学校和中等学校要少招生，因此高小和初中毕业生就会有一部分不能升学。在这方面，青年团就有工作可做，可以在城市和农村组织和推动补习教育，使青少年不至于因无学校可上而到处乱转。帮助他们自修自学，也可以培养出一批人才。不一定人人都是从正规学校毕业才能到社会劳动，有一部分没有进大学的也可以一样做事。我们同辈党员中有很多专家并没有进过正规的大学。我们这一代是如此，后一代是不是一定都要在大学或高

中毕业？我看在目前经济情况下还不可能要求这么高。将来要求人人至少达到中学毕业，但现在还不可能实现。这就需要青年团在这方面进行教育，提倡自修自学，帮助补习，不仅可以公办，也可以自办。一个人在家开业帮助几个青年补习功课，收点学费是允许的。这是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以外的一种辅助的方式。甚至于某些手工业者、文艺家收几个徒弟学习，也是许可的。我们应该开这方面的路。

还有，在城里征兵，去年是第一年实行，有成效，打算今年还继续实行，特别是在大、中城市。青年团要在这方面好好宣传。我们提倡“好男当兵，四海为家”，社会主义社会培养教育出来的有了选举权的青年要积极报名入伍，造成一种空气。特别是干部子弟更要做模范，要带头入伍，入伍后也不要因为是干部子弟就要求受优待。

第六，妇女组织的作用。

妇联在一些方面也要负责任。例如，要在居民委员会和农村中提倡补习教育。要帮助做母亲的鼓励成年的儿子入伍。有时候，干部子弟入伍，做母亲的反而更舍不得，当然这是个别现象，但是也值得提出来。我前天讲到，在城市和人口密度大的农村中，要提倡节制生育。希望妇联也来提倡一下。过去做过，证明是有效的。

第七，工商联的工作。

工商联的责任也加重了。一方面，我们对工商业者的定息〔124〕，延长三年，到时再议。另一方面，工商业者也面临着调整的情况。工商业者里面有民族资产阶级分子，小业主等上层小资产阶级分子，也有小商小贩，其中一部分要回到集体

经营或者是个体经营的商业中去，一部分还保留在国营的企业、事业单位里面，也有一部分年老的可以实行退休制度。这些人如何安置，政府要负责，但是工商联可以协助政府来进行工作，调查这方面的情况。我觉得目前的情况，不但全国的工商管理局要加强，省、市的工商管理局也要加强，好跟工商联联系。对工商业者的安置要适当，例如有些人不适合到农村去，家又在城市，就不能勉强，应该在城市里面安置。在这一方面，问题比较多。工商业者中间也有一些生活困难的，工商联可以从定息中抽取一定的比例作互助金，如果不够，政府也可以协助。我跟陈叔老^{〔147〕}谈过这个问题，要在这方面研究一些具体的办法。工商联协助政府在工商业者的改造、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和生活安置等各方面做工作，更要加紧，不要放松，事情会更多，不会更少。

第八，文教科学团体。

在这次会议上，大家的提案和发言讲得最多的是这一方面的问题，从数量上和质量上来看都很重要。陈毅^{〔213〕}同志昨天在发言中答复了很多，我不想在这里再多说了。总之，我们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要拿出自己的力量来，这就需要使文教、科学队伍更加强、更发展，质量更提高，教学制度搞得更好。这方面的工作，过去一个时期注意得不够。今后不仅要从政府系统、教育系统、科学研究系统和生产系统来加强，就是政协系统，也要来加强。要使我们文教科学事业的发展适应经济建设的要求，把过去的追求数量转到重视质量、重视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真正使我们在文教科学方面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能够做得更好，不仅是形式，而且是有内容的。拿

政协来说，担任副主席的各位，从文教出身的就占多数。昨天陈毅同志自告奋勇，这一方面如果有意见可以向他反映。不仅陈毅同志，我们管科学、管文教的其他同志也在这里，希望这一方面被重视起来。

至于思想上拔白旗、插红旗〔264〕的问题，昨天陈毅同志讲得很好。思想上怎么来拔白旗？红旗怎么能插进去呢？解决思想问题，这需要逐步提高认识，通过自我学习、自我认识、自我改造的过程，才能办到。昨天陈毅同志说，中共中央对这一提法没有责任，是下边搞的。我要给他改正一下，他可能忘记了。昨天文教办公室的张际春〔295〕同志给我写了一个条子，他说中央有一个文件上面有这么一句话。我今天查了一下，果然是这样。中共中央应该承担这个责任。这个话说得很生硬，可以作几种解释。属于头脑中的事情，怎么能一下子拔白旗、插红旗呢？这样是插不进去的。有时候对一种估计或者一种情况，随便一说，文字上没有注意，就会引起不好的后果。我们应该承认这种缺点错误。

第九，兄弟民族的关系问题。

这一点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已经回答了。关于民族自治区的一些问题，需要在会后经过政府的程序来解决，还可以在政协的民族组来讨论，人大的民族委员会和政府的民族事务委员会还准备合起来开会讨论。有一些需要政府执行的，一定尊重各个兄弟民族的代表人物所提出的好的意见，经过考虑和研究来执行。例如过去在行政编制上、民族干部问题上，有许多处理是有缺点错误需要改正的，这里就不去多说了。

第十，宗教问题。

政协里有宗教单位。过去一个时期，这方面的工作有些缺点错误，一些宗教界的朋友提出来批评，有许多好的意见是值得我们重视的。我们把宗教信仰问题常常看得太简单了，拿共产党员马列主义的认识来要求所有的人，要求所有人的的人生观、世界观都一样，这是不可能的。思想认识是逐步改变的，而且思想认识问题是人民内部的问题。就宗教信仰来说，更是一个长期的问题。我们只是希望，爱国的宗教界人士，热爱祖国，愿意为社会主义服务，也愿意努力学习。这样，他们思想上还有宗教信仰，这并不妨碍我们整个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扩大和团结，并不妨碍我们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

第十一，华侨问题。

这一次参加人大、政协会议的华侨代表，都是在国内工作的。政协只有几位委员在港澳工作，人大只有两位代表在香港工作。联系华侨要通过我们的华侨事务委员会。华侨工作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侨居在国外的；一个方面是他的眷属在国内，或者回国来工作、学习的。党和国家有关这一方面的政策，已经讲过多次。目前也发生了一些问题。例如照顾眷属的问题，华侨干部在城市工作怎样下放的问题。有很多人原来在城市，适合于在城市安置。这些问题，我们的华侨事务委员会应该注意，政协的华侨组也可以研究。

政协所包含的还有其他的方面，我就不一一去说了。

总之，我们政协包含各个党派、各个人民团体，是由这些单位的成员组成的，通过这些单位的成员，联系全国的各个方面，联系全国的人民，以至联系到海外的侨胞。通过这次会议，使得我们的统一战线更扩大、更深入了，工作更加重了。

人大所批准的政府工作报告和我们的方针任务，通过我们政协，向国内的广大人民讲清楚，我相信是会收到我们预期的效果的，正如《人民日报》在昨天的社论中所号召的：“团结奋斗争取新胜利”。我们肯定了成绩，批评了缺点错误，也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方针任务，这样就可以增强我们建设的信心，保证我们能够克服面临的困难。我们团结奋斗，争取新的胜利，是有把握的，是有信心的。

认清形势，掌握主动^{*}

（一九六二年五月十一日）

刘少奇同志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296〕的报告中分析了全国的形势。他说，我们最困难的时期已经基本度过了，但目前还处在一个严重困难的时期。对于这一点，我在那次会上作了分析。现在看来，总的情况还是那样，但需要作进一步的说明。

为什么说我们的政治形势和经济形势，从总的方面看最困难的时期已经基本度过了呢？

在政治上，全党全国人民的绝大多数，党外人士的绝大部分，高举三面红旗〔297〕，取得了成绩，经历了困难。经过这次考验，大家是团结的，这在和平建设时期，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同时，这几年对各项具体政策，我们也在逐步补充和完备。

在经济方面，我们开始高举三面红旗前进的时候，对于新的事物缺乏经验，在执行中犯了很多错误，有很多缺点，而且有很多是原则性的、很严重的。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从正面反面初步总结了经验，逐步地认识和掌握了新情况下的发

^{*} 这是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第一部分的节录。

展规律，不象过去那样懵里懵懂了。从这一点说，我们比过去也清楚了一些。

现在，农村中连续三年灾荒造成的困难正在克服中，农业生产下降的趋势，除部分地区还在继续外，大多数地方已经停止并开始回升。这四年，工业和基本建设的计划指标本身就没有综合平衡，结果一面是跃进，一面又被迫地大调整，被迫地后退。年终的产量跟年初的计划数字差得很大。工业问题，可以说是在逐渐认清形势，逐步掌握主动。现在，我们主动地调整指标，大家在数字上基本没有争论了。前几年如果提出今年这样的调整指标，是不可设想的。这就说明，现在大家的认识比较一致了。

所以，从总的方面说，不论政治形势或经济形势，最困难的时期的确是度过了。如果现在还是懵里懵懂，后果还要严重。当然，现在影响还没有完全消除，但我们总是能够预见发展趋势了。

为什么说目前情况还很严重呢？因为我们主观上的失误造成的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后果，不是短时期能够消除的，只能逐步解决。经济工作千头万绪，毛泽东同志说要越做越细，而我们在这个时期恰恰是越做越粗，过去几年甚至可以说是越做越乱。工作上造成这样的后果，影响就比较长远，直到现在还没有结束。灾荒的后果也是严重的，虽然我们克服了许多困难，但是受灾面积这样大，影响这样深，也不是一时能够扭转过来的。

有些地区和部门的情况还很严重。部分地区工作中的错误还没有纠正过来，或者灾荒还很严重。工业、基建部门过去

工作中的错误所造成的后果还继续存在，并影响到其他部门，现在在调整中就看出来了。当然，这些地区和部门绝大多数也在纠正中，只有个别的还没有纠正。

要做好工作，应该情况明，决心大，办法对。要做到这样是很不容易的。

首先是情况明。这是毛泽东同志提出调查研究的时候特别强调的。目前我们对困难的情况是不是看得够了？我想要有分析。困难的发展趋势我们是看出来了。前年经济调整的时候，觉得很快就可以调整过来了，去年也还是这样想。今年七千人大会之后，在西楼开会〔298〕，陈云〔78〕同志讲了话，少奇同志作了结论，毛泽东同志也同意，就是说，调整时期要成为一个阶段，主要的内容就是恢复。不仅农业要恢复，工业也要恢复。因为不仅农业生产力被破坏了，工业也是这样，有些生产设备被破坏了，部分的生产秩序弄乱了，规章制度也不存在了，都要重新恢复起来。教育方面也有这个问题。现在看，这个调整时期要相当长。一般设想，第三个五年计划时期恐怕就是个调整阶段，甚至于还不够。把这个时期看得长一些，现在大家争论不大了，看法比较一致了。

是不是我们现在对困难的情况都弄清了呢？还不能这样说。趋势是看清了，调整的时期会长一些也看清了，但是具体情况常常是由极复杂的因素形成的，往往是现象发生了我们才看到。这类事情很多。例如三门峡的水利枢纽工程到底利多，害多大，利害相比究竟如何，现在还不能作结论。原来泥沙多有问题，现在水清了也有问题。水清了，冲刷下游河床，乱改道，堤防都巩固不住了。上游清水灌溉，盐碱就不能

统统洗刷掉。洪水出乱子，清水也出乱子。这个事情，本来我们的老祖宗有一套经验，但是我们对祖宗的经验也不注意了。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既要防洪，又要灌溉，又要发电，又要运输，综合利用。修三门峡的方针是对的，但是办法不对，现在不能发电，泥沙又淤塞，还要大调整。类似这样的例子很多。所以，我们不能认为现在对困难的情况都估计够了。每个部门，每个地区，大家都要警惕这一点。

少奇同志说，把困难说多一点有什么坏处呢？领导上把困难指出来，然后找出办法来克服，只有好处，没有坏处。懵里懵懂，怕说困难，一听说困难就泄气，这不是马克思主义者。革命就是要认识困难，摆出困难，提出办法，克服困难。共产党就是在克服困难中取得胜利的。革命战争是这样，社会主义改造是这样，社会主义建设也应该是这样。不管哪一个问题，都是千头万绪。姚依林〔299〕同志讲了物价政策，他是经过一番研究的，但那只是一个设想。情况复杂得很，还会出现购买力超过商品供应量、财政赤字、货币难以回笼等情况。教育、政法方面，都会出现一些新的问题。我们宁可承认对困难估计得还不大够，多看一看，这不仅不会使我们在困难面前低头泄气，反而会使我们团结起来，依靠群众，克服困难。

这两年的调整中，我们觉得，我们总是对困难估计不够，总是希望好一点，好得快一点。我个人经手的事情几乎没有一件不是如此。你说我愿意慢一点呀？总还想快一点的。当年搞钢铁，别的让路，也是我在那里督战的，结果把大家搞垮了，现在回过头来，钢铁只好让路。这还不是自己的错误？当然，有外在的因素，但外在的因素不能成为借口，还是我们不

冷静。钢的产量要求达到一千八百万吨，现在退到六百万吨。你总不能说那个一千八百万吨是对的。问题不在于后悔不后悔。不怨天，不尤人，主要是要得到经验教训。我们主观上想快一点，是好心肠，争取快，但是要准备慢。毛泽东同志说，对于社会主义建设，我们的经验还不够，还有许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从必然王国飞跃到自由王国，要有一个过程。

现在我们领导的意见接近一致了，但这还不行，还要把我们的意见传达到广大的干部中去，并且适当地向群众说清楚。当然，领导是起决定作用的，可是要把领导的意见变为群众的行动，说服群众和我们一道去做，那就需要做艰苦的工作，要经过群众的体验。现在省一级同志的意见大概跟我们比较接近了，地委就差一点，县、社、队，厂矿、各种事业单位就更差。这不能怪下面，还是七千人大会上说的，责任首先在中央，因为许多错误的东西是我们发起和创议的。当然，有的是他们做过了头，做走了样子，但这样做也是上面逼的。所以，上下认识的接近，需要一个过程，必须做艰苦的工作，不能希望很快。调整的具体工作要有步骤，要通气。党内的七千干部通了气，通过人大、政协，也跟党外人士初步通了气，但是还没有全部通气。要全部通气，也需要有个过程。

其次是决心大。现在我们决心大不大？我想，基本上是大。当然，去年已经是下大决心了，一千多万人下乡，八百七十万职工精简下来，这是一个大决心。但是去年我们还不能设想关这么多厂，拆这么多“庙”，精简这么多人。这件事情，在中国，没有哪个政权能够这样做，只有我们才有这样做的群众基础。去年没有出大乱子，今年会做得更好一些。原

来不敢下那么大决心，觉得去年下了那么多人，今年再下那么多人，不大可能。我对这个问题，一方面主张多下人，可是如何下法，要走一步看一步。所以，最初决定下七百万城市人口，其中包括五百万职工。后来许多地方要求一步走，就提出一千三百万城市人口下乡，其中包括九百多万职工。现在经过政治局常委讨论，下了更大的决心，就是下乡职工超过一千万人，下乡城市人口相应地可能争取超过二千万人。这个决心，的确也是逐步酝酿出来的，去年不可能，前年更不可能。现在下这个决心，目的就是要我们的经济生活来一个大幅度的调整，使它新的基础上来一个大改组。这是领导的决心，也是全民族的决心，几乎要震动我们全民的生活，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再次是办法对。办法现在只能有那么多，更多的办法还要依靠群众创造。革命战争是如此，建设也是如此。大家来想办法，一定有出路。各地各部门的领导同志不要怕把话说多了，不要怕我们的干部知道。你把问题说清楚了，他们的办法会比我们还多。你不说清楚，他们不晓得你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反而互相猜疑，议论纷纷。我们现在把决心传达到下面去，就可以找出办法来，经过一年到一年半的时间，就能在初步调整的基础上前进。时机紧迫，不应该犹豫了。可是另一方面，今天的情况又是千头万绪，动一根头发就要牵动全身，稍一不慎就会出乱子，我们应该有准备。一方面是力争不出乱子，另一方面也要有准备，万一出了乱子也没有什么可怕。我们只要把情况跟干部、群众讲清楚，大乱子可以克服，可是办事不能急躁，不能草率，必须谨慎从事。

在目前形势下，关键是如何处理好毛泽东同志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的农轻重关系、城乡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现在的农业基础没有办法负担这样规模的工业。工业本身也不平衡，没有办法继续均衡生产，也没有办法支援农业，支援市场，兼顾国防，比例的失调极其严重。城乡比例也失调。现在我们农业生产的各种因素，劳力、畜力、地力、水利、肥料、种子、农具、运输工具等等，都有不同程度的削弱或减少。在这样的情况下，农业的恢复要有一个相当的时间。拿粮食来说，总要三五年，少的三年，多的五年，有一部分地区也许要超过五年。至于农业的全面恢复，包括经济作物，农、林、牧、副、渔，那要超过五年。所以，我们首先就应该抓住农轻重关系、城乡关系这个关键来调整。调整不是今年一年就可以就绪的。工业也存在这个情况，工业和基本建设三年调整，就必然影响以后的三年。因为基本建设三年踏步，重点又放在支援农业上，那么，工业的后备力量，扩大再生产的能力，比如煤炭、木材、有色金属、化工材料的增长都不会很大，这就必然影响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后三年。我们在七千人大会上提出的指标，还是尽量压下来的，但是现在看来，那些指标还高了。一九六七年钢产量一千八百万吨，煤三亿五千万吨，看来都达不到。粮食产量一九六七年能不能达到三千七百亿斤，还要看两年。棉花产量一九六七年显然到不了三千七百万担。现在我们应该更冷静地看问题。我们对新的发展，总的规模，还没有完全摸清楚，要承认自己不行。

我们这样一个人口多、经济落后的国家要在经济上翻身，这是一个艰巨的任务。我们应该有临事而惧的精神。这不是

后退，不是泄气，而是戒慎恐惧。建设时期丝毫骄傲自满不得，丝毫大意不得。

目前的中心工作，还是我在七千人大会上提出的四句话：精兵简政，增产节约，保证市场，整顿秩序。

要增产，首先农业要增产，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如果不把农业这个基础恢复起来，现在这个工业基础也站不住，城市就是减了二千万人口也站不住。这个经济形势，大家看得很清楚。

抓粮食要抓两头，一头是商品粮食基地，一头是灾区。还要认真抓棉花。棉花产量不能再减了，每年总要增产才好。每人每年供应三尺布的情况不能再继续了。棉花生产的恢复比粮食还要慢。除国家注意棉花集中产区以外，地方上还可以提倡在自留地上种点棉花。自留地种的棉花不要收购。返销农村的粮食，首先要照顾棉农。

在这样的农业基础上，工业必须有一个大幅度的调整。现在工业的秩序是乱的，有些产品的指标很高，很不平衡，这种情况是难以为继的。我们的方针是按照短线平衡，不留缺口，并且留有余地。这个方针不可能一步实现，但是必须坚持，要逐步实现。至于缺门，那是任何一个国家都有的，任何国家都有些缺门短线，都要互通有无，这是另外一个问题。当然，万一世界各国都封锁我们，那我们就要搞一部分代用品，有些就要停止生产。直到现在，合金钢材、橡胶我们还是缺门，靠进口。我们国内能够生产成套设备的，就不要只生产出主机，没有副机，不配套，积压起来。到去年年底，设备积压接近一百亿元，这是一个最大的浪费。

我们现在调整工业的政策是采取关厂、并厂、缩小规模、改变任务、转业这样五个办法。全国六万多个工业企业，可能关掉一半以上。这好象是消极的，实际上，这样就可以把原材料、电力、煤炭集中到消耗少、质量好、品种多、成本低、劳动生产率高的工厂去使用。从全国来看，一个时候产量会低一些，但最后会使工业品的数量多起来，质量好起来，有一部分还可以增加出口。当然，这要经过调整，要有一个过程。

我们调整的目的，就是为了精兵简政，增产节约，保证市场，整顿秩序。缩短工业生产和基本建设的战线，相应地缩短其他方面的战线，精兵简政，减少城市人口，减少职工，达到增加农业生产和工业生产的目的，这是一个积极的方针，是一个经过调整、改组，然后前进的方针。

建成社会主义强国， 关键在于实现科学技术现代化^{*}

（一九六三年一月二十九日）

我对自然科学是外行。这次来到上海，碰到各位正在讨论制定十年科学规划，借这个机会我谈谈下面几个问题。

首先，我们要正确认识科学技术现代化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大意义。

我国过去的科学基础很差。我们要实现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把我们祖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强国，关键在于实现科学技术的现代化。

实现科学技术现代化的主要要求是：实事求是，循序渐进，相互促进，迎头赶上。前两点是指要有科学的态度。毛主席在一九四二年整风〔14〕时就提出了实事求是，这同样适用于自然科学。我国是一个人口最多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不仅要实事求是，循序渐进，还要有雄心壮志，尽快赶上世界先进水平。我们的四个现代化，要同时并进，相互促进，不能等工业现代化以后再进行农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我们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但是我们有先进经验可

^{*} 这是在上海市科学技术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以学习，有最新科学技术成果可以利用，这样可以扩大我们的眼界，所以我们前进的步伐可以加快。当然不会一点弯路不走，但总可以少走弯路。我们应该迎头赶上，也可以赶上。我们不应该跟在别人后面把所有的程序都走一遍，那样，我们将永远落在后面。只有把实事求是、循序渐进和相互促进、迎头赶上统一起来，才能使我们科学技术的发展适应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要求，比较快地赶上世界先进水平。

第二，我们要看到我们实现科学技术现代化的各方面的有利条件。

我们有辩证唯物主义思想作指导。我们不是以主观唯心主义作指导，也不是以机械唯物主义作指导，而是以辩证唯物主义思想作指导。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客观规律，更好地发挥主观能动性。

我们有广大的人力和丰富的资源做基础。我国是多民族的国家，人口众多，物产丰富，天然给我们带来的任务是：对祖国、对人类应该做出较大的贡献。历史上，我们的祖先有过许多发明，为什么到现代就不能有所发明呢？后来居上，我们是应该超过自己的祖先的。

我们有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做保证。在旧社会，某些科学家赤手空拳，单枪匹马，也还能做出一些贡献；在新社会，社会制度有了根本变化，生产力解放了，人们思想解放了，单枪匹马变为群策群力，科学家有充分发挥自己才能的广大的自由天地。当然这要有一个过程。另外，把集体需要与个人自由辩证地结合起来，也需要有一个实践和认识的过程。我们在座的一些同志，经过清末、北洋军阀政府^{〔6〕}、蒋介石反动统治

和社会主义四个时期，比较一下四个时期的情况，就可以清楚地看出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

我们已经有了了一支比旧中国大许多倍的知识分子队伍和科学技术力量。从清末派出留学生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为止，全国一共只有二十多万大学生。新中国建立后到去年为止，我们有了九十六万大学毕业生，几百万中级知识分子。再过十年，我们又会有一百多万大学毕业生。这是旧时代所不能比拟的。我们现在已经有了一支不小的技术力量和一批科学研究机构，这是国家的宝贝。

我们现在有了工业化的初步基础。一般设备和原材料绝大部分自己能够制造或生产。这就为我们科学技术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只要我们在党的领导下，把这些条件运用好，群策群力，自力更生，就一定能够后来居上，做出超过前人的贡献。

第三，如何多快好省地实现科学技术现代化的要求，我讲几点具体意见：

一、加强科技界人士的主人翁责任感。就是要做到接受党的领导，为社会主义服务，自愿地坚持自我改造。我们应该做到老、学到老。只有认识到自己需要不断地学习和改造，才会愉快。不自满，有了缺点就改，就会进步；如果自满了，那就要退步。人总是要不断地前进。大家要互相勉励，共同进步。

二、集中和加强科学技术力量。科学研究部门、教育部门和工厂要密切结合，有分工有合作，而不是把力量全部集中在科学研究部门，也不是全部集中在教育部门或工厂。如上海要集中力量突破半导体技术，别的地方如有这方面的力量就可以调来。

三、改进各方面的关系。首先是党群关系、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我这里讲的领导是指集体而言，不是讲党员个人。当然，党员个人的讲话有些时候是根据党的指示，传达党的意见。但是，人总是有个性的，某个人在某一方面兴趣大一些，因此在传达党的意见时，在某一方面多讲一些，发挥一些，这是有可能的。领导者讲话也有不是指示性的，如果一讲话就是指示，那么这日子如何过？所以我总是不大赞成讲“指示”。传达党的意见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党群之间的融洽相处。还有青老关系、师徒关系。应该把老放在前面，是老青关系，不过这样讲不顺口。带路的是老的，但青年人有活力，能够推动事业进步。还要正确处理理论和实践、任务和学科的关系，认真实现领导、专家和群众的三结合，以及科学研究机关、学校和生产部门的紧密协作。安排好这些关系是科委的责任。加强思想工作，组织科技力量，调整各方面的关系，是科委要做的事。

四、适当改善科学技术研究的工作条件和工作环境。国家科委和政府有关部门应该给大家便利。研究和教学要有实验室，生产要有车间。上海有些设备不够，必不可少的要补充，需要进口就进口一些吧，总要相当满足你们的要求。关于原材料，可以相互支援，图书也可以相互支援。订购外国书刊，开始时掌握得松了一些，因此重复的很多，但后来又太紧了。必要的图书资料还是要订。必要的交换刊物要给人家，否则人家也不给你。关于助手、技术工人的问题，上海是能解决的，需要从别处调的，个别的可以支持。总之，条件有利，就能创造出新的成绩来。

关于工作环境问题，真正的科学家在生活方面的要求并不高，但生活问题、居住问题也不能完全不考虑，如有的科学家住得太远，就要给予便利。有些科研项目需要协作完成，所以集体活动是必要的，但不要因此而排除个人钻研。科学家专业外的事情应该少一些，这是科委要安排的，每个单位也要注意。我们过去习惯于搞突击工作，对于经常的工作不是安排得很好，大家可以提意见。

我相信你们一定能够订出很好的十年科学规划。

我们的任务是艰巨的，心情是愉快的；责任是重大的，精神是饱满的。上海，作为我国最大的工业城市和科学技术的重要基地，我们对上海科学技术界寄予深切的期望。希望上海的科学技术界在实现四个现代化中做出应有的成绩。

学 习 雷 锋^{*}

（一九六三年三月六日）

向雷锋〔300〕同志学习憎爱分明的阶级立场，言行一致的革命精神，公而忘私的共产主义风格，奋不顾身的无产阶级斗志。

* 这个题词刊载于一九六三年三月六日《解放军报》。

反对官僚主义^{*}

（一九六三年五月二十九日）

官僚主义是领导机关最容易犯的一种政治病症。

官僚主义是剥削阶级长期统治的遗产。中国长期是封建社会，一百年来又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官僚主义更是有深远的影响。

官僚主义与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命令主义、事务主义、分散主义、本位主义、宗派主义，都是密切相关的。我们反对官僚主义，也就必须联系到反对这些主义。当然，不单单是这七种，但这七种特别突出。

官僚主义有各种表现，我现在把它分开来说。

第一种，高高在上，孤陋寡闻，不了解下情，不调查研究，不抓具体政策，不做政治思想工作，脱离群众，脱离实际，一旦发号施令，必将误国误民。这是脱离领导、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

党的路线、政策再好，如果执行的业务部门给阻塞住了，那就是把党和群众隔开了。所以我把这种官僚主义列为第一种。这种官僚主义是领导者尤其是高级领导者必须时时警

^{*} 这是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直属机关负责干部会议上的报告中关于反对官僚主义部分的要点。

惕的。

第二种，狂妄自大，骄傲自满；主观片面，粗枝大叶；不抓业务，空谈政治；不听人言，蛮横专断；不顾实际，胡乱指挥。这是强迫命令式的官僚主义。

一个人站在领导地位，不虚心，不平易近人，自以为了不起、什么都懂，只要有这种思想并且在作风中表现出来，就危险了。这种人大概总是不去抓业务，觉得我是领导政治的，人家的话听不进去，觉得琐碎，也不研究人家讲话的内容，结果就蛮横专断，瞎乱指挥。

第三种，从早到晚，忙忙碌碌，一年到头，辛辛苦苦；对事情没有调查，对人员没有考察；发言无准备，工作无计划；既不研究政策，又不依靠群众，盲目单干，不辨方向。这是无头脑的、迷失方向的、事务主义的官僚主义。

常有人说：“我做个辛辛苦苦的官僚主义。”好象这种官僚主义还能容许似的。我看，这种官僚主义也要批判。如果是个普通干部，忙忙碌碌，有时方向不大清楚，那还可以谅解。如果是个领导干部，怎么能容许他是个事务主义者呢？

第四种，官气熏天，不可向迩；唯我独尊，使人望而生畏；颐指气使，不以平等待人；作风粗暴，动辄破口骂人。这是老爷式的官僚主义。

第五种，不学无术，耻于下问；浮夸谎报，瞒哄中央；弄虚作假，文过饰非；功则归己，过则归人。这是不老实的官僚主义。

第六种，遇事推诿，怕负责任；承担任务，讨价还价；办事拖拉，长期不决；麻木不仁，失掉警惕。这是不负责任的官僚

主义。

第七种 ,遇事敷衍 ,与人无争 ,老于世故 ,巧于应付 ,上捧下拉 ,面面俱圆。这是做官混饭吃的官僚主义。

第八种 ,学政治不成 ,钻业务不进 ;语言无味 ,领导无方 ;尸位素餐 ,滥竽充数。这是颟顸无能的官僚主义。

第九种 ,糊糊涂涂 ,混混沌沌 ,人云亦云 ,得过且过 ,饱食终日 ,无所用心 ;一问三不知 ,一曝十日寒。这是糊涂无用的官僚主义。

第十种 ,文件要人代读 ,边听边睡 ,不看就批 ,错了怪人 ;对事情心中无数 ,又不愿跟人商量 ,推来推去 ,不了了之 ;对上则支支吾吾 ,唯唯诺诺 ,对下则不懂装懂 ,指手划脚 ,对同级则貌合神离 ,同床异梦。这是懒汉式的官僚主义。

第十一种 ,机构庞杂 ,人浮于事 ,重床叠屋 ,团团转转 ,人多事乱 ,不务正业 ,浪费资财 ,破坏制度。这是机关式的官僚主义。

凡是机关大而人多的地方 ,必定要出官僚主义 ,这几乎成为规律了。那里的领导人即使精明强干 ,也会有官僚主义。因为那个机关本来不需要那么大 ,机构搞得那么臃肿 ,一定会有很多人不办事情 ,吵吵嚷嚷 ,很多事情在那里兜圈子 ,办不出去。把机关搞小 ,有事情一商量就解决了。

第十二种 ,指示多 ,不看 ,报告多 ,不批 ,表报多 ,不用 ,会议多 ,不传 ;来往多 ,不谈。这是文牍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官僚主义。

第十三种 ,图享受 ,怕艰苦 ,好伸手 ,走后门 ,一人做“官” ,全家享福 ,一人得道 ,鸡犬升天 ;请客送礼 ,置装添私 ;苦乐不

均，内外不一。这是特殊化的官僚主义。

我们国家的干部是人民的公仆，应该和群众同甘苦，共命运。如果图享受，怕艰苦，甚至走后门，特殊化，那是会引起群众公愤的。

第十四种，“官”越做越大，脾气越来越坏，生活要求越来越高，房子越大越好，装饰越贵越好，供应越多越好；领导干部这样，必定引起周围的人铺张浪费，左右的人上下其手。这是摆官架子的官僚主义。

第十五种，假公济私，移私作公；监守自盗，执法犯法；多吃多占，不退不还。这是自私自利的官僚主义。

第十六种，伸手向党要名誉，要地位，不给还不满意；对工作挑肥拣瘦，对待遇斤斤计较；对同事拉拉扯扯，对群众漠不关心。这是争名夺利的官僚主义。

第十七种，多头领导，互不团结；政出多门，工作散乱；互相排挤，上下隔阂；既不集中，也无民主。这是闹不团结的官僚主义。

第十八种，目无组织，任用私人，结党营私，互相包庇；封建关系，派别利益；个人超越一切，小公损害大公。这是宗派性的官僚主义。

第十九种，革命意志衰退，政治生活蜕化；靠老资格，摆官架子，大吃大喝，好逸恶劳，游山玩水，走马观花，既不用脑，也不动手；不注意国家利益，不关心群众生活。这是蜕化变质的官僚主义。

官僚主义发展到这个程度，就严重得很了。一个干部、一个共产党员的最基本的要求，就是要有革命的热情，要有朝

气、有干劲。革命热情一衰退，政治上就要蜕化了。

第二十种，助长歪风邪气，纵容坏人坏事，打击报复，违法乱纪，压制民主，欺凌群众；直至敌我不分，互相勾结，作奸犯科，害党害国。这是走上非常危险道路的官僚主义。

我举了这么多种官僚主义，分析不一定很科学，也不是说在一个机关中所有各种官僚主义都已经发生。但是，必须看到，官僚主义在我们执政的党内，在我们的国家机关内，的确是十分有害、非常危险的。在我们领导干部中，官僚主义严重的虽然是少数，然而，正如党中央三月一日的指示^{〔301〕}上所说，官僚主义的态度和作风已经给我们的工作造成许多损失，如果听其发展，不坚决加以克服，必将造成更大的危害。我们绝不能容许官僚主义再继续发展下去。

过好“五关”^{*}

（一九六三年五月二十九日）

我现在讲一讲领导干部过“五关”的问题。过“五关”，就是过思想关、政治关、社会关、亲属关和生活关。

第一，过思想关。过思想关就是我们常说的思想改造，是解决世界观和人生观的问题，也就是要树立马克思列宁主义或者说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学会运用毛泽东同志的《实践论》、《矛盾论》和最近讲的认识论〔302〕。这是一辈子的事。我们知道，时代是不断前进的，思想改造就是要求我们的思想不落伍，跟得上时代，时时前进。事物的发展是没有止境的，因此我们的思想改造也就没有止境。一万年后，在人们的头脑里，还会有先进和落后的矛盾，新和旧的矛盾，个人和集体的矛盾，还会有思想改造的问题。所以我们现在怎么能说到哪一年哪一月思想改造就完成了？没有这样的事。即使参加革命多年的同志，如果忽视了改造，革命意志衰退了，还是要落伍的。所以，我们要把思想改造看成是长期的无止境的工作。这样认识问题，大家的心胸就开阔

^{*} 这是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直属机关负责干部会议上的报告的一部分。

关于过“五关”问题，周恩来同志还对知识分子、民主人士和亲属多次讲过。

了。既然一万年后还有思想上的矛盾，还要改造，为什么现在就觉得自己的思想改造已经完成了，就满足了呢？我们永远不能满足。

过思想关要联系到自身的阶级关系，还要看我们现在工作周围环境的阶级关系怎么样，接触事物中的阶级关系怎么样。比如说，你的家庭出身和本人成份很好，历史上也是革命的，可是现在把你派到香港去工作，你就要想一想周围环境的问题了。不到香港，就在北京做外交工作，跟外国人打交道，或者做外贸工作，跟外国商人打交道，那么你对接触的人和事就要研究研究了。我们跟资本主义国家做的买卖很多，现在又要引进成套设备，有的同志总是跟外国商人打交道。接触的是这些人，你就要研究呀。我也常常接触这些人，我也得想一想呀。总之，阶级关系是要注意的。还是以我为例吧。我出身于一个封建家庭，我个人受过资产阶级教育，不过经过改造现在是个革命知识分子了。历史上我做过统一战线工作，跟蒋介石打过多次交道，跟美国的马歇尔〔303〕也打过交道，在台湾有那么多国民党同学和朋友，在美国也有很多朋友，我的关系可复杂了。从周围的环境看，我接触党内外的人和事很多，也接触外国人，有时候要出国访问，还到资本主义国家，跟那些国家的领导人打交道。这么一个复杂的情况，我就得注意自己的思想。我今年六十五岁了，是不是已经修养得很好不必改造了？我不敢这样说。廖鲁言〔304〕同志用了我的话，他说，周总理都要思想改造，何况我们？他的这句话是句好话，我很欣赏。我的确常说我也要改造这句话，现在还在改造中。我愿意带头。我希望大家承认思想改造的重要性。要

承认各种关系各种事物都会影响个人的思想。要经常反省，与同志们交换意见，经常“洗澡”。要把思想改造看成象空气一样，非有不可。不然，你的思想就会生锈，就会受到腐蚀。每个党员从加入共产党起，就应该有这么一个认识：准备改造思想，一直改造到老。还没有加入党的朋友，凡是参加革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也应该这样。

第二，过政治关。最重要的是立场问题。不要以为我们是干革命的，立场就一定是稳的。立场是抽象的，要在具体斗争中才能看出你的立场站得稳不稳。可能在这个斗争中站得稳，在那个斗争中又站不稳了。所以，立场究竟稳不稳，一定要在长期斗争中才能考验出来。同时还要看我们的工作态度、政策水平、群众关系，看我们的党性，没有入党的看是不是把无产阶级作为先进的阶级，接受它的思想领导。特别是看我们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精神，是不是知过能改。可见，过政治关不是简单的事，不能认为只要参加了革命，打了多少年的仗，过去有过功绩，立场就可以保险了。没有这样的事。为什么陈独秀〔40〕、王明〔194〕的立场不保险，高岗〔305〕的立场也不保险？在陈独秀身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东西就极少，更没有成为他的指导思想。王明直到现在对自己的错误还不认帐。所以，我们要认真对待立场问题，过好政治关。

第三，过社会关。一般总是讲思想、政治两关，我特别提出后三关，是因为中国这个社会极其复杂，我们还有改造社会的任务。在这个社会里，旧的封建的资本主义的习惯势力，很容易影响你，沾染你，侵蚀你，如果失去警惕，这些东西就会乘虚而入。所以改造社会的任务是很艰巨的，处在领导地位的

同志担子更重。旧社会的习惯势力不是一下子就会消除的，改造是长期的，哪能一次改造就成功呢？旧社会的习惯势力存在于各个角落里，各种机关团体都有。一个北京城，你只要去看一看，到处可以看到旧的习气。要把北京这个社会改造好，需要几十年或者更长的时间。我看，在座的六十岁以上的人恐怕不容易看到了。所以，过社会关也不是那么简单的事，你能把社会改造好，自己也就得到改造了。不然，是你影响它，还是它影响你？《霓虹灯下的哨兵》中说，是资产阶级改造我们，还是我们改造资产阶级？这段剧词说得好。你改造了它，它又影响了你，互相改造，这是个长期的反复的斗争。而且，你在这个地方过好了社会关，换一个环境，那个地方的旧势力、旧习惯又影响你。你在国内过好了社会关，到了香港或是到外国去又变化了。所以过社会关要有精神准备，要有长期奋斗的決心。

第四，过亲属关。不只是直系亲属，还有本家，还有亲戚。对亲属，到底是你影响他还是他影响你？一个领导干部首先要回答和解决这个问题。如果解决得不好，你不能影响他，他倒可能影响你。我看，解决亲属问题的最好办法主要是依靠社会，由社会去锻炼他，改造他。要相信社会的力量。过亲属关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就不那么容易了。天天跟你生活在一起的总有这么几口子。特别是干部子弟，到底是你影响他，还是他影响你？这个问题十分重要。我呼吁我们的领导干部，首先是我也在内的这四百零七个人〔306〕应该做出一点表率来。不要造出一批少爷。老爷固然要反对，少爷也要反对，不然我们对后代不好交代。我们是社会主义社会，不象封建社会和

资本主义社会那样，但是历史也可以借鉴。秦始皇能够统一中国，可是他溺爱秦二世，结果秦王朝就亡在秦二世。我们决不能使自己的子弟成为国家和社会的包袱，阻碍我们的事业前进。对于干部子弟，要求高、责备严是应该的，这样有好处，可以督促他们进步。

第五，过生活关。生活关分两种：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物质生活方面，我们领导干部应该知足常乐，要觉得自己的物质待遇够了，甚至于过了，觉得少一点好，人家分给我们的多了就应该居之不安。要使艰苦朴素成为我们的美德。这样，我们就会心情舒畅，才能在个人身上节约，给集体增加福利，为国家增加积累，才能把我们的国家更快地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强国。精神生活方面，我们应该把整个身心放在共产主义事业上，以人民的疾苦为忧，以世界的前途为念。这样，我们的政治责任感就会加强，精神境界就会高尚。当然，我们不是说一天到晚只搞政治斗争，只干工作。人的生活要丰富一点，精神更要舒畅一点。文艺生活总是要有的，但是，我们的文艺生活是为了活跃人的思想，提高人的修养，把教育寓于文化娱乐之中。我们的文艺节目要有教育意义。那种庸俗低级的、野蛮恐怖的、堕落腐化的东西，是资产阶级和封建阶级的产物，我们应该坚决批判，坚决反对，不能用官僚主义态度对待它，容忍它。这些东西不仅对我们不利，对青年一代的成长更为不利。还应该看到，资本主义国家的某些文艺思潮和文艺作品是颓废的没落的，决不能让那些糟粕影响我们的干部，影响我们的青年一代。我们要在这方面加以整顿。上一次我在文联谈过这个问题，要整顿我们的文艺队伍，加强我们文艺

界的思想改造。

总之 ,对个人来说 ,这“五关 ”不是一次就能过了的 ,而是长期的。我们的领导干部要认真对待 ,严格要求自己 ,一步一步地过好“五关 ”。

对外经济技术援助的八项原则^{*}

（一九六四年一月十五日）

中国政府在对外提供经济技术援助的时候，严格遵守以下八项原则：

第一，中国政府一贯根据平等互利的原则对外提供援助，从来不把这种援助看作是单方面的赐予，而认为援助是相互的。

第二，中国政府在对外提供援助的时候，严格尊重受援国的主权，绝不附带任何条件，绝不要求任何特权。

第三，中国政府以无息或者低息贷款的方式提供经济援助，在需要的时候延长还款期限，以尽量减少受援国的负担。

第四，中国政府对外提供援助的目的，不是造成受援国对中国的依赖，而是帮助受援国逐步走上自力更生、经济上独立发展的道路。

第五，中国政府帮助受援国建设的项目，力求投资少，收效快，使受援国政府能够增加收入，积累资金。

第六，中国政府提供自己所能生产的、质量最好的设备和

^{*} 这是在访问加纳共和国时答加纳通讯社记者问的节录。同月二十一日发表的中国同马里共和国两国政府的联合公报中正式写入了这八项原则。

物资，并且根据国际市场的价格议价。如果中国政府所提供的设备和物资不合乎商定的规格和质量，中国政府保证退换。

第七，中国政府对外提供任何一种技术援助的时候，保证做到使受援国的人员充分掌握这种技术。

第八，中国政府派到受援国帮助进行建设的专家，同受援国自己的专家享受同样的物质待遇，不容许有任何特殊要求和享受。

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

（一九六四年十月十七日）

一九六四年十月十六日，中国爆炸了一颗原子弹，成功地进行了第一次核试验。同日，中国政府就这一事件发表声明，详细地阐明了中国对于核武器问题的立场。

中国政府一贯主张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中国进行核试验、发展核武器，是被迫而为之的。中国掌握核武器，完全是为了防御，为了保卫中国人民免受美国的核威胁。

中国政府郑重宣布，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中国都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

中国政府继续争取通过国际协商，实现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并且为此，在自己的声明中，提出了以下建议，即：

“召开世界各国首脑会议，讨论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问题。作为第一步，各国首脑会议应当达成协议，即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和很快可能拥有核武器的国家承担义务，保证不使用核武器，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核武器，不对无核武器区使用核武器，彼此也不使用核武器。”

^{*} 这是以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名义发出的致世界各国政府首脑的电报，刊载于一九六四年十月二十一日《人民日报》。

防止核战争，消灭核武器，是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的共同愿望。中国政府真诚地希望，中国政府的上述建议将得到贵国政府的有利考虑和积极响应。

在治理黄河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十八日）

这次会议是国务院召开的，我本来想用半个月到一个月的时间去现场看看，由于临时有国际活动，回国后又忙于准备三届人大，离不开北京。

对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改建问题，要下决心，要开始动工，不然泥沙问题更不好解决。当然，有了改建工程也不能解决全部问题，改建也是临时性的，但改建后情况总会好些。

治理黄河规划和三门峡枢纽工程，做得是全对还是全不对，是对的多还是对的少，这个问题有争论，还得经过一段时间的试验、观察才能看清楚，不宜过早下结论。只要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能使黄河水土为民兴利除弊，各种不同的意见都是允许发表的。旧中国不能治理好黄河，我们总要逐步摸索规律，认识规律，掌握规律，不断地解决矛盾，总有一天可以把黄河治理好。我们要有这样的雄心壮志。

黄河治理从一九五〇年开始到现在将近十五年了。但是我们的认识还有限，经验也不足，因此，不能说对黄河的规律已经都认识和掌握了。我们承认现在的经验比十五年前是多了，比修建三门峡枢纽工程时也多了，但将来还会有更多的未知数要我们去解答。不管持哪种意见的同志，都不要自满，

要谦虚一些，多想想，多研究资料，多到现场去看看，不要急于下结论。

改建规模不要太大，因为现在还没有考虑成熟。总的战略是要把黄河治理好，把水土结合起来解决，使水土资源在黄河上中下游都发挥作用，让黄河成为一条有利于生产的河。这个总设想和方针是不会错的，但是水土如何结合起来用，这不仅是战术性的问题，而且是带有战略性的问题。比如说，泥沙究竟是留在上中游，还是留在下游，或是上中下游都留些？全河究竟如何分担，如何部署？现在大家所说的大多是发挥自己所着重的一部分，不能综合全局来看问题。任何经济建设总会有些未被认识的规律和未被认识的领域，这就是恩格斯说的，有很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我们必须不断地去认识，认识了一个，解决一个，还有新的未被认识。自然界中未被认识的事物多过人们已经认识了。即使有那么多有关黄河的历史资料，当时也许看着比较好，现在再看就不够了，因为情况变了，沧海桑田，要变嘛！即使古书都查了，水文资料积累更多了，也还不能说我们对治理黄河的经验已经够了。这样说是不是永远无法做结论呢？那也不是。一个时期有一个时期内掌握得比较全面、比较成熟的东西，能够做结论的先做，其他未被认识的或未掌握好的，经验不成熟的，可以等一等，可以推迟一些时间解决。推迟是为了更慎重，更多地吸收各方面的意见，有利于今后的规划工作。

治理黄河规划即使过去觉得很好，现在看到不够了，也要修改。农村工作六十条〔290〕要修改，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105〕也要改。象这些摸熟的东西还要不断地改，何况黄河自然情

况这样复杂，哪能说治理黄河规划就那么好，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一点问题都没有，这不可能！因此，希望所有行政领导同志、专家要和群众相结合，做出符合实际的结论。允许大家继续收集资料，到下面去观察、蹲点、研究。大家可以分工从各方面用力。观察问题总要和全局联系起来，要有全局观点。谦虚一些，谨慎一些，不要自己看到一点就要别人一定同意。个人的看法总有不完全的地方，别人就有理由也有必要批评补充。要破也要立。不要急躁，慢一点做结论。这是不是调和的意见呢？当然不是。而是集中对的，去掉不对的，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这样，才能不断前进。

基于这个原因，我们对治理黄河规划和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既没有全面肯定，也没有全面否定。至于设想，可以大胆些。我曾经说过，可以设想万一没有办法，只好把三门峡大坝炸掉，因为水库淤满泥沙后遇上大水就要淹没关中平原，使工业区受到危害。我这样说，是为了让大家敢于大胆地设想，并不是主张炸坝。因为我不这样说，别人不敢大胆地想。花了这么多投资又要炸掉，这不是胡闹吗！我的意思是连炸坝都可以想一想。不过不要因为我说了，就不反对，就认为可以炸了。毫无此意。我也是冒叫一声，让人家想一想。如果想出理由来，驳倒它，就把它取消，不必顾虑。专门性的问题，就是要大家互相发现矛盾，解决矛盾，有的放矢，这样，才能找出规律，发现真理。

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原来苏联专家是按正常高水位三百六十米设计的。我们把大坝高程和运用水位都压低了，施工时大坝高程改按三百五十米，初期蓄水位不超过三百三十

五米。三百三十五米以下库容原为九十六亿立米，现在已经淤了五十亿吨泥沙，只经过五年，已经淤了一半。仅一九六一年和一九六四年两年就淤积了三十多亿吨。如果再经过一个五年，又遇上两场大水，加上平常年度的淤积，三百三十五米以下库容即将淤满。到那时，回水不影响渭河、洛河是不可能的。过去我们曾设想三门峡水库堆沙年限至少维持二十多年到三十年，在这个时期内，大搞水土保持等各种措施。但是，五年已淤成这个样子，如不改建，再过五年，水库淤满后遇上洪水，毫无问题对关中平原会有很大影响。关中平原不仅是农业基地，而且是工业基地。不能只顾下游不看中游；更不能说为了救下游，宁肯淹关中。这不是辩证的说法。做不好，上下游都受害怎么办？为什么不从另一方面想想？如果三门峡水库淤满了，来了洪水，淹了上游，洪水还要下来，遇上伊、洛、沁河洪水，能不能保证下游不决口？即使不决口也有危险。我们看问题要有全局观点，要进行比较。

有的同志主张维持原状。但是，五年之内能不能把上中游水土保住？绝不可能！要求在五年内把西北高原上的水土保住，我看砍了头也没办法。要叫我去，也不能接受这个任务，因为这是不可能办到的。因此，三门峡工程总要改建。

当前的关键问题在泥沙。眼前五年十年内这一关怎么过？即使二洞四管的方案〔307〕批准后就施工，也要到一九六八年或一九六九年才能生效，而且四管只能泄一千秒立米，排沙有限。如果在这期间遇上象一九六一年和一九六四年的情况，库区再淤上三十亿吨，怎么办？这是燃眉之急，不能等。

本来三门峡工程改建的事，请计委批准就可以了，可是有

些意见出入比较大，不征求大家的意见还不安心，因此挤出时间来参加这次会。听了大家的意见以后，情况清楚了。现在，大家都认为增加二洞四管还是需要的，对三门峡工程改建问题的争论少了。个别同志反对这个方案，主张上游修三个拦泥库，只拦泥，不综合利用。我看光靠上游建拦泥库来不及，而且拦泥库工程还要勘测试点，所以这个意见不能解决问题。即使说过去水土保持做得不好，上游勘察工作做得不好，黄河水利委员会、水利电力部工作上都有错误，但是眼前的这个病怎么治？要回答五年内怎么办这个问题。反对改建的同志为什么只看到下游河道发生冲刷的好现象，而不看中游发生了坏现象呢？如果影响西安工业基地，损失就绝不是几千万元的事。对西安和库区同志的担心又怎样回答呢？实施水土保持和拦泥库的方案还遥远得很，五年之内国家哪有那么多投资来搞水土保持和拦泥库，哪能完成那么多的工程。那样，上游动不了，下游又不动，还有什么出路！希望多从全局想一想。我也承认三门峡二洞四管的改建工程不能根本解决问题，而是在想不出好办法的情况下的救急办法。改建有利于解决问题，不动就没法解决问题。改建投资可能多一些，但即使需要八九千万元，也不能不花，哪能看着问题不去解决！看问题要有全局观点，要看到变动的情况。三门峡工程二洞四管的改建方案可以批准，时机不能再等，必须下决心。

今天，我只能解决第一步增建问题，其他问题我还要负责继续解决，不是光注意了中游，不注意上游，更不是不注意下游。绝无此意。现在成熟的方案只有这一个，其他的事情还要继续做。

再补充一点，一切问题都要到现场去实践，通过实践，不断总结，取得经验，然后再实践再总结。到现在我还担心二洞四管会不会有什么问题。不要把事情想得太满，还可能会遇到困难，还可能发生预料不到的新问题。设计方面要多研究，施工时要和工人多商量，要兢兢业业地做。如果发现问题，一定要提出来，随时给北京打电话，哪一点不行，赶快研究。不要因为中央决定了，国家计委批准了，就不管了。因为决定也常会出偏差，会有毛病，技术上发生问题的可能性更多。我再重复一句，决定二洞四管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既然决定了，就要担负起责任。大家要时常多想想。因为，黄河的许多规律还没有被完全认识。这一点要承认。我还要再三说一下，不要知道一点就以为自己对其他都了解了。当时决定三门峡工程就急了点。头脑热的时候，总容易看到一面，忽略或不太重视另一面，不能辩证地看问题。原因就是认识不够。认识不够，自然就重视不够，放的位置不恰当，关系摆不好。一九五九年水电部修建了三百多座大型水库，这几年下马了一些，现在还有将近二百座，很大一部分工程没有完成，遗留问题很大。修水库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几年的教训是应该深刻吸取的。

发展国民经济的主要任务^{*}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今后发展国民经济的主要任务，总的说来，就是要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为了实现这个伟大的历史任务，从第三个五年计划开始，我国的国民经济发展，可以按两步来考虑：第一步，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

第三个五年计划时期，是实现上述第一步任务的一个关键时期。这个时期的工作做好了，再经过大约两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就可以有把握地使我国建立起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

我们在今后发展国民经济中，应该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正确处理农业、轻工业、重工业的关系。处理好这三者的关系，是顺利执行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一个重要保证。发展国民经济的计划，应该按照农、轻、重的次序来安排。

^{*} 这是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第一部分中的一段话。

必须更好地执行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总方针。工业的发展规模，要同农业可能提供的商品粮食和工业原料相适应。各行各业都应该面向农村，为农业服务。重工业部门应该首先为农业提供越来越多的机械、化学肥料、农药、燃料、电力、水利灌溉设备和建筑材料，同时为轻工业提供越来越多的原料、材料和设备。为了实现这个要求，进一步加快重工业首先是基础工业的发展，是完全必要的。

农业的发展，一方面要国家给以必要而又可能的财力、物力的支援，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依靠人民公社的集体力量。

第二，正确处理自力更生同国际合作的关系。自力更生是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基本立足点。社会主义国家只有从本国的具体情况出发，依靠本国人民的辛勤劳动，充分利用本国的资源来进行建设，才能比较迅速地发展本国的经济，从而增强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威力。

各国人民之间的援助，从来不是单方面的，而是互助互利的。那种以“经济互助”为名，把别国的经济变成附庸，是大国沙文主义^{〔67〕}的作法。国际合作必须建立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一个国家只有自力更生地进行建设，才能更有力量去支援别国。而在援助别国的时候，又必须促进受援国家实现自力更生。

自力更生是我们党一贯坚持的方针。中国人民不是懒汉懦夫，过去没有、今后也决不会依赖别人过活。我们完全能够依靠自己的力量，建立一个独立的完整的现代化的国民经济体系。同时，我们仍然要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认真地加强对

外援助，努力做出更大的国际主义贡献。

第三，实行技术革命。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我们所说的大跃进，就是这个意思。难道这是做不到的吗？是吹牛皮、放大炮吗？不，是做得到的。既不是吹牛皮，也不是放大炮。只要看我们的历史就可以知道了。我们不是在我们的国家里把貌似强大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从基本上打倒了吗？我们不是从一个一穷二白的基地上经过十五年的努力，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各方面，也达到了可观的水平吗？我们不是也爆炸了一颗原子弹吗？过去西方人加给我们的所谓东亚病夫的称号，现在不是抛掉了么？为什么西方资产阶级能够做到的事，东方无产阶级就不能够做到呢？中国大革命家、我们的先辈孙中山先生在本世纪初期就说过，中国将要出现一个大跃进。他的这种预见，必将在几十年的时间内实现。这是一种必然趋势，是任何反动势力所阻挡不了的^{〔308〕}。

要采用先进技术，必须发挥我国人民的聪明才智，大搞科学试验。外国一切好的经验、好的技术，都要吸收过来，为我所用。学习外国必须同独创精神相结合。采用新技术必须同群众性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相结合。必须实行科学研究、教学同生产相结合。

第四，实行集中领导同大搞群众运动相结合。我们党在革命斗争中领导群众运动已经有了丰富的经验。我们在经济建设中开展群众运动，也取得了成功的经验。这就是：要把任

务交给群众讨论；开展比学赶帮竞赛；实行领导干部、专家、群众三结合；既要提倡敢想敢说敢做的革命精神，又要提倡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既要干劲十足，又要劳逸结合；对于群众的各种创造，必须经过试验，逐步推广；必须坚持党的阶级路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各种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农村卫生工作和计划生育问题^{*}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一日）

这是林大夫〔309〕和傅连璋〔310〕会长给我出的难题。你们讨论妇产科专门问题，我完全是外行。我讲什么呢？我讲讲卫生工作面向农村和计划生育的问题吧。

我国农村人口约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七八，城市人口只不过占百分之十二三。如果我们的卫生工作不把重点放到农村，那怎么为劳动人民服务啊？为绝大多数劳动人民服务的口号等于没有兑现嘛。这个问题直到毛主席再三提出来，才引起卫生部门的注意。当然我们政府要负责，我做国务院总理的首先要负责。虽然有时也说过，但提得不那么着重，不那么尖锐。毛主席这么一提，卫生部门就具体订计划了，现在已经有了初步规划。

在五年之内真正把农村中三种卫生人员培养起来，这是一个艰巨而伟大的任务。一种是不脱离生产的卫生员，每个生产队有一名，全国有五百多万生产队，就要训练五百多万卫生员，五年能不能做到，现在还说不定，也许需要十年。要培养这样多不脱离生产的卫生员，使他们成为多面手，既能治一

^{*} 这是接见中华医学会第一届全国妇产科学术会议代表时的讲话。

般的病，又能治妇科病，还会接生。这是一项艰巨的工作，你们在座的都有责任，不要把它看得容易了。卫生员不脱离生产，又有一定的本领，生产队非常欢迎。当然不能保证培养这样多的人都是百分之百地合格，不合格就再培养，再进修嘛。第二种是在生产大队和一部分公社能够有半脱产的卫生员，治病时给他记工分，不治病时我也去参加体力劳动，这些人由公社或大队管。对他们的本事要求高一点，不仅能治一般的头痛、伤风，还能治一些比较难治的病。全国有八十多万个生产大队，一个大队培养一个人就是八十多万个，有的大队还可能不只一个人。第三种是为公社或区里培养脱离生产的专职医生。全国有七万多个公社，每个公社培养三至五人，总共就要培养大约三十万人。这些人基本上脱离生产，在一年里有些时间能参加一些体力劳动也好。应该说明医务人员的工作也是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结合的。林大夫过去忙的时候，一星期要做好几次手术。年轻的大夫每天在手术室做手术一站几个小时，手术前还要做准备，这是脑力劳动，也是体力劳动，是脑力和体力结合的劳动。护士也是一样。除去医生和护士外，还有医院的其他技术人员也都是半脑力劳动半体力劳动。

怎样才能帮助农村培养出这三种人，这是个大问题。现在整个卫生队伍除行政人员外，还不到一百万人，要训练这三级卫生人员六百万到七百万人，我看五年不可能实现，也许十年才能实现，可能还要扫尾。计划可以打得宽一些，工作要抓紧，如果不到十年完成当然更好。在座的女同志应该负更多的责任，因为培养上述三种人中人数最多的不脱产的卫生员一级，可能大多数是女同志，六七百万各级卫生人员半数以上

是女同志，任务很艰巨。你们如何去培养呢？如何入手呢？一定要组织大中城市、工矿企业、机关、学校以及军队的医务人员，分期分批组成医疗队，到农村去，主要做两件事，一是治病，一是培养医务人员。只要真正为农民治病，为他们培训医务人员，农民就欢迎得不得了。对一部分年老体弱的大夫不能勉强他们去，年纪太大了，走路都要人扶，还不如留在城里。象蒲老，蒲辅周^{〔311〕}先生，是很有名的中医，如果到农村去，受了风寒，反而把他的服务期限缩短了。这样的医生就要留下，他们可以教学生，也可以写点东西，把丰富的经验留下来，对人类对人民都有贡献。城市也不能不管。城市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百分之十二三，有一亿多人，将来也许更多，要做好他们的医疗保健工作。要改革医疗制度，还要培养人，这也是很重要的任务。

另外，我讲讲计划生育问题。对计划生育要进行宣传教育。一方面要有一些规定，如在工资、住房、供应等方面，对实行计划生育的，要给予优待，一方面要自觉自愿，绝对不能强迫命令。又要自觉自愿又要有所约束。要用各种办法帮助人们避孕。怎样使我国人口能有计划地生育，这是一个伟大的事业。现在全国有七亿人，如果不实行计划生育，人口增长得太快，生产就跟不上，这是一个大问题。要使全社会都能够按照计划生育的要求，在二十世纪以内把人口年纯增率控制在百分之一，这就很了不起。总之，计划生育是一件长期的事情。上述这个要求并不高，如果能够提前做到当然很好了。

植树造林是百年大计*

（一九六六年二月二十三日）

林业工作要面向全国，依靠全党全民，要两条腿走路。林业部过去只注意林区采伐，我看主要任务还是造林^{〔312〕}。工业犯了错误，一二年就可能转过来，林业和水利上犯了错误，多少年也翻不过身来。我最担心的，一个是治水治错了，一个是林子砍多了。治水治错了，树砍多了，下一代人也要说你。我国森林覆盖率只有百分之十多一点。十六年来，全国砍多于造，是亏了。二十世纪还剩下三十几年，再亏下去不得了。造林是百年大计，要好好搞。

造林也要两条腿走路，要依靠六亿农民。四旁^{〔313〕}植树也是个大工作。兵团要搞试点。用剃光头的办法采伐森林，采光了就走，修一条林区铁路废一条，这怎么得了！营林是建设社会主义，我们不能吃光了就算，当败家子^{〔314〕}。过去林业部长梁老^{〔315〕}经常讲这个问题。现在抓紧造林还不晚。

林业部要把主要力量放在南北方造林上。要调查公社的造林办法，总结推广经验。

国营与群众营林，重点放在群众；伐木与育林，重点放在

* 这是同出席全国林业工作会议的西北各省、自治区林业厅（局）长和西北林业建设兵团、林业部负责同志的谈话。

育林；前方与后方〔316〕，重点放在前方。重点放对了，才能用得少，造得多。总得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时期摸出一套林业工作的经验来。

北方八省〔317〕地区大，人口多，树林少，造林工作搞起来能很快发展。南方各省条件好，更要做好。南方本来有林，现在一些地方也有水土流失的现象。南方造林、护林、用林都很重要。

林业部到处提倡植树，可是在眼睛鼻子底下，就是到北京机场这一段路好，北京到天津的路上最难看了。十多年了，要你们在铁路两旁植树，就是不种，可难看了！有人讲公路上好一些，可是我从火车上看公路，也是一样。树本来是容易种的，与公社结合，委托给他们，分段负责，就能种好管好。

西北地区造林要集中在黄河泥沙主要来源地区，不要孤零零地分散搞。分散了，投资很大，功效很小，起不了多大作用。

西北黄土高原搞了多少年造林啦？劳大功小，要很好总结经验。陕北防沙林带有人烟，地下水浅，就可以造林。靖边、定边高原上水位低，不容易成林。要有选择、有阵地地前进。面对黄河流域二十八万平方公里水土流失区，只要有雄心壮志，有愚公移山的精神，就能战胜它。黄土高原是我们祖宗的摇篮地，是民族文化的发源地，但是这个地方的森林被破坏了。我们不仅要恢复森林面貌，而且要发展得更好。

西北局要搞一个领导小组，管农垦、水土保持。农林互相支援有好处。植树造林是百年大计，总得坚持到二十一世纪。华北大有可为，西北更是大有可为。

发展生产 重建家园^{*}

（一九六六年三月十日）

同志们，乡亲们：

你们受了灾，损失很大，党中央和政府非常关心你们，毛主席让我来看望大家，慰问大家。昨天夜里我到了隆尧县城，听了地委、县委的汇报，今天又来到这里。

这次地震来得很突然。你们这个地方从邢家湾到耿庄桥是地震的中心。二十年前，在抗日战争中，你们也受了损失，那是和民族敌人作斗争。这次是和地底下的“敌人”作斗争。每个村庄、每个家庭都有很大损失。付出了代价，也取得了经验。

听到地震的消息后，解放军立刻赶来了，地方上的工作队和医疗队也来了。重伤的得到抢救，轻伤的得到治疗，牺牲的也掩埋起来了。他们牺牲了，我们要继承他们的事业。我们要和地球“打仗”。你们这个地方是洼地，过去改造得不错，现在要战胜地震灾害，重建家园。重建家园光靠你们的力量还不够。你们县西部有好多没有受灾的庄子，巨鹿、宁晋、任县都有些没有受灾的庄子，可以来帮助你们。互相支援，过去

^{*} 一九六六年三月八日，河北省邢台地区发生强烈地震。三月九日，周恩来同志到达灾区。这是在隆尧县白家寨慰问灾区人民大会上的讲话。

打日本就是这样。重建庄子要建得分散一点，房子要矮一点。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少先队员要带头抗震救灾。你们组织起来，办法一定会有的。国家当然要支援你们。你们这个地区有三十个公社、三十四万人受灾，现在已开进解放军两万多人，地方上的工作队和医疗队一万多人，共三万多人，十个人就有一个人帮助。真是一人有困难，大家来相帮，因为我们是社会主义的国家。你们不是学过《愚公移山》吗？愚公能够移山，我们对现在的困难也一定能够战胜。死了人当然难过，但是不要低头。大家一定要团结起来，团结就是力量！老年人家里没有人，我们要照顾他们，娃娃没有人带，我们要帮着带，这些都要靠青年壮年去做。

我不能到每个庄子去了，请你们庄子做代表，你们要把党中央、毛主席的关怀和我讲的这些话传给别的庄子。中国人民是有志气的。你们要学习毛主席著作，把劲头鼓起来，用七八天的时间把生活组织起来，过几天还要搞生产。隆尧要和巨鹿、宁晋比嘛！恢复了生产，恢复了力量，就对得起死去的人。现在大家一起呼口号：

奋发图强！

自力更生！

发展生产！

重建家园！

重建家园后，再来看你们。

关于保护干部的若干文电^{*}

(一九六六年——一九七四年)

一份应予保护的干部名单^{**}

(一九六六年八月三十日)

宋庆龄 郭沫若 章士钊 程潜 何香凝
傅作义 张治中 邵力子 蒋光鼐 蔡廷锴
沙千里 张奚若^[318]

(1) 副委员长、人大常委、副主席

(2) 部长、副部长

(3) 政副

(4) 国副

* “文化大革命”中，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为达到篡党夺权的罪恶目的，残酷迫害党内外干部，制造大批冤假错案。周恩来同志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为保护干部作了极大的努力。这里选辑的是有关文电的一小部分。

**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九日夜，某校红卫兵抄查章士钊先生的住宅。三十日晨，章写信给毛泽东主席。毛泽东同志批示：“送总理酌处，应当予以保护。”周恩来同志严厉批评了有关人员，责令当即送回抄走的全部书籍，并派人前往保护章宅。同时写下了这份名单。九月一日，又命三〇一医院准备接收章士钊、程潜、傅作义、蔡廷锴、李宗仁等先生入院，对他们加以保护。

(5) 各民主党派负责人

(6) 两高〔319〕

(李宗仁〔320〕)

应当尊重宋庆龄*

(一九六六年九月一日)

宋庆龄是孙中山的夫人。孙中山的功绩，毛主席在北京解放后写的一篇重要文章《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就肯定了。他的功绩也记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上。南京的同学一定要毁掉孙中山的铜像，我们决不赞成。每年“五一”、“十一”在天安门对面放孙中山的像是毛主席决定的。孙中山是资产阶级革命家，他有功绩，也有缺点。他的夫人自从与我们合作以后，从来没有向蒋介石低过头。大革命失败后她到了外国，营救过我党地下工作的同志，抗日战争时期与我们合作，解放战争时期也同情我们，她和共产党的长期合作是始终如一的。我们应当尊重她。她年纪很大了，今年还要纪念孙中山诞辰一百周年，她出面写文章，在国际上影响很大。到她家里贴大字报不合适。她兄弟三人姐妹三人〔321〕就出了她一个革命的，不能因为她妹妹是蒋介石的妻子就要打倒她。她的房子是国家拨给她住的。有人说：“我敢说敢闯，就要去。”这是不对的，我们无论如何要劝阻。

* 这是对首都红卫兵的讲话节录。

不应改变被批斗干部的工资*

(一九六六年九月十八日)

吉林省委九月十六日电悉。对被批判斗争对象的工资处理意见：即使已定性的，也暂不改变；如本人少领工资，或捐献一部分工资作党费，听其自愿，但不强求，也不许其由减少用费而致病。凡未定性的，工资仍照旧。

一定要放出李葆华^{〔322〕}、李任之^{〔323〕**}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四日)

请陶铸^{〔324〕}同志以电话找安徽省委一谈。如情况属实，请找八·二七造反团负责人以电话交涉，无论如何要放出李葆华、李任之两同志，让他们回家休息。

关于刘澜涛出狱问题^{〔325〕}

给西北局的电报***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二十三日电悉。请向南开大学卫东红卫兵和西安炮打司

* 这是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复中共吉林省委并告各中央局的电报节录。

** 这是在中共中央华东局关于中共安徽省委两位书记被连续批斗的情况反映上的批示。

*** “文化大革命”初期，康生等人制造了“六十一人”案件，诬陷一大批老干部。为保护这批干部，周恩来同志写信给毛泽东同志，明确提出，刘澜涛同志等出狱“当时确为少奇同志代表中央所决定，七大、八大又均已审查过，故中央必须承认知道此事”，并为中共中央起草了给西北局的这份电报。

令部战斗队同学说明，他们揭发的刘澜涛同志出狱的问题，中央是知道的。如果他们有新的材料，可派代表送来中央查处，不要在大会上公布和追查。

九大^{〔326〕}代表应包括王恩茂^{〔327〕}*

（一九六九年一月十二日）

新疆自治区出席九大的代表应包括王恩茂同志在内。你们已为此做了不少工作，并为他留出名额。现在你们正面临新的困难。如说服党员干部和党内外革命群众需要时间才能选出，可先将王恩茂同志全家送来北京，以便继续工作。

你们意见如何，望告！

建议徐海东^{〔328〕}参加九大主席团**

（一九六九年三月三十一日）

今晚与主席团预选成员和军队主要负责同志协商徐海东同志为九大代表。如取得大家同意，拟同时提议徐也参加主席团，然后由各组召集人回到各组征求全体代表同意。徐海东同志既已当代表，就以参加主席团为好，我和军委办事组各同志商量都同意。请示主席批准。

* 这是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给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电报。

** 这是写给毛泽东同志的。

陶铸^{〔324〕}应送入医院治疗^{*}

（一九六九年四月五日）

拟同意送入三〇二医院，进行保密治疗。即呈主席批阅。
我是看了四月三日警卫局的报告才知陶的病状较重，经追问后，送来这一报告。

不要斗批民主党派的领导人^{**}

（一九六九年五月四日）

派往各民主党派机关的军代表不知已否派去？如已派去，可与他们谈谈政策。

机关革命造反派的任务是清理机关干部的队伍，而不要去斗批民主党派的领导人，即他们的中央委员、省市党部委员。如他们中间出现了现行的反革命分子，自当别论，但也需先报告军管代表，得中央或省、市革委会同意后，方能采取行动。

机关干部也要在清理队伍时，按具体情况区别对待，不能以中共党内标准要求。

附上邓初民^{〔329〕}先生一信，请加注意。

* 这是在《关于陶铸的病情报告》上的批示，经毛泽东同志圈阅过。

** 这是给当时国务院直属口党的核心小组负责人转人大、政协军代表的信。

应给华罗庚^{〔330〕}以保护^{*}

（一九七〇年三月四日）

首先，应给华罗庚以保护，防止坏人害他。

次之，应追查他的手稿被盗线索，力求破案。

再次，科学院数学所封存他的文物，请西尧^{〔331〕}查清，有无被盗痕迹，并考虑在有保证的情况下，发还他。

第四，华的生活已不适合再随科大去“五七”干校^{〔332〕}或迁外地，最好以人大常委身份留他住京，试验他所主张的数学统筹方法。

此事请你们三位办好后告我。

关于张霖之^{〔333〕}死亡问题^{**}

（一九七〇年七月三十一日）

国务院业务组于一九七〇年七月三十一日会议，审查了煤炭部军代表一九七〇年五月二十日和七月三十一日两次报告，以及首都驻北京矿业学院工、军宣队^{〔334〕}专案组一九七〇年五月十七日的报告，同时，并阅看了反革命分子戚本禹^{〔335〕}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在矿院的公开演说。大家一致认

* 这是就华罗庚同志要求追查被盗手稿的来信，给当时国务院直属口党的核心小组负责人、北京市公安局军管会负责人和周恩来同志派到科学院的联络员的批示。

** 这是为国务院起草的给煤炭工业部的通知节录。

为：张霖之同志的历史是清楚的。张霖之同志在矿院全校广播中听到戚本禹反革命分子这种威胁和煽动的语言，而身体已受到重伤，自不能不陷入极度紧张状态，因此，致张在武斗和逼供的混乱中死去。

根据当时情况，矿院专案组的报告只涉及各项经过的表面现象，还需要依照煤炭工业部所掌握的全面材料，认真地予以澄清。

兹决定，张霖之同志的死亡，应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张霖之同志家属和他的子女不受任何牵连，应按革命干部家属看待。

废除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十八日）

请你们联合起来办三件事。

一、将刘建章^{〔336〕}保外就医。按他身体病状，或送阜外医院，或送工农兵医院，并通知其妻刘淑清及其子女家属去看望刘。

二、将刘建章全案结论抽出送国务院先念^{〔337〕}、登奎^{〔338〕}同志批。

三、请公安部会同卫戍区将我在国务院当面提出过的要

^{*} 一九七二年，原铁道部副部长刘建章的妻子刘淑清同志写信给毛泽东同志，反映刘建章同志无辜被捕及在狱中受到迫害。毛泽东同志批示：“请总理办。这种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是谁人规定的？应一律废除。”周恩来同志立即给公安部、交通部和国务院办公厅负责人写了这封信。

清查北京监狱待遇问题，再在年内做一次彻底清查。凡属毛主席指出的“这种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和虐待、殴打都需列举出来，再一次宣布废除，并当着在押犯人公布。如有犯者，当依法惩治，更容许犯人控诉。

各事办好，请分别报来。附去主席批示件，请随第三事办好退回。

对参加国庆招待会名单的意见^{*}

（一九七四年九月二十九日）

昨晚你交我国庆节招待会拟见报的名单，并告我已经主席一一听过，主席当即提出要加肖华〔339〕、李力群〔340〕、侯宝林〔341〕三人，又问及商震〔342〕是否列入。经政治局昨晚讨论，你告我遵照主席精神，又加刘志坚〔343〕一人。昨夜我匆匆看过名单，便想到齐燕铭〔344〕。

今晚又将两千多见报名单细细翻阅。在第十七类爱国人士方面，据统战部提出起义将领四夫人韩权华（卫立煌〔345〕夫人）、郭翼青（程潜夫人）、洪希厚（张治中夫人）、刘芸生（傅作义夫人）及张学铭〔346〕（张学良〔347〕之弟）、张学思〔348〕之兄（因吕案解案〔349〕被禁多年，去年已无罪释放）五人。我看，四夫人对国内外影响也不小。至于张学铭，则因林彪利用东北军一案大搞东北民主人士，现吕正操同志已平反，张学思已死（此案亦应弄清），故邀张学铭出席有此必要。

^{*} 这是写给王洪文和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一封信的节录。当时，周恩来同志病重住院，政治局日常工作由王洪文主持。

关于经济工作的几则文电^{*}

（一九六六年——一九七三年）

工人请愿不要妨碍生产^{**}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欢迎你们派代表（小厂一人，大厂二至三人，总数请不要超过三百人）来北京商谈。

请你们认真考虑：成千的工人同志来北京请愿，既不利于接待和会谈，也会影响你们工厂的生产。如果另一方面工人同志也照样来京，那将更影响生产。

我们希望：在省、市委和厂矿企业的领导方面，要保证不得解雇工人，不得扣工资，不得打击报复，不得用党籍、团籍来威胁工人；在工人同志方面，要保证安排好生产，不要妨碍生产和交通运输。

你们来京人数确定后望告，以便通知铁道部配车，车费由

* “文化大革命”期间，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在全国各地煽动派性，挑动武斗，破坏生产，中断交通，使国民经济遭到巨大损失。周恩来同志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尽力促进职工队伍的团结，稳定局面，维持生产，减少损失。这里选辑的是有关这一方面工作的几则文电。

** 这是由周恩来同志修改和审定以国务院名义发给成都拟来北京请愿工人的电报。

所属厂矿解决。廖志高〔350〕同志也同你们的代表一道来京。

藏 富 于 民^{*}

（一九六七年五月三日）

毛主席说过，农民以多报少是藏富于民。粮食多了百分之十，只有好处，农民是不会乱吃掉的，藏在农民家里比国家收购起来还好。你们不要产生错觉，这不是提倡不老实，毛主席讲这句话的意思是整官僚主义的。官僚主义者不下去，不调查，一九六一年以前实行高指标、高征购，整了农民，现在他们就以多报少。城市也是这样，多报人口，口粮就多算了。

土地以多报少，粮食以多报少，人口以少报多，灾情以少报多。两个以多报少，两个以少报多，这是对付官僚主义的办法。如果我们实事求是，依靠贫下中农，他们就会说真话。

必要的奖励政策不能叫物质刺激。过去实行奖励政策是需要的。对产棉花地区要给些化肥和粮食，使他们的生产恢复得快些。我们出口一吨大米可以换回一点七吨小麦或两吨玉米，换回来外汇，很有利嘛！

粮食工作也有错误。以前有过大进大出。征购多了，必然返销，造成假象，徒劳往返。毛主席主张能少购就少购一点，藏富于民是好事。战争打起来还是藏富于民好，特别是要消灭敌人在国境内，这就更有必要了。

^{*} 这是接见十四个省、市夏季粮油征购会议代表时的谈话节录。

不许中断铁路轮船交通^{*}

（一九六七年五月三十一日）

送上铁路中断情况电讯八份，请阅。今午在主席处，已说明铁路轮船关系到全国交通命脉，决不能中断。下午曾约集富春〔351〕、先念〔337〕剑英〔352〕、肖华〔339〕、成武〔353〕、谷牧〔354〕、秋里〔355〕各同志会商此事，除已报请批发不许中断铁路轮船交通命令外，并拟将全国十八个铁路管理局分给附近驻军实行军管包干，将沿海沿江轮运交海军军管包干，均与当地军分区、武装部分开，不再介入地方支左〔356〕工作，以便统一全国铁路轮船运输，免受干扰。这一计划正由总参草拟，明日当可订出送审。

此外，拟为此事再发一告铁路轮船职工书，定稿后再送阅。

联合起来，保护海港运输^{**}

（一九六七年十月二日）

据说，由于厦门海关和港务局各分两派，无人检查，致英国商船到来后无法靠岸，而该船有三病号，吃喝均成问题。这种违犯国法、影响祖国信誉的行动，是极端错误的，是绝对不能容忍的。望厦门军管会、调查组接此电话后立即向两派组

^{*} 这是给“中央文革小组”的信。

^{**} 这是给厦门军管会的电话稿。

织号召：对外、对业务必须采取联合行动，如果哪一派响应中央、主席号召并见于行动，中央将通报表扬，如拒不执行，中央定予揭露，并命令军管会采取必要措施，保护海港检查、靠岸装卸。哪一派破坏这一行动，军管会应按《六六通令》〔357〕惩处该派的主使人和肇事头头。

制止武斗措施^{*}

（一九六八年）

取消武斗专业队。

按系统归口接受革命大联合三结合。

不许重拉队伍另立山头，革委会、军管代表要保证任何工人职员不得被赶离本生产工作岗位。凡自动脱离不回厂者要限期回厂，逾期不归的扣发工资，半年不回的开除。

凡回厂者要由革委会、军管代表保护，被打的，要追查凶手，送院治疗，按期送工资。

停止脱离生产和工作岗位的自由串连。

不容再运再抢武器弹药。

不许攻夺建筑物，建立据点。

不许抢夺任何公家仓库商品物资。

更不许杀人放火。

^{*} 这是周恩来同志的手稿。

合理的规章制度应该保留^{*}

（一九六九年四月十二日）

飞机因质量事故影响到战备和援外，影响到安全。你们都是空军来的，怎么能对同志的性命这样不负责呢？一个军事工厂搞得这样怎么行？四一〇厂取消了检验制度你们是不是知道？报告了没有？你们为什么不敢抓？为什么不下命令恢复？你们就是怕事，怕群众。我是早上看到报告的，看后非常难过，军事工厂哪能搞成这样！你们现在还说检验制度正在逐步恢复。什么逐步恢复？你们怎么能这样说话，怎么能用这样的词句？不是逐步恢复，而是应当马上恢复！对的、合理的要马上恢复，不对的不恢复。检验是不能放松的。你们应当下命令嘛！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合理的还是要保留，一概取消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是不尊重科学的。不能违背科学。应该相信工人阶级，只要把道理给他们讲清，他们是不会同意取消这些合理的规章制度的。有些人要把一切制度砸烂，这是极左思潮。对西北、西南、东北都要派人去检查。二十年来，毛主席的红线还是主要的，不能否定一切，要一分为二，不然二十年的工业生产怎么能发展起来呢！

^{*} 这是在召集有关部门负责人解决飞机生产质量事故问题时的谈话节录。

要把质量问题放在 议事日程来解决*

(一九七一年十二月十五日、一九七二年一月二十一日)

—

“歼六”四十架，原说是为援外装配的。一经检查，便有七架不能交付，占全数百分之七十五。只此一端，就可看出我们飞机生产质量下降到什么程度，还不够我们提起警惕么！

二

请秋里^{〔355〕}象剑英同志一样，把长汽、二汽、重汽、南汽^{〔358〕}抓一抓。质量这样下降，如何援外，如何备战？这是路线问题，要在这个月内放在议事日程来解决！

消除林彪一伙对经济的破坏性后果**

(一九七三年二月二十六日)

一九六九年以后，在经济管理上瞎指挥盛行。南昌把飞机厂最好的工人下放了。景德镇陶瓷窑也给炸了。林彪一伙一直破坏到“九一三”^{〔359〕}，影响到一九七三年，恶果逐步暴露

* 这是关于飞机、汽车生产质量问题的两件批示。

** 这是在国家计划委员会汇报一九七三年计划和《关于坚持统一计划，加强经济管理的规定》的草稿时的插话。

出来了。应把九大〔326〕以来林彪一伙破坏经济计划的情况编个材料，供大家批判。一定要批透，把破坏性后果消除掉。

工业生产指标，煤增长最少，电也少啊！这样，生产怎么能上去。国民经济要按比例发展，但现在根本没有比例！

经济协作区问题怎么提法？到处搞独立经济体系是不行的。

基本建设战线为什么长？一是中央各部的项目多了，一是地方项目也多了，原因就在这里。中央和地方，首先中央收缩一下。中央、地方都不许扩大建设规模，中央先下一些，给地方留点余地。

基本建设要经常检查，全年抓。一九七〇年基本建设大膨胀，一九七二年没有抓，鉴于这个教训，以后要全年抓。该停的停，停得不合适的再建。

基本建设中的问题，还要说一条，有人在基建中顺手牵羊，搞非生产性建设。当然必要的可以建，如宿舍、商店、学校要建。但是有很多建筑不是这方面的，要指出来。

地方五小工业〔360〕要整顿的问题说得不够。搞五小工业也要有原料、材料和设备的保证。没有原料也搞，同大厂争原料，变成自由发展了。整顿的方针要写清楚。发展五小工业要有个范围，要对农业有利，破坏计划的无论如何不能发展。

职工人数、工资总额、粮食销售量三项都突破了计划数字。去年我讲了这个问题，但没有抓。确实没有“王法”了。

不只三个突破，货币发行也突破了。这不是那么舒服的。

资本主义有经济危机，我们与他们根本不同，但也不那么舒服。商品有差额，货币回笼不了。职工人数多了，工资多了，货币流通量也一定多了。多是一定要多的，但现在超过了实际需要，要研究这个问题。今年市场平衡有三十亿元的商品差额，票子发多了。

林彪一伙破坏经济所造成的恶果这两年表现出来了。票子发多了，到了最大警戒线。三个突破不如这一个突破。你们管财政、银行的也不叫，要随时提醒，这是个寒暑表嘛！湖北货币大投放，去年第四季度预支今年的，安徽、江苏也投放。这样大胆地开支，过去是少有的哩！

全国职工总数突破五千万人，一下子达到五千六百多万人。你们要抓一下。民工好减，五小工业工人、临时工要动员回去，现在就要进行工作。

钢那么多，钢材怎么样？前后左右不衔接，出了钢不能轧材，白白消耗了热能。还是十年前存在的问题，一前一后，前后左右总是个大问题。运输能力也不行，进出口拥挤不堪。这些不建设，光搞大品种不行。

按劳分配的问题，现在是四个一样^{〔361〕}嘛！还有干难干易一个样。“不利于调动职工积极性，也不利于控制职工人数的增加”，这句话说得对！

必要的奖励制度是可以的。

农业生产要注意防涝抗旱^{*}

（一九七三年五月十四日）

请你们好好读一下五月十四日的《参考消息》（五二五一期）四版下栏关于世界气象变化的两篇报道，并要气象局好好研究一下这个问题。今年我们可能还会遇到南涝北旱的局面，请告农林部多多提醒各地坚持实行防涝抗旱的措施，不要丝毫松懈。

^{*} 这是给李先念等同志的信。

恢复文教科科技部门的正常工作^{*}

（一九七〇年——一九七三年）

不要因人废文^{**}

（一九七〇年九月十七日）

王云五〔362〕编的四角号码字典为什么不能用？不要因人废文。一个人有问题，书就不能用了？它总有可取之处嘛！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是德国的古典哲学、英国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这三个来源还不是资产阶级的或受唯心史观限制的学说吗？可是它们都含有合理的因素。任何思想的发展都不是无根的，新社会是从旧社会脱胎出来的。剥削阶级的出身不能改，思想却是可以改造的。这就叫历史唯物主义。要有点辩证法，不要一听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就气炸了，那叫形而上学、片面性。

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就不能要了？那样做，不叫为群众服务。青年一代着急没有书看，他们没有好书看，就看坏书。

* “文化大革命”中，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乘机煽动极左思潮，使文教、科技、出版等方面的工作遭到严重破坏。这一组文件，部分地反映了周恩来同志在这几个方面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所作的斗争。

** 这是同文化教育部门一些负责人的谈话节。

毛主席在九届二中全会上讲，要学哲学，要反对唯心主义。同志们要好好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书，读毛主席的书。

要懂得水有源树有根。毛泽东思想是从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来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毛泽东思想的根。《新华字典》也是从《康熙字典》发展来的嘛！编字典可以有创造，但创造也要有基础。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新的出不来，旧的又不能用，怎么办？芭蕾舞是洋的，能说是我们创造的吗？我们编的芭蕾舞剧，基础是原来的，内容却是新的，形式又有了改造，这就叫做洋为中用。芭蕾舞还要发展。你们文化部门的同志要好好读几本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知道一点根嘛！毛主席的哲学著作，可以先学《实践论》，要通过实践来提高我们的认识。

关于外语教学的谈话*

（一九七〇年十一月二十日）

你们要研究一下，外语师资短训班的效果到底如何？学的能巩固吗？落实的有多少？也许个别人学得快，多数人是平平或较差，个别人不行。如果五十天效果很差，可以向主管部门提出建议，延长一些时间。要抱着对学员负责的态度，否则误人子弟。师资培训不好，将来学生也教不好。短训班质量不行，人家会骂你草草了事。

* 这是接见北京大学、北京外国语学院等校师生代表时的谈话节录。

学外语要天天练。天天练的时间不要仅限于一个小时。如果硬性规定一小时，其他时间就不许练，这种办法一定要脱离群众的。他们是学外语的，将来要做外语工作。外语教师也好，外事工作人员也好，总是要练，要允许人家抽空练。人家自己挤点时间练，不要去干涉！所以天天练不要限于一小时。别的活动多的时候也不要取消练外语。时间允许的话可以增到两三个小时。

苦练，应当成为原则，毛主席就强调这一点。写字也要苦练才能写得好。要把语言这个工具用得纯熟，还是要苦练。要看一些新的资料，光看课本不够。

翻译工作不是那么好做的。不仅要有现场经验，还要掌握材料，了解背景，真正翻译得恰当是不容易的。

现在有的中学英语课本，只有政治词汇，没有生活词汇，实在不适用，应当修改。政治语言和生活语言可以一并学，实际上也不能分。北大英语教材有一个问句：“你出身工人家庭吗？”这个问题局限性太大，难道除此之外就没有别的出身？

外语教学有个基本功问题。比如京戏有基本功，唱腔、道白、武打等，这都是京戏艺术的基本功。而且，京戏的基本功不限于京戏艺术本身，还有政治、历史、地理等知识。学外语也是如此，不光是要掌握外语的语音、词汇、语法，做好听、说、读、写、译五个字，还要懂得历史、地理。不仅要读中国地理、历史，还要读世界地理、历史。自然科学也要懂一些。马克思、恩格斯懂得很多自然科学知识。毛主席也知道得很多。你不懂这些知识，做翻译时就译不出来。搞翻译不是那么简单的，不是懂几句外国话就行的。不但要有政治水平，同时要有

较高的文化水平。没有基本功和丰富的知识不行。基本功包括三个方面：政治思想、语言本身和各种文化知识。

外语教学要造就什么人材？第一是师资，有了好的师资，中学生把外语学好了，进大学或以后自学就有了基础。第二是培养懂外文的干部、技术人员，要使他们能够读外文资料。第三是外事工作人员。这三方面的需要都很急迫，需要量最大的是师资，最急需的是外事人员。因此，要认真搞好外语教学。俄文为什么丢掉呢？一旦需要，量是很大的。

讲历史，多出书^{*}

（一九七一年四月十二日）

你们管出版的，要印一些历史书。我们要讲历史，没有一点历史知识不行。你们的出版计划中有没有历史书籍？现在书店里中国和外国历史书都没有。不出历史、地理书籍，是个大缺点。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都是从资产阶级的或受唯心史观限制的学说发展来的。不讲历史、割断历史怎么行呢？中国人不讲中国历史总差点劲。毛主席的著作还有不少篇幅是讲历史的嘛！读毛主席的著作也得懂历史。

同志们说，有的地方把封存的图书都烧了，我看烧的结果就是后悔。应该选择一些旧的书籍给青少年批判地读，使他们知道历史是怎么发展来的。都读新的，哪有那么多？要有组织地给他们读一点书，总不能把历史割断吧！否定一切，不

^{*} 这是在接见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领导小组成员时的谈话节录。

一分为二，这是极左思潮，不是毛泽东思想。我们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问题。那些把书都烧了的，还不是受极左思潮的影响？不分为二，就是极左思潮。

《鲁迅全集》封起来干什么？这不是滑稽得很吗！普列汉诺夫〔363〕前期是马克思主义者，有好的著作。把有点问题的书都封起来，只有少数人能看，只相信自己不会受影响，其他人就都会受影响？群众总是比我们个人知道得多，他们是能够作出判断的。一面说青年没书读，一面又不给他们书读，就是不相信青年人能判断。无怪现在没有书读了，这完全是思想垄断，不是社会主义民主。

我看现在要出一批书，要广开言路。读马克思、列宁的书和毛主席的书是主要的，但也要读历史、地理，读哲学。有些青年连世界地理位置、重大历史事件都搞不清楚，知识面越来越狭窄，这不行，这样是不可能真正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毛泽东思想不是孤立产生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伟大的实践产生的伟大的知识。

极左思潮破坏艺术质量的提高^{*}

（一九七二年四月九日）

你们报幕的同志，为什么不报独唱、伴奏人员的名字？看来你们的极左思潮还没有肃清。极左思潮不肃清，破坏艺术

^{*} 这是在广州观看部队文艺演出时的谈话。

质量的提高。

你们的歌越唱越快，越唱越尖，越唱越高。

革命激情要和革命抒情结合，要有点地方的色彩。

加强气象工作^{*}

（一九七二年七月三十日）

请你们乘此由国务院业务组将气象局业务抓起来，体制暂时不管。

总参、海军、空军哪一位管气象？请剑、春、德^{〔364〕}三位指定专人参加国务院业务组会议，整顿气象局全国布局。收听国际气象预报和预测，不知地面卫星站能否通过空中卫星收听更多情报，请打听一下，如行，立即办。凡属空白地区、海岸都要分类补上，对北线西线寒流、东线南线暖流也要管。人不够，要从“五七”干校^{〔332〕}调回，或者将转业或遣散走的调回。要打破军民界限，共同协力，军民两用。预防各种气象变化，特别要防气流、大风突变转向。总结经验，并且要考虑到空气中有无新的因素、元素增变。

妥否，请酌。

^{*} 这是针对“文化大革命”中各单位业务工作遭到严重破坏的情况，在中央气象局《关于今年第三号台风预报的初步检查报告》上写给叶剑英、李先念等同志的批语。

重视基础科学和理论研究*

(一九七二年九月十一日)

文裕〔365〕同志交来二机部四〇一所一部十八位同志一信〔366〕,已由郭老〔265〕、西尧〔331〕同志处转到。看了很高兴,正是月初我们同见巴基斯坦那位科学家〔367〕时所说的话。

现在请文裕同志将你们今年四月送给二机部和科学院那份报告〔368〕转给我一看。西尧同志请朱光亚〔369〕同志召集有关方面一议事,请不要等我批,先议出办法,供大家讨论采用。

这件事不能再延迟了。科学院必须把基础科学和理论研究抓起来,同时又要将理论与科学实验结合起来,高能物理研究和高能加速器的预制研究,应该成为科学院要抓的主要项目之一。所见可能有错,请你们研告。

中学毕业生可以直接上大学**

(一九七二年十月十四日)

我们小学和中学的学制究竟是十年还是十二年,还没有确定。过去是十二年,是不是要这么长,现在还在研究。对学

* 这是给张文裕、朱光亚同志的信。同年七月,周恩来同志曾指出,要把综合大学的理科办好,提高基础理论水平,并强调有什么障碍就要拔除。八月,他还对当时的科教组和科学院负责同志指出,要“好好议一下,并要认真实施,不要如浮云一样,过了就忘了”。

** 这是会见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李政道博士时的谈话节录。

习社会科学理论或自然科学理论有发展前途的青年，中学毕业后，不需要专门劳动两年，可以直接上大学，边学习、边劳动。当然这总是少数，大多数人要参加劳动，不一定升学。至少在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不可能所有的人都进大学，国家没有这个力量。中学毕业后马上进大学的总是少数，大量的要在生产实践中提高。劳动几年后，有升学机会的当然还可以深造。

要学外国的长处*

（一九七三年二月二十六日）

最近我们出去了两个代表团。一个医学代表团在国外看了回来，不敢做报告。他们要做报告，有一个军代表说，不要把我们说得一团漆黑。这么老大，随便给人家戴帽子，结果他们不敢讲了。这种风气不好。出去花了不少钱，回来连报告也不敢做。科学家代表团出国回来后，连一个报告都没有写出来，不敢谈人家的长处，也不敢谈我们的短处，这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有些人自己不懂，又随便给人家戴帽子。出国参观、考察，就是为了学习人家的长处。

* 这是在国家计划委员会汇报一九七三年计划和《关于坚持统一计划，加强经济管理的规定》的草稿时的谈话节录。

中美友好来往的大门 终于打开了*

（一九七二年二月二十一日）

首先，我高兴地代表毛泽东主席和中国政府向尼克松总统和夫人，以及其他的美国客人们表示欢迎。

同时，我也想利用这个机会代表中国人民向远在大洋彼岸的美国人民致以亲切的问候。

尼克松总统应中国政府的邀请，前来我国访问，使两国领导人有机会直接会晤，谋求两国关系正常化，并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这是符合中美两国人民愿望的积极行动，这在中美两国关系史上是一个创举。

美国人民是伟大的人民。中国人民是伟大的人民。我们两国人民一向是友好的。由于大家都知道的原因，两国人民之间的来往中断了二十多年。现在，经过中美双方的共同努力，友好来往的大门终于打开了。目前，促使两国关系正常化，争取和缓紧张局势，已成为中美两国人民强烈的愿望。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我们相信，我们两国人民这种共同愿望，总有一天是要实现的。

* 这是在欢迎美国总统尼克松的宴会上的祝酒词，刊载于一九七二年二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

中美两国的社会制度根本不同，在中美两国政府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分歧。但是，这种分歧不应当妨碍中美两国在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正常的国家关系，更不应该导致战争。中国政府早在一九五五年就公开声明，中国人民不要同美国打仗，中国政府愿意坐下来同美国政府谈判，这是我们一贯奉行的方针。我们注意到尼克松总统在来华前的讲话中也谈到，“我们必须做的事情是寻找某种办法使我们可以有分歧而又不成为战争中的敌人”。我们希望，通过双方坦率地交换意见，弄清楚彼此之间的分歧，努力寻找共同点，使我们两国的关系能够有一个新的开始。

中日两国人民 应该世代友好下去^{*}

（一九七二年九月二十五日）

日本首相田中角荣阁下应邀来我国访问，谈判并解决中日邦交正常化问题，我们感到高兴。我代表毛泽东主席和中国政府，对田中首相以及其他日本贵宾们表示热烈的欢迎。

田中首相来我国访问，揭开了中日关系史上新的一页。在我们两国的历史上，有着两千年的友好来往和文化交流，两国人民结成了深厚友谊，值得我们珍视。但是，自从一八九四年以来的半个世纪中，由于日本军国主义者侵略中国，使得中国人民遭受重大灾难，日本人民也深受其害。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这样的经验教训，我们应该牢牢记住。中国人民遵照毛泽东主席的教导，严格区分极少数军国主义分子和广大的日本人民。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尽管两国间战争状态没有宣告结束，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来往和贸易关系不但没有中断，而且不断发展。最近几年来，每年来中国访问的日本朋友人数超过其他国家朋友，中国同日本在平等互利基础上的贸易额也高过其他国家。这就为中日关系正常化创造

^{*} 这是在欢迎日本首相田中角荣的宴会上的祝酒词，刊载于一九七二年九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

了有利条件。

当前，世界形势正在发生巨大变化。田中首相就任以后，毅然提出新的对华政策，声明要加紧实现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邦交正常化，表示能够充分理解中国方面提出的复交三原则〔370〕，并且为此采取了实际步骤。中国政府本着一贯的立场，作出了积极的响应。实现两国邦交正常化已经有了良好的基础。促进中日友好，恢复中日邦交，是中日两国人民的共同愿望。现在是我们完成这一历史性任务的时候了。

首相阁下，你来华前说，两国会谈能够达成协议，也必须达成协议。我深信，经过我们双方的努力，充分协商，求大同，存小异，中日邦交正常化一定能够实现。

中日两国的社会制度不同，但这不应该成为我们两国平等友好相处的障碍。恢复中日邦交，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104〕的基础上建立友好睦邻关系，将为进一步发展我们两国人民的友好往来，扩大两国经济和文化交流，开辟广阔的前景。中日友好不是排他的，它将为和缓亚洲紧张局势和维护世界和平作出贡献。

中国和日本都是伟大的民族。中国人民和日本人民都是勤劳勇敢的人民。中日两国人民应该世代友好下去。在这里，我谨代表中国人民向日本人民致意，并衷心祝愿日本人民在前进的道路上取得更大的成就。

今天，中日两国领导人已开始就实现两国邦交正常化问题，进行具有重要意义的会谈。我们期望，我们的会谈将取得圆满成功。

向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前进^{*}

（一九七五年一月十三日）

遵照毛主席的指示，三届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曾经提出，从第三个五年计划开始，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可以按两步来设想：第一步，用十五年时间，即在一九八〇年以前，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

我们要在一九七五年完成和超额完成第四个五年计划，这样就可以为在一九八〇年以前实现上述的第一步设想打下更牢固的基础。从国内国际的形势看，今后的十年，是实现上述两步设想的关键的十年。在这个时期内，我们不仅要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而且要向实现第二步设想的宏伟目标前进。国务院将按照这个目标制订十年长远规划、五年计划和年度计划。国务院各部、委，地方各级革命委员会，直到工矿企业和生产队等基层单位，都要发动群众，经过充分讨论，制订自己的计划，争取提前实现我们的宏伟目标。

^{*} 这是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的一段话。报告全文刊载于一九七五年一月二十一日《人民日报》。

注 释

- 1 《共同纲领》即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九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共同纲领》确定了当时我国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民族、外交等各方面的基本政策。它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各族各界人民的代表共同制订的建国纲领，是全国人民在一定时期内共同的奋斗目标和统一行动的政治基础。一九五四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颁布以前，它起了临时宪法的作用。——第1、15、23、34、82、99、104、132页。
- 2 绥远是旧省名。这两个字原有安抚平定边远地区的意思。一九四九年一月北京和平解放后，同年九月绥远和平解放。一九五四年该省撤销，其辖区划归内蒙古自治区。——第3、260页。
- 3 党的七届二中全会 即一九四九年三月五日至十三日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毛泽东向全会做了报告。会议讨论了彻底摧毁国民党统治，夺取全国胜利，把党的工作重心从乡村转到城市，以生产建设为中心任务的问题。同时着重分析了当时中国经济各种成分的状况和党所必须采取的正确政策，规定了党在全国胜利后，使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发展到社会主义社会的总任务和主要途径。全会号召，全党在胜利面前务必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和艰苦奋斗的作风。——第9、123、331页。
- 4 学田 是中国旧时属于学校的田地，一般为乡绅所把持。学校以学田的收入作为教师的薪俸和学生的补助等费用。一九四七年九月十三日，中国共产党全国土地会议通过的《中国土地法大纲》中规定废除学校的土地所有权。一九五〇年一月十三日，政务院通过的《关于处理老解放区市郊农业土地问题的指示》中又明确规定学田应一律收归国有，对依靠学田收入维持的学校，应拟具妥善的办法，解决其经费问题。一九五〇年六月中央人

民政府委员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也作了类似的规定。
——第20页。

- 5 清朝初年，因郑成功等在东南沿海领导反清的武装斗争，清政府厉行海禁，严禁人民出海，严格限制对外贸易。一六八三年清政府统一台湾后，才允许商民造船出海，并于一六八五年指定广州、漳州、宁波、云台山为通商口岸，允许外商来华贸易。一七五七年，由于英国等殖民者在中国沿海进行非法活动，清政府又下令只准在广州通商，并制定了许多外商来华贸易的禁例，继续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一八四〇年至一八六〇年，英、法等国家先后发动两次鸦片战争，迫使清王朝签订许多不平等条约，开辟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牛庄（后改营口）、登州（后改烟台）、台南、淡水、潮州（后改汕头）、琼州、汉口、九江、南京、镇江、天津、喀什噶尔等地为商埠，并剥夺了中国关税自主权，取得了深入内地贸易、自由传教和招募华工出国等项特权。这样，它们用炮火打破了清王朝闭关锁国的局面。后来，人们把鸦片战争以后出现的这种形势，称为“海禁大开”或“海禁开放”。——第22页。
- 6 北洋军阀是清末袁世凯在北方几省首先建立起来的封建军阀集团。一八九五年清政府命袁世凯在天津小站编练“新建陆军”，归北洋大臣节制。一九〇一年袁世凯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以后，培植党羽，自成派系。辛亥革命后，袁世凯窃取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职务，组织了代表大地主大买办阶级的第一个北洋军阀政府。一九一六年袁死后，这个集团分别在英、日等帝国主义国家支持下分化为直、皖、奉三系，为争权夺利彼此间进行过多次混战。一九二六年皖系军阀段祺瑞下台，一九二七年直系军阀被国民革命军消灭，一九二八年奉系军阀政府垮台。至此，北洋军阀反动统治时期结束。——第22、62、95、258、297、318、355、413页。
- 7 李仪祉（一八八二——一九三八），陕西蒲城人，水利专家。一九二二年，历任陕西省水利局局长、黄河水利委员会委员长等职，曾提出很多治理黄河的意见，主办过陕西省泾惠、洛惠、渭惠和织女渠等灌溉工程。——第22页。
- 8 孔祥熙（一八八〇——一九六七），山西太谷人。曾任国民党政府财政部部长、行政院长、中央银行总裁、中国银行总裁，长期控制国民党政府的财权。一九三八年他在任行政院长时，颁行“非常时期农矿工商管理条例”，实行所谓战时经济管制政策，大幅度压低棉花价格，对农民进行公开的掠

- 夺。据统计，一九三八年和一九三九年陕西每市担棉花所能换取的生产资料或生活资料，只相当于抗日战争前的百分之四十左右。——第22页。
- 9 花园口的决堤指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军队炸开黄河大堤的事件。一九三八年五月，日本侵略军攻占徐州，随即沿陇海路西进。六月初，蒋介石下令炸开郑州以北花园口黄河大堤，企图以黄河之水阻止日军西犯。结果不仅未能阻住日军进攻，反而给人民造成空前灾难。河南、安徽、江苏三省四十余县被淹，数十万人溺死，一千多万人流离失所。大水过后，留下了一片连年灾荒的黄泛区。——第23页。
- 10 土改这里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农民废除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实现农民的土地所有制的革命运动。一九五〇年六月，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同年冬起，在新解放区陆续开展了土地改革运动。到一九五二年冬，除台湾省和一部分少数民族地区以外，全国的土地改革基本结束，使三亿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分得了约七亿亩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第24、41、55、63、80、93、132、162、264页。
- 11 侯德榜（一八九〇——一九七四），福建闽侯人，化学家。一九二二年至一九三四年先后创办塘沽永利碱厂和南京永利硫酸铵厂，一九三九年发明联合制碱的生产技术，称为侯氏制碱法。一九五〇年时是永利化学工业公司总经理。一九五七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次年任化学工业部副部长。——第25页。
- 12 萨福均（一八八六——一九五五），福建福州人，铁路工程专家。曾参加修建粤汉铁路。一九五〇年时是西南军政委员会交通部副部长兼西南铁路工程局副局长。——第25页。
- 13 詹天佑（一八六一——一九一九），广东南海人，铁路工程专家。一九〇五年至一九〇九年主持修建我国自建的第一条铁路——京张铁路（今京包线的北京至张家口段），后又主持修建粤汉铁路。——第25页。
- 14 整风运动指中国共产党自一九四二年起在全党范围内开展的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教育运动。主要内容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经过这个运动，全党进一步地掌握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的统一这样一个基本的方向。——第29、123、313、359、412页。

-
- 15 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于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三日至六月十一日在延安举行。毛泽东做《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朱德做《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刘少奇做《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周恩来做《论统一战线》的重要发言。大会总结了我国民主革命二十多年曲折发展的历史经验，制定了正确的纲领和策略，克服了党内的错误思想，使全党的认识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统一起来，达到了全党的空前团结。这次大会，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第29、125、303、313页。
- 16 大禹是传说中我国古代部落联盟领袖。他率领群众用疏通江河的办法治平水患。——第30页。
- 17 指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一九五〇年二月十四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在莫斯科签订，同年四月十一日起生效，有效期三十年。一九七九年四月三日举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鉴于国际形势已发生重大变化，决定条约期满后不延长。——第31页。
- 18 盟国对日管制委员会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盟国驻日占领军最高统帅的咨询机构。它根据一九四五年十二月苏、美、英三国外长莫斯科会议的协议在东京设立，由中、苏、美三国代表各一人和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四国联合代表一人组成。其主要任务是实现《波茨坦公告》的规定，完全解除日本的武装，并使其走向民主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在该机构的席位仍由蒋介石集团的代表非法占据着。一九五二年四月该机构由美国单方面宣布解散。——第36页。
- 19 李承晚（一八七五——一九六五），当时是南朝鲜“总统”。——第36页。
- 20 辽东省，一九四九年设置，辖今辽宁省东部。一九五四年撤销，其大部分地区和当时的辽西省合并为辽宁省，部分地区划归吉林省。——第36页。
- 21 斯德哥尔摩宣言是世界保卫和平大会常设委员会于一九五〇年三月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举行的第三次全体会议上通过发表的。宣言要求无条件禁止原子武器，并号召全世界一切善良的人们在这个宣言上签名。随后，在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一个签名运动。——第37页。
- 22 人民代表会议即地方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是解放初期人民参政的一种形式。其代表由推选、邀请、商定及选举等方式产生。在地方各级人民代表

大会召开之前，它先是地方各级人民政府传达政策、联系群众的协议机关，后曾代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在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休会期间，设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协助人民政府实行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决议，以及负责筹备下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第38、58、74、95页。

- 23 指一九五〇年三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全党学习 斯大林、毛泽东论共产党员要善于和非党群众团结合作 的指示》。指示指出，中国共产党在与非党员亲密团结这一工作上，是有很大成绩的。但是，有一部分党员，特别是负相当领导责任的党员，仍然犯着向党外群众摆党员架子，摆革命老资格，不愿或不善于和党外群众与民主人士合作的关门主义的毛病。指示要求各级党委和全体党员认真学习《斯大林、毛泽东论共产党员要善于和非党群众团结合作》这一文件，以加强共产党员和民主人士及广大非党群众的团结合作。——第39页。
- 24 这里指一九五〇年在中国共产党内进行的整风运动。这年五月一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全党全军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指出全国胜利后新党员大量增加，其中很多人思想作风不纯；在老党员中，也有很多人滋长了骄傲自满、命令主义作风，少数人甚至贪污腐化，违法乱纪。指示要求全党在和各项工作任务密切地结合而不是相分离的条件下，用阅读若干指定文件，总结工作，分析情况，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等项方法，进行一次整风运动，以整顿全党首先是干部的作风。——第39页。
- 25 这里指当时流通的旧人民币。中国人民银行自一九五五年三月一日起发行新人民币代替旧人民币，按规定人民币新币一元等于旧币一万元。——第45页。
- 26 一九五〇年六月二十五日朝鲜内战爆发后，美帝国主义发动侵朝战争，同时派军队侵略我国领土台湾。九月十五日又打着联合国军的旗号，派兵在朝鲜西海岸仁川登陆，随后越过“三八线”大举北犯，并且轰炸、扫射中国东北边境城市和村庄，严重威胁中国的安全。为了援助朝鲜人民的抗美援朝战争、保卫刚刚诞生的新中国，中国人民响应毛泽东主席发出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号召，组织了以彭德怀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开赴朝鲜前线，同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抗击美国侵略军。十一月四日，中国各民主党派发表联合宣言，坚决支持志愿军的正义行动。全国人民以增产节约、报名参加志愿军、捐献武器等各种方式全力支援朝鲜前线

的作战。在中朝人民军队的沉重打击下，美帝国主义连遭失败，被迫于一九五三年七月二十七日在朝鲜停战协定上签字。至此，朝鲜停战实现，中国人民的抗美援朝战争取得了伟大胜利。——第50、87、93、106、148、162、236、273、302页。

- 27 华莱士（一八八八——一九六五），原为美国共和党人，后加入民主党，在罗斯福任总统期间，曾任农业部长、商务部长和副总统。一九四六年加入美国进步党。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参加总统竞选失败后，在纽约州经营农业。一九五〇年六月朝鲜战争爆发后，他一方面支持美国政府的侵朝战争政策，另一方面又在九月二十九日以农人身份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说什么“如果新中国在学会制造卡车和拖拉机之前先学会了制造坦克，这将是一个世界的悲剧”。——第51页。
- 28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投降时，美、苏两国商定在朝鲜国土上以北纬38°线作为两国接受日军投降的临时分界线，分界线以北为苏军受降区，以南为美军受降区。这条线通称三八线。朝鲜战争爆发时，朝鲜人民已在这条线以北地区建立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这条线以南地区还在美帝国主义扶植的李承晚集团统治下。——第52页。
- 29 尼赫鲁（一八八九——一九六四），当时任印度总理。——第52页。
- 30 这里指一九五〇年九月十二日至十八日在美国纽约召开的美、英、法三国外长会议。——第52页。
- 31 见本书第37页。——第52页。
- 32 贝文（一八八一——一九五一），英国工党首领之一。一九五〇年时是英国工党内阁外交大臣。当时我国同美国尚未建立外交关系，在关于朝鲜战争问题上同美国政府的一些交涉，是通过与我国已建立外交关系的印度，再由印度通过英国来进行的。——第52页。
- 33 麦克阿瑟（一八八〇——一九六四），美国职业军人。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后，任盟国驻日占领军总司令，执行美国单独占领日本的任务。一九五〇年六月任“联合国军总司令”，指挥侵朝战争。——第52页。
- 34 甲午战争是一八九四年（甲午年）中国和日本发生的战争。这次战争是日本军国主义者蓄意挑起的。日本军队先向朝鲜发动侵略并对中国的陆海军进行挑衅，继即大举侵入中国的东北。由于清朝政府的腐败，中国方面

- 在陆上和海上都遭到失败，被迫于一八九五年签订了《马关条约》。——第53、297页。
- 35 七七事变也称芦沟桥事变。芦沟桥距北京城十余公里，是北京西南的门户。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本侵略军在这里向中国驻军进攻。在全国人民抗日热潮的推动和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的影响下，中国驻军奋起抵抗。中国人民英勇的八年抗战，从此开始。——第53、321页。
- 36 这里指一九五〇年四月十三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七次会议通过、五月一日由中央人民政府公布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全文共八章二十七条。主要内容是：废除包办强迫、男尊女卑、漠视子女利益的封建婚姻制度，实行男女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权利平等、保护妇女和子女合法权益利益的新婚姻制度。——第55页。
- 37 一九五一年九月起，北京、天津各高等学校的教师进行了有系统的思想改造的学习运动。为了统一领导这一运动，教育部成立了京津高等学校教师学习委员会，北京大学教师学习会是这个学习委员会的分会。——第59页。
- 38 马校长指马寅初（一八八二——一九八二），浙江嵊县人，经济学家。当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第59页。
- 39 五四运动是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发生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英、美、法、日、意等战胜国在巴黎召开对德和会，决定由日本继承德国在中国山东的特权。中国是参加对德宣战的战胜国之一，但北洋军阀政府却准备接受这个决定。五月四日，北京学生游行示威，反对帝国主义的这一无理决定和北洋军阀政府的妥协。这次运动迅速地获得了全国人民的响应，到六月三日以后，发展成为有工人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参加的广大群众性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五四运动也是反对封建文化的新文化运动。以一九一五年《青年杂志》（后改名《新青年》）创刊为起点的新文化运动，竖起“民主”和“科学”的旗帜，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五四运动中的先进分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使新文化运动发展成为马克思主义思想运动。他们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在思想上和干部上准备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第59、297、303、356页。
- 40 陈独秀（一八七九——一九四二），安徽怀宁人。一九一五年九月起主编《青年杂志》（后改名《新青年》），一九一八年和李大钊创办《每周评论》，提倡新

文化，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五四运动后，接受和宣传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建人之一。在党成立后的最初六年中是党的主要领导人。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犯了严重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其后，对于革命前途悲观失望，接受托派观点，在党内成立小组织，进行反党活动，一九二九年十一月被开除出党。后公开进行托派组织活动。一九三二年十月被国民党逮捕，一九三七年八月出狱。一九四二年病故于四川江津。——第61、301、425页。

- 41 章太炎即章炳麟（一八六九——一九三六），浙江余杭人。早年参加戊戌维新运动，一九〇四年和蔡元培等发起成立光复会，一九〇六年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前，他先后在《苏报》、《国粹学报》、《民报》等报刊上发表文章，宣传革命思想，公开提出推翻清朝统治。——第62页。
- 42 《国粹学报》是一九〇四年成立的学术团体国学保存会的机关刊物，一九〇五年二月在上海创刊。它以“发明国学，保存国粹”、“爱国保种，存学救世”为宗旨，是一个阐发民族学术传统、宣传反清思想但有复古主义倾向的刊物。一九一一年武昌起义后停刊。——第62页。
- 43 袁世凯（一八五九——一九一六），河南项城人。清末曾任山东巡抚、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等职，成为北洋军阀首领。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时，出任清政府内阁总理大臣。一九一二年在英、美、日等帝国主义国家支持下窃取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职务，组织了代表大地主大买办阶级的第一个北洋军阀政府，对内专制独裁，对外投降卖国。一九一五年五月接受日本企图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同年十二月称帝，一九一六年三月在全国人民的反对下被迫取消帝制。——第62、297页。
- 44 “二十一条”是日本帝国主义利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机在一九一五年一月十八日向袁世凯政府提出的旨在独占中国的秘密条款。这些条款共有五号，分为二十一条。主要内容是：一、由日本接管德国在山东所掠夺的权利，并加以扩大；二、承认日本在南满洲和内蒙古东部享有各种特权；三、将汉冶萍公司改为中日合办；四、中国沿海港湾岛屿概不让予或租予第三国；五、由日本控制中国的政治、财政、警察、军事大权，允许日本在湖北、江西、浙江、广东各省之间修筑重要铁路，并承认日本在福建享有投资修筑铁路、开采矿山、整顿海口等优先权。五月七日，日本提出最后通牒。五月九日，袁世凯政府对日本的这些要求，除声明第五号要求的一部分“容日后协商”外，一概加以承认。后来，因为全国人民的一致反对，以及各帝国主义国家

- 在华利益上存在矛盾，日本的这些要求没有全部实现。——第62页。
- 45 中日军事协定指一九一八年五月段祺瑞政府与日本政府在北京先后秘密签订的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和《海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协定以“共同防敌”为由，保证日本军队可以在共同进行反苏战争的名义下进入中国境内，并支配中国的有关军队。——第62页。
- 46 国家主义是以抽象的国家概念来掩盖国家的阶级本质的一种资产阶级思想。十九世纪开始在欧洲流行。它标榜“国家至上”，主张放弃阶级斗争，效忠于剥削阶级的国家；有些国家主义者还鼓吹“民族优越论”，制造民族间的矛盾对立，并用保卫祖国的名义鼓动侵略战争。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一些政治代表，组织了奉行国家主义的中国青年党，进行反对共产党和反对苏联的活动。——第62页。
- 47 少年中国学会是五四时期建立的一个社团。由李大钊、王光祈等人发起，一九一九年七月在北京正式成立。这个学会兼容了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出版刊物有《少年中国》、《少年世界》等。由于会员思想的分化日趋明显，一九二五年底停止活动。——第63页。
- 48 李大钊（一八八九——一九二七），河北乐亭人。曾任《新青年》杂志编辑，并与陈独秀创办《每周评论》，是最早在我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进分子之一。一九一八年参加筹组少年中国学会。一九二〇年在北京组织共产主义小组，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建人之一。——第63、303页。
- 49 曾琦（一八九二——一九五一），四川隆昌人。一九一八年参加发起筹组少年中国学会。一九二三年在法国留学期间与李璜等建立中国青年党。一九二四年回国，创办《醒狮》周报，鼓吹国家主义。一九二六年任中国青年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一九四五年任该党主席。解放战争时期参加国民党一手操纵的国民大会，并任国民党政府委员、总统府资政等职。——第63页。
- 50 李璜，一八九五年生，四川成都人。曾参加少年中国学会。一九二三年在法国留学期间与曾琦等建立中国青年党。一九二六年任该党中央执行委员，一九四八年任该党代理主席。——第63页。
- 51 左舜生（一八九三——一九六九），湖南长沙人。曾参加少年中国学会。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国青年党。一九二六年任该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

- 一九三五年任该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解放战争时期参加国民党一手操纵的国民大会，曾任国民党政府农林部部长。——第63页。
- 52 基马尔（一八八一——一九三八）是土耳其民族商业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一九一九年起领导土耳其的民族解放运动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一九二三年土耳其共和国成立后，当选为第一任总统。基马尔主义是以基马尔为代表的、主张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思潮。中国一些资产阶级分子在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后曾高唱基马尔主义，企图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第63页。
- 53 洪秀全（一八一四——一八六四），广东花县人，太平天国农民革命运动的领袖。一八五一年，他和杨秀清等领导群众在广西桂平县的金田村起义，建号太平天国，同清朝的封建统治坚持斗争十四年之久。——第63页。
- 54 严复（一八五四——一九二一），福建闽侯人。曾在英国海军学校留学。一八九四年中日战争后，主张君主立宪，变法维新。曾译赫胥黎《天演论》、亚当·斯密《原富》、穆勒《名学》和孟德斯鸠《法意》等书，传播了欧洲资产阶级的思想。——第63页。
- 55 康有为（一八五八——一九二七），广东南海人。一八九五年中国在甲午战争中被日本帝国主义打败后，他联合一千三百多个在北京参加科举考试的举人联名向光绪皇帝上“万言书”，要求“变法维新”。他主张改君主专制制度为君主立宪制度。一八九八年光绪皇帝任用他和谭嗣同、梁启超等人参预政事，试图变法。后来顽固派的代表慈禧太后重揽政权，维新运动遂告失败。康、梁逃亡海外，组织保皇会，和孙中山所代表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派相对立，成为反动的政治派别。康有为的著作有《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大同书》等。——第63页。
- 56 法国大革命指一七八九年至一七九四年在法国推翻封建专制制度、确立资本主义制度的资产阶级革命。它是各国资产阶级革命中一次规模最大、最彻底的革命。——第63、94页。
- 57 明治是日本天皇睦仁的年号。明治维新是从一八六八年起在日本明治年间发生的资产阶级性质的改革运动。这次改革虽未彻底消灭封建制度，但废除了封建割据的幕府制度，建立了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并通过一系列措施发展资本主义，使日本很快成为资本主义国家。——第63、321页。
- 58 梁漱溟，一八九三年生，广西桂林人。当时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

- 委员会委员。——第67页。
- 59 张伯苓（一八七六——一九五一），天津人，教育家。一九〇四年在天津创办敬业中学堂（一九〇七年改名南开学校）。一九一九年任南开大学校长。一九四五年后曾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国民党政府考试院院长等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致电周恩来总理表示祝贺。——第69页。
- 60 翁文灏（一八八九——一九七一），浙江鄞县人，地质学家。一九四八年曾任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长。不久辞职赴法。一九五一年回国，后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委员会常务委员。——第70、358页。
- 61 这是指一九五二年一月二十八日周恩来总理署名发布的《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加强老根据地工作的指示》，即本文第二部分：《大力扶植老根据地的经济和文化建设》。——第75页。
- 62 这是毛泽东给老根据地人民的题词，载一九五一年八月十一日《人民日报》。——第75页。
- 63 这里指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一九五〇年十二月十一日公布的《革命烈士家属革命人家属优待暂行条例》、《革命残废军人优待抚恤暂行条例》等。——第80页。
- 64 指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个体经济。——第82、100、108页。
- 65 司徒雷登（一八七六——一九六二），美国人，生于中国杭州。一九四六年七月出任美国驻中国国民党政府大使。一九四九年四月南京解放后，仍然留在那里观望。同年八月离开中国。——第86页。
- 66 一九三九年十一月，苏联与芬兰因边界问题发生战争，为此，英、法两国在美国支持下组织了一支远征军拟经瑞典进攻社会主义苏联。苏联政府警告瑞典政府，希望它不要违反中立政策，以免引起不必要的纠纷。瑞典政府决定同苏联保持正常关系。一九四〇年四月初，希特勒军队占领丹麦和挪威后，瑞典面临被希特勒占领的威胁。十三日，苏联政府向德国驻苏大使发表声明说，苏联不能让德国破坏瑞典中立。这个声明引起了德国政府的重视。瑞典政府对苏联这一行动表示感谢。——第89页。
- 67 沙文主义原指资产阶级反动的本民族至上主义。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产生于法国，因法国士兵沙文狂热拥护拿破仑一世的侵略扩张政策，主

张用暴力建立法兰西帝国而得名。它宣扬本民族利益高于一切，主张征服和奴役其他民族。在帝国主义时代，沙文主义成为帝国主义、霸权主义侵略其他国家和压迫其他民族的思想工具。——第91、229、440页。

- 68 镇压反革命指一九五〇年至一九五三年在全国开展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全国各地残存着大量的土匪、恶霸、特务、反动党团骨干和反动会道门头子等反革命分子。他们进行各种破坏活动，危害人民的革命和建设事业。为了迅速建立和巩固革命秩序，根据中共中央《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和中央人民政府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全国开展了镇压反革命运动。这次运动沉重打击了反革命残余势力，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第93、132、162、204页。
- 69 王芸生（一九〇一——一九八〇），天津静海人。曾任天津《商报》总编辑、上海《大公报》总编辑等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副主席。一九五二年二月九日在上海《大公报》上发表了《资产阶级有没有猖狂进攻？是我们“制造阶级斗争”吗？》一文。此文经毛泽东作了个别修改后，同年二月十三日为《人民日报》转载。——第93页。
- 70 文艺复兴是十四世纪至十六世纪欧洲部分国家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逐渐形成的条件下，思想和文化范围内发生的反映新兴资产阶级利益和要求的大变革。十六世纪资产阶级史学家认为它是古代希腊、罗马文化艺术的复兴，所以称为“文艺复兴”。这个时期表现在科学、哲学、文学、艺术、教育方面的人文主义思想，提倡人性，反对神性；提倡人权，反对神权；提倡个性自由，反对中古的宗教桎梏，冲击了腐朽的封建文化，在当时历史上起了很大的进步作用。文艺复兴为近代文学、艺术、教育、哲学和实验科学的发展开辟了道路。——第94、354页。
- 71 美国独立战争也称北美独立战争。一七七五年起北美十三个殖民地的人民先后进行推翻英国殖民统治、争取独立的资产阶级革命战争。一七七六年七月四日发表了《独立宣言》，正式宣告脱离英国。英国战败后，被迫在一七八三年签订《巴黎和约》，承认美国独立。——第94页。
- 72 南北战争也称美国内战，是一八六一年至一八六五年由美国南部种植园主奴隶制与北部资产阶级雇佣劳动制之间的矛盾所引起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战争。在战争过程中，代表北部资产阶级利益的联邦政府总统林肯颁

布了《宅地法》和《解放黑奴宣言》并采取其他民主措施 激发了工人、农民和黑人的革命斗志，因而联邦政府取得了战争的胜利。经过这次战争，美国的资本主义得到进一步的发展。——第94页。

- 73 辛亥革命是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政党同盟会所领导的推翻清朝专制王朝的革命。一九一一年（辛亥年）十月十日，革命党人发动新军在湖北武昌举行起义。接着，各省热烈响应，外国帝国主义所支持的清朝反动统治迅速瓦解。一九一二年一月在南京成立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帝制从此结束，民主共和国的观念从此深入人心。但是资产阶级革命派力量很弱，并具有妥协性，没有能力发动广大人民的力量比较彻底地进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辛亥革命的成果迅即被北洋军阀袁世凯篡夺，中国仍然没有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状态。——第94、255、290、318、354页。
- 74 “五反”指一九五二年在全国资本主义工商业中开展的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和反对盗窃经济情报的斗争。——第96、112、162、331页。
- 75 “五毒”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一些资本家的行贿、偷税漏税、盗骗国家财产、偷工减料和盗窃经济情报的五种违法行为。——第96、112页。
- 76 一九五二年一月五日，周恩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四次会议上报告了正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斗争和思想改造运动的情况，号召工商界人士积极参加这一运动，进行自我改造。这个报告的要点即本书《“三反”运动与民族资产阶级》一文。——第97页。
- 77 “三反”指一九五一年底至一九五二年十月在国家机关、部队和国营企业等单位中开展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第97、112、162、331页。
- 78 陈云，一九〇五年生，上海青浦人。一九五二年时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副总理兼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和一九六二年时是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第98、233、405页。
- 79 黄炎培（一八七八——一九六五），字任之，上海川沙人。清末曾考中举人。

- 早年加入同盟会。一九一七年在上海创办中华职业教育社。一九四〇年底参与发起组织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一九四五年底发起建立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副总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国民主建国会主任委员。——第101、357页。
- 80 这是唐代初期政治家魏征说过的话，见《资治通鉴·唐太宗贞观二年》。毛泽东在《矛盾论》等著作中，曾多次引用过这句话。——第103页。
- 81 毛泽东在一九五二年和一九五三年多次表述过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一九五三年六月十五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第一次对过渡时期总路线作了比较完整的表述。这里引用的是毛泽东审阅周恩来一九五三年八月在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上的结论时对过渡时期总路线所作的表述。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中共中央批准并转发了经毛泽东修改和审订的中共中央宣传部编写的《为动员一切力量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这个提纲对过渡时期总路线作了准确的表述，即：“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各项工作离开它，就要犯右倾或‘左’倾的错误。”——第105页。
- 82 盛丕华（一八八二——一九六一），浙江宁波人。当时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上海市副市长、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主任委员等职。——第106页。
- 83 “四马分肥”是当时对民族资本主义企业的利润分配形式的形象的说法，指企业利润按国家所得税金、企业公积金、职工福利奖金和资方的股息红利四部分分配（参见本书第101页）。一九五六年全行业公私合营后，资方的股息红利被定息代替。——第112页。
- 84 农业生产合作社是当时我国劳动农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自愿联合组成的集体经济组织。按照集体化程度的不同，分为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和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实行土地入股、统一经营；收益按土地和劳力比例分配；牲畜、农具等生产资料入股，也取得合理的代价。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土地取消了报酬，归集体所有，牲畜、农具等生产资

- 料作价入社，完全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第112、215、264、315页。
- 85 见毛泽东《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必经之路》（《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98—100页）。——第112、114、115、116页。
- 86 三大运动指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运动。参见本书注26、10、68。——第112页。
- 87 思想改造指一九五一年至一九五二年在我国知识分子中开展的思想改造学习运动。这次运动的主要内容是：组织知识分子学习历史唯物论的基本原理，学习《共同纲领》，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清除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政治思想影响，划清敌我界限，建立为劳动人民服务的观点。——第112页。
- 88 指一九五三年五月二日至十一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国工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大会总结了一九四八年全国第六次劳动大会以后，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全国工会工作的经验，确定了有计划的经济建设时期的工会的任务是团结全国人民，积极地完成国家经济建设计划，为逐步实现国家的工业化和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而斗争。——第115页。
- 89 指一九五四年二月六日刘少奇受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委托向党的七届四中全会所作的报告。——第119页。
- 90 指中国共产党七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中提出的、要求全党高级干部遵守的六条规定。原文如下：“（一）党的团结的利益高于一切，因此应当把维护和巩固党的团结作为指导自己言论和行动的标准，即有利于党的团结的话就说，不利于党的团结的话就不说，有利于党的团结的事就做，不利于党的团结的事就不做。（二）党是工人阶级先进分子的统一的集中的组织，党的团结的唯一中心是党的中央，因此，必须把任何地区、任何部门的党的组织及其工作看作是在中央统一领导下的整个党及其工作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反对任何派别思想、小团体习气、地方主义、山头主义和本位主义，反对任何妨碍中央统一领导、损害中央的团结和威信的言论和行动。（三）党的团结的重要保证之一是严格遵守民主集中制，严格遵守集体领导的原则，因此必须坚决反对分散主义和个人主义，反对把自己领导的地区和部门当作独立王国，反对把个人放在组织之上，反对不适当地过分地强调个人的作用，反对骄傲情绪和个人崇拜。

（四）全党高级干部的重要的政治活动和政治意见应该经常向所属的党的组织报告和反映，其关系特别重大者则应直接向党中央的政治局、书记处或中央主席报告和反映；如果避开党组织和避开中央来进行个人的或小集团的政治活动，避开党的组织和避开中央来散布个人的或小集团的政治意见，这在党内就是一种非法活动，就是违反党的纪律、破坏党的团结的活动，就必须加以反对和禁止。（五）全党高级干部应根据增强党的团结的原则来检查自己的言论和行动，凡是不利于党的团结的言论和行动都必须改正。（六）对于任何有损党的团结的言论和行动应当进行批评和斗争。”——第120页。

- 91 《甲申三百年祭》是郭沫若一九四四年三月在重庆《新华日报》发表的著名史论著作。文中叙述了一六四四年李自成农民起义军进入北京以后，它的一些首领因为胜利而骄傲起来，生活腐化，进行宗派斗争，以致使这次起义在一六四五年陷于失败。一九四四年四月十二日，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说：“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以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902页）——第123页。
- 92 遵义会议指一九三五年一月长征途中，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遵义举行的扩大会议。这次会议集中讨论和纠正了军事上的错误，结束了“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第126、302页。
- 93 “劳卫制”这里指一九五四年二月十一日政务院政务会议批准，同年五月至一九五八年十月在全国推行的“准备劳动与卫国”体育制度。它规定了当时全国统一的体育锻炼项目和考核标准。——第129页。
- 94 吴传玉（一九二八——一九五四），祖籍福建石美（今属龙海县），生于印度尼西亚，中国优秀的游泳运动员。一九五一年回国。一九五三年八月在第一届国际青年友谊运动会上获得百米仰泳的第一名，在国际比赛中第一次升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一九五四年赴匈牙利途中，因飞机失事遇难。——第130页。
- 95 两个教育部指当时的高等教育部和教育部。高等教育部的职掌范围是分管全国除高等师范学校、民族学院以外的高等学校；除师范学校以外的中等专业学校，工农速成中学及有关留学生派遣、接受等事项。教育部的职掌范围是分管全国高等师范学校、民族学院、师范学校、中学、小学、幼儿

园、成人初等学校、盲哑学校等。——第131页。

- 96 亚非会议也称万隆会议，一九五五年四月十八日至二十四日在印度尼西亚万隆举行。参加会议的有缅甸、锡兰（今斯里兰卡）、印度、印度尼西亚和巴基斯坦五个发起国，以及阿富汗、柬埔寨、中华人民共和国、埃及等二十九个亚非国家。会议广泛讨论了民族主权、反殖民主义斗争、世界和平以及与会国之间的经济、文化合作等问题，发表了《亚非会议最后公报》，提出了著名的关于促进世界和平与合作的十项原则。——第146、236、274页。
- 97 日内瓦会议指一九五四年四月二十六日至七月二十一日在瑞士日内瓦举行的讨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和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的国际会议。中、苏、美、英、法五国参加所有两项议题的讨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南朝鲜李承晚集团及英、美、法以外的其余十二个侵朝国家参加了朝鲜问题的讨论，越南民主共和国、老挝、柬埔寨和南越保大政权参加了印度支那问题的讨论。关于朝鲜问题没有达成任何协议；关于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达成了一系列协议，实现了印度支那的停战。——第148、236、274页。
- 98 科伦坡五国会议指一九五四年四月二十八日至五月二日印度、巴基斯坦、缅甸、印度尼西亚和锡兰（今斯里兰卡）五国总理在锡兰首都科伦坡举行的会议。会议发表公报呼吁立即在印度支那实行停火，欢迎日内瓦会议通过谈判恢复印度支那的和平，并提出了召开亚非会议的问题。——第148页。
- 99 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后，法国为在印度支那重建殖民统治，先后侵入越南、柬埔寨和老挝，发动了印度支那战争。印度支那三国人民经过八年多的英勇抗战，迫使侵略者在一九五四年七月签订停战协定。同年八月实现了印度支那停战。——第148、275页。
- 100 关于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的协议指一九五四年七月在日内瓦会议上达成的《关于在越南停止敌对行动的协定》、《关于在老挝停止敌对行动的协定》、《关于在柬埔寨停止敌对行动的协定》和《日内瓦会议最后宣言》等文件。协议的主要内容是：与会国尊重越南、老挝、柬埔寨的主权、独立、统一和领土完整，不干涉它们的内政；上述三国交战双方同时、全面停火；三国不参加任何军事同盟，不容许外国在它们的领土上建立军事基地；法国从印度支那撤军等。但美国没有在《日内瓦会议最后宣言》上签字，只声明美

- 国政府将不使用武力去妨碍日内瓦协议的实施。后来美国背弃了自己的诺言，使这一协议遭到了破坏。——第148页。
- 101 指一九四五年八月六日美国第一次使用原子弹轰炸日本广岛。——第148页。
- 102 指一九五四年三月美国在中太平洋的比基尼岛附近的公海上进行氢弹试验时，使日本船员久保山爱吉得“原子病”致死。——第148页。
- 103 茂物会议是缅甸、锡兰（今斯里兰卡）、印度、印度尼西亚和巴基斯坦五国总理继科伦坡五国会议后于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至二十九日在印度尼西亚的茂物举行的第二次会议。会议发表了联合公报，决定联合发起在一九五五年召开亚非会议。公报申明：召开亚非会议的目的，在于促进各国间的友好合作和睦邻的关系；讨论与会各国的社会、经济与文化问题和关系；讨论对亚非各国人民具有特别利害关系的问题，例如有关民族主权的问题、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的问题；讨论亚非国家和它们的人民在世界上的地位，以及它们对于促进世界和平与合作所能作出的贡献。——第152页。
- 104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即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参见本书《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一文及题解。——第152、244、478页。
- 105 《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是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倡议提出的，一九五六年一月公布。一九五七年十月公布修正草案。一九六〇年四月经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并作为正式文件颁发。纲要全文共四十条，提出了我国农业、畜牧业、林业、渔业、副业以及农村商业、信贷、交通、邮电、广播、科学、文化、教育、卫生等方面的发展规划。关于粮食每亩平均年产量，纲要规定从一九五六年开始，在十二年内，在黄河、秦岭、白龙江、黄河（青海境内）以北地区，要达到四百斤；黄河以南、淮河以北地区，要达到五百斤；淮河、秦岭、白龙江以南地区，要达到八百斤。——第160、220、434页。
- 106 即毛泽东《大量吸收知识分子》一文（《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581—583页）。——第161页。
- 107 胡风，一九〇二年生，湖北蕲春人，文艺理论家和诗人。一九三三年七月在上海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中国作家协会

理事、中国文联全国委员会委员等职。一九五五年胡风等人被错定为“反革命集团”，一九六五年胡风被判刑。一九八〇年九月，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并经过法律程序，为“胡风反革命集团”和胡风本人平反。一九八一年胡风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国作家协会顾问等职。

——第162页。

- 108 布尔加宁（一八九五——一九七五），当时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下面引用布尔加宁的话，是一九五五年七月四日他在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所做《关于在工业的进一步高涨、技术的进步和生产组织的改进方面的任务》的报告中说的。——第182页。
- 109 见毛泽东《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6页）。——第189页。
- 110 这是毛泽东在一九五六年一月二十五日最高国务会议上讲的一段话，见同年一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第190页。
- 111 《十五贯》是根据清初戏剧家朱素臣的传奇剧本《十五贯》（又称《双熊梦》）改编的昆曲剧目。主要情节是：赌徒娄阿鼠图财杀死屠户尤葫芦，窃去铜钱十五贯，反嫁祸于尤之养女苏戍娟及身带十五贯钱的路人熊友兰；无锡知县过于执主观地断定熊、苏二人通奸杀人，将熊、苏判处死刑。苏州知府况钟奉命监斩时发现疑点，连夜去见巡抚周忱，请求缓刑复查。况亲赴现场和民间查访，终于查明了真凶，平反了冤狱。——第192、334页。
- 112 指剧中人物江南巡抚周忱。历史上的周忱（一三八一——一四五三），明宣德年间以工部右侍郎巡抚江南。为官清廉，兴利除弊，曾与况钟一起奏请减免江南重赋。——第193页。
- 113 这里指剧中人物苏州知府况钟。历史上的况钟（一三八三——一四四三），明宣德年间任苏州知府。任内抑制豪强，严惩贪官污吏。曾与周忱一起奏请减免江南重赋。——第193页。
- 114 “熊氏二难”指朱素臣著《十五贯》中所写熊家二兄弟相继遭难的情节。剧本写熊友兰、熊友蕙兄弟都为十五贯钱引起的误会而遭祸获罪，苏州知府况钟梦见双熊，疑为冤狱，后亲自查访，终于为二熊昭雪。昆曲《十五贯》在改编时，删去了有关熊友蕙的情节，剔除了梦见双熊等封建性糟粕，突出了况钟实事求是的精神和注重调查研究的作风。——第195页。
- 115 传淞即王传淞，昆剧演员。当时是浙江昆苏剧团副团长，在《十五贯》中扮

- 演娄阿鼠。传瑛即周传瑛，昆剧演员。当时是浙江昆苏剧团团长，在《十五贯》中扮演况钟。——第196页。
- 116 老舍（一八九九——一九六六），北京人，作家。当时任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等职。曾将《十五贯》改编为京剧。——第196、296、317页。
- 117 宋景诗（一八二四——？），山东堂邑（今聊城西）人。一八六〇年参加鲁西农民抗粮斗争，次年捻军进入山东时，参加白莲教起义，率领黑旗军，转战直隶（今河北）、山东边界一带。不久被清军包围，投降清钦差大臣胜保。后脱离清军，回到山东家乡一带，重举义旗。一八六五年曾参加围歼清军僧格林沁部的曹州大战，后来下落不明。根据宋景诗的事迹创作的文艺作品有京剧《宋景诗》、电影《宋景诗》。——第197页。
- 118 和平解放台湾的号召指一九五六年一月三十日周恩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中提出的“为争取和平解放台湾，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而奋斗”的号召。他代表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宣布：“凡是愿意回到大陆省亲会友的，都可以回到大陆上来。凡是愿意回到大陆来参观和学习的，也都可以到大陆上来。凡是愿意走和平解放台湾道路的，不管任何人，也不管他们过去犯过多大罪过，中国人民都将宽大对待，不究既往。凡是在和平解放台湾这个行动中立了功的，中国人民都将按照立功大小给以应得的奖励。凡是通过和平途径投向祖国的，中国人民都将在工作上给以适当的安置。”——第201页。
- 119 中美两国在日内瓦会谈指中国和美国一九五五年八月开始在瑞士日内瓦举行的大使级会谈。双方商定会谈包括两项议程：一是双方平民回国问题，二是双方有争执的其他实际问题。前项议程在同年九月十日达成协议，后项议程一直没有达成任何协议。一九五八年九月至一九七〇年二月，中美大使级会谈改在波兰首都华沙举行。——第201页。
- 120 解放战争后期和新中国成立初期，在新解放的地区，为了彻底打垮封建势力，巩固革命秩序，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军民开展了大规模的肃清土匪、特务，反对恶霸地主的斗争。一方面展开军事活动，清剿土匪，掩护群众工作；一方面发动群众，进行反恶霸斗争，摧毁反革命统治势力，建立人民民主政权，动员群众力量支援剿匪的军事行动。清匪反霸斗争为以后农村进行土地改革，作好了政治上和组织上的准备。——第204页。
- 121 为了肃清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自一九五五年六月起至一九五六年底，

在全国开展了肃反运动。党政机关、团体、工矿企业、部队和学校开展的肃反运动，称作机关肃反或内部肃反；农村、街道和私营企业等方面开展的肃反运动，称作社会肃反。——第205页。

- 122 一九四三年四月中共中央决定在整顿党的作风的同时，进行一次普遍的审查干部的运动。在这次审干中，一度掀起了所谓“抢救运动”，发生了反特扩大化的严重错误。这一年八月十五日中共中央通过《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总结了这次审干运动的经验。这个决定提出了首长负责，自己动手，领导骨干与广大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调查研究，分清是非轻重，争取失足者，培养干部，教育群众等九条方针，反对“逼、供、信”的主观主义的错误方针。十月九日，毛泽东指出：“一个不杀，大部不抓，是此次反特务斗争中必须坚持的政策。”这样，就及时纠正了反特扩大化的严重错误。——第205页。
- 123 我国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为了便于各级主管机关对建设项目的计划、设计、施工等工作实行分级管理，按基本建设项目总投资的多少确定一个数额，这个数额称为限额。如一九五四年规定钢铁工业的投资限额为一千万元，纺织工业的投资限额为五百万元，其他各项轻工业的投资限额为三百万元至四百万元。限额以上项目，一般为国家重点建设项目。——第211页。
- 124 定息是我国在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后，对民族资本家的生产资料进行赎买的一种形式，即不论企业盈亏，统一由国家每年按照资本额发给资本家固定的利息（一般是年息百分之五）。定息从一九五六年起支付，一九六六年九月停止支付。——第215、360、398页。
- 125 定产、定购、定销又称粮食“三定”，是我国政府在一九五五年为了进一步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农业增产，保证国家和人民对粮食的需要所采取的一项重要措施。定产就是根据田地质量和自然条件，结合经营条件，按正常年景下的单位面积常年产量评定农户的粮食产量，这是计算国家向农户购销粮食的依据。定购是从定产数量中按规定标准扣除农民的口粮、种子、饲料等用粮和实缴公粮后，对剩下的余粮按百分之八十至九十计算收购数量。一九五五年分户核定的余粮户粮食交售任务，在正常的年景下，自同年起三年不变，增产不增购。定销是对各类缺粮地区按规定标准确定统销数量。——第216页。
- 126 八大即一九五六年九月十五日至二十七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八

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大会分析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的形势，提出了全面开展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毛泽东致开幕词，刘少奇作政治报告，周恩来作《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邓小平作《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朱德、陈云、董必武等作了重要发言。大会通过了《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中国共产党章程》和《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二年）的建议》，并选举了新的中央委员会。八大制定了正确的路线，为新时期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和党的建设指明了方向。——第229页。

- 127 邵力子（一八八二——一九六七），浙江绍兴人。当时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务委员。——第231页。
- 128 十大关系指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论十大关系》中论述的十个问题：一、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二、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三、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四、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五、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六、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七、党和非党的关系；八、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九、是非关系；十、中国和外国关系。——第231页。
- 129 三大改造指一九五六年基本完成的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第231、395页。
- 130 太平洋战争指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反法西斯联盟国家与日本在太平洋地区进行的战争。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晨，日本未经宣战，以强大的海、空军突然袭击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主要海、空军基地珍珠港，使美国太平洋舰队遭到惨重损失。十二月八日，美、英对日宣战。同日，德、意对美宣战。日本军队先后侵占了东南亚的许多国家和地区以及太平洋上的一些岛屿，后来在太平洋地区各反法西斯国家武装力量的沉重打击下，不断遭到失败。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无条件投降，战争结束。——第241页。
- 131 东土耳其斯坦指一九三三年十一月英帝国主义在中国直接策动新疆大伊斯兰主义分子萨比提大毛拉在喀什成立的“东土耳其斯坦伊斯兰共和国”。这个政权因分裂祖国，投靠帝国主义，受到新疆各族人民的反对，一九三四年二月瓦解。——第259页。
- 132 一九一一年武昌起义后，湖北军政府提出改政体为五族共和。孙中山曾经宣传过这种思想，主张汉、满、蒙、回、藏五族一家，立于平等地位，通过五大

民族平等参与国家政权，实现国家统一和民族统一。——第263页。

- 133 一九四三年蒋介石在《中国之命运》一书中，认为从民族成长的历史来说，中华民族是多数宗族融和而成的；各地的宗族，同源于一个始祖，是同一血统的大小宗支，它们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由于生活的互相依赖、文化的交流和累世的婚姻关系，逐渐同化、融和为一个“中华大民族”。蒋介石在这里实质上只承认有汉族，否定少数民族的存在，把各少数民族称之为汉族的大小宗支。——第263页。
- 134 程砚秋（一九〇四——一九五八），北京人，京剧表演艺术家、京剧“程派”艺术的创立者。抗日战争期间拒绝为日伪演出，致力于戏曲理论的研究和戏曲教学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戏曲研究院副院长。一九五七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第272、296、318页。
- 135 这是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七日毛泽东在莫斯科对中国留苏学生讲话中的一句话，意思是社会主义力量超过了帝国主义力量。见同年十一月二十日《人民日报》所刊载的通讯《毛主席会见留苏学生》。——第274页。
- 136 《汉字简化方案》中的简化字从一九五六年二月一日到一九五九年七月十五日分四批推行。一九六四年，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根据国务院的批示编印了《简化字总表》，应用扩大后的简化偏旁又类推简化了一部分汉字，使简化字的总数增加到二千二百三十八个。——第280页。
- 137 李凤莲抗日战争时期是延安的被服厂工人、劳动模范。一九五八年时在中华全国总工会工作。——第281页。
- 138 李烛尘（一八八一——一九六八），湖南永顺人。当时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国民主建国会副主任委员、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副主任委员。——第281页。
- 139 注音字母是标注汉字读音的一套音标。一九一三年由读音统一会制定，一九一八年由北洋政府教育部公布。后来国民党政府把它改名为注音符号。——第287页。
- 140 见鲁迅《且介亭杂文·门外文谈》（《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90页）。——第290页。
- 141 鸦片战争是一八四〇年至一八四二年资本主义的英国对中国发动的侵略战争。从十八世纪末期起，英国把大量鸦片走私输入中国，毒害中国人民，并使中国白银大量外流。一八三八年底清政府派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去广

- 州禁烟。一八三九年六月林则徐下令当众销毁从英、美等国不法商人手中缴获的鸦片二百三十多万斤。一八四〇年，英国借口保护通商，发动侵华战争。清政府在战争中动摇妥协，只有部分军队和人民群众奋起抵抗侵略者。英军除先后在广东、福建、浙江沿海骚扰并入侵外，又攻占吴淞，闯进长江，直逼南京，迫使清政府在一八四二年八月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从此，中国逐步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第291、354页。
- 142 清末我国邮政由英国人掌管。邮政式指英国人在邮政业务中用拉丁字母拼写中国地名时习用的一套拼写法。——第291页。
- 143 威妥玛式指英国驻中国使馆中文秘书威妥玛在一八六七年发表的汉语官话的拉丁字母拼写法。——第291页。
- 144 卢懋章（一八五四——一九二八），福建同安人，中国文字改革运动最早的提倡者之一。一八九二年发表《一目了然初阶》，提出一种拼切汉字读音的设计方案，他把这种方案称为“中国切音新字”。——第291页。
- 145 国语罗马字即“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是用罗马字母（也叫拉丁字母）拼写汉语的方案。由“国语罗马字研究委员会”成员钱玄同、黎锦熙（当时均为国立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赵元任（当时是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教授）等人制订。一九二六年由国语统一筹备会发表，一九二八年经国民党政府大学院（教育部）正式公布。——第291页。
- 146 拉丁化新文字是用拉丁字母拼写汉语的方案。瞿秋白在一九二八年起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期间，经常与当时在苏联学习的吴玉章、林伯渠等人研究中国文字改革问题，并写成了《中国拉丁化字母》的小册子。瞿秋白一九三〇年回国后，吴玉章、林伯渠以原有研究成果为基础，和一些苏联语言学家一起研究制订了中国北方话拉丁化方案。一九三一年九月，旅苏华侨在海参崴召开中国新文字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了根据上述研究成果制订的《中国汉字拉丁化的原则和规则》的方案。这一方案于一九三三至一九三四年间传到国内，被称为“拉丁化新文字”。——第291页。
- 147 陈叔老即陈叔通（一八七六——一九六六），浙江杭州人。曾是清末翰林。参加过反对袁世凯的斗争。一九二七年后担任浙江兴业银行董事。抗日战争时期，支持抗日救亡活动。抗战胜利后，参加上海各界人民团体联合会，从事反蒋民主活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华全国工

- 商业联合会主任委员等职。——第295、357、399页。
- 148 张文白即张治中（一八九〇——一九六九），安徽巢县人。当时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第296页。
- 149 戊戌变法是一八九八年（戊戌年）发生的资产阶级性质的维新运动。当时，中国面临被帝国主义列强瓜分的严重危机。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在清朝光绪皇帝的支持下，企图通过自上而下的变法维新，逐步地在中国推行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联合统治的君主立宪制度，发展民族资本主义，以挽救民族危亡。但是，当时还没有强有力的资产阶级，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坚决反对变法维新。在宣布变法三个多月以后，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幽禁光绪皇帝，杀害谭嗣同等六人，变法遭到失败。——第297页。
- 150 顾颉刚（一八九三——一九八〇），江苏吴县人，历史学家。当时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历史研究所研究员。——第298页。
- 151 八旗这里指八旗兵。清代常备军之一。它是分别以正黄、镶黄、正白、镶白、正红、镶红、正蓝、镶蓝军旗为标志的八支军队的统称。每旗设都统一人、副都统二人为正副统帅。八旗兵后又分满洲八旗、蒙古八旗、汉军八旗。——第298页。
- 152 绿营指绿营兵，也称绿旗兵。它是清朝政府按明代军队建制建立的常备军。因这些由汉人组成的军队使用绿色军旗，所以称绿营。——第298页。
- 153 湘军是曾国藩为镇压太平天国农民革命运动，于一八五二年在其家乡湖南招募、训练的封建军阀武装。因士兵和将领多是湘乡人，所以称湘军。——第298页。
- 154 淮军是李鸿章为镇压太平天国农民革命运动，在曾国藩的支持下，于一八六一年将其家乡安徽的地主武装按湘军的组织形式加以改编组成的封建军阀武装。因士兵多是淮南一带人，所以称淮军。——第298页。
- 155 新军指一八九四年（甲午年）中日战争后清朝政府仿照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军制编练的新式陆军。——第298页。
- 156 一九五七年十月，苏联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这是当时世界上最新的科学成就。我国在一九五八年“大跃进”运动中，有人用放“卫星”来比喻各行各业出现的“高产指标”和“最新成就”。但是当时在浮夸风的影响

下,不少部门和单位宣布的“高产指标”和“新技术”、“新产品”是不切实际和不符合标准的。——第298页。

- 157 黄埔军校指设在广州黄埔的陆军军官学校,它是一九二四年孙中山在中国共产党和苏联的帮助下创办的。中国共产党曾派周恩来、恽代英、肖楚女、聂荣臻、熊雄等到该校工作。学员中有很多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一九二七年蒋介石背叛革命以前,这是一所国共合作的学校。——第298页。
- 158 三二〇事变即中山舰事件,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蒋介石为排挤共产党人而制造的反共阴谋事件。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八日,蒋介石指使其亲信以黄埔军校驻省办事处的名义,向海军局代理局长李之龙(当时是共产党员)传达命令,要他调中山舰到黄埔待命。当中山舰抵达黄埔后,他们又造谣说中山舰要炮轰黄埔军校、共产党要赶走蒋介石。三月二十日,蒋介石借口共产党阴谋暴动,逮捕了李之龙,扣留了中山舰,并派兵包围省港罢工委员会。随后又强迫共产党员从国民革命军第一军以及黄埔军校中撤出。由于当时中共中央的主要领导人陈独秀、张国焘等人妥协退让,不敢反击蒋介石,遂使他的阴谋得逞。——第298、304页。
- 159 一九四〇年十月,国民党军事当局强令长江南北和黄河以南坚持抗日的新四军、八路军全部开赴黄河以北。中国共产党一方面驳斥这一无理要求,一方面从维护抗日大局出发答应将安徽南部的新四军部队调到江北。一九四一年一月,皖南的新四军九千余人,取得国民党当局的同意,向江北转移。部队行至安徽泾县茂林地区,遭到七八万国民党军队的突然袭击。经七昼夜浴血奋战,弹尽粮绝,除小部分突围外,大部壮烈牺牲。军长叶挺被扣,副军长项英遇害。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第298页。
- 160 陈炯明(一八七八——一九三三),广东海丰人。一九一七年护法军政府成立后,任援闽粤军总司令。一九二〇年,任广东省省长兼粤军总司令。一九二二年发动反对孙中山的军事政变。一九二五年二月至三月,为了巩固广东革命根据地,国共合作组织的以黄埔军校学生为骨干的革命军从广州出发东征陈炯明,打败了盘踞在东江的陈炯明部的主力。同年十月至十一月,革命军再次东征,最后消灭了陈炯明的军队。——第299、304页。
- 161 梁思成(一九〇一——一九七二),广东新会人,建筑学家。清末维新派著名人物梁启超之子。当时任清华大学土木建筑系主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常务委员会委员。一九五九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第299页。

- 162 康同璧（一八八一——一九六九），广东南海人，清末维新派著名人物康有为之女。当时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第299页。
- 163 维新派指中日甲午战争前后主张向西方学习、实行维新变法的资产阶级政治派别，主要代表人物有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等。——第299页。
- 164 一九五八年九月二十八日，中国史学会和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今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在北京联合举行学术讨论会，纪念戊戌变法六十周年。会议由范文澜主持。参加会议的有北京的史学工作者和吴玉章、李济深、黄炎培、陈叔通、陈垣、潘梓年、章士钊、康同璧、梁思成等六十余人。参加会议的同志在发言中谈到，一八九八年的戊戌变法是改良主义运动，但在当时代表着中国社会的发展趋势，具有进步的意义，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次思想解放运动。——第299页。
- 165 共产国际又称第三国际，一九一九年三月在列宁领导下成立。一九二二年中国共产党参加共产国际，成为它的一个支部。一九四三年五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通过决定，提议解散共产国际，同年六月共产国际正式宣布解散。——第300页。
- 166 李立三（一八九九——一九六七），湖南醴陵人。一九二一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他在担任中共中央领导工作期间，于一九三〇年六月至九月犯了“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后来他接受了党对他所犯错误的批评，认识和改正了错误，在党的第七次、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继续被选为中央委员。——第301页。
- 167 三次“左”倾错误指一九二七年十一月至一九二八年四月以瞿秋白为代表的“左”倾盲动主义错误，一九三〇年六月至九月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和一九三一年一月至一九三五年一月遵义会议前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第302页。
- 168 江亢虎（一八八三——一九五四），江西弋阳人。早年游历日本和欧洲。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后，他标榜社会主义，在上海创办中国社会党。一九一三年，该党被袁世凯政府解散。一九二一年六月他以社会党人身份列席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一九二四年，他为了投靠北洋军阀，重新组织中国社会党，次年又改组为中国新社会民主党。一九二七年，当北伐战争节节胜利时，他不得不把这个党解散。抗日战争时期，他投身敌伪政府，堕落

为汉奸。——第303页。

- 169 黄介民（一八八三——一九五六），江西清江人。早年加入同盟会。一九一九年在上海任中华工业协会总干事，参加过反帝爱国活动。一九二七年国民党反动派叛变革命后，他不满蒋介石的独裁统治，辞去国民党江西省党部候补监委等职务，从事司法和教育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团结委员会委员、江西省人民政府监察厅副厅长。——第303页。
- 170 戴季陶（一八九一——一九四九），原籍浙江吴兴，生于四川广汉。早年加入中国同盟会。五四运动期间，在上海主编《星期评论》周刊，对社会主义和劳工问题作过一些研究。一九二四年任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歪曲孙中山学说的革命内容，反对共产党，反对工农运动，为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进行思想上的准备。一九二七年国民党反动派叛变革命后，继续追随蒋介石，历任国民党政府委员、考试院院长等职。——第303页。
- 171 吴佩孚（一八七四——一九三九），山东蓬莱人，北洋军阀直系首领之一。一九一八年反对皖系首领段祺瑞的“武力统一”政策，主张南北议和。五四运动时，曾以“爱国军人”姿态，通电反对在巴黎和约上签字。一九二〇年联合奉系推翻段祺瑞政府，随后曾与苏俄政府建立联系。一九二二年将奉系逐出关外后，支持曹锟控制北京政府。一九二三年残酷镇压京汉铁路工人运动。一九二六年所部在湖北被北伐军击溃。——第303页。
- 172 三大指一九二三年六月十二日至二十日在广州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大会的中心议题是讨论同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问题。大会正确地估计了孙中山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民主主义的立场，以及使国民党改造成为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革命联盟的可能性，批评了怀疑国共合作的“左”倾观点和主张“一切工作归国民党”的右倾观点，并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同时保持共产党在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这次大会为国共合作进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作了必要的准备。——第303页。
- 173 张国焘（一八九七——一九七九），江西萍乡人。一九二一年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党内曾先后被选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一九三一年任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副主席等职。一九三五年六月红军第一、第四方面军在四川

懋功地区会师后任红军总政治委员。他反对中央关于红军北上的决定，进行分裂党和红军的活动，另立“中央”。一九三六年六月他被迫取消第二“中央”，随后与红军第二、第四方面军一起北上，十二月到达陕北。一九三八年四月背叛革命，投入国民党特务集团，随即被开除党籍。一九七九年死于加拿大。——第304页。

- 174 一九二五年孙中山去世后，国民党右派公开进行反革命分裂活动。十一月二十三日，邹鲁、谢持、林森等十余人，在北京西山碧云寺召开会议，反对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通过反共、反苏、反对国共合作等议案。随后，他们在上海另立“国民党中央党部”，在北京等地设立地方党部，从事反共反人民活动。这批人被称为西山会议派。——第304页。
- 175 一九二四年，英帝国主义用大量金钱、军火支持广州大买办陈廉伯所控制的反革命武装组织商团，企图颠覆广东革命政府。八月，广东革命政府扣留了陈廉伯为组织武装叛乱而偷运的军火。陈指使商团向孙中山请愿，并在全省各地煽动罢市。十月十日，广州群众为庆祝辛亥革命举行游行，遭到商团枪击。参加游行的十六个团体成立了“工农兵学革命大同盟”，发表宣言，坚决要求解散商团，严惩凶手。在中国共产党、广大工农群众和国民党左派的影响和支持下，孙中山采取措施，调集黄埔学生军、工农武装及其他军队，在十五日消灭了这一反革命武装。——第304页。
- 176 独立团指一九二五年冬在广东肇庆成立的以共产党人叶挺为团长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该团以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为骨干，在北伐战争中，英勇善战，战功卓著。——第304页。
- 177 指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一九二七年二月，毛泽东曾将这篇文章送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向导》，但是陈独秀等右倾领导者不予发表。三月五日，这篇文章的一部分首先发表在中共湖南省委机关刊物《战士》第35、36期合刊上，其余部分在第38、39期上续登。三月十二日，《向导》发表了此文的一部分，当时在党中央主管宣传工作的瞿秋白主张全文刊完，被陈独秀等拒绝。四月，瞿秋白将此文交中共在武汉开办的长江书局以《湖南农民革命》为书名出版单行本，并为此书写了序言。——第304页。
- 178 指一九二七年七月十五日汪精卫在武汉发动的反革命政变。这年四月十二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后，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政府也日趋反动。六月十日，汪精卫同冯玉祥举行郑州会议，策划反共；十九日，冯

又同蒋介石举行徐州会议，密谋蒋汪合作，共同反共。中国共产党在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指导思想的影响下，对国民党的阴谋不加戒备，没有准备应付突然事变。七月十五日，汪精卫公开与共产党决裂，随后封闭工会、农会等革命团体，大批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至此，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遭到失败。——第304页。

- 179 鲍罗廷（一八八四——一九五一），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是苏联政府派到广州革命政府的代表和国民党的政治顾问。一九二三年十月到广州，一九二七年七月武汉政府叛变后回国。——第306页。
- 180 叶挺（一八九六——一九四六），广东惠阳人。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冬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团长。叶挺的部队指南昌起义前以独立团为基础组成的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二十四师和由独立团一部分骨干编成的第四军二十五师。叶挺当时任第二十四师师长。——第306页。
- 181 南昌起义是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中国共产党为了反击以蒋介石、汪精卫为代表的反革命势力而在江西南昌发动的武装起义。起义部队在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周恩来和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领导下，经过激烈战斗，占领了南昌城。这次起义打响了中国人民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从此，开始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武装斗争的新时期。起义部队撤离南昌后南下广东。十月初在潮汕一带遇到优势敌军的围攻而失败。保存下来的起义部队，一部分到达海陆丰地区，继续坚持斗争；另一部分在朱德、陈毅等率领下，转移到湘南，发动了湘南起义，一九二八年四月到达井冈山和毛泽东领导的工农革命军会合。——第306页。
- 182 罗米那兹（一八九八——一九三四），苏联人。一九二七年七月下旬作为共产国际代表来中国。此时，武汉政府已经叛变革命，他参加了中共八七会议的领导工作。——第306页。
- 183 八七会议指一九二七年八月七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的紧急会议。这次会议总结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的经验教训，结束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在中央的统治，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统治的总方针，并把发动农民举行秋收起义作为当时党的最主要的任务。但是，这次会议在反对右倾错误的时候，不认识应当根据各地不同的情况，组织恰当的反攻或必要的策略上的退却，并在组织上开始了宗派主义的过火的党内斗争，因而为后来的“左”倾错误开辟了道路。关于对八七会议的分析，

参见周恩来《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71—172页）。——第306页。

- 184 张太雷（一八九八——一九二七），江苏常州人。一九二〇年在北京参加共产主义小组。一九二五年在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并任苏联顾问鲍罗廷的翻译、中共广东区常委和宣传部长。一九二七年五月在党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同年八月出席党的八七会议，被选为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后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十二月领导广州起义时牺牲。——第306页。
- 185 指斯大林一九二七年七月二十八日在苏联《真理报》上发表的《时事问题简评》、七月二十九日至八月九日在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上的演说以及九月二十七日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和共产国际监察委员会联席会议上的演说等。见《斯大林全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298—325页；《斯大林全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3—84页、第132—143页。——第306页。
- 186 谭平山（一八八六——一九五六），广东高明人。一九二〇年组织广州共产主义小组。在中国共产党的第三、第四、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历任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央组织部长、农民部长和武汉国民政府委员等职。一九二七年南昌起义时，是革命委员会主席团成员。同年十一月，在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被当时的“左”倾领导者开除党籍，后参与组织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即第三党）。抗日战争时期，反对蒋介石的卖国独裁政策。一九四八年参与组织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第307页。
- 187 广州暴动是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在广州发动的反击国民党反革命势力的武装起义。十二月十一日，在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张太雷和叶挺、恽代英、叶剑英、杨殷、周文雍、聂荣臻等领导下，驻广州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教导团联合广州工人、市郊农民，经过激战，占领了市内绝大部分地区。起义胜利后成立了广州苏维埃政府。十二日，国民党反动军队在帝国主义战舰炮火的掩护下，向广州反扑。张太雷在战斗中壮烈牺牲。起义部队十三日被迫撤出广州。撤出的起义部队，分别与东江、湖南一带的革命武装结合，继续坚持武装斗争。——第307页。
- 188 六大指一九二八年六月十八日至七月十一日在莫斯科举行的中国共产党

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会上，瞿秋白作了《中国革命与共产党》的政治报告，周恩来作了组织问题和军事问题的报告，刘伯承作了军事问题的补充报告。会议通过了政治、军事、组织等问题的决议案，选举了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这次大会肯定了中国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当时的革命依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指出了当时的政治形势是在两个革命高潮之间和革命发展的不平衡，党在当时的总任务不是进攻，不是组织起义，而是争取群众。会议在批判右倾机会主义的同时，特别指出了当时党内最主要的危险倾向是脱离群众的盲动主义、军事冒险主义和命令主义。这次大会的主要方面是正确的，但也有缺点和错误。它对于中间阶级的两面性和反动势力的内部矛盾缺乏正确的估计和适当的政策；对于大革命失败后党所需要的策略上的有秩序的退却，对于农村根据地的重要性和民主革命的长期性，也缺乏必要的认识。——第307页。

- 189 向忠发（一八七九——一九三一），湖北汉川人。一九二七年七月大革命失败后，任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一九二八年党的六大后，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一九三一年六月二十二日被捕叛变，二十四日被国民党枪杀。——第307页。
- 190 布哈林（一八八八——一九三八），一九〇六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十月革命后曾任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一九二九年十一月联共（布）中央全会决定撤销其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职务。一九三七年被开除党籍，次年被处死。——第307页。
- 191 陶里亚蒂（一八九三——一九六四），曾任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一九二八年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第307页。
- 192 米夫（一九〇一——一九三八），苏联人。一九二八年任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兼莫斯科中山大学校长。一九三〇年冬到上海任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在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上，由于他的支持，王明掌握了党的最高领导权。——第307页。
- 193 瞿秋白（一八九九——一九三五），江苏常州人。一九二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党的早期领导人之一。在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的紧要关头，主持召开八七会议。会后任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主持中央工作。一九二七年十一月至一九二八年四月犯过“左”倾盲动主义错误。一九三〇年九月主持召开党的六届三中全会，纠正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在一九三一年一月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上，受到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宗派主义

分子的打击，被排斥于党中央领导机关之外。此后，在上海同鲁迅合作从事革命文化运动。一九三四年到中央革命根据地，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教育人民委员。一九三五年二月从江西往福建转移途中被国民党逮捕，六月十八日在福建长汀就义。——第307页。

- 194 王明即陈绍禹（一九〇四——一九七四），安徽金寨人。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长江局书记。他是一九三一年一月党的六届四中全会至一九三五年一月遵义会议前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内“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主要代表。抗日战争初期，又犯了右倾投降主义错误。他长期拒绝党的批评和帮助。六十年代后堕落成为中国革命的叛徒。——第308、425页。

- 195 改组派是二十年代末期到三十年代初期国民党内部的一个派系。一九二七年七月武汉政府实行反共后，武汉汪精卫的国民党和南京蒋介石的国民党合流。后来，汪精卫、陈公博、顾孟余等不满蒋介石独揽权力，于一九二八年底在上海成立“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形成了国民党中的“改组派”。——第308页。

- 196 指一九三〇年共产国际东方部作出的《中国共产党的最近组织任务》、《中国共产党在职工运动中的任务（草案）》、《关于中国农民问题》、《关于中国苏维埃问题》、《关于中国苏区土地农民问题（草案）》、《关于中国苏维埃政权的经济政策（草案）》等六项决议案。——第308页。

- 197 何孟雄（一八九八——一九三一），湖南酃县人。中国早期北方职工运动的组织者之一，曾创建京绥铁路工会。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曾任中国共产党江苏省委员会委员、省委农民运动委员会秘书，抵制过李立三和王明的“左”倾错误。一九三一年在上海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牺牲于龙华。——第309页。

- 198 指一九三〇年党的六届三中全会以后王明写的《两条路线》。这是一本宣扬“左”倾教条主义的小册子，一九三一年二月在上海出版，一九三二年在莫斯科再版，书名改作《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第309页。

- 199 陈昌浩（一九〇六——一九六七），湖北汉阳人。当时任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委员。——第310页。

- 200 宁都会议是中共苏区中央局一九三二年十月在江西宁都召开的会议。这次会议错误地批评了毛泽东等提出的向敌人统治力量较弱、党和群众力量

较强的赣东北发展的正确主张，而要求红军去夺取中心城市，争取江西首先胜利。会后，调毛泽东做政府工作，接着又撤销了他的红军第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的职务。——第310页。

- 201 罗明，一九〇一年生，广东大埔人。一九三三年任中国共产党福建省代理书记时，认为党在闽西上杭、永定等边缘地区的条件比较困难，党的政策应当不同于根据地的巩固地区。当时党内“左”倾错误领导者把这种意见说成是“悲观失望的”、“机会主义的、取消主义的逃跑退却路线”，并开展了所谓“反对罗明路线的斗争”。——第310页。
- 202 邓指邓小平，一九〇四年生，四川广安人。当时任中共会（昌）、寻（乌）、安（远）中心县委书记。毛指毛泽覃（一九〇五——一九三五），湖南湘潭人。当时任苏区中央局秘书长。谢指谢唯俊（一九〇七——一九三五），湖南耒阳人。当时任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委员、江西省军区政治部主任、中共乐安中心县委书记等职。古指古柏（一九〇六——一九三五），江西寻乌人。当时任总前委秘书长、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委员等职。他们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执行正确的防御路线，被党内“左”倾错误领导者指斥为“罗明路线在江西的创造者”，受到了错误的打击。——第310页。
- 203 李德（一九〇〇——一九七四），又名华夫，德国人，原名奥托·布劳恩。一九三二年，受共产国际派遣来中国。一九三三年十月到中央革命根据地，担任中国共产党的军事顾问，实际上掌握红军的最高指挥权。第五次反“围剿”期间，他同当时党内“左”倾错误领导者在军事指挥上实行了一系列错误的战略战术，使红军受到重大损失。遵义会议前夕，他被取消了红军的最高指挥权。一九三九年，李德离开中国。——第310页。
- 204 博古即秦邦宪（一九〇七——一九四六），江苏无锡人。一九三一年九月至一九三五年一月，曾是中共临时中央主要负责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自一九三三年九月开始的第五次反“围剿”起，掌握了红军的最高领导权，在军事指挥上犯了一系列错误，使红军受到极大损失。遵义会议后，被撤销了红军的最高领导权。抗日战争初期，在党中央的长江局、南方局工作。一九四一年以后，在延安创办和主持《解放日报》和新华通讯社。一九四五年，在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继续当选为中央委员。一九四六年四月因飞机失事遇难。——第310页。
- 205 季米特洛夫（一八八二——一九四九），保加利亚人。一九二一年任工会国际中央理事会理事，一九三五年至一九四三年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总书

记。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回国后，任保加利亚共产党总书记和部长会议主席。——第311页。

- 206 西安事变也称“双十二事变”。在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中国，要把中国变为它的殖民地的危急形势下，以张学良将军为首的国民党东北军和以杨虎城将军为首的国民党第十七路军，在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全国人民抗日运动的影响和推动下，要求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蒋介石拒绝了这个要求，并亲自赶到西安积极部署“剿共”。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张、杨联合行动，在西安附近的临潼扣押了蒋介石，这就是著名的西安事变。事变发生后，国民党内以何应钦为首的亲日派准备乘机发动大规模内战，牺牲蒋介石以便取而代之。中国共产党坚持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并经过中共代表周恩来以及博古（秦邦宪）、叶剑英等的艰苦工作，终于同张学良、杨虎城等一道使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促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第311页。
- 207 第二次王明路线指抗日战争初期以王明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从苏联回国不久的王明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了《如何继续全国抗战与争取抗战胜利？》的报告，系统地提出了右倾投降主义的主张。随后，在任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时，又擅自发表一些包含有原则错误的意见、宣言、决议和文章。他相信国民党超过相信共产党，对国民党的反人民政策让步，不敢放手发动群众斗争，不敢放手发展人民军队，不敢在日本占领区扩大抗日根据地，主张“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将抗日战争的领导权送给国民党。由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已经在全党占统治地位，王明的这些错误只在部分地区一度得到推行。一九三八年九月至十一月，中共中央召开了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进一步确立了全党独立自主地领导抗日武装斗争的方针和政策。——第311页。
- 208 见《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543—548页。——第312页。
- 209 毛泽东这篇文章原题为《调查工作》，写于一九三〇年五月，一九六一年三月曾在中国共产党内印发。一九六四年收入《毛泽东著作选读》时，题目改为《反对本本主义》。——第313页。
- 210 “五风”指“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发生的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和对生产瞎指挥风。——第313页。
- 211 指毛泽东主席一九六一年五月六日在上海写给李井泉和陈正人的信（见

《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80—581页）。信中要求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在半个月內，下苦功去农村认真做调查研究工作。李井泉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陈正人当时任国务院农林办公室副主任、农业机械工业部部长，在四川作农村调查。——第314页。

- 212 《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规定：对农村中缺乏劳动力、生活没有依靠的鳏寡孤独的社员，生产队在生活上给以适当的照顾，做到保吃、保穿、保烧（燃料）、保教（儿童和少年）保葬。享受这“五保”的社员户，称为五保户。——第315页。
- 213 陈总即陈毅（一九〇一——一九七二），四川乐至人。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部长。一九六一年出席扩大的日内瓦会议，任中国政府代表团团长。——第315、329、399页。
- 214 日内瓦会议这里指一九六一年五月十六日至一九六二年七月二十三日举行的扩大的日内瓦会议。一九五四年日内瓦会议后，美国违反日内瓦协议，对老挝进行干涉和侵略，并在一九六〇年挑起老挝内战。为了和平解决老挝问题，中、苏、美、英、法、老挝、柬埔寨、越南民主共和国、南越（以上为一九五四年日内瓦会议参加者）、印度、缅甸、加拿大、波兰和泰国举行了这次会议。会议最后签署了《关于老挝中立的宣言》和《关于老挝中立的宣言的议定书》，确认尊重老挝的主权、独立、中立、统一、领土完整和不干涉其内政的原则。——第315页。
- 215 许明（一九一九——一九六六），河北沧县人。当时任国务院总理办公室副主任。——第315页。
- 216 嵯峨浩，一九一四年生，原籍日本，溥杰的夫人。——第316页。
- 217 溥杰即爱新觉罗·溥杰，一九〇七年生，清朝末代皇帝溥仪的胞弟。一九三〇年至一九四四年先后三次留学日本，曾任伪满宫廷侍从武官等职。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后被苏军俘虏，一九五〇年八月被移交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一九五九年十二月被特赦释放。后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专员、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第316、357页。
- 218 溥仪即爱新觉罗·溥仪（一九〇六——一九六七），清朝末代皇帝。一九一

二年中华民国建立后被迫退位。一九三二年任日本帝国主义一手策划的伪满洲国“执政”，一九三四年改称“满洲帝国皇帝”。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后被苏军俘虏，一九五〇年八月被移交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一九五九年十二月被特赦释放。一九六四年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第316、345页。

- 219 嵯峨尚子，日本人，嵯峨浩的母亲。——第316页。
- 220 宫下明治，日本人。一九四五年日本帝国主义投降以前，曾是清东陵守备队的守备人员。嵯峨尚子访华时，他是随行人员。——第316页。
- 221 嫣生是溥杰和嵯峨浩的女儿，已入日本籍。——第316页。
- 222 载涛（一八八七——一九七〇），清末曾任军谘大臣。一九六一年时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第317、357页。
- 223 西园寺即西园寺公一，一九〇六年生，日本政界元老西园寺公望公爵之孙。曾任日本参议员、《日曜新闻》编辑、维也纳世界和平理事会书记处书记。一九五八年至一九七〇年任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联络委员会副秘书长，常驻中国。——第317页。
- 224 千子即町田千子，嵯峨浩的妹妹。——第317页。
- 225 贝勒是清代皇室的封爵称号。清代的爵位分亲王、郡王、贝勒、贝子、国公、将军六级。——第317页。
- 226 “满洲国”是一九三一年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中国东北后扶植的傀儡政权。一九三二年三月在长春成立，一九三四年三月改称“满洲帝国”。一九四五年随着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而被摧毁。——第317页。
- 227 齐白石（一八六四——一九五七），湖南湘潭人，画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北京中国画院名誉院长、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第318页。
- 228 陈半丁（一八七六——一九七〇），浙江绍兴人，画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北京中国画院副院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第318页。
- 229 于非闇（一八八九——一九五九），北京人，画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中国画研究会副会长、北京中国画院副院长。——第318页。
- 230 贺龙（一八九六——一九六九），湖南桑植人。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

员、国务院副总理兼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第318页。

- 231 查理一世（一六〇〇——一六四九），英国斯图亚特王朝国王。一六四〇年爆发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一六四二年起他发动内战，两度战败。一六四九年被国会判处死刑。——第318页。
- 232 路易十六（一七五四——一七九三），法国国王。一七八九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爆发后，他表面上接受立宪政体，暗地勾结外敌，纠集王党，企图镇压革命。一七九二年被废黜，次年一月被处死。——第318页。
- 233 威廉二世（一八五九——一九四一），德意志帝国皇帝、普鲁士国王。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德国革命爆发后逃亡荷兰。——第319页。
- 234 埃及的王室指埃及法鲁克王朝。一九五二年七月二十三日埃及爆发了由自由军官组织发动的革命。二十六日国王法鲁克被废黜，当天他逃往国外。——第319页。
- 235 指溥仪的《我的前半生》一书。这本书溥杰曾帮助整理过。——第319页。
- 236 这里指一八九四年所发生的中日战争，也称甲午战争。见本书注34。——第321页。
- 237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驻在中国东北境内的关东军进攻沈阳。这次事件被称为九一八事变。随后，日军向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全面进犯。驻守沈阳和东北其他地方的中国军队，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的命令，使日军得以迅速占领了这三个省。——第321页。
- 238 大谷莹润（一八九〇——一九七三），曾任日本众议院议员、参议院议员、法务委员会委员。一九五三年起任中国人在日殉难者慰灵实行委员会委员长，一九六一年五月率领日本“中国殉难烈士名单捧持代表团”访问中国。——第321页。
- 239 土肥原即土肥原贤二（一八八三——一九四八），日本战犯。早年被派到中国进行特务活动。曾任日本在沈阳的特务机关长，参与策动日本侵占我国东北的九一八事变和策划建立伪满洲国的阴谋活动。其后任日本航空总监、驻新加坡的第七方面军司令官和日本军事训练总监。日本投降后被捕，一九四八年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处绞刑。——第321页。
- 240 冈村宁次（一八八四——一九六六），一九三二年任日本上海派遣军副参谋

长，参加侵犯上海的战争。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五年，历任日军侵华第十一军、华北方面军、第六方面军司令官和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在一九四五年八月延安公布的日本战犯名单中，被列为首要战犯。解放战争期间曾充当蒋介石的秘密军事顾问。一九四九年一月被国民党政府宣判“无罪”，释放回国。——第321页。

- 241 东条英机（一八八四——一九四八），日本战犯。九一八事变后历任日本关东军宪兵司令官、关东军参谋长。一九四〇年至一九四一年任日本陆军大臣，积极主张扩大侵华战争和准备对美英的战争。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四年担任内阁首相期间，发动了太平洋战争，使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的范围从中国扩大到太平洋和东南亚地区。日本投降后被捕，一九四八年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处绞刑。——第321页。
- 242 板垣征四郎（一八八五——一九四八），日本战犯。曾参与策动侵略中国的九一八事变，历任日本关东军参谋长、陆军大臣、中国派遣军参谋长、驻朝鲜日军司令官、驻新加坡的日本第七方面军司令官。日本投降后被捕，一九四八年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处绞刑。——第321页。
- 243 华族指除皇族外有爵位的日本贵族。——第322页。
- 244 远藤三郎，一八九三年生，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任日本关东军副参谋长、陆军航空本部总务部长。自五十年代起，曾多次访华。——第322页。
- 245 辻政信，一九〇二年生，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先后在我国东北、马来亚、菲律宾、缅甸、泰国指挥日本侵略军作战。战后曾当选为众议员和参议员。一九五七年曾来华访问。一九六一年四月由泰国至老挝考察途中失踪。——第322页。
- 246 高碕达之助（一八八五——一九六四），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任伪满洲国政府经济顾问、满洲重工业开发公司总裁。战后多次当选为众议员和参议员，并先后任国务大臣和通商产业大臣。他积极推进中日两国民间贸易，曾任日中综合贸易联合协议会会长，一九六二年同我国廖承志签订发展日中两国民间贸易的备忘录。——第322页。
- 247 久原房之助（一八六九——一九六五），曾任日本邮政大臣，政友会总裁。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作为日中邦交调整国民会议代表积极参加恢复中日邦交活动。一九五五年任日本“恢复日中、日苏邦交国民会议”会长，并率代表团访问我国。——第322页。

- 248 指一九五九年五月三日周恩来邀请文艺界中的部分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以及北京的一部分文艺界人士，在中南海紫光阁座谈时所作的《关于文化艺术工作两条腿走路的问题》的讲话。见周恩来《关于文艺工作的三次讲话》，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5页。——第324页。
- 249 指一九五七年开展的反对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斗争。一九五七年四月，中共中央决定在全党进行一次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进攻，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六月，党中央发出指示，决定对右派进攻实行反击。当时对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进攻进行反击是必要的，但在斗争中犯了严重的扩大化的错误。一九七八年，中共中央决定对被划为右派分子的人进行复查，把错划的改正过来。——第327、361页。
- 250 “五子登科”原指五代后周人窦禹钧五个儿子相继都考中进士（参见《宋史·窦仪传》）。这里借用这个词来说明当时在文艺工作中存在的套框子、抓辫子、挖根子、戴帽子、打棍子等错误做法。——第328页。
- 251 李维汉（一八九六——一九八四），湖南长沙人。当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他在一九六一年第十一期《红旗》杂志上发表了题为《统一战线是中国人民争取胜利的一个法宝》的文章。——第335页。
- 252 参见本书注297。——第335页。
- 253 周扬，一九〇八年生，湖南益阳人。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和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第336页。
- 254 “的笃班”是越剧形成初期的表演形式。它是清末在浙江嵊县一带的山歌小调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演唱时用竹节笃鼓、一副檀板伴奏，几个人帮腔伴唱。因角色从“的、笃”声中出场，所以有这个称呼。——第338页。
- 255 绍兴大班是绍剧的旧称，又称“绍兴乱弹”。明末清初形成于浙江绍兴，后流行于浙江、上海一带。——第338页。
- 256 陈云在一九五九年十一月至一九六一年六月对评弹和其他曲艺发表过多次谈话（现已收入《陈云同志关于评弹的谈话和通信》一书中），指出当时的曲艺创作和演出存在着强调了政治一面，忽略了文化娱乐一面的偏向。他还指出广大群众在劳动之后喜欢听一些轻松愉快的东西，思想教育的目的要通过艺术手段来达到。——第338页。

- 257 梅兰芳（一八九四——一九六一），原籍江苏泰州，生于北京，京剧表演艺术家，京剧“梅派”艺术的创立者。当时任中国京剧院院长、中国戏曲学院院长、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一九五九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第341页。
- 258 聂荣臻，一八九九年生，四川江津人。当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第342页。
- 259 太平天国时代指一八五一年至一八六四年洪秀全、杨秀清等人领导的反对清朝封建统治的农民革命战争的时代。——第344页。
- 260 章行老即章士钊（一八八一——一九七三），字行严，湖南长沙人。曾任北京大学教授、北洋政府司法总长兼教育总长等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第345页。
- 261 见《续资治通鉴长编·宋太祖开宝八年》。——第345页。
- 262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一八六三——一九三八），苏联演员、导演和戏剧理论家。著有《我的艺术生活》和《演员自我修养》等。他的戏剧理论概称为“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第348页。
- 263 魏征（五八〇——六四三），唐初政治家。唐太宗在位时，任谏议大夫和秘书监等职。他敢于直言进谏，说过：“兼听则明，偏信则暗。”——第349页。
- 264 在一九五八年开始的“大跃进”过程中，由于“左”倾思想的影响，曾把一些坚持实事求是、反对浮夸的人，以及一些所谓具有资产阶级学术观点的人都作为“右倾保守思想”的反面人物，作为“资产阶级白旗”加以批判、斗争甚至处分。当时把这种作法叫做“拔白旗”。一九六二年四月，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要求为在“拔白旗”、“反右倾”等运动中被错误地批判和处分的人进行甄别平反。——第350、400页。
- 265 郭老即郭沫若（一八九二——一九七八），四川乐山人。当时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国科学院院长等职。——第355、473页。
- 266 范文澜（一八九三——一九六九），浙江绍兴人。当时任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所长。——第355

- 267 我国封建社会传统教育以“天地君亲师”五者为人类至尊，所以并举表示崇敬的意思。——第356页。
- 268 无政府主义是十九世纪中叶出现于欧洲的一种小资产阶级思潮。主要代表人物有法国的蒲鲁东、俄国的巴枯宁和克鲁泡特金等。它否认任何国家和政权，否认任何权力和权威，鼓吹绝对自由、极端民主，主张建立一个“无命令、无权力、无服从、无制裁”的无政府状态的社会。“五四”时期，无政府主义思想在中国青年中曾有过较大的影响。一些地方先后出现了无政府主义的小团体。最初它们也表现过某些反帝反封建的意愿，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播，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一些曾经具有无政府主义思想的青年转而信奉科学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的团体则愈来愈趋于反动。——第356页。
- 269 觉悟社是一九一九年九月周恩来等在天津组织的进步青年学生团体。成员有邓颖超、郭隆真、马骏、刘清扬等二十余人。主要活动是出版《觉悟》杂志，讨论研究新思潮，抨击孔孟之道，积极领导青年学生的爱国运动，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一九二〇年冬，觉悟社社员分散各地，社的活动无形停顿。以后，它的主要成员大部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第356页。
- 270 邓颖超，一九〇四年生，河南光山人。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时，在天津和周恩来等一起组织觉悟社。下面引用邓颖超的一段话，是一九四九年她回答《中国青年》杂志记者提问时说的。参见一九四九年五月《中国青年》第七期上的邓颖超《五四运动的回忆》一文。——第356页。
- 271 基尔特社会主义也称行会社会主义（基尔特是英文“行会”一词的音译），是二十世纪初英国工人运动中出现的一种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潮。主要代表人物是潘蒂、柯尔等。他们主张一个社会应设立两个平行的组织：一个是由工人、工程师等按行业联合组成的产业基尔特，领导和管理生产，一个是作为消费者的组织的国家，负责产品分配和保证全民消费。他们幻想等到基尔特发展到包括全体人民时，就可以和平地代替资本主义国家，从而实现社会主义。——第357页。
- 272 费边社会主义是以英国费边社的主张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潮。费边社是英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一八八四年创立的团体，以善于等待时机、实行拖延缓进战术著称的古罗马统帅费边命名。其主要代表人物有维伯夫妇、肖伯纳等。他们以为用温和缓进的办法，通过细小的改良就能使资本主义制度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第357页。

- 273 刘清扬（一八九四——一九七七），天津人。一九二一年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脱离共产党。一九三一年后从事抗日救亡运动。一九四四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一九四八年进入华北解放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务委员、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副主席、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副会长。一九六一年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第357页。
- 274 张申府，一八九三年生，河北献县人。一九二〇年去法国、德国留学。一九二一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二四年任广东大学教授兼黄埔军校政治部副主任。一九二五年脱离共产党。一九四二年加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一九四四年改称中国民主同盟），任常务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北京图书馆研究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第357页。
- 275 罗素（一八七二——一九七〇），英国唯心主义哲学家、逻辑学家。一九二〇年至一九二一年曾来中国讲学，在旧中国学术界有相当影响。——第357页。
- 276 弗洛伊德（一八五六——一九三九），奥地利心理学家、精神分析学派创始人。——第357页。
- 277 爱因斯坦（一八七九——一九五五），犹太人，出生于德国乌尔姆城，是著名的物理学家。他创建的相对论是现代物理学的理论基础之一。——第357页。
- 278 沈衡老即沈钧儒（一八七五——一九六三），号衡山，浙江嘉兴人。清末曾考中进士。参加过辛亥革命和反对北洋军阀的斗争，后在上海任律师。抗战前组织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和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抗战期间，倡议组织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后改称中国民主同盟）。抗战胜利后，任中国人民救国会主席，积极参加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反对国民党的内战政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副委员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中国民主同盟中央主席。——第357页。
- 279 董老即董必武（一八八六——一九七五），湖北黄安（今红安）人。清末曾考中秀才。他早年是同盟会会员，参加了辛亥革命和反对北洋军阀的斗争。在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国五四运动之后，积极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建

- 工作，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一九六二年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第357页。
- 280 李根源（一八七九——一九六五），云南腾越（今腾冲）人。一九〇五年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后任云南省军政府军政部总长兼参议院议长，在一九一八年护法战争中被推为驻粤滇军总司令。一九二三年在北洋政府农商总长任内兼署过国务总理。——第358页。
- 281 胡适（一八九一——一九六二），安徽绩溪人。早年留学美国。一九一七年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宣扬实用主义哲学。五四新文化运动时，主张文学改革，提倡白话文。一九一九年七月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公开反对马克思主义。随后追随蒋介石，反对人民革命运动。一九三八年任国民党政府驻美国大使。一九四六年任北京大学校长。一九四九年去美国，后到台湾。——第358页。
- 282 见列宁《“关于用自由平等口号欺骗人民”出版序言》（《列宁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43—344页）。——第358页。
- 283 定股是指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公私合营时，对原来私营企业的资产和负债，根据公平合理、实事求是的原则，进行清理、估价，以核定私股股额。——第360页。
- 284 毛泽东在一九五七年四月三十日和民主党派负责人、无党派民主人士谈话中以及后来的一些场合讲到知识分子问题时，曾引用“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参见《左传·僖公十四年》）和“梁上君子”（参见《后汉书·陈寔传》）作比喻，说明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所依附的经济基础那几张旧“皮”已经不存在了，因此他们不能不依附在公有制这张新“皮”上，即站在无产阶级方面，而不能象“梁上君子”（原意指躲藏在梁上的小偷，这里是借用）那样，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第363页。
- 285 科学工作十四条即一九六一年六月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党组和中国科学院党组提出、同年七月中共中央批准试行的《关于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当前工作的十四条意见（草案）》。中央批准这个草案的批语中指出：“做好知识分子工作，很关紧要。”“近几年来，有不少的同志，在对待知识、对待知识分子的问题上，有一些片面的认识，简单粗暴的现象也有所滋长，必须引起严重的注意，以端正方向，正确地贯彻执行党的政策。”草案就正确理解对自然科学工作者的红与专的要求，正确贯彻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和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明确科学研究机构的根本任务（出成果，出人才），保持科学研究工作的相对稳定，保证科学研究工作的时间，改进研究机构中党的领导方法等问题，作出了一系列具体的政策规定。中央认为这个文件的精神对于一切有知识分子工作的部门和单位都是适用的。——第364、375页。

- 286 高等教育六十条指一九六一年九月中共中央原则批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全文共六十条。条例草案总结了一九五八年后三年多高等教育工作的经验和教训，针对当时学校教学质量降低，忽视知识分子作用以及劳动过多等主要问题，规定了高等学校必须以教学为主，努力提高教学质量；正确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做好总务工作，保证教学和生活的物质条件；以及改进党的领导方法和领导作风，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等。——第364、375页。
- 287 工矿企业七十条即一九六一年九月中共中央制定的《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全文共有七十条。一九五八年“大跃进”后，由于许多企业没有实行严格的责任制，不讲究经济核算，工资、奖励制度上存在平均主义，以及党委包揽企业的日常行政事务等等，相当普遍地出现了生产秩序混乱，瞎指挥、乱操作，设备损坏严重，经济效果很差等问题。针对这些情况，工业七十条草案明确规定了国营工业企业的性质和基本任务，要求建立和健全必要的责任制和各项规章制度，强调计划管理、按劳分配、企业经济效益和职工物质利益等项原则。这个条例草案的讨论和试行，对于总结国营工业企业管理工作的经验，贯彻执行当时提出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促进我国工业的恢复和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第364页。
- 288 文艺方面也提出了几个初稿，指《关于当前文学艺术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草案）》（简称“文艺八条”）的初稿及《关于剧（团）工作条例（修正草案）》（简称“剧（团）十条”）、《关于加强电影艺术片创作和生产领导的意见（草案）》（简称“电影三十二条”）从五十年代后期起，在政治、经济领域“左”倾错误的影响下，文艺工作也产生了不少缺点和错误，一些文艺领导部门、文艺工作单位和领导文艺工作的党员干部，没有正确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没有很好地贯彻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对一些文学创作和艺术活动进行了简单粗暴的批评、限制和不适当的干涉。为纠正这些偏向，在党中央以及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中共中央宣传部、文化部和全国文联作了大量调查研究工作，由中宣部起草了《关于当前文学艺术工作的意见（草

案》)(简称“文艺十条”),文化部起草了“剧院(团)十条”和“电影三十二条”。“文艺十条”经过充分讨论修改,最后改定为“文艺八条”,于一九六二年四月三十日由中共中央批转,以文化部党组和全国文联党组名义正式下达全国。文艺八条的主要内容是:进一步贯彻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努力提高创作质量;批判地继承民族文化遗产和吸收外国文化;正确地开展文艺批评;保证创作时间,注意劳逸结合;培养优秀人才,奖励优秀创作,加强团结,继续改造,改进领导方法和领导作风。“剧院(团)十条”和“电影三十二条”没有形成正式文件,只作为草案,分别于一九六一年八月八日和十一月十三日印发各省、市、自治区文化局及有关艺术单位征求意见并先予试行。这三个文艺文件的贯彻,对促进我国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繁荣和健康发展起了积极作用。——第364页。

289 参见本书注297。——第370页。

290 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六十条指一九六一年三月中共中央制定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全文共六十条。条例草案针对人民公社内部严重存在的队与队、社员与社员之间的平均主义,在纠正社、队规模偏大,公社对下级管得太多太死,民主制度和经营管理制度不健全等方面,作了比较系统的规定。同年五六月间,中共中央又对这个草案作了修改,制定了供讨论和试行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进一步规定取消分配上的供给制部分,停办公共食堂。一九六二年九月二十七日,中共八届十中全会正式通过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人民公社六十条的贯彻执行,对恢复农村经济起了重要的作用。——第373、434页。

291 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参见本书注287。手工业工作条例草案指一九六一年六月中共中央制定的《关于城乡手工业若干政策问题的规定(试行草案)》,全文共三十五条。一九五八年“大跃进”后,由于手工业盲目过渡到国营工业和公社工业,并改变生产方向,造成大批手工业者改行转业,许多日用小商品减产、停产,供应十分紧张。针对这种情况,草案规定我国手工业应有全民、集体和个体三种所有制,以集体所有制为主;手工业者必须归队;生产经营方式要灵活多样;工资制度应贯彻执行“按劳分配,多劳多得”原则,以及供产销要统筹安排等。——第373页。

292 为了加强对物资的管理,做好物资供需的平衡,保证经济建设的顺利进行和市场稳定,国家按各种物资对国计民生的重要程度,分三类管理,即由国

家统一分配的物资、中央各主管部门分配的物资和地方管理的物资。根据商品对国计民生的重要程度，国家把商品也分一、二、三类管理。地方管理的物资和第三类商品称三类物资。这类物资品种繁多，生产分散，使用面广，主要是通过市场调节产、供、销之间的关系。——第382页。

- 293 “六条标准”是毛泽东在一九五七年《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提出的。原文是：“在我国人民的政治生活中，应当怎样来判断我们的言论和行动的是非呢？我们以为，根据我国的宪法的原则，根据我国最大多数人民的意志和我国各党派历次宣布的共同的政治主张，这种标准可以大致规定如下：（一）有利于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而不是分裂人民；（二）有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而不是不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三）有利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专政；（四）有利于巩固民主集中制，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制度；（五）有利于巩固共产党的领导，而不是摆脱或者削弱这种领导；（六）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国际团结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国际团结，而不是有损于这些团结。这六条标准中，最重要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两条。”——第389页。
- 294 胡先骕（一八九四——一九六八），江西新建人，植物学家。当时是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应邀列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第390页。
- 295 张际春（一九〇〇——一九六八），湖南宜章人。当时任国务院文教办公室主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第400页。
- 296 这里指一九六二年一月十一日至二月七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中央、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及地委、县委、重要厂矿企业党委和部队的负责干部共七千多人，所以又称七千人大会。会上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所作的报告，初步总结了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以来工作中的经验和教训，分析了工作中的主要缺点错误，指出全党当时的主要任务是做好调整工作。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着重指出要健全民主集中制，在党内、党外充分发扬民主；要在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的基础上，加深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对前几年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毛泽东承担了责任，作了自我批评。——第403页。
- 297 三面红旗指“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一九五八年五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通过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要求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普遍

- 愿望，但是忽视了客观的经济规律。在总路线提出后，没有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和试点，就轻率地在全国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打乱了正常的经济建设秩序，浪费了巨大的人力和资源，造成了国民经济比例的严重失调。这是我国国民经济在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发生严重困难的主要原因。当时由于党还没有从根本的指导思想上总结经验教训，所以党的文件中都还使用“高举三面红旗”的提法。——第403页。
- 298 指一九六二年二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三日在北京中南海西楼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刘少奇主持了这次会议。会议讨论了财政、金融、市场以及整个经济形势的问题，认为当时财政经济的困难很严重，估计当年的国家预算有很大的赤字。陈云在会上作了关于目前财政经济情况和克服困难的若干办法的讲话。会议一致同意陈云讲话的精神，认为在国民经济的调整阶段主要是恢复经济，要全党集中力量增加农业生产和日用品生产，保证市场供应，制止通货膨胀，坚决缩短基本建设战线。这次会议对扭转当时财政经济状况的被动局面起了重要作用。——第405页。
- 299 姚依林，一九一七年生，安徽贵池人。当时任商业部部长、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副主任。——第406页。
- 300 雷锋（一九四〇——一九六二），湖南长沙县简家塘（今属望城）人。一九六〇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六一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部队工程兵某部运输连班长。一九六二年因公殉职。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在毛泽东思想哺育下成长起来的卓越的共产主义战士。一九六三年三月五日，毛泽东发出“向雷锋同志学习”的号召，随后在全国广泛开展了学习雷锋的群众运动。——第417页。
- 301 指一九六三年三月一日中共中央发布的《关于厉行增产节约和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运动的指示》。——第422页。
- 302 指毛泽东一九六三年五月在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即前十条）中写的一段话。一九六五年收入《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时，题为《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第423页。
- 303 马歇尔（一八八〇——一九五九），美国民主党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任美国陆军参谋长。一九四五年十二月被美国总统杜鲁门派任驻华特

- 使，一九四六年一月同国民党代表张群（后为张治中）、共产党代表周恩来组成军事三人小组，他以“调处”为名，参与国共谈判，力图维护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地位。一九四六年八月宣布“调处”失败，不久返回美国。——第424页。
- 304 廖鲁言（一九一三——一九七二），江苏南京人。一九六三年时是农业部部长。——第424页。
- 305 高岗（一九〇五——一九五四），陕西横山人。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一九五三年调中央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后，积极进行反党分裂活动。一九五四年被揭露。一九五五年三月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通过决议，开除他的党籍。——第425页。
- 306 指当时国务院总理、副总理及国务院七十三个直属机关的主要领导干部。——第426页。
- 307 一九六〇年黄河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大坝建成蓄水后，发现泥沙淤积严重，威胁上游一些地方及水库本身的安全。为了增加枢纽工程的泄流排沙能力，减轻水库淤积，有关部门提议：在大坝左岸打两条泄流排沙隧洞，把八条发电引水管管中的四条改成泄流排沙道。这就是后来被批准实施的二洞四管方案。——第436页。
- 308 从“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起的这一段话是毛泽东在修改周恩来这个报告的草稿时增写的。——第441页。
- 309 林大夫即林巧稚（一九〇一——一九八三），福建厦门人，妇产科专家。当时任中国医学科学院副院长、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第443页。
- 310 傅连璋（一八九四——一九六八），福建长汀人。当时任卫生部副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卫生部副部长、中华医学会会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第443页。
- 311 蒲辅周（一八八八——一九七五），四川梓潼人。当时任中医研究院副院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第445页。
- 312 一九六二年十一月，周恩来在一次会议上谈到林业问题时提出：“林业的经营一定要越伐越多，越多越伐，青山常在，永续作业。”后来，他这一思想发展为以营林为基础，采育结合，实现青山常在，永续利用，越采越多，越采越好的林业建设的指导思想。——第446页。

- 313 四旁指村旁、宅旁、路旁、水旁。——第446页。
- 314 从六十年代初起，周恩来针对林业生产中重采伐、轻育林的错误作法多次指出，长此下去，林业生产在几十年后就要出现生产中断的危险，我们将会犯“吃祖宗饭、造子孙孽”的历史错误。——第446页。
- 315 梁老指梁希（一八八三——一九五八），浙江吴兴（今湖州）人，林学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林业部部长。——第446页。
- 316 前方指林区和林业生产第一线，后方指林业的领导机关。——第447页。
- 317 北方八省是指长江以北的河南、山东、河北、山西、陕西以及湖北、安徽、江苏等省。——第447页。
- 318 宋庆龄（一八九三——一九八一），广东文昌人。当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郭沫若（一八九二——一九七八），四川乐山人。当时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国科学院院长。章士钊（一八八一——一九七三），湖南长沙人。当时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程潜（一八八二——一九六八），湖南醴陵人。当时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副主席。何香凝（一八七八——一九七二），广东南海人。当时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主席、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名誉主席。傅作义（一八九五——一九七四），山西临猗人。当时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水利电力部部长。张治中（一八九〇——一九六九），安徽巢县人。当时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副主席。邵力子（一八八二——一九六七），浙江绍兴人。当时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务委员。蒋光鼐（一八八七——一九六七），广东东莞人。当时任纺织工业部部长、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务委员。蔡廷锴（一八九二——一九六八），广东罗定人。当时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副主席。沙千里（一九〇一——一九八二），上海人。当时任粮食部部长、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副主任委员。张奚若（一八八九——一九七三），陕西朝邑（今大荔）

人。当时任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主任、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会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第450页。

319 这里所说的副委员长，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副主席，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政副，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国副，指国务院副总理；两高，指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和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第451页。

320 李宗仁（一八九一——一九六九），广西临桂人，原为国民党桂系首领。一九四八年四月任国民党政府副总统，一九四九年一月任代总统。国民党政权崩溃后去美国。一九六五年七月回到北京。——第451页。

321 指宋庆龄和她的弟弟宋子文、宋子良、宋子安及姐姐宋蔼龄、妹妹宋美龄。——第451页。

322 李葆华，一九〇九年生，河北乐亭人。当时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第452页。

323 李任之（一九一九——一九八三），广东东莞人。当时任中共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安徽省副省长。——第452页。

324 陶铸（一九〇八——一九六九），湖南祁阳人。一九六六年十一月时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后遭受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迫害，一九六七年一月起被监禁。——第452、454页。

325 刘澜涛，一九一〇年生，陕西米脂人。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一九三一年，刘澜涛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判刑后监禁在北平军人反省院。一九三六年，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高涨的形势下，中共中央北方局为了开展工作，解决缺乏干部的问题，报请党中央批准，决定被捕同志履行手续后出反省院。这样出反省院的共有刘澜涛等六十一人。对此，中央早已有过结论，没有当作问题。“文化大革命”初期，康生、江青伙同林彪等人为了篡党夺权的需要，到处支持一些学校的红卫兵组织揪斗这批老党员。一九六七年三月中共中央发出文件，错误地将这六十一人定为“叛徒集团”“粉碎”“四人帮”后，一九七八年中共中央为这一大错案进行了平反。——第452页。

326 九大即一九六九年四月一日至二十四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会议使“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实践合法化，加强了林彪、江青、康生等人在党中央的地位，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指导方针都是错误的。——第453、464页。

- 327 王恩茂，一九一三年生，江西永新人。当时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新疆军区第一政治委员。——第453页。
- 328 徐海东（一九〇〇——一九七〇），湖北大悟人。曾任红二十五军军长、红十五军团军团长。一九六九年时是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中央军委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委员。——第453页。
- 329 邓初民（一八八九——一九八一），湖北石首人。当时任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副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第454页。
- 330 华罗庚，一九一〇年生，江苏金坛人，数学家。当时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副校长、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第455页。
- 331 西尧即刘西尧，一九一六年生，湖南长沙人。一九七〇年时是周恩来总理派往中国科学院的联络员，一九七二年时是国务院科教组组长。——第455、473页。
- 332 “文化大革命”期间，在“左”的思想指导下，以贯彻一九六六年五月七日毛泽东给林彪的信中关于党政机关干部也要学农、学工的指示为名，把干部集中下放劳动的场所称为“五七”干校。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利用它对一大批干部进行劳动惩罚和迫害。粉碎“四人帮”后，各地“五七”干校陆续停办。——第455、472页。
- 333 张霖之（一九〇八——一九六七），河北南宫人。一九五七年起，任煤炭工业部部长。“文化大革命”期间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迫害致死。——第455页。
- 334 指当时根据中共中央通知派往北京矿业学院领导该校工作的“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第455页。
- 335 戚本禹，一九三一年生，山东威海人。“文化大革命”初期是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员，积极参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犯罪活动。一九六八年一月十三日被关押。一九八三年十一月，因反革命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八年，剥夺政治权利四年。——第455页。
- 336 刘建章，一九一〇年生，河北景县人。一九五四年起任铁道部副部长，“文化大革命”期间遭受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迫害，被关押。——第456页。

- 337 先念即李先念，一九〇九年生，湖北黄安（今红安）人。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第456、460页。
- 338 登奎即纪登奎，一九二三年生，山西武乡人。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第456页。
- 339 肖华，一九一六年生，江西兴国人。一九六四年起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因受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迫害，一九六七年十二月至一九七四年国庆节前夕被关押。——第457、460页。
- 340 李力群，一九二一年生，江苏宿迁人。当时是国务院科教组工作人员。——第457页。
- 341 侯宝林，一九一七年生，北京人，相声表演艺术家。“文化大革命”期间遭受迫害，被批判、斗争。——第457页。
- 342 商震（一八八七——一九七八），浙江绍兴人，国民党元老。抗战胜利后，由于不满蒋介石的卖国内战政策和反动统治，一九四九年辞去了国民党政府驻日本代表团团长的职务，留居日本。一九七四年九月正在国内参观访问。——第457页。
- 343 刘志坚，一九一二年生，湖南平江人。一九五七年起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文化大革命”期间遭受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迫害，一九六七年一月至一九七四年国庆节前夕被关押。——第457页。
- 344 齐燕铭（一九〇七——一九七八），北京人。一九六〇年起任文化部副部长、文化部部长。期间遭受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迫害，一九六六年夏至一九七四年国庆节前夕被隔离审查。——第457页。
- 345 卫立煌（一八九六——一九六〇），安徽合肥人，原国民党将领。一九四八年任国民党军东北“剿总”司令，因在辽沈战役中没有积极执行蒋介石的“反攻”命令，被软禁于南京。一九四九年获释后去香港。一九五五年三月回北京，后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务委员。——第457页。
- 346 张学铭（一九〇六——一九八三），辽宁海城人，张学良的胞弟。曾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文化大革命”期间遭受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迫害，一九六八年至一九七三年被关押。——第457页。
- 347 张学良，一九〇一年生，辽宁海城人，东北军爱国将领。一九三六年十二月

任国民党军西北“剿总”副司令时和国民党第十七路军总指挥杨虎城一起发动西安事变，要求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后被蒋介石长期扣押。——第457页。

- 348 张学思（一九一六——一九七〇），辽宁海城人，张学良的胞弟。曾任辽宁省人民政府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司令部参谋长等职。“文化大革命”期间遭受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迫害，一九六七年起被关押。——第457页。
- 349 吕案解案即吕正操专案和解方专案。这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为了篡党夺权，残酷迫害曾在东北军和东北各界工作过的吕正操、解方、刘澜波、张学思、万毅、阎宝航、高崇民、贾陶等人而蓄谋制造的一个所谓“东北叛党集团”的假案。一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和民主人士曾受到株连。一九七八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这个案件得到彻底平反。——第457页。
- 350 廖志高，一九一三年生，四川冕宁人。当时任中共四川省委第一书记。——第459页。
- 351 富春即李富春（一九〇〇——一九七五），湖南长沙人。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第460页。
- 352 剑英即叶剑英，一八九七年生，广东梅县人。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第460页。
- 353 成武即杨成武，一九一四年生，福建长汀人。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副总参谋长、代总参谋长。——第460页。
- 354 谷牧，一九一四年生，山东荣成人。当时任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主任。——第460页。
- 355 秋里即余秋里，一九一四年生，江西吉安人。一九六七年时是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一九七二年时是中共中央委员、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第460、463页。
- 356 支左指在“文化大革命”中派人民解放军支持当时被称为左派群众的人们，是“三支两军（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的一个方面。这在当时的混乱情况下对稳定局势起了积极的作用，但也带来了一些消极的后果。——第460页。
- 357 《六六通令》指一九六七年六月六日颁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

中央文革小组通令》。——第461页。

- 358 长汽、二汽、重汽、南汽指第一汽车制造厂（在吉林长春）、第二汽车制造厂（在湖北十堰）、重庆汽车分公司和南京汽车制造厂。——第463页。
- 359 指“九一三事件”。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凌晨林彪乘飞机外逃叛国，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第463页。
- 360 地方五小工业是我国地方小型厂矿的统称。六十年代一般是指小钢铁厂、小煤矿、小电站、小化肥厂、小机械厂，后来又包括小水泥厂等。——第464页。
- 361 四个一样是对当时在分配方面的平均主义做法的概括说法，即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会干不会干一个样，干与不干一个样。——第465页。
- 362 王云五（一八八八——一九七九），原籍广东中山，生于上海。他首先将四角号码检字法运用于字典。一九四六年后曾任国民党政府经济部部长、财政部部长、行政院副院长等职。一九四九年去香港，一九五一年到台湾。——第467页。
- 363 普列汉诺夫（一八五六——一九一八），前期是俄国马克思主义宣传家。一八八三年创建俄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团体“劳动解放社”。翻译和介绍了许多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并先后发表《社会主义与政治斗争》、《我们的意见分歧》、《论一元论历史观的发展》、《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等论著，为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传播起了重大作用。一九〇三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后，逐渐转向孟什维克，后成为第二国际机会主义的首领之一。——第471页。
- 364 剑、春、德指叶剑英、张春桥、李德生。叶剑英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主持军委办公会议。张春桥、李德生当时是军委办公会议的成员。——第472页。
- 365 文裕即张文裕，一九一〇年生，福建惠安人。当时任第二机械工业部四〇一所副所长。——第473页。
- 366 指一九七二年八月十八日第二机械工业部四〇一所一部张文裕等十八位科学工作者写给周恩来总理的信。这封信反映了我国高能物理研究的情况，提出了发展高能物理研究的建议。——第473页。
- 367 指物理学家萨拉姆教授，当时是巴基斯坦总统科学顾问。一九七二年九月

五日，周恩来在和他谈话中，强调了自然科学理论研究工作的重要性。——第473页。

368 指一九七二年四月四日第二机械工业部四〇一所一部提出的关于发展高能物理方向任务的请示报告。——第473页。

369 朱光亚，一九二四年生，湖北武汉人。当时任国防科委副主任。——第473页。

370 中国方面提出的中日复交三原则是：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二、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三、“日台条约”是非法的、无效的，应予废除。——第478页。